



中華帝國
 蔡東杰 著
 TSAI TUNG
 -CHIEH

傳統天下觀與當代世界秩序
 從宏觀敘事重構兩千年中國史
 探求東方帝國之前世今生

中國
 三部曲
 I

CHINESE EMPIRE
 Tianxia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 of Modern World Order



中華帝國
 TSATUNG
 CHIH
 蔡東杰 著

傳統天下觀與當代世界秩序

從宏觀敘事重構兩千年中國史
 探求東方帝國之前世今生

中國
 三部曲
 I

CHINESE EMPIRE

Tianxia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 of Modern World Order

作者簡介

蔡東杰 TSAI TUNG-CHIEH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酷喜讀史，長期聚焦於破除因各種中心觀所致之視野偏狹，迄今著作甚豐，除十餘冊關於外交史與東亞研究學術專書、與上百篇文章散見各主要學術期刊外，近年來並致力以深入淺出文筆，在歷史、論述與群眾間搭構理性之對話橋梁，普獲好評肯定。

重要概念性名詞解釋

中華（Chinese）：指稱以「中國本部」作為地理與歷史基礎之綜合政治勢力。

天下（Tianxia）：在中國傳統概念中，具單一性質之絕對地理空間，由於近似當代之「世界」概念，也因後者目前受普遍運用，因此本書部分行文也採取「世界 = 天下」用法。

世界（world）：中文「世界」一詞源自佛教用語，意義等同「宇宙」，亦即無限之時間與空間總和，英文world原指特定人群已知且可到達之地理環境，最初為可數概念，亦即可能存在並立但彼此互動有限之幾個獨立運作但彼此區隔的世界。但近期在全球化下用法趨於單一性，由於目前只有「一個世界」，其意義乃接近天下。

帝國（empire）：在特定地緣環境下的「世界 = 國際體系」中，除擁有絕對不對稱之權力外，同時可透過制度化途徑影響體系秩序之單一政治實體。本書認定在中國歷史當中，只有秦漢、隋唐、清等三個時期符合此一定義。

帝國體系（imperial system）：擁有帝國實體並由其主導之層級性國際體系，包括核心（帝國政權本身）與附庸（帝國核心投射能力所及之周邊地區）兩部分。

世界秩序（world order）：其嚴格定義乃由帝國維持之體系穩定狀態，亦為帝國提供之最主要公共財，但廣義上有時亦泛指某種「秩序現狀」。

帝制（imperial institution）：在中國歷史當中，統治者自稱「皇帝」之朝代階段，但擁有皇帝頭銜並不能自動完成帝國建構。

中國三部曲：序

中國與歐洲的交匯，不只對雙方來說，對世界史而言也絕對是一件大事。

在沒有航空器提供快速運輸途徑，也沒有人造衛星可俯瞰地球，將世界各區域一覽無遺之前，位於歐亞大陸兩側的中國與歐洲，彼此幾乎隔著永遠不可能觸及對方之遙遠距離。儘管如此，早自西元前二世紀起，一條在一八七七年後才被德國探險家李希霍芬定名為「絲路」（Silk Road），穿越草原、沙礫、綠洲與荒漠的無名路徑，便以今日的西安作為起點，極其艱辛且充滿冒險犯難精神地慢慢向西延伸過去。與如今常見道路完全不同，這條跨國大道多數未經人工整理、沒有指標與里程碑，更因缺乏有效管理以致不斷重蹈「公共財悲劇」，在搭便車者與若干刻意破壞份子之威脅下，時斷時續，但在貿易商超人意志與貪婪動機堅持下，路徑末端最終觸及地中海東岸，包括大馬士革、君士坦丁堡以及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等地。

橫亙大陸走了七千多公里路，終究僅到了歐洲家門口，還差一步之遙。

與最初常識不同，後來人們發現，經歷超過一千年以上演化，所謂絲路早就超越一開始的路徑與規模，除了陸上通道之外，從西太平洋緣海穿越麻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直抵非洲東岸，商人不但將絲路展延至陸地外圍，甚至建構起一個涵蓋整個歐亞大陸之海陸貿易網路；這個網路在十三世紀末「蒙古時代」中臻於高峰，至於鄭和在一四一三年第四次遠航時抵達肯亞，則迎來了最後一波高潮。其後，隨著明朝轉而採取戰略收縮政策，草原蒙古勢力逐漸式微，

蒙兀兒帝國主要侷限在次大陸北部，主導伊斯蘭世界的鄂圖曼帝國聚焦於突破基督徒的東歐防禦線，支援絲路之動能也日益下降。

在鄭和死於一四三三年第七次遠航途中之後，中國的海外活動雖輒然而止，幾乎就在同時，位於歐亞大陸另一端邊陲之蕞爾小國葡萄牙，卻啟動了海上探險事業，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奮鬥，達伽馬船隊在一四九八年繞過好望角，筆直朝向印度航去，從而掀開了歐亞大陸東西方關係的歷史新頁。

一五〇五年二月二十七日，頂著一大堆頭銜自封為「蒙上帝洪恩，大海此岸的葡萄牙與阿爾加維國王，大海彼岸的非洲之王，幾內亞領主，衣索比亞、阿拉伯半島、波斯與印度的征服、航海與貿易之王」的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發下一道敕令，要求其遠征隊在印度建立一個永久性帝國，並以此控制整個印度洋的貿易。關於這個國家的雄心壯志與豐功偉業，在此就不多提了，重點是，隨著海上戰火持續蔓延與香料貿易之強烈誘惑，葡萄牙人乃橫渡孟加拉灣，然後從安達曼海南下前往馬六甲；一五〇九年，繼兩百年以前的馬可波羅，歐洲人再度於此和中國人相遇。一五一三年，鄭和船隊抵達肯亞的一百年後，馬六甲要塞司令布里托派出一支船隊，成為首批抵達中國的歐洲人；四年之後，身兼藥劑師、作家與航海家身分的皮萊茲，則是近代以來西方第一個進到中國內地的官方使者，甚至曾到北京覲見明武宗。雖然葡萄牙最終未能與明朝建立關係，一五五三年占領之澳門，仍成為它在此後四百四十六年間，經營亞洲的重要據點。

話說回來，葡萄牙人來到亞洲，雖是中國與歐洲互動的一個關鍵時刻，實際上對雙方當下歷史進程影響有限。直到三個世紀後，隨著歐洲挾工業革命提供之新能量，再度推動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其結果既徹底顛覆了雙方在全球結構中的相對位置，亦帶來迄今人類或已無可逆轉的發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中國從原先居於睥睨天下自視甚高之帝國寶座，一度苟延殘喘於滿目瘡痍、瀕臨存亡之邊緣，近期則因其「再崛起」跡象而受到普遍關注：究

竟中國在過去數百年的大轉型中扮演著何種角色？影響其應對策略與興衰起伏之主要因素何在？我們該如何去重新審視中國與整個世界之交流互動？又應如何去預測判斷中國的下一步作法？甚至藉此分析並預測世界秩序內涵之未來走向？

前述之一連串問題既充滿思考趣味，也具高度研究價值，進入新世紀以來，更吸引無數人加入討論行列。在此，一方面不希望落入以管窺豹之窠臼，亦期盼能拉開足夠歷史縱深，從愈發宏觀視野來捕捉完整之發展輪廓，個人嘗試透過「三部曲」之寫作設計，由遠而近來進行討論。在第一部中，主要先回到中國歷史本身，從西元前二二一年奠下之帝國框架雛型，以及其中最具代表性之若干個案，以長達兩千年之歷史長河作為背景，設法歸納並抽離出中國傳統之內、外政策原則。接著，在第二部中，則延續前述中國與歐洲之間，最初雖僅短暫有限交集，終究各自埋下關鍵性伏筆之歷程，描述雙方自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之碰撞，及其激發出之正負火花。最後，第三部試圖聚焦自二十世紀初迄今，在整整一百年當中，中國如何面對沉重之外部環境壓力，與既有世界結構和秩序之間如何妥協互動，又如何以過去四十年來經濟發展累積之能量，影響自己與全球之未來發展。

總的來說，個人雖希冀透過「兩千年、四百年、一百年」之視野釐清與轉換，逐步將目光聚焦至當下與可能之未來，但如同牛頓的名言「如果我能看得更遠，那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這一系列思考與書寫當中，也將努力汲取前人積累之智慧與思想啟發，並期盼以此拋磚引玉，讓更多人能正面理性地觀察此一問題。

是為序。

蔡東杰

二〇一九年己亥暮春

於台中抱樸齋







引言與綱要

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經濟改革政策正面進展所提供的市場潛在性，不僅引發了一股「中國熱」（China Fever），對於其未來前景之不同關注，亦跟著帶來「中國崛起」（China Rise）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等相異論調。甚至進入新世紀後，由於某種挑戰美國既存霸權之邏輯可能性，關於「美中開戰」之各種場景想像，十餘年來更眾說紛紛、不曾休止。問題是，相較於美國與西方之想法，本即因身為主流而為各方熟稔，中國研究則雖也有其源流脈絡，畢竟對於它將如何可能影響世界秩序之未來，過去並非討論重點，也是目前應強化補白之處。

再次從中國出發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隨著「中國崛起」（China Rising）態勢愈發明顯，其政經影響力亦逐漸外溢，隱然佔據了無可忽視之國際地位，關於其未來政策將如何發展？影響其決策內容之主要變數來源為何？我們該從何種角度或基礎去進行觀察？是否能找到觀察甚或預測中國未來走向之有意義途徑？這一連串問題不但引發眾人關注，也為中國研究學界帶來長期聚訟不休之爭辯。

中國威脅論之浮現 當然，推動中國研究之主要動力，除了學術興趣與商業機會，更多也更重要的或許是源自某種「威脅感」之敵意。

雖然作為一九七〇年代美中關係正常化主要推手，季辛吉早就提出警告說：[\(註1\)](#)「一旦中國足夠強大，不再仰賴他國，便可能隨時拋棄我們；只要被認為是符合其利益，不久之後，中國甚至可能與我們為敵。」其後，隨著中國經濟以奇蹟式速度成長並進行追趕，尤其因台灣民主化運動牽動兩岸關係，在一九九五年引發一次飛彈危機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也正式登場。[\(註2\)](#)即便時至今日，美中軍事能力一般認為仍存在相當差距，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Munro)仍以媒體人之敏感度與慣性誇飾，從政權本質與意識形態差異切入，早在一九九七年便試圖論述某種美國「與中國即將到來的衝突」，強調「這兩個國家關係緊繃，利益相互衝突，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成為對手」；由此醞釀至二〇〇〇年左右，類似觀點愈發甚囂塵上，例如格茨(Bill Gertz)便接續前述觀點，一方面以法西斯納粹與冷戰為例，強調民主與極權國家必然之「勢不兩立」，並藉此提醒美國政府注意有著「槍桿子出政權」傳統的中國，至於毛思迪(Steven Mosher)則嘗試說服眾人，「身為霸主(Hegemon)是中國夢寐以求的國家定位，這發軔於其民族認同，與其對國運之詮釋息息相關，更根植於它曾經身為亞洲支配性強權的歷史，以及中國人對自身文化優越感之堅定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前述主要來自媒體界之喧囂，美國主流學界與政策智庫雖同樣關心中國發展之未來(及其對美國利益之潛在影響)，態度顯然謹慎保守許多，即便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積極推動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戰略，一般公認具有圍堵中國之意圖，畢竟雙方還維持著內張外弛、鬥而不破之態勢。直到非傳統之商人川普陡然上台，終於在二〇一八年以「貿易戰」揭開了新階段衝突序幕。

無論做為西方代表之美國政府乃至學界，如何看待這波美中衝突之內涵，是否意味著長期以來關於「中國威脅」之爭辯終究獲致定論，身為重要當事人，中國之反應既同樣眾所矚目，藉由更客觀理

性地瞭解中國之過去與當下，以便預測其未來可能作為，自為當務之急。

中國歷史的他者視野 要「認定」中國是個威脅，或許不難，但想真正瞭解中國，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自西元前四八一年（西周共和元年）迄今相近三千年間，中國擁有舉世無匹之連續性歷史記載，堪稱跨度空前且資料確實浩瀚無垠，畢竟長期以來本土史學方法進展有限，何況政治斧鑿痕跡處處可見，所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者寥寥可數，想在「斷爛朝報」中穿透各種有意偽造與意識迷霧並發掘真相，自然難上加難。

若此，想深入剖析中國的話，該怎麼辦呢？

我們或許可暫時將目光轉向一五九二年。這一年是哥倫布「發現」美洲後第一百週年，中國為明朝萬曆二十年，在朝鮮王朝則恰為太祖李成桂建國後滿兩百年。該年農曆四月十三日，豐臣秀吉率領日軍以「蔽海而來」之勢，對半島發動大規模閃擊戰，短短不到三週便攻佔了首都漢城，被迫棄城而去的國王李昞先逃到平壤，六月初又再度撤往鴨綠江畔平安道的義州。此時，朝鮮國土淪陷已十有其九，滅國迫在眼前。

儘管自日軍登陸後，「請援之使」早就「絡繹於途」，李昞仍在八月正式派出使節團請求明朝支援。對朝鮮而言，這趟旅程絕不陌生。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作為明朝最忠誠之附庸藩屬國家，朝鮮每年均按例向中國派出冬至使、朝正使、聖節使與千秋使等四次使團，從漢城沿陸路出發，途經平壤、義州、鴨綠江、鳳凰城、山海關、通州，約花五十至六十日抵達北京，然後在此停留四十日，由於頻率相當密集，這也意謂他們返程時必然與下個使節團錯身而過。此次由於軍情緊急，又因從義州出發，僅僅費時二十五天便抵

達北京，至於明朝也隨即「慨然」同意支援已在滅亡邊緣的朝鮮，[\(註3\)](#)即便最終付出了極慘重的政治代價。[\(註4\)](#)

值得注意的是，朝鮮非但是與中國關係最密切之鄰國，從某個角度來看，或許亦是最瞭解中國的一個周邊國家。

朝鮮不僅作為忠誠藩屬，也是中國典章制度的熱心學習者，很早就使節團中設置所謂「朝天官」（後改稱質正官）編制，專責記錄並蒐集所有關於中國之訊息，許多內容都被整理並收進累計長達四百七十二年的《朝鮮王朝實錄》中，既提供了海外最為龐大的中國歷史側寫紀錄，也是瞭解中國歷史之一個重要的客觀來源。[\(註5\)](#)即便如此，儘管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且身處「漢字文化圈」中，如同近年來大量留學歐美者一般，這批朝鮮士子在閱讀資料時或者並無隔閡，畢竟一方面「目的性」甚強（無論引進制度用以自我改良，抑或純粹為了國家安全目的蒐集情報），且多數僅為短期「過客」（當時無常駐使節制度，知識階層移民者也極有限），加之紀錄往往零星斷散，作為史料補充校勘來源則可，在近代漢學研究興起之前，若真想透過此類「他者」視角來觀察中國，仍舊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憾。[\(註6\)](#)

相較於朝鮮對中國或「知之甚詳」，此際歐洲人則顯然對中國一無所知。作為最早由海路抵達中國的歐洲人，[\(註7\)](#)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在一四九七年對其遠東探險隊所交付的任務，乃是一連串待解疑問：「你必須探明有關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何時到馬六甲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甚麼禮物？每年來多少艘船，船隻形式和大小如何？是否當年就回國？他們在馬六甲或其他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懦弱或強悍？有沒有武器或火炮？穿著甚麼衣服？身體是否高大？是基督教徒還是異教徒？國土大嗎？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摩爾人或其他任何人和他們一起居住？若非基督徒，

他們信奉甚麼？他們遵守甚麼風俗習慣？國土擴展到甚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為鄰？」

前述一部分問題（關於貿易部分），其實無須抵達中國便可探知，但另一部分（政治體制與社會風俗習慣）則顯然得藉由深入的資料蒐集與田野調查才能完成，至於這項工作，雖然自利瑪竇（Matteo Ricci）一五八三年抵華後開端，這位頗受中國士大夫敬重且尊為「泰西儒士」的傳教士亦的確成功扮演了橋樑性溝通角色，甚至歐洲在十七世紀還流行過一陣「中國風」（Chinoiserie）文化浪潮，事實是，不僅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打開中國門戶之前，歐洲對中國的一切仍一知半解且多所猜測，即便時至今日，「主觀想像」仍是當代西方對中國認知之重要組成部分。

回到中國來觀察中國 其實，想瞭解中國，最終或還是得回到中國本身。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曾經如此說道：「通過中國歷史可以最好地瞭解中國，這是因為，與其他民族相比起來，中國人更愛從歷史角度觀察自身，並強烈地感受到某種傳統的存在，……只有在中國歷史長河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其發展之方向，並瞭解目前在中國發生之一切事情。」[（註8）](#)

當然，費正清並不完全接受所謂「例外論」的看法，根據此種觀點，東亞（以中國為代表）是一個有別於世界其他地方的特殊區域。例如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書中，便曾提出「軸心時代」（Axial Age）的概念，指出在西元前八百年乃至西元後兩百年的一千年間，在印度、西方和中國，幾乎同時出現了自覺精神並湧現一批偉大的哲學家，其中，東亞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先後被拖入了以中國為軸心的區域文明體系之中，從而出現了完全不同於其他地方的歷史景象。[（註9）](#) 雅克（Martin Jacques）

則認為，當下這個世界雖習慣於從民族國家角度來思考各種問題，但這不過是歐洲主導時代的遺緒，不可否認的，目前中國也尋求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民族國家，且正在如此轉化，傳統文明特徵仍為中國帶來了它的獨特性，包括對大一統的極度重視、政府的權力角色、向心性、中央帝國心態，以及關於種族、家庭和家族的論述等。[\(註10\)](#)

從某些角度（例如儒家文化與漢字）和特定區域（東北亞）看來，前述說法似「無庸置疑」，顯然並非共識。對某些學者來說，反對此種例外主義的理由，主要源自近代以來將人類世界視為某種共同體之「普遍史」意識，尤其新世紀以來，無論大歷史（mega history）與全球史（global history）均愈發帶領風騷，從而壓抑了例外論的發展；其次則因西方仍為學術方法主流，例外論既暗示尋找某種獨立研究途徑之必要，也為想偷懶的搭便車者（free rider）帶來明顯「不便」，自然不甚討喜。

就本書而言，至少在方法論部分，特別是面對中國當前已漸融入世界秩序之不可逆現實，個人雖不堅持完全的例外主義觀點，只不過，如同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陸伯彬（Robert Ross）在一九九七年《長城與空城計》書中，試圖從地緣條件切入，指出「歷史傳統和地理環境為中國的外交政策設定了前提」，在黎安友與施道安（Andrew Scobell）於二〇一二年續寫的修訂版本中，同樣保留了此一觀點，[\(註11\)](#)基於獨特地理特性為中國歷史發展帶來之長期文化沉澱，以及中國雖已經「加入」世界但仍舊「去古未遠」之現實，回到中國歷史本身來次「再出發」不僅有其必要，也是近期中國研究的主流之一。

問題只在於：我們究竟能走多遠？又如何找到客觀正確的道路？

研究中國外交之時代意義與重要性

說實話，到底何謂「中國」始終沒有明確的定義，端視從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抑或族群角度切入而定。儘管目前它主要指的是一個「國家」，若回到歷史本身，則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感受不啻非常深刻，「……坦白地講，我愈是研究中國，就愈加難以捉摸其確切定義；過去兩千年，它是個帝國，不是國家，而且是個非常開放且邊界非常不固定的一個帝國。」[（註12）](#)

暫且不論「帝國」之嚴謹定義及其相關議論，[（註13）](#)至少「政治」上的中國，以其無可忽視之龐大地理幅員與人口規模，即便在近代陷入歷史最低迷的時刻之一，也難以被排除其可能之潛在重要性。例如在一九四五年，雖然剛剛勉強贏得了一場甚至很難被真正稱為勝利的「慘勝」，且隨即陷入全面內戰陰霾，中國仍被邀請（或安排）進入了方纔成立的聯合國，甚至被賦予全球僅僅五席的否決特權，便是一個例證。

事實是，在國際政治史上，所謂強權（great power）或霸權（hegemony）國家的存在雖相當普遍且自然，這類說法通常並不單單用來「描述性」地說明國家之間的權力差距而已，更重要的是，它還具有某種「操作性」暗示；進一步來說，多數強權與霸權國家都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積極且慣常之介入性角色，並經常設法制裁或控制那些潛在的秩序破壞者。[（註14）](#)當然，從權力差距及其暗示看來，前述由強權國家進行的制裁或者控制過程，多半應當以成功收場，事實看來卻並非完全如此。由於部分潛在秩序破壞者（或權力挑戰者）所具備之能量有時難以壓抑，結果不斷帶來在國際政治中的興衰循環，也成為多數人觀察歷史演進的關鍵所在。

權力興衰，永遠是歷史焦點之一，也是當前中國崛起所以受關注的緣故。

世界秩序變遷與霸權轉移之可能性 回顧近代史，隨著工業革命在十八世紀末爆發，原先因伊斯蘭世界擠壓而處於地緣政治相對邊緣的歐洲，於是在擴張「欲望」外，首度獲得了實際的擴張「力量」，其結果如同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歐洲經濟突破了它在漫長的十六世紀中所創造的疆界，開始將巨大的新地帶併入它所包含的有效帶動分工中」，[（註15）](#)從而使全球性世界體系有機會跟著建立起來。值得一提的是，自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葉的國際體系，其實是分成兩個世界來運作的：首先是存在於歐洲並被稱為「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平行性互動模式，其中，英國只不過是個擁有較大影響力的強權國家而已；[（註16）](#)至於在歐洲國家相對於世界其他區域的階層性關係上，則幾個重要殖民國家在面對各自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時，都不啻可說是霸權國家，當然，英國乃其中力量最強大的一個「霸權」（one of the hegemons）。[（註17）](#)

相較過去習慣從純粹權力平衡政治角度來觀察國際關係演進，特別是針對歐洲霸權時期的大國興衰問題，近期以來，權力轉移理論（power-transition theory）似乎提供了某種更具解釋力的角度，[（註18）](#)其不同處在於，傳統理論經常不由自主地假設國際結構是靜態存在的，也就是大國之間的關係其實變化不大，但後者更重視國際內涵變遷的動態性，特別是霸權地位的更迭，並認為在結構演進中，前述變化很難不是國際衝突導致的結果，爆發衝突的原因，又不外乎是特定國家之間的權力對比出現了均衡（parity）或超越（overtaking）現象所致，[（註19）](#)前者指的是後進或潛在挑戰者的權力值藉由完成了「追趕」政策（通常暗示經由經濟成長以致提升軍備與政治影響力），逐漸拉近與領先者或霸權之間的距離，[（註20）](#)至於所謂超越，則是指潛在挑戰者不僅有效拉近與領先者或霸權的權力差距，甚至透過某種躍進式發展，導致其能力最終凌駕於霸權之上。[（註21）](#)

權力轉移與傳統理論的差異還在於，一方面國際經濟與政治權力關係其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決策者有關合作或競爭的抉擇，往往也引導著彼此之政經互動；[\(註22\)](#)由此將經濟考量加入國際政治行為後，我們便可以發現，強權國家常使用貿易政策來轉變不滿意國家的喜好（例如美國在一九四七年建立布萊頓森林體系，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普遍利用三〇一條款，以及二〇一八年向中國發起貿易戰），也傾向頻繁使用經濟制裁來對付不滿意國家，最後，為避免出現前述「均衡」或「超越」現象，多數霸權都會限制某些關鍵技術流向對手國家（潛在挑戰者）。[\(註23\)](#)總的來說，特定國家之經濟快速擴張，將帶來重新形塑國際結構的效果，而結構內涵的改變與權力重新分配，則會增加衝突爆發之潛在可能性。[\(註24\)](#)

儘管有關霸權理論的學術討論，未必針對美國而來，作為現任霸權，也是最重要的個案研究對象，美國之霸權發展歷程既受到普遍關注，其未來前景自然是目前相關理論之研究焦點。

正如眾所周知，由於與歐洲具備高度文化聯繫、自一八六〇年代內戰後歷經快速工業發展、相對於世界其他區域與歐洲更加密切的地理鄰接性、自獨立後逐漸形成的社會自由特徵，以及本土未曾受兩次大戰波及（甚至利用大戰賺足戰爭財）等諸多原因，自二十世紀初期起，美國非但慢慢躋身成為與歐洲並駕齊驅的強權行列，[\(註25\)](#)更一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超越」舊核心歐洲，躍升全球性領導霸主，史無前例地被稱作「超級強權」（superpower）。由於曾經同時擁有具壓倒性的軍事（核子技術與全球性投射力量）與經濟（占全球工業產值大半，並擁有全球最大黃金儲量）等絕對優勢，美國的強大在一九五〇年代看來確實無庸置疑，只不過，從歷史經驗看來，任何霸權國家都很難恆久維持下去，美國亦恐難例外。[\(註26\)](#)

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冷戰乃關鍵所在。

由於與蘇聯進行大規模軍備對抗與全球性結盟競賽的緣故，致使美國消耗掉相當大的經濟能量，[\(註27\)](#)一九七〇年代後尼克森主義（Nixonism）所強調「有限介入」與「區域合作」等退縮策略，便部分突顯出其霸權逐漸力有未逮。儘管在蘇聯崩解之後，它一度「就像跨坐在地球上的巨人，主宰著商業、貿易與運輸等領域，經濟可說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軍事力量也無人能及」，[\(註28\)](#)小布希政府強調「先發制人」之單邊主義政策，亦似乎充分象徵美國擁有的相對優勢，[\(註29\)](#)但不再依賴外交手段、援助與國際法，而是透過軍事力量、恫嚇與金融管制來貫徹外交政策的趨勢，既引發來自全球的反彈聲浪，讓奈伊（Joseph Nye, Jr.）提出「軟權力」（soft power）此一新名詞來提醒美國政府，[\(註30\)](#)至於二〇〇三年至二〇一〇年在伊拉克戰爭中虛擲的大量資源，以及二〇〇八年由於次級房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更使美國經濟面臨大幅萎縮的窘境，從而埋下國際格局遽變的潛在伏筆；即便美國依舊維持領先，一方面全球權力分散跡象益發明顯，[\(註31\)](#)哈斯（Richard Hass）也不無悲觀地指出，不僅冷戰結束初期預測的「世界新秩序」美好場景根本沒出現，目前世界且正浮現某種失序（disarray）現象。[\(註32\)](#)

當前中國能量特色及其發展評估 正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一九九九年所預估的：「單一超強的世界將不會持續下去；在未來二十年當中，中國不但人口將達到十五億，其強勁的經濟成長與依然帶有威權取向的政府，也必然會繼續推進其利益，……至於當某個人帶領後葉爾辛時代的俄羅斯向前邁進後，另一個全球影響力的競爭者也將再度出現。」[\(註33\)](#)且不論此種推斷之主觀臆測性，既然霸權興衰無可避免，也是必須接受的歷史邏輯，在既有格局存在變動可能時，嘗試推估未來發展相當自然。

從另一個角度看來，「由於蘇聯解體與冷戰落幕，自十九世紀末形成的這個（東亞）區域體系中，首度出現一群國家和另一群國家

之間沒有被分割的現象。中國不必在到處是衝突的背景中考慮國防問題，首度可以同時和所有國家相交，……經濟影響力與軍事力量日益強盛的中國，可以在塑造其周遭環境時，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註34\)](#)在前述有利背景下，不僅中國也認為自己「正在世界的東方崛起」，國際上對中國未來的樂觀評估也其來有自，包括改革開放後三十年間高達兩位數的奇蹟式平均成長率，以及它力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政治結構調整等事實，再再促使觀察家們提醒中國將成為新權力競爭者的趨勢。[\(註35\)](#)

無可否認，經濟成就絕對是當前中國地位與能量的象徵。正如大前研一所言：「最近幾十年間，全球政治家、經濟學者與投資家一面祈禱中國繼續沉睡下去，一面又承認中國的潛在實力並預測其即將覺醒，扮演世界經濟原動力的角色。」[\(註36\)](#)不可諱言，中國連續數十年的快速增長，可說無愧於「奇蹟」稱號，以此為基礎，至少就可見的歷史記憶（近百年來的發展頓挫）與正常的國家利益考量而言，對中國領導者來說，他們很難不希望利用這個契機（或稱戰略機遇期）來提升國家安全度，甚至取得更高的地位與影響力；其中，所謂「大國論」既逐步成型，經濟實力也成為中國最自信且不容忽視的軟軍備。大體來說，在後冷戰環境與中國本身發展所提供的複雜背景下，中國應付挑戰的一套邏輯是：首先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後，逐步確立將推動（具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提高綜合國力的長期方針；[\(註37\)](#)其次，認定由於美國不可能鞏固其單邊主義政策，因此世界新格局不但將朝向權力分散特徵邁進，此種多極化的結果也將為中國提供有利於改善其國際地位的「戰略機遇期」；[\(註38\)](#)最後，無論中國將如何利用前述所謂機遇期，更重要的是，中國應決定如何透過更寬廣的視野，運用當前的國際環境與國力要素以徹底扭轉百餘年來的歷史發展困境。

無論中國是否真的可能崛起，一旦它有機會成為霸權的話，如何觀察並預測其崛起特徵便顯得相當關鍵，例如從「崛起—大國崛起—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和諧發展—和諧世界」等一連串國際宣傳主題內涵變遷可見，中國確實不斷地試圖去尋找出能被多數人接受

的形象。再者，中國的崛起還必須有以下條件配合：首先是符合權力轉移理論有關均衡與追趕的假設，亦即實質縮小與既存霸權美國之間的實力差距；其次是擁有可填補的權力真空地帶，亦即能否成功地將東亞地區作為其依托基礎；第三是能否有效地使用武力來展示並奠定國際地位，並避免因此被拖入不必要的戰爭泥沼；[\(註39\)](#)最後，則是能否擬定擁有長期發展前景的「大戰略」，而非目的僅在於追趕的「大國戰略」。

在本書中，主要關切對象便在於如何掌握此一或將浮現之「大戰略」潛在內涵，以及它對下一階段世界秩序走向之可能影響。

相較客觀層面的國際結構內涵條件，國家的外交戰略無疑具備較為主觀的特徵；換言之，此一戰略設定既必須符合自身發展利益（也就是為自己的需求量身訂做），也不可能無視於相關決定之歷史經驗（亦即過去類似之戰略設定及其實踐結果）。尤其對於曾經擁有悠久文明傳統甚至霸權經驗的中國而言，為因應時勢變遷帶來的新挑戰，完全複製傳統模式是不可能的，但過去的傳統思考與作法也不可能對當前毫無影響。正因如此，相較於多數討論中國外交的學術論著，主要將焦點放在當前中共政權特質及其可能之因應作法上，本書則試圖透過更長遠的歷史追溯路徑，希望從中找出理解未來中國外交戰略走向之不同思路。

本書結構與段落安排

根據前述邏輯與想法，除引言之外，本書共分為八個部分來逐步進行討論。

首先在第二部分中，個人希望打破過去「古代史」與「近代史」的傳統藩籬，一方面以「三大帝國時期」的歷史架構來重新組織中

國的對外關係發展，據以追尋一個「客觀存在的中國」，藉此作為歸納其主要認知內涵與行為模式，以及觀察自清末以來漫長之「再崛起」（rerising）歷程的基礎。接著，在簡略地重新勾勒中國過去兩千餘年來的發展脈絡，並透過國家形式變遷與體系架構內涵等角度，引導大家瞭解中國在面對周邊環境挑戰時之相應對策後，第三部分則將焦點轉往政策制定的心理邏輯基礎，亦即從所謂「天下觀」出發，針對「天朝觀念」之內在意涵進行討論；對此，本書嘗試提出「現實建構主義」之修正性概念作為理論指引，接著鎖定天朝觀念最主要的制度形式（亦即朝貢體制）加以批判論證，期盼能在「解構」部分不切實際且先入為主的傳統歷史觀點之後，「建構」出對未來中國外交更確實的分析角度。

正如眾所周知，政策的理性程度有賴於「政策目標」與「實際能力」之間的有效維持平衡。以中國傳統外交戰略為例，重建帝國政治架構並恢復天朝上國威望，固然是許多執政者（尤其是王朝創建者）夢寐以求的目標，但在邁向目標的過程中仍需要不斷地進行理性評估。更何況，正所謂「外交乃內政之延長」，因此，瞭解中國進行內部統治時所面對之各種挑戰，此類挑戰對於對外政策內涵之影響，以及中國在面對此類挑戰時所慣常出現的思考與反應，既是分析中國對外政策時無可迴避的基本點，也是第四部分的重點所在。至於在第五部分中，本書將轉而注意另一個關鍵之處，亦即理解工具的問題：究竟我們應當繼續使用西方理論邏輯來解析中國歷史發展，還是必要但有限地加入一定程度「具中國特色」的想法？儘管個人並不否認某些普遍性概念確實存在，事實證明，不同群體仍舊可能衍生出具相對獨特性的行為規範，中國自然亦是如此。在此，個人將維持前一部分從內政出發的觀察角度，討論「具中國特色之戰略觀」的可能焦點內涵所在。

無論如何，本書雖嘗試進行重構中國歷史的工作，並將焦點放在中國如何建立自我認知，並依此判斷並決定其對外行動方針上，但前述重構過程中更重要的挑戰並不在切入角度的選擇，而是如何將傳統王朝史（舊中國）與近代史（新中國）在邏輯上銜接起來。對

此，第六部分首先從「大轉型」角度出發，然後設法由中國面對挑戰時所選擇的回應途徑，整理出連繫兩個歷史階段的接合點。接著在第七部分當中，則設法再度透過回顧性的探討，希望藉由「客觀」與「自省」所提供的理性，脫離「中國中心」傳統且危險的主觀論點，以便更清楚地檢視中國決策者的心理背景與治理過程，並將焦點拉到二十世紀，經由釐清「中國崛起」相關概念以預視其未來發展。

最後，與其將第八部分視為結論，面對所謂「後美國時代」開始成為新一波被討論焦點之輿論發展，本書更期盼將它作為觀察下一階段世界格局，以及未來中國外交戰略走向的「起點」。無論所謂中國崛起之實情、現況與未來如何，它對既存國際政經板塊變遷所帶來的拉動與推移效應不容忽視，尤其中國企圖努力貫徹「走出去」戰略以掌握此一「戰略機遇期」的具體外交作為，更值得關注。對此，當前中國的外交目標究竟將如何設定，未來又可能朝哪個方向前進，不僅是結論部分關切的重點，也是本書從一開始便希望加以勾勒的思考藍圖，至於對「帝國」與「世界秩序」未來之反思與預測，也是個人在能力所及之處期盼能加以著墨的。

（註1）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1923-）為出生於德國的猶太裔美國政治家與國際政治理論家，曾任尼克森政府時期國家安全顧問與國務卿，一九七一至七二年扭轉美中關係成為冷戰重要轉捩點，一九七三年因調停結束越戰獲諾貝爾和平獎。[↑](#)

（註2）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0); Steven W. Mosher, *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0).[↑](#)

(註3) 這場戰爭從一五九二年持續到一五九八年，在日本稱為「元祿慶長之役」，在朝鮮稱為「壬辰戰爭」，在中國則稱為「萬曆戰爭」。事實上，早在朝鮮於八月正式遣使求援之前，明朝邊境部隊已自六月起局部介入衝突，至於正式援軍則在十二月底開拔。普遍認為，明朝所以派軍進入朝鮮，並非單純只為救援，相較日本目的在「假道入唐」，中國則不啻發動一場境外決戰。[↑](#)

(註4) 明朝在戰爭結束不到半個世紀後，於一六四四年告終，一般認為與此戰役不無關係。[↑](#)

(註5) 又稱《李朝實錄》，中國史學界直到二十世紀初才開始重視此一資料，最早接觸者為吳晗（1909-1969），他在一九三二至三六年間，花了四年時間抄錄《實錄》涉及中國部分，最終在一九八〇年出版《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一書。值得一提的是，其整理內容上溯至高麗王朝恭愍王三年（元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年），比《實錄》內容多了三十八年。[↑](#)

(註6) 又如自日本學者濱下武志以降，許多人從「朝貢體系」角度觀察中外關係，雖不無創意與說服力，仍需進一步檢視。對此，本書將於後面篇幅論述。[↑](#)

(註7) 受馬六甲首任要塞司令布里托（Rui de Brito Patalim）委託，歐維士（Jorge Álvares）在一五一三年抵達廣東外海島嶼（或為大嶼山），此時為明武宗正德八年。[↑](#)

(註8) John K. Fairbank,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 1989), p.2.[↑](#)

(註9) 日本學者西嶋定生也曾在《東アツア世界と日本史—關連諸學からのアプロウ文中》，倡言東亞世界的「四大支柱」（漢字、儒教、佛教和法律系統），構成了東亞完全不同於西方的特點。[↑](#)

(註10)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2), Chapter 10.[↑](#)

(註11)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7); Andrew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註12) 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p.3.[↑](#)

(註13) Stephen Howe, *Empi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Gopal Balakrishnan, ed., *Debating Empire* (London: Verso, 2003); 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註14) 部分霸權穩定論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學者似乎較重視霸權對國際「經濟」秩序而非「政治」秩序的維持；參見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 (1981), pp.242-259, and Robert O.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 1967-1977," in Ole Holsti, Randolph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pp.131-162.[↑](#)

(註15)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9), p.129.以第一個可被稱為「全球性」霸權國家的大英帝國為例，其殖民擴張雖可遠溯至十七與十八世紀時，但因政經結構未完成調整，因此直到十九世紀初才確實奠

定它在歐洲或全球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這裡是指英國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完成之經濟（工業革命）與政治（憲章運動）的雙重革命；William A. Speck, *A Cambridge Concise History of Britain, 1707-19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pter 3.[↑]

（註16）例如Kennedy便強調，由於太過宣揚軍隊的非生產性，因此「在維多利亞女王中期，儘管英國經濟成就輝煌，卻可能是自斯圖亞特王朝以來對戰爭最缺乏動員的時期」；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188.[↑]

（註17）Giovanni Arrighi and Beverly Silver, et al.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Chapter 3.[↑]

（註18）該理論其實最早由A.F. Organski在其所著*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一書中所提出，與傳統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比較起來，該理論認為權力很難被真正地平衡，因此不斷地權力衝突乃是理解重點。[↑]

（註19）See A.F.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Manus Midlarsky, *The Onset of World War* (Boston: Unwin Hyman, 1988), and Jacek Kugler, et al.,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 2000).[↑]

（註20）Moses Abramovitz, *Thinking about Growth and other Essay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Welf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20-242.[↑]

（註21）Elise S. Brezis, Paul R.Krugman, and Daniel Tsiddon, “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5 (1993), pp.1211-1219.[↑](#)

(註22) Jacek Kugler, et al. ,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 Century*, Chapter 5.[↑](#)

(註23) 例如法國在十八世紀針對英國，英國在十九世紀末針對美國，美國則自二十世紀末起針對中國。[↑](#)

(註24) Kalevi J.Holsti也認為自一六四八至一八一五年間，至少從數量上看來，經濟問題及其爭議愈來愈成為歐洲國際戰爭的主要根源，見*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15.[↑](#)

(註25) Robert D.Schulzinger, *U.S. Diplomacy since 19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9-37.[↑](#)

(註26) A.F.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Manus Midlarsky, *The Onset of World War* (Boston: Unwin Hyman, 1988); Richard Rosecrance, “Long Cycl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1987), pp.288-296.[↑](#)

(註27) George Modelski, *Exploring Long Cycle*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87);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註28) See “America’s World,” *The Economist*, October 23, 1999, p.15.[↑](#)

(註29) Stephen W.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W.W. Norton, 2006).[↑](#)

(註30) Joseph S. Nye, Jr.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5:2 (1990), pp.177-192;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80 (1990), pp.153-171.[↑](#)

(註31) Charles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2 (1998), pp.40-79; “Hollow Hegemony or Stable Multi-polarity?” in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68-97.[↑](#)

(註32) Richard Hass, *A World in Disarra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7).[↑](#)

(註33) See “When the Snarling’s Over,” *The Economist*, March 13, 1999, p.17 ; 根據統計，中國人口在二〇一七年底才跨越十三點九億，低於前述估計，且近期進入低速增長，二〇三〇年或達十四點五億峰值。[↑](#)

(註34) Michael Oksenburg, “China: A Tortuous Path onto the World’s Stage,” in Robert Pastor, ed., *A Century’s Journey: How the Great Powers Shape the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p.291-332.[↑](#)

(註35)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78:5 (1999), pp.29-32.[↑](#)

(註36) 大前研一，《中國，出租中》（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二〇。[↑](#)

(註37) 參考：吳敬璠，《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台北：麥格羅希爾文化事業，二〇〇五年），第二章。[↑](#)

(註38) 陳佩堯與夏立平主編，《新世紀機遇期與中國國際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徐堅主編，《國際環境與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註39) 儘管中國企圖以二次戰後的德國與日本為例，來說明「和平崛起」的可能性，見夏立平與江西元，《中國和平崛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二章；但此種引喻既不甚恰當，事實上部分學者也不否認因崛起的「零和性」及其衝突暗示，見閻學通與孫學峰等，《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頁二至七。[↑](#)











背景：漫長的再崛起之路

在目前研究成果當中，有關中國對外關係與政策內涵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討論自十八世紀中期以來，環繞著清季中國與國際社會互動所引發的一連串問題；至少迄今為止，清末以前的中國對外互動內涵仍未真正受到注意（即便有，亦僅僅被視為是個可與現代時期切割之純粹歷史問題）。從某個角度看來，多數學者並不真正關切中國的社會發展與結構變遷歷程，亦不擬追尋其行為模式的源起與演化路徑，不過習慣性地套用西方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理論來進行批判而已。在此部分，個人試圖在有限篇幅當中，以「三大帝國時期」的歷史架構來重新組織中國的對外關係發展，希望以此作為歸納其主要認知內涵與行為模式的基礎。更甚者，就宏觀角度而言，當前所謂「中國崛起」發展，其實是一條漫長的「再崛起」（re-rising）歷程。

前帝國時期的中國外交

儘管近年來各界對於中國之關注，逐漸聚焦於其霸權潛質，至於預測角度則大致如毛思迪所言，「如果霸權的對內政策是鎮壓和思想控制，對外政策不外乎是持續對鄰國進行侵略與併吞」；暫且不論何以美國似乎是此種霸權慣性的「例外者」（事實是華府此類行為始終被主流刻意忽視），長期以來，有關中國對外關係與政策內涵的研究，大多數仍然集中討論自十八世紀中期以來，環繞著清季中國與國際社會（以歐洲作為代表之所謂西方）互動引發的一連串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此時中國相對於歐洲國家所凸顯之弱勢地位，因此研究焦點乃順勢集中在中國應當「如何」（how）融入，以及「何以」（why）無法積極融入國際社會等現象上面，至於主要角度無疑也是「批判性」的，亦即從先設性價值（以西方中心國際觀與既存國際法規範作為應然面）角度，來評論及批評當時清廷政府因應國際壓力時的「不理性」外交舉措，尤其是過度重視威望利益，以致經常從情緒化角度來理解並處置問題，最終不斷帶來「喪權辱國」的負面結果。其後，隨著現代民族主義浪潮自十九世紀起席捲全球，再加上中國進入二十世紀後所遭遇的內外環境動盪交迫與發展頓挫，研究者也跟著將前述批判觀點轉而向外，一方面繼續強調「政府素質」（政治腐敗）所帶來的內部限制，同時引入「殖民帝國主義剝削」角度，視為制約中國外交之新的外部壓力來源。

無論如何，至少迄今為止，一個「客觀存在的中國」似乎仍不存在。

例如就針對中國本身而言，多數學者並不真正關切中國的發展與結構變遷歷程，以及追尋其行為模式的源起與演化，也很少人從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謂「挑戰 - 回應」（challenge-response）途徑去思考中國如何在外在環境壓力下，[（註40）](#)逐步修正與重新形塑（未必是全然接受改變）其行為內涵與指導方針，反倒是諸如像費正清等一部分近代西方漢學家，還努力汲汲營營地由「似懂非懂」的角度，來幫中國重新「整理國故」，[（註41）](#)從而提供了某種客觀分析的可能性，並引領出另一條新的研究路線來，儘管從成果面看來還是極其有限的。

至於當代中國，自一九八〇年代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一方面由於有著「重新融入」（re-blending into）國際社會的必要性，此時，國際外部環境也因為長期冷戰隨即宣告結束，使得全球體系內涵在結構與規範上都面臨著重組的挑戰，再加上經濟起飛後「中

國崛起」正面進展所帶來之各種潛在可能性，這些新發展既讓部分中國研究者得以從更具自信（或至少是較少壓力）的視角，來審視中國自身發展，並使「呼喚中國理論」一度成為某種共同聲音，至於如何尋找並歸納出中國的行為邏輯模式，或設定此種模式之心理與認知根源與基礎，自然成為最受學術界矚目的研究方向；[（註42）](#)其中，例如在先秦春秋與戰國時期「國家間」（inter-state）或「準國際」（quasi-international）關係的討論，近來便有蔚為風潮之勢。[（註43）](#)

以下，我們便話說從頭，首先就此進行若干簡略的介紹。

早期國家與西周體系發展 若想追尋並有效釐清中國對外行為模式中的傳統來源，儘可能地「上窮碧落下黃泉」雖有其必要，為了凝聚共識且避免引發不必要的紛爭，將研究之時間上限界定在以周代作為起點，[（註44）](#)應是大致合理的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多數國際關係學者無視於（或根本明明知道）既存的「西發利亞式」（Westphalia-style）國際規範既源自歐洲大陸一隅，在時間範疇上僅能涵蓋距今將近五百年間，在地理上更自十九世紀起，才逐漸覆蓋整個地球表面之事實，迄今仍舊習慣以類推（以今論古）方式來研究中外人類歷史，本書則希望相關討論能回歸更為實事求是的「演化」觀點，由此或許才能真正瞭解行為模式的長期發展概況。

首先，近幾十年來，在歷史學界對於人類古代政治組織發展的研究當中，所謂「早期國家」（early state）已逐漸是一個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它意指在人類歷史上最先出現但未臻成熟的政治制度化嘗試；[（註45）](#)一九六〇年代起，賽維斯（Elman R. Service）等人類學家更從「遊獵集團（band）- 部落（tribe）- 酋邦（chiefdom）-

國家（state）」等系列性演化角度，設法藉此進一步瞭解人類社會中政治單位之階段性特徵，以及其與周邊環境的互動發展關係。[（註46）](#)當然，對於相關問題的細部討論，乃是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的事情，此處的關切重點，主要是「早期國家」與「現代國家」（modern state，亦或可稱為西發利亞式國家）的差別，尤其是單位中央集權程度及其對單位之間形塑互動模式的影響。儘管受限於上古史料並不充足，相關討論亦尚未完全成熟，將它硬套入中國歷史當中或許未必適當，作為某種參考指標的價值還是有的。

就西周時期而言，[（註47）](#)彼時政治架構基本上介於從部落聯盟（tribe alliance）到所謂酋邦的演化過程中。[（註48）](#)例如，從此際「封建制度」暗示的分權特徵看起來（各封建單位擁有較今日美國各州更高的獨立性與權力），固然「聯盟」之鬆散形式頗明顯，但以此時期政治機器與中央集權體制之某種演進程度而言，「酋邦」的單位特徵不啻亦極為突出；重點在於，透過西周初期周公東征後的「分封」（藉此擴大周國作為領導核心的影響力，同時稀釋並分化附庸單位的能量，藉以將聯盟性質朝垂直性方向引導）、[（註49）](#)「徙封」（迫使部分附庸單位離開原有勢力範圍，然後由嫡系單位進駐接收並作為中央單位屏藩，由此展示權威並鞏固聯盟之垂直特徵）與「禮法」（藉由將權威概念予以形式化與社會化，以克服因投射力有限所埋下之聯盟性質不穩定性）等制度設計，周國不僅逐步強化對其影響範圍（或可統稱之為周朝或西周體系）的控制，也形成某種具有「軸 - 輻」（hub-spoke）特徵之層級性輪廓與準國際體系的部分外貌。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控制力」既與「技術能力」成正比，也和軸輻之「距離」成反比。從這個角度看來，基於西周時代具備的科技創新與交通運輸能力，以周國為中心的體系範圍既不可能太大（大約從渭河平原延伸至黃河中、下游局部地區），政治框架內容也必然相當鬆散。例如以直轄的「王畿」地區為例，其核心稱為「國」（範圍包括由城郭圍起的王城，以及在其周邊被稱為「鄉」的附屬地區），鄰近「國」的外圍地帶則稱為「郊」（此部分有時

也被涵蓋在廣義的「國」範圍中)以及所謂「遂」,其間差別在於,「國」的土地與人民均由周王直接統轄(人民稱國人,具有公民性質),[\(註50\)](#)「郊」與「遂」有時分封給卿大夫作為采邑,居民則稱為野民或庶人(類似自由民概念);至於在郊之外,則是所謂的「野」,基本上是一些介於各個封建單位之間,歸屬模糊的緩衝地帶。

由前述可知,首先,作為現代國家關鍵要素的「人民、土地、政府、主權」等基本特徵,與此時的政治現狀可謂相差甚遠,因此很難去進行類比;其次,即便在自身直轄土地上,周王尚且不可能進行嚴謹綿密的統治,更何況針對其下屬封建單位,因此,由其控制的地域與其視為單一國家,或許更接近「體系」(system)或前述部落聯盟的假設,[\(註51\)](#)這也是個人何以傾向從「時代」而非「王朝」角度來進行觀察的理由。且由於普遍實施封建制度的關係,雖然不易確切釐清,周國似乎仍根據其政治影響力輻射所至,模糊地畫出了某種可資界定體系範圍的「邊界」(boundary)來,從而讓它成為一個可被研究的標的。最後,正因此一體系結構內涵非常鬆散,除了大致以形式為主且頻率不高的禮儀性質互動之外,具拘束性之行為規範(norm)並不明顯,這也是在此何以稱其為「準體系」的緣故。[\(註52\)](#)

舊秩序動搖及其最終崩潰 進一步來說,西周時期政治制度設計與當時國際體系結構趨於鬆散,除交通不便限制了投射能力之外,主要或許還是與經濟結構的承載力有關。

此時中國(或中原地區)正從半遊牧逐漸轉向以農耕為主的生活型態,有限的經濟能量也使「小國寡民」成為西周初期政治單位的普遍特徵。不過,隨著封建秩序提供日常生活穩定性來源,相關生產技術也慢慢發展累積起來,一方面人口繁衍的結果,不斷擴張既

有政治單位的規模，[\(註53\)](#)填補了原先在「國」與「野」之間的真空地帶，同時強化了人民對於秩序與政治效率的需索；更甚者，人口數量的持續增長亦提高了對於土地的需求壓力，一方面位於體系核心（從俗稱「關中」的渭河谷地到黃河中游範圍）的單位（包括周王本身），由於為了安全因素進行密集分封，以致缺乏足夠擴張空間，最終只能為了爭奪有限土地而陷入彼此不斷混戰的局面，從而開啟了終結數百年封建時代的序幕，相對地，原先居於體系邊陲的國家（例如齊、秦與楚等），反倒因為有機會透過侵入周邊遊牧地帶而獲致擴張機會，其後乃紛紛躍升成為在春秋與戰國時期的主要政治單位。[\(註54\)](#)

正所謂「禍福相倚」，歷史的發展路徑確實經常如此出人意料。

總而言之，西周體系所代表的舊秩序的崩解，不啻反映在封建單位不斷遭到兼併的事實上，由此凸顯出周國雖作為體系核心，卻無法履行「保護者」角色職責的困境。根據《呂氏春秋·觀世篇》所載，最初「周王所封四百餘國，服國八百餘」，但迨至春秋初期，能見於經傳者只賸下一百六十餘個政治單位；到了戰國時代，如同《史記·周本紀》所言：「……諸侯彊併弱，齊、楚、秦、晉始大」，其中，齊併國三十五，楚併國三十六，晉併國二十，可見當時兼併戰爭之激烈程度。[\(註55\)](#)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發生國際戰爭的頻率在春秋時期大幅提高，在深化單位之間互動性之餘，一方面驅使原先僅具儀式性的國際關係，不斷朝向「實質化」發展，具「非戰」性質的外交斡旋行為，也成為解決紛爭的選項之一；於此同時，正如當代霸權穩定論（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暗示的，在周王威望衰退帶來的霸權真空狀態中，「準霸權」國家經常試圖取代其角色，透過「會盟」（召開國際會議）途徑來排解糾紛，[\(註56\)](#)並藉此獲取較高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註57\)](#)其中，齊桓公在西元前六八一年召開「北杏之會」以安定宋國內亂問題，可謂類似手段的首度成功嘗

試，也是春秋時期不根據周王室指令，由諸侯自相擁戴盟主來平息國際紛爭的歷史性開端。[\(註58\)](#)

不過，隨著各個政治單位紛紛針對稅收、人事行政、法律制度、軍事動員與經濟政策等方面進行徹底變革，一方面雖加強了上層統治者的治理與領導能力，同時鼓勵並誘使國家繼續投入惡性競爭（戰爭）循環，結果不僅將政治單位內涵推向了更成熟的國家形式，在戰爭型態與目標方面，也逐步從西周體系時期的「儀式性威望戰爭」（目的在確認周王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與春秋時期的「威望性有限戰爭」（戰爭激烈度增加，但主要仍只在取得對他國的影響力與控制權），升高到戰國時期普遍可見的「兼併性總體戰爭」（投入戰爭的動員規模更大，且最終目的在吞併戰爭對象）；[\(註59\)](#)最後，不僅西周時期奠下的國際秩序蕩然無存，於此同時，或許正因紛亂日殷，以及由此導致對秩序之更終極性渴求，作為一種全新的政治與國際體系架構，「帝國」（empire）亦藉此油然而生。

例如，魯惟一（Michael Loewe）便將從西周到春秋戰國的政治經驗，視為被留給後續帝國的歷史遺產：「帝國必須尋求一種靈活的折衷方案，……以便在紀律嚴明的政府模式與重視人性道德價值之間獲得可行的平衡，這個問題其實在帝國的黎明降臨前便已然出現了，雖然在接下來的兩千年內也沒有完全被解決，但每一個王朝都設法在兩種不同的原則之間進行選擇，並決定自己的政府形式」。[\(註60\)](#)

無論如何，相較於傳統史家習慣從「王朝」（dynasty，指稱一段相對穩定之政治發展時期）更迭角度，來整理過去兩千餘年來的中國歷史，本書則試圖從建造「帝國」（聚焦於更加緊密之國際體系階層性權力分配特徵）的不同視野，來探究並嘗試解讀中國某種宏觀性大戰略傳統的發展歷程，據此，首先以第一帝國（秦漢帝

國)、第二帝國(隋唐帝國)與第三帝國(滿清帝國)作為觀察主體,其次,再由此論述其對外政策重點以及其中的演化變遷現象。

第一帝國與中心觀的形成

在先秦的西周時期中,由於原先由體系核心(周國或周王)負責維持的國際秩序逐漸崩解,[\(註61\)](#)最起碼為了「自助」(self-help)起見,相對複雜且更具實質性(利益導向而非儀式導向)的國際關係與外交互動也跟著浮現出來。儘管戰爭似乎是更被各政治單位慣常使用的手段,至少在理性層次方面,正如《孫子兵法》所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如何透過「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低成本和平手段來達成保護或獲致利益的目標,也成為各國進行政策思考或網羅人才(例如像蘇秦或張儀等縱橫家)的重點之一。

儘管如此,為更有效因應外部挑戰,如何強化中央集權(centralization)並建立專業官僚制度,仍是各單位應對「體系秩序崩解」的當務之急;由此,首先是傳統封建體系與貴族世襲制度受到動搖,接著,在因體系核心(周)衰落以致釋出政治與經濟能量並鼓勵競爭之餘,單位內社會結構既因此產生大幅變遷,諸如冶鐵鑄鋼、開採礦藏、大型水利設施與糧食種植等生產技術都呈現突飛猛進之態勢,加上跨國商業交易網路的建構與受政治激勵(因其有助於累積戰爭資本),這些都明顯提升了個別單位與體系本身的「能動性」(agency),從而改變了傳統以分權封建為主的體系靜態特徵,並在歷經數百年的混戰後,帶來新的「統一帝國」(unification empire)結構與互動模式。

新範圍、新秩序與新規律 由秦國在西元前二二一年藉由統一六國所創造的新時代，不僅對中國而言，對整個東亞地區也具有關鍵性的歷史意義。

相較於主要侷限在黃河中下游流域的西周體系，經由從春秋到戰國時期的不斷擴張後，體系核心範圍逐步被往北方推進至目前長城沿線，東北部抵達遼東半島附近，南部涵蓋了整個長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北緣，西邊則靠近河西走廊入口，由此所構成之龐大幅員，也是未來中國數度重建帝國的地理基礎所在，一般也被泛稱為「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註62）](#)至於從朝鮮半島到西伯利亞遠東地區、從內蒙古草原直抵中亞與青康藏高原邊緣地帶，以及由珠江流域向南沿伸至中南半島北端等地，也因自此與前述「中國本部」維持著長期且密切的聯繫互動，乃成為「中國中心體系」（或東亞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與西周時期相比，整個體系範圍顯然擴張了數倍以上。[（註63）](#)

更重要的是，在西周體系秩序崩解的壓力下，隨著戰國時期各政治單位朝向「現代國家化」不斷成熟邁進，治理能力與綜合國力顯著提升的結果，不僅使其彼此鬥爭愈發激烈，其實孟子所謂天下必須「定於一」才能終結戰禍的說法，[（註64）](#)既相當自然，也指出了未來無可避免的政治發展方向。

從某個角度看來，由秦始皇所建立的「帝國」架構，與西周封建體系有著若干異曲同工之妙，亦即都試圖藉由「層級性」（hierarchical）構造來確保威望「在形式上的集中化」；例如在西周體系中，只有周國統治者可稱「王」便是一個例證，至於在戰國時代後，由於各國亦紛紛稱王，一方面凸顯周王威望的減損，暗示整個體系朝向平行性結構邁進，也刺激各國在「安全困境」（無政府狀態下之危機意識感）想像下邁向戰爭。為重建前述層級性秩序，秦王在統一六國後的自稱並壟斷「皇帝」稱號，不啻具有高度的象徵性意義；[（註65）](#)在此後的兩千餘年間，在東亞體系中唯有居

於核心的統治者（未必只有中國）才能稱帝，[（註66）](#)並作為國際秩序存在的某種象徵。

除此之外，相較西周時期主要面對起自於內部的體系穩定挑戰，自秦朝建立帝國體制後，「農耕民族與游牧部落的對抗」便成為主導中國，甚至於東亞大陸歷史發展的新規律來源。可以這麼說，儘管周國亦經常與周邊游牧部落發生衝突，例如武王與周公伐東夷（黃河下游與淮水流域附近）、康王伐鬼方（位於陝西與山西北部交界處）、昭王征楚（位於長江中游的楚國當時屬於蠻夷行列）、穆王討伐揚越（長江下游）並西征犬戎（甘肅東部）、夷王再征犬戎、厲王擊退玁狁（與鬼方約略屬同一民族，有人亦認為是匈奴先民）……等，這些互動之目的主要在於透過掃蕩邊陲地帶，以便再次確認體系範圍及其秩序安全，既未曾帶來衝擊或改變體系結構本身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或許我們必須從另一個新角度來審視中國與周邊民族之間的早期關係。

如同美國漢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imore）以及法國學者馬伯樂（Henri Maspero）等人的主張，[（註67）](#)直到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五百年左右，在黃河中游到蒙古草原之間，無論草原部落抑或平原聚落，其實都維持著某種程度的混合經濟型態（亦即農耕與畜牧同時並行），彼此生活差異並不大；其後，由於以西周體系為主的文明地區在（尤其是農業）生產技術方面的顯著進步，加上人口繁衍增長帶來的土地需求，由此所發起對體系邊緣的擴張行動（武裝移民或戰爭），於是逐漸迫使草原民族一路向北遷徙，最終專營游牧生活。如果接受此種被稱之為「逐離理論」（theory of displacement）的說法，不僅可以更清楚地解釋前述由歷代周王推動之不斷對外征伐活動，至於結果，首先是將原先的「東夷」（黃河流域下游）與「南蠻」（約略為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漸次納入體系範圍當中（此過程一般稱為「漢化」，其實亦可視為是某種「體系化」或「全球化」的努力），理由或許是這些區域的地理環境較適宜進行農耕的緣故，其次，則是在經濟型態差異慢慢明顯到可以被畫出一條「界線」（約略與長城重疊）之後，[（註68）](#)這條界線既成為未來

帝國與文明的邊界（被視為蠻夷的遊牧民族，由此被置於以文明加以定義之世界以外），在此邊界兩側所進行的攻防戰，也不斷地影響並重新書寫著以中國為中心的帝國歷史。

準中心觀念的形塑與演進 由秦國在西元前二二一年建立新的帝國體系做為開端，並由兩漢（西漢與東漢）接續其後的歷史時期，個人在此將其稱為「第一帝國」階段。正如前述，此階段發展對中國（或東亞）而言，其重要性不僅在於確立了此後大約兩千年的中國（與東亞）基本體系範圍，也在於它藉由地緣慣性，所創造出用以支撐核心威望的正當性基礎，亦即「中國中心」（Chinese-centric）概念。

一般討論所謂中國中心概念時，多半從《國語·周語上》中，祭公謀父進諫周穆王征伐犬戎時，所提出的「五服」制度作為出發點。

所謂「五服」，是指周國在概念上根據其所統屬地區的遠近，區分出不同性質的臣屬互動模式，例如，「邦內甸服」是指王畿之內的直轄地區（從國到郊遂），「邦外侯服」是指王畿以外分封諸侯的地區，「侯衛賓服」是指必須以客禮相待之前朝（商人）遺緒地區，「夷蠻要服」是指應該加以約束的周邊蠻族，而「戎狄荒服」則是指應設法維持其臣服姿態的遙遠地帶。據此，從「甸服」到「賓服」乃體系主要範圍，「要服」指的是鄰近體系邊陲的外圍地帶，而「荒服」不啻是另一個世界；至於在維繫秩序之具體原則方面，體系內自然是以落實封建規範為主，對外則希望能夠達成「要服者貢，荒服者王」的目標，也就是讓前者按時進獻貢賦，後者則必須透過所謂「來王」（朝覲）以滿足周王的威望需求。[（註69）](#)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井田制度」一般，[（註70）](#)在暫時缺乏史料予以有力支撐前，所謂五服概念或許不過也是古人對於「理想方程

式」的發抒罷了。更甚者，即便它有實施的可能性，亦僅僅反映出某種理性的對外政策取向；由於落實政治強制力之可能性往往與涉及對象所在之距離成反比，因此，根據地理遠近設定強弱不同的政策目標，既相當合理，與所謂「中心說」未必有關係。進一步來說，正如帝國結構本身暗示的「中央集權」（至少在形式上）與「權力分配懸殊」（缺乏足以與帝國核心抗衡的其他單位與能量來源）等特徵，理性上既可藉由某種正當性概念來支撐威望，透過權力差距所獲致的心理優越感，亦很自然地成為所謂「中心說」的來源。

無論如何，關於前述準中心概念本身，其實有著一段思想演化歷程。

首先是所謂「諸夏」或「華夏」等，尤其從「諸」字的複數意義，便自然浮現出某種可見的「體系」想像，亦即由位於黃河中游地區若干部落組成的鬆散聯盟。接續其後出現的則是「中國」，此一名詞若依現代國家界定，其意義約等於「首都」，但就早期國家而言，從「中」與「國」兩字的象形涵意而言，或分別指稱「王旗所在之處」與「統治者居所」（後者在遊牧部落亦即「大帳」之意）。王爾敏曾根據「計字法」從先秦古籍中歸納所謂「中國」的原始含義，發現約有五端，即京師、國境之內、諸夏領域、中等之國、中央之國等，其中，最重要的乃「諸夏領域」，其次是「國境之內」；由此，一方面顯示相關概念指稱對象在西周體系出現後呈現出來的微妙變化，同時正如《詩經·小雅·北山》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用以描述某種「政治現實」的概念作用既愈發重要，[\(註71\)](#)以中國作為中心的「天下」體系秩序概念，也在春秋戰國之際慢慢浮現出來。[\(註72\)](#)

隨著西周體系崩解導致國際秩序蕩然無存，再加上鄰近遊牧性部族為反制中原逐離行動所進行「侵略性舉措」（例如導致西周終結

的犬戎之禍），為加強內部凝聚力，「族群」意識也被漸次加入，導致前述概念再度轉化。

自春秋時期起，「中國」一詞不僅經常用以與「夷狄」對比，[\(註73\)](#)在西元前六六一年管仲對齊桓公提及「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後，一方面諸如「華夷之辨」或「夷夏之防」等概念紛紛出籠，齊桓公在西元前六五一年「葵丘之會」中透過「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併」所高舉的「尊王攘夷」口號，更將族群矛盾內化至體系內部的互動規範中。值得注意的是，此際周邊部落入侵中原地區的能量其實相當有限，加上進入戰國時期之後，各國為了因應激烈競爭以致不斷地拉高技術層次，更暫時降低不少遊牧部落的安全威脅；其證據是，從戰國諸子著作文獻來看，不僅「華夷之辨」的觀念鮮見記載，如「諸夏」或「華夏」等也極少被提及，例如在《孟子》、《莊子》和《韓非子》等經典中便從未出現過；在《荀子》中雖然出現過三次，但都是用以追敘歷史故事而已，並非指稱政治現實。

世界主義浮現及其初步制度化 在漢朝建立後，一方面帝國結構愈趨成熟，導致前述「華夏」或「中國」概念逐漸由族群意識朝向「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挪移，至於諸如「天下」、「四海」或「海內」等亦漸成為更常見的用詞，目的在表述一個以帝國作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註74\)](#)例如對明太祖朱元璋來說，所謂天下便達到「窮天通地，極四維之東西南北，無弗皆覆，無弗皆載，無弗皆戴履」的地步。當然，個人並不完全否定在第一帝國時期以前，中國曾經存在類似世界主義的相關概念，但它們與此後發展相較起來的差別至少有二：首先，後者「形而上」哲學成分明顯加深（並非僅僅藉此反映對於地理空間的想像而已），其次也更重要的，則是其「制度化」面向，亦即管理層次的設計發展與落實。

進一步來說，制度化的進展自然與中央集權程度息息相關。

正如前述，在戰國時期由早期國家邁向更成熟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各單位也紛紛透過一連串從中央（專業官僚制）到地方（直轄郡縣制）層級的改革，重新形塑了國家機器的運作方式，並提升了治理的實質內涵。進言之，無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世界秩序的存在，對於邊界以及帝國與附庸者之間關係的管理乃至關重要，且兩者也是相輔相成的。其中，為了透過穩定邊界來鞏固帝國核心，正如宋代學者王應麟所言：「漢文帝募民耕塞下，已有屯田之說，武帝屯渠犁，始有屯田之規，成於昭宣，廣於魏晉」，相較於西周體系廣立封建諸侯「以蕃屏周」，此類屯墾戍邊的舉措可說頗具象徵性意義；此後直到清代中期為止，無論類型與設計有何差異，屯田制度都是帝國核心藉以捍衛其邊界安全的重要設計與政策。

其次，為更有效管理帝國與附屬者關係，除了戰國時期便有諸如「行人」（主管外事活動）、「封人」（掌管邊疆事務）或「大行」（下設謁者與主客等，負責接待國外賓客）等，用以強化西周時期「小行人」職權的制度演進，到了秦朝，不僅在中央官制中設置了「典客」（掌諸歸義蠻夷，位居九卿之列）與「典屬國」（主管蠻夷降者）等職位，在地方上亦特設等同於縣的「道」級單位，目的在管理少數民族地區。漢朝基本上承接了前述秦朝的設置，只不過將典客轉而分設「大行令」與「大鴻臚」兩職，以「掌諸侯與四方歸義蠻夷及四方夷狄封者」，至於在地方上，除了沿襲道的設置之外，還有所謂「屬國」（具半獨立地位）與「都護」（設置於邊疆地區，管理包括屯田在內相關業務）等新的制度設計。[（註75）](#)

更有甚者，相較西周體系較具「儀式性」與「形式化」的貢納行為，西漢時期也有了重大轉化。關鍵在西元前五三年（宣帝甘露元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決定「稱臣入朝事漢」後所導致的制度化發展。[（註76）](#)例如在「朝覲」方面，包括單于親自入朝、派遣使節、質子（侍子）入朝與「賀正旦」（正月入朝）等，相關禮儀與使團

規模都愈來愈發繁複，且朝著規範化方向演進，相對地，由中國進行「封賞」方面，也有了更為明確的制度設計。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漢朝將源自秦代的「封爵」制度延伸到對於周邊屬國的關係上，此舉不啻強化了中國作為帝國核心之較高層級位置，至於套用春秋戰國時期主要用於諸侯國之間的「質子」制度，也有強化體系核心安全防護的意味。除此之外，繼秦朝建立帝國核心（中國本部）的基本地理規模後，透過漢朝的廣納朝貢對象來源，中國中心體系的雛型輪廓亦隨之浮現，包括從東北亞、東南亞，乃至中亞與南亞等地，此後都以「附庸」身分，與擔任「核心」的中國維持著長期互動關係。

文明融合與第二帝國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所謂「中國中心觀」的內涵並非始終一致，尤其在進入帝國時期後便開始了某種「二元互動」的發展途徑。

在「真正」的帝國結構中（包括前述第一帝國，以及接下來要說明的第二與第三帝國），它主要是以「世界主義」（作為普遍秩序之正當性基礎）的包容性面貌出現，以良善霸權（benign hegemon）身分，支持並強調兼容並蓄之價值，並在帝國體系內部（包括帝國本身及其附庸）提供一定程度之秩序公共財；但在不同帝國時期之間的過渡階段當中（弱勢王朝與分裂時期，雖然在正統與主流論述中並不加區分），則相對透露出更多「族群自我主義」（用來凝聚內部共識以對抗外部壓力）意味，更多地暗示隔離與抗衡之必要。進一步來說，帝國結構所以會出現過渡階段之衰退現象，一方面反映出帝國從崩解到重建的自然歷史循環進程，並與結構設計本身內部缺陷有關（在此暫時不擬贅述），另一方面，則或許來自前段提到過，有關「農耕民族與游牧部落的對抗」的新歷史規律所致。

事實上，就在中原文明程度相對提升並拉開與周邊部族之間的差距，帝國結構也大大自我強化了中央集權框架與政府效能後，非但生產技術的躍進，慢慢確定了中國本部以定居式農耕為主的經濟發展累積形態，在文明範圍持續擴大帶來的排擠效應下，部分原本「半農半牧」的周邊部族，既被迫向體系邊緣遷徙並「專事遊牧」，帝國為了確保邊界安全而對國境交易進行的諸多管制，也讓相對利益受損的遊牧民族必須透過季節性的「戰略性劫掠」不斷侵擾帝國邊疆，[\(註77\)](#)其目的雖或藉此捍衛自身群體生存，但所施加的壓力往往成為帝國最終崩解的關鍵因素之一，從而不斷地改寫著中國的歷史。

遊牧勢力增強及其影響 首先，正如同「牛頓第三定律」的反作用力概念一般，農耕帝國的文明躍升發展，既刺激（尋求貿易開放）並引誘（分享文明繁榮果實）了遊牧群體設法接觸帝國核心區，帝國架構較高的安全係數及其導致之「中心觀」質變（由族群意識轉而彰顯更多世界主義意涵），亦逐漸讓第一帝國政府願意且放心地採取更開放的邊境政策，結果是自西漢中期南匈奴部落南遷內附以來，到了東漢後期，由於殘餘之北匈奴勢力被迫向西方移徙，[\(註78\)](#)東漢政府乃繼續將前述內附匈奴南移至「邊境八郡」（約為現在的甘肅、陝西和內蒙古地方），並將部分漢民遷至此地與匈奴人雜居。此後，隨著原先居住於長城以北的各遊牧部族不斷向中原內地移動聚集，勢力亦持續壯大；到了西晉時期後，甚至部分已逐漸滲入了關中及涇河與渭河流域等地區，從而埋下其後「五胡亂華」的伏筆。[\(註79\)](#)

由於漢帝國在二世紀下半葉因宦官亂政加上爆發黃巾之亂，引發長達數十年的內部動亂後，甚至一度形成「三國鼎立」，力量大幅衰退的帝國核心區終於在三一一年引誘大量遊牧部族進來填補權力真空，此即史稱「永嘉之禍」的事件。

從後續之立即發展看來，不但位居帝國核心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由於數量龐大之異族進駐，由此開啟了一直延續至七世紀初的民族大融合過程，即便被迫往南遷徙的中原部族，也逐漸更進一步地與長江中、下游，乃至於珠江流域的當地各族（例如百越等）結合起來；更甚者，由於中原農耕文明所具備的相對高度與強韌性，一方面使南遷的新族群紛紛向滯留漢人進行「文化採借」，[（註80）](#)北方（黃河流域）新興諸國的典章制度與禮儀法律也幾乎都交由漢人制定，其次，由於舊帝國核心（自稱正統的政治機構）轉而定居南方，在行政強制力政策的推動下，所謂江南地區因此不斷提升「漢化」程度，至於前述在南、北同時發生的大規模文化融合過程，長期看來，或許也奠下了帝國再造的社會基礎與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述族群交流過程中，尤其是在初期階段，思想衝突、種族糾紛及政治鬥爭等因素經常帶來各種破壞與矛盾，原先帝國地理核心（中原）陷入戰火紛飛的長期亂世，排他性族群意識由此再度抬頭並發揮其影響力；最具代表性的言論可算是江統在二九九年提出「徙戎論」，目的的一方面是希望凸顯「關中之八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環境現實，並強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之潛在危機，至於政策主張，則是建議遣返「人面獸心」的胡人。正如前文所言，此種充滿敵對意識的族群分化論調，在國際秩序蕩然無存時往往會順勢而出，例如早在春秋時期，《國語·晉語》中便有類似「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描述，《左傳·成公四年》也提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說法，這些既都被江統等人所繼承下來，亦不啻是當時的主流看法，反映出該時期中原文明處於相對劣勢下存在之普遍不安全感，與由此激發之消極自保意識。從某個角度看來，無論歐洲在兩次大戰期間的法西斯浪潮，抑或近年來聲勢陡起的極右派排外主義，背景豈非都與此若相彷彿。

以混合為特色的新帝國架構 儘管自十九世紀迄今，由於民族主義成為具支配性的主流意識形態，致使尋找、凸顯並發展以「單一民族」為主的各自特色，也成為國家在追求競爭力時奉為圭臬的政策核心。事實上，近代以來源自歐洲的民族主義思潮也反映出自封建解體後，區域國際關係因戰亂頻仍所導致的反射性自保想法，與中國處於分裂時期的想法相當類似，差異在於每當中國「回歸一統」後，此種思想便轉趨非主流。無論如何，從更普遍之歷史現實看來，強調兼容並蓄的「融合」（hybrid）似乎才是邁向偉大成就的不二法門。不僅奠定第一帝國基礎的秦朝，所謂「統一六國」本來就充滿了融合意味，做為第二帝國的隋唐時期亦復如此，[（註81）](#)西方的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乃至既存超強美國，何嘗不是藉由「民族融爐」特色以致成就霸業。

巧合的是，就在主導東亞體系的第一帝國於四世紀初遭到遊牧部族襲擊的同時，位於歐亞大陸西側，主導著地中海體系的羅馬帝國也面臨類似挑戰；[（註82）](#)自三世紀起便不斷對帝國邊境施壓的中亞西翼民族（以日耳曼人為主），其後或許部分來自於匈奴西遷導致的骨牌推擠效應，在逐步從高加索區往多瑙河流域滲透之後，首先藉由帝國在地緣結構上的缺陷（以地中海作為核心的羅馬帝國，本便缺乏足夠防禦縱深），直接切入義大利半島進行劫掠，隨後而至的匈奴人更以此作為基礎，在四七六年摧毀西羅馬帝國並橫掃大半歐洲。[（註83）](#)可以這麼說，就在復興後的匈奴族陸續將東西兩大帝國帶進「黑暗時代」（Dark Age）後，文明發展雖暫時進入休眠緩進狀態，但在此歷史時期中，一方面遊牧與農耕文明之交融互動不啻為下一階段的創新蘊積活力，亦讓重建後的帝國結構內涵有了不同以往的重大轉變。

以中國在隋唐時期的第二帝國為例，與先前的第一帝國時期比較起來，便可明顯發具有更高且明顯之「包容性」特徵；不僅「華夷之辨」不再重要，胡漢通婚相當普遍（包括高級皇族），在西元六三〇年前後（唐太宗貞觀初年），唐朝對於大量內附的突厥與鐵勒人貴族也「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

士相半」，[\(註84\)](#)可見其所受到的相對「平等」待遇。[\(註85\)](#)更甚者，唐太宗同時被周邊諸國尊為「天可汗」，相較第一帝國，更在客觀形式上被確認了體系核心地位。[\(註86\)](#)事實上，從太宗一直到代宗年間，歷代唐朝皇帝均有被尊稱為「天可汗」的紀錄，其中光是在唐玄宗時期就高達了七次之多，除唐朝本身確實擁有帝國所需之不對稱優勢外，原因亦或因大食（伊斯蘭阿拔斯帝國）不斷向東擴張入侵中亞西域地區，以致該區域諸國紛紛要求唐朝保護其安全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由於唐朝看似胡風昌盛，[\(註87\)](#)以致於有人認為它有若干「突厥化」傾向，但這不過反映出前述「融合性」特質罷了。例如，唐太宗在接受西北諸民族呈上「天可汗」尊號時便曾指出：「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可見他仍然堅持以「中國中心觀」為主的帝國體系概念，正因如此，「大唐天子」的政治位階自然高於「可汗」，不過為了籠絡游牧部族，只好折衷創造「皇帝天可汗」的雙重稱號。除此之外，第二帝國時期另一個值得關注之發展特徵，則凸顯於帝國經濟重心，逐漸由黃淮平原南移至長江下游三角洲（俗稱江南）的現實上，至於其歷史影響，首先是「政經中心分離」（此後帝國首都難以同時身兼政經中心）之不得不然趨勢，[\(註88\)](#)更重要的是，由於帝國外部威脅主要依舊來自北方，經濟重心南移的結果，不啻造成補給線拉長與後勤成本大幅提高的負面效果，以致在第二帝國崩解後，游牧民族隨著再度南下，長期控制了舊體系核心地區，並讓其後完成統一中國本部的朝代，被迫面臨著更嚴酷的重建帝國條件。

地緣環境變遷下的第三帝國

由於游牧部族自三世紀以來不斷南下，甚至長期盤據原帝國（體系）核心地區，重建後的第二帝國又採取「融合」政策來面對新的多民族環境，這些都使一度被逐離的北方勢力藉由持續吸收農耕文

化，從而拉近了雙方的力量對比；再加上前述政治與經濟重心分離的影響，一方面阻礙了農耕部族重建帝國的過程，繼四世紀初至六世紀末的「大分裂」後，[\(註89\)](#)自第二帝國於九世紀末崩解，直到十四世紀中葉為止，再度促使遊牧與農耕兩大勢力，在東亞世界中維持著某種多極平衡態勢。由於邊境遊牧民族施加之沉重壓力，重新控制中國本部的宋朝雖然無法如過去一般順利建立帝國架構，[\(註90\)](#)不過，對其構成強大威脅的遼（契丹族）或金（女真族）等北方政治勢力，也因為難以解決本身內部矛盾（融合新的漢化習慣與舊有遊牧風俗），由此大幅限制了繼續擴張南下的可能性。接下來異軍突起的則是蒙古的力量；事實上，蒙古的崛起對歐亞權力結構變化具有極重要的象徵意義。

歐亞陸權系統之擴張及其影響 儘管後來入主中原的元朝，長期以來被中國中心史學家們一廂情願地納進「正統王朝」系統，一方面在蒙古勢力崛起的過程中，至少直到其關鍵領袖成吉思汗在一二二七年去世為止，[\(註91\)](#)影響所及之勢力範圍主要集中於從蒙古草原至中亞地區之間，往南尚未跨越黃河，與青藏高原之間也還隔著西夏勢力；其後，在蒙哥汗於一二五一年聯合拔都成功奪權之後，蒙古實際上便一分為二，後者單獨在西方鞏固了欽察汗國的力量，[\(註92\)](#)至於旭烈兀在一二五六年建立伊兒汗國之後，[\(註93\)](#)則不僅只願意在名義上從屬於蒙古可汗，甚至在第七任合贊汗時期，一方面悍然拒絕認可蒙古可汗的權力，且持續與欽察汗國之間進行戰爭。換言之，「現實」是既從未存在過一個多數人想像當中，橫跨歐亞大陸的統一蒙古大帝國，即便是進入了東亞體系當中的蒙古勢力，其重心也始終沒有放在這個體系上頭，費正清所謂「在蒙古帝國之內的中国」的說法，不啻是個明顯且實際之暗示，[\(註94\)](#)何況在不久之後，蒙古便被迫重新回歸以中亞草原作為主要活動範圍。

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儘管目前大部分人都接受起自十五世紀末期，由歐洲藉著地理發現運動率先掀起全球化浪潮的「正統史觀」論述，但事實是：首先，歐亞大陸不但是在地球表面上覆蓋面積最大的一塊陸地，同時是人類數量最多且活動最頻繁密集的一個區域（且可延伸至北非地中海沿岸），當然也是所謂「國際關係」發生的主要場所，儘管如此，由於從中亞草原一直到青藏高原之地理阻隔，人類在這塊大陸上的活動，長期以來都被迫各據一方，亦即以地中海世界與東亞體系為基礎，形成所謂「西方」與「東方」之相對性地緣概念。

其次，前述源自歐洲的全球性地理發現運動，結果雖然在表面上帶來了所謂「海權」時代，追逐海權自始便非戰略關鍵所在，透過新路徑（海路）接觸或控制另一端人群聚集處（東方），始終才是主要目標。第三，隨著東西方一度各自形成穩定的帝國結構（羅馬帝國與秦漢帝國），其對外投射能力的上升，加上與游牧民族間互動更趨頻繁，一方面使連結東、西兩方成為某種具有明顯利益的活動（以絲路為主之貿易通道便因此應運而生），尤其在源自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勢力於六到九世紀之間打通歐亞管道後，十二到十三世紀之間接踵崛起的蒙古勢力，不啻讓此一管道的發展與效益臻於高峰，可以這麼說，正是存在著一個繁榮的歐亞貿易系統，提供了歐洲人往東方探險的足夠誘因，至於此一貿易系統在促使歐亞大陸地緣板塊發生質變之餘，亦刺激著中國傳統對外觀念進行修正與部分扭轉。

中國海洋戰略之掙扎與內部限制 自第一帝國時期以來，由於中國長期控制了亞洲大陸東境長達一萬公里以上的海岸線，隨著航海技術逐漸發達，也慢慢取得與東北亞（以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嶼為主）以及東南亞（環南中國海地區至麻六甲周邊）地區的海上貿易聯繫；其後，由於海路相較於傳統陸上貿易線（由河西走廊出發，穿越中亞直抵地中海東岸的絲路主線）的安全性，加上掌握季風作為

動力來源、相關生產技術突破（從絲織品到瓷器），以及經濟重心南移至華中與華南地區等因素影響，至宋朝以後，中國周邊不僅海上貿易愈發鼎盛，泉州成為當時世界第一大港，[（註95）](#)根據既有史籍記載，此際與宋朝有通商關係的國家總數達到五十八個，從而讓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活動，於十二到十三世紀之間超越了阿拉伯人。[（註96）](#)更有甚者，在前述蒙古勢力藉由歷次西征打通歐亞大陸，甚至連結阿拉伯半島伊斯蘭勢力的通道後，皆替廣大的「世界島」東側帶來無數的行商與旅客。

前述發展對歐亞大陸西側帶來了好壞參半的影響（蒙古西征帶來了死亡無數的黑死病，也為十五世紀末地理發現運動奠下基礎），至於東側，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則面臨著如何處理此一地緣環境新變數的重大決策挑戰。

進一步來說，對比第一與第二帝國時期所奠下的地理邊界基礎，明朝表面上雖因為重新控制「中國本部」而滿足建構帝國的基本地理要件，遭驅趕至塞北的蒙古也沒有帶來如同北宋所面臨之契丹與女真般的嚴重威脅，但歐亞大陸地緣板塊內涵變化，再加上海洋貿易發達帶來了不同於陸權本位之戰略視野，仍讓「世界內涵擴張」（亦即中國不再被地理環境「孤立」於東亞一隅）成為明朝在設法重建帝國時，難以克服之最重要挑戰。換句話說，明朝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將「自我閉鎖」於原有傳統體系邊界之中，尋找以此為基礎重建帝國結構之可能機會，其次，則是接受新的地緣變數，從陸上與海上連結過去數百年來逐漸成形的歐亞交通新動脈。

對此，至少是明白海外貿易潛藏的龐大利益，因此明太祖一度特設市舶提舉司來管理相關事宜，但隨後在一三七〇至七二年間，表面上為了抵制蕃貨，其實是唯恐張士誠與方國珍舊部捲土重來，[（註97）](#)於是下令「罷太倉黃渡市舶司」，這也是所謂「海禁」政策的開端；接著在數度重申類似禁令之後，[（註98）](#)一度使明朝對外經濟互動只剩下單純的朝貢貿易而已。推究朱元璋所以採取消極退縮政策

的原因，固然與當時中國缺乏防禦廣大海疆之必要技術與能力有關，但也正因如此，由於中國作為區域體系核心，在經濟剩餘持續外溢散發的誘惑下，反倒讓非法貿易蒸蒸日上，倭寇（泛指東亞沿岸海盜，非專指日本人）也在此種情況下難以滅絕。若比照西班牙在十五至十六世紀統治拉丁美洲時遭遇的挑戰，彼時大西洋海盜之猖獗也源自類似背景。

從另一個角度看來，明朝在實施「海禁」政策時，考慮者或許不僅是國家安全問題而已。正如曹永和所言：「我國歷朝均為農業國家，僅元朝是以商業國家為其性格」，這一方面再度反映出前面所提及，蒙古勢力相較於中原正統王朝（尤其是第一與第二帝國）的差異，至於原委也相當簡單：對任何統治者來說，儘可能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乃最起碼的政策理性，在農耕地區繼續作為結構核心的情況下，農業部門與農民利益自然是左右政治秩序穩定的關鍵，基於「農商相剋」定律（有用土地有限，農民必須仰賴耕地生存，但商人又傾向掠奪作為農民最重要資本財的土地），「重農抑商」乃成為不可避免的國策重心，自秦漢建立第一帝國以來，各朝無不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明太祖掙扎於開放邊緣，最終傾向於透過自我閉鎖政策來試圖重建帝國架構，其繼任者明成祖朱棣派遣鄭和數度「下西洋」的舉措，則不啻暗示著另一種積極政策取向，亦即努力去正面因應新的地緣變數。儘管如此，隨著前述積極海洋戰略在一四三三年最後一次（第七次）任務結束後悄然中止，尤其明朝終究無法有效壓制北面的蒙古勢力，這也讓此時期成為一次失敗的帝國重建經驗。[（註99）](#)

從排他性意識重回融合政策 對比從西周體系到第一帝國時期（西元前七七〇至西元前二二一年，約五百五十年），以及從第一帝國到第二帝國時期（二二〇至五八〇年，共三百六十年）所經歷長短不一的過渡時期（括號內僅為參考年代），接下來從第二帝國到第三帝國（九〇七至一六四四年，近七百四十年）之歷史間隙顯然更為

漫長。此結果固然或須歸因於前述歐亞地緣板塊變動之效應，我們更關切的，還是它對中國對外觀念與行為的影響。

最主要的差別表現在「中心觀」的內涵上。

正如前述，若比較第一與第二帝國時期，當可發現較高的體系安全係數既導致「中心觀」產生質變（由狹義民族意識，轉而彰顯更廣泛之世界主義意涵），也讓第二帝國願意採取較開放的對外政策態度。不過，由於北方勢力在第二帝國崩解後的漫長過渡期中，對舊帝國核心區（中原）呈現出更強大的威脅壓力，甚至整個中國本部亦史無前例地首度完全被塞外民族（蒙古）控制，由此一方面再度將族群意識提升至頂點，加上被迫往北遷移後的蒙古勢力始終未完全受到壓制，東南沿海又成為新的威脅來源方向（倭寇），在腹背受敵威脅下，這也使努力重建帝國的明朝被迫選擇具一定程度「閉關」性質的排他性對外政策，在宣布前述海禁政策之餘，也擴大修築強化長城防禦網，[（註100）](#)希望藉此塑造出一個相對安全的外部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自十五世紀中期後，承接蒙古勢力作為歐亞板塊中間樞紐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似乎無意繼續維繫東西交通管道，甚至自十六世紀初起更致力於巴爾幹向東歐地區進行戰略擴張，於是讓阿拉伯穆斯林與蒙古人在八到十三世紀接力引發的地緣變數頓時宣告中止；其次，此際歐洲人雖已開啟遠洋探險運動，並在十六世紀穿越印度洋，成功建立東西方之間史上首度海洋聯繫，直到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帶來新的爆炸性能量前，歐洲國家實則無力將此條新通道轉換成等同於絲路的地緣戰略變數。正是在歐亞大陸再度裂解之結構背景下，滿清既免於面對如同明朝一般的戰略兩難困境，更順勢利用東亞體系重新恢復相對孤立狀態的契機，成功地重建了帝國架構，此即「第三帝國」時期。

進言之，建構第三帝國的滿清勢力，雖然是繼蒙古之後，第二個完全控制中國本部的塞外族群，比起前者有中亞大草原以及散布歐亞大陸各處部族勢力作為依恃，汲汲藉由管理歐亞通道獲致利益，從一開始便鎖定「問鼎中原」目標的滿洲，非但將重心徹底移入關內，更甚者，相較蒙古刻意貶抑漢人地位，[\(註101\)](#)滿清則自入關建政後，至少在表面上宣稱「天下一統，滿漢自無分別」，表現出極盡籠絡之意。儘管滿人無可避免占有優勢主導地位，「雙元政治」的平行設計仍讓漢人得以分享相當程度的政治權力，甚至皇帝還帶頭強調漢化，在貴族教育中特別重視對於儒家經典的學習，在滿足傳統漢族士人菁英優越感之餘，也提供了一個心理層面的平衡支點。例如從清末經驗可見，面對新一波外來壓力，相較元朝末年土崩瓦解與樹倒猢猻散，此際高舉「扶清滅洋」大旗的民粹主義浪潮一度還甚囂塵上，在面對以漢人為主的太平天國挑戰時，[\(註102\)](#)清廷亦反而成為衛道重鎮所在。

不僅如此，比起第一與第二帝國時期，雖然帝國架構本身暗示著高度的權力集中性，周邊外部安全威脅（從匈奴到突厥）雖受壓制但始終未能被根除，在歐洲壓力於十八世紀中葉「意外」而至以前，由清朝建構的第三帝國幾乎享有可稱為「絕對安全」的體系環境，幾乎不存在明顯外患，主要原因便在於其具有高度融合性的民族政策。

早在入關以前，滿清便有「理藩院」的制度設置，負責處理與周邊附庸勢力之間的關係，其後透過不斷擴充，該部尚書且經常參贊軍國大事並提供意見。除此之外，它也透過靈活且因地制宜的政策來處理相關問題，例如利用頻繁密集的貴族通婚，與設計特殊的「盟旗」制度來拉攏並管理蒙古部族事務，[\(註103\)](#)透過「崇其教但抑其政」的政教分離手段，並設法影響「忽畢勒罕」（靈童轉世）過程來控制西藏地區，以及將西北與西南的世襲貴族（在新疆稱「伯克」，在雲南稱「土司」）改為簡放官（此即所謂改土歸流政策）以強化中央管制權力等，結果也讓清朝成為唯一不將修築長城視為國家安全要務的帝國時期。

近代涉外關係與後帝國格局

或可這麼說，若非歐洲自十六世紀以來透過地理發現運動帶來一波全球化浪潮，從而使其影響逐漸及於世界各地，由清朝藉由重建帝國形塑出來的東亞體系，不僅比前面兩個帝國架構具有更高的穩定性，延續時間或許也應該更長一些。但現實是，如同李鴻章在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所言：「……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形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聚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械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砲彈所到無所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千年來未有之強敵。」[（註104）](#)這確實點出了近代中國所面臨對外關係之困境特色與挑戰所在。

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與東亞體系 一度由於蒙古打通由中亞草原至西亞伊斯蘭地區之通道，以致貿易來往頻率大幅提高的歐亞大陸東西兩側，在蒙古趨於式微，以土耳其為主的伊斯蘭勢力代之而起後，一方面由於宗教與文明衝突而提升陸路貿易障礙，依舊存在貿易需求的西歐國家則被迫轉而自行尋找前往東方的遠洋航路；其結果是，以葡萄牙與西班牙為先驅的幾個主要海權國家，在十六至十八世紀間不斷地增加與南亞及東亞地區的接觸，從而亦開啟以「海洋通道」為主的東西方交流新階段。其後，更具關鍵性的發展當屬英國在十八世紀末開啟工業革命，由此所帶來的雙邊貿易內涵之轉變（歐洲國家由進口商角色轉為以出口導向為主），最終不僅重塑了東西方關係，也宣告全球化時代正式來臨。

對此，儘管「中國何以沒有出現工業革命」乃是許多人關注的問題，[\(註105\)](#)但它畢竟不是本書焦點所在。此處所關切的，首先是第三帝國所受到的外部環境壓力及其政策回應內容。

可以這麼說，中國雖然很早便脫離了「早期國家」階段，並建構了以中央集權為特色的帝國架構，正如同一時期的世界各地（包括歐洲在內）一般，離目前眾所周知的現代國家特徵仍有明顯的距離。歷經一段時間之各自發展，透過海外擴張與隨後產業革命的激盪，歐洲不僅率先朝向現代國家階段邁進，大幅強化效能後的政府體制更成為其稱霸世界的關鍵，此種狀況非但與戰國時期類似（例如趙武靈王、魏惠王或秦孝公等，都曾經藉由率先進行法政體制改革以獲致競爭優勢，而改革亦通常意味著提升總體效率的努力），相對地，中國不僅在類似過程中處於落後劣勢，甚至正如前述，面對較高穩定性的周邊安全環境，在遙遠的歐洲壓力陡然來臨前，第三帝國也確實找不出進一步改革的動機。[\(註106\)](#)在此情況下，由於政府效能（西歐現代國家與或可稱前現代國家的中國）與心理狀態（現狀挑戰者與維持現狀政策的對比）上都存在差異，清廷的回應結果自然很難讓人滿意。

雖然「人和」（少數民族統治埋下日後改革失敗的主要變數）條件不佳，但因「地利」（遠東地區乃歐洲殖民最後抵達之處，以當時技術而言仍屬於遙遠地帶，致使其投射能力受到限制）與「天時」（入侵者在十九世紀末開啟一波新帝國主義浪潮後，隨即捲入以歐洲為主戰場的兩次世界大戰）之便，以清朝為核心的東亞帝國體系雖因全球化浪潮來襲而告瓦解終結，擁有廣土眾民支撐的中國仍倖免於被殖民的危機。只不過，隨著改朝換代而來的形式民主體制，一方面既無法有效解決困境，長期內憂（從軍閥混戰到國共兩度內戰）加上外患（尤其是日本侵略）的威脅，亦不斷地挫折著各種可能的改革機會，終究讓中國在當代全球體系持續成形並落實的過程中，不僅國際地位，甚至在文明內涵方面也出現史上首度自我貶抑的趨勢，無論是一九二〇年代的「全盤西化」論調，抑或是一九六〇年代以「破四舊」為口號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明顯例證。

從某個角度看來，這不啻也是所謂「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的內在面向。

當代中國崛起的發展及其暗示 總的來說，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的國際政治發展，乃是一段起伏跌宕且令人目不暇給的歷史過程。在二十世紀初的某些時刻中，歐洲國家的全球宰制地位似乎看來牢不可破，英國依舊在國際經濟體系互動中呼風喚雨，國際秩序也維持在某種「動態平衡」的穩定狀態中。正如美國《紐約時報》在一九〇〇年元旦社論中所表達的祝福：「那即將到來的輝煌世紀，將卸下窮人身上的重擔，掃除所有不幸與謬誤，並讓天使所頌讚的和平仁善如雪花飄揚大地，灑落在那些爭戰對立的國家中」一般，狄金遜（G. Lowes Dickinson）也在一九〇五年提到：「……我看到這個時代即將來臨：世界各國捐棄政治敵對而以和平貿易競爭結合在一起，民族障礙消融在科學與藝術的照耀下，槍砲聲為織物聲所掩蓋，工匠裙與農夫衫較軍服更受尊重，上帝不再被人類的無知愚行與罪惡所隔絕，個人的努力與發明將成為全體的成就」。[（註107）](#)但這些預言與幻想隨即為兩次世界大戰徹底擊潰。

自此，歐洲等於自我終結了數世紀以來作為全球體系核心地區的位置，取而代之的則是美國與蘇聯的兩極對峙時期。

其後，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儘管美蘇兩強的權力是不均衡的，核武競賽依舊帶來某種平行對抗的假象，並使許多人認為兩國之共存霸權乃是牢不可破的，曾幾何時，隨著後冷戰時期在世紀末來臨，不僅蘇聯稱霸世界的迷夢風流雲散，即便自後冷戰初期至新世紀初一度有機會鞏固單極結構，甚至嘗試「建構帝國」的美國，也在起自二〇〇八年末金融危機的挑戰下，面臨著地位消長的關鍵轉捩點。美國的整體能量與國力雖或許依然無可忽視，當前國際體系呈現的乃是具有「準多極」特徵的格局，至於其中暗示可能出現的「權力

真空」狀態，既讓不少霸權候選者躍躍欲試，事實上也有不少國家確實展現出顯著的競爭能量，中國便是其中之一。

正是在前述背景下，基於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所釋放出的活力，以及其所達成的推升正面增長效果，中國的國際地位不但跟著水漲船高，對自身國際定位的態度亦愈發積極。正如閻學通所言：「冷戰結束後，中國崛起的勢頭愈來愈明顯，國人也感到中國在世界上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於是認為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不錯。」[（註108）](#)大致反映出此際中國內、外主流的普遍看法所在。據說，拿破崙曾將中國形容成一頭「睡獅」，並預言「一旦中國覺醒，天下將為之震動」；至於到了二十世紀末，也有許多人高聲疾呼「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從某個角度來說，這些「命定式」的說法雖然缺乏根據，也無實質意義，「事實」是中國當前的綜合國力確實提供了大量可供討論與臆測的空間；更甚者，作為全球發展最快的大型經濟體，中國（或許還包括印度等）的崛起似乎正暗示它將繼歐洲與美國後，成為近代國際關係史中足以重新形塑全球結構內涵的一股新力量。

無論如何，在第三帝國於十九世紀末逐漸崩潰瓦解之後，如同過去的歷史一般，中國也再度進入另一段過渡時期當中。

當前中國既面臨著類似十四世紀末明朝試圖重新建構帝國時，世界範圍大幅擴張的挑戰，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由於當前國際體系結構與非戰價值觀之限制，亦暫時很難想像它透過如以往般的大規模戰爭手段來鞏固自身地位，並提供穩定之世界秩序，因此在可能的「再崛起」道路上，包括中國是否可能崛起、最終將以何種途徑邁向崛起、崛起後對國際結構與世界秩序將帶來何種影響、各方勢力又將如何面對中國崛起的挑戰、是否可能引發進一步衝突等等問題，相信在可見的未來，依舊是受國際學術與輿論界關注的議題焦點所在。[（註109）](#)至於本書之寫作目的，則是在深信「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的前提下，試圖透過客觀地「鑑往知來」的歷史角度，回首

漫長過往，設法探索可用以觀察未來中國外交政策發展的蛛絲馬跡。

（註40）參考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著，陳曉林譯，《歷史研究》（台北：遠流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第十一章。[↑](#)

（註41）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相關著作請參考：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九四年）；劉尊棋譯，《偉大的中國革命》（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張沛等譯，《費正清中國史》（長春：吉林出版集團，二〇一五年）。[↑](#)

（註42）在一九八七年學界首度提出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後，有關當前中國對西方國際關係之研究、批判與自我建構，可參考：傅耀祖與顧關福編，《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郭樹勇編，《國際關係：呼喚中國理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趙可金與倪世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等。[↑](#)

（註43）相關著作可參考：葉自成，《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外交思想》（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許田波，《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二〇〇九年）；Yan Xuetong, et al,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註44）中國政府在一九九六年正式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隸屬於「九五計畫」下的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希望結合自然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共同解決中國上古史中的若干爭議，其後

曾於二〇〇〇年公布《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等，但事實上未能形成學術共識。無論如何，本書將「周」視為是個時代（era or period）而非王朝（dynasty），理由見後續所述，歷史起點約為西元前一〇四五年。[↑](#)

（註45）相關著作可參考：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台北：慧明文化，二〇〇一年）；李玉潔編，《中國早期國家性質》（台北：雲龍出版社，二〇〇三年）；李學勤編，《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台北：雲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易建平，《部落聯盟與酋邦：民主、專制與國家起源問題比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四年）；沈長雲與張渭蓮，《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與形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

（註46）See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W. Norton, 1975).[↑](#)

（註47）有關西周問題討論可參考：許倬雲，《西周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楊寬，《西周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年）；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九年）；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與政治危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楊寬，《古史新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等。[↑](#)

（註48）部落聯盟乃是由以血緣氏族為主的部落，彼此共同組成鬆散且具分權性的政治單位，酋邦則指「在這種社會中，政治權力集中在一個人（酋長）身上」，一般而言，酋長權力具神授暗示，可介入分配土地等生活資源。William A. Haviland, *Anthropology*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ing, 1999).[↑](#)

(註49) 例如《荀子·儒效篇》曾言：「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可見周公進行普遍分封的政治意涵重點所在。↑

(註50) 如果與希臘城邦制度類比的話，則周之國人雖未必有「公民大會」可以參加，但仍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發言權，甚至可議論國君，如《史記·周本紀》所言「厲王虐，國人謗之」，甚至「乃相與叛，襲厲王」便是例證。↑

(註51) 也有人基於此時期高於部落之文明特徵，將其稱為「城市國家聯盟」(city-state alliance)。↑

(註52) 從現有青銅器銘文內容看來，諸侯雖有向周王「朝覲」或「述職」的描述，但是否定期進行或確切儀式又如何，則難以稽考，且隨著距離拉長，例如東方諸侯與王室關聯便更加模糊。除此之外，周王對於諸侯國之間的紛爭，壓制與仲裁能量亦不甚明顯。↑

(註53) 例如《戰國策·趙策三》有言：「古時都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便可看出西周初期的現象，其中，一丈約等於現今二點二公尺；但到了戰國初期，則「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經濟效應也完全顯現出來。↑

(註54) 所謂「春秋時期」是因孔子修訂《春秋》一書得名，大致起自西元前七七〇年(周平王元年)東周立國，迄於西元前四七七年(周敬王四十三年)為止，共約兩百四十年左右。至於接續其後的「戰國時期」，若根據《史記》始於西元前四七六年(周元王元年)，亦即緊接著春秋時期，但根據《資治通鑑》則始於西元前四〇三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的趙魏韓「三家分晉」，但這將使其與春秋時期出現約七十年的間隔，無論如何，它以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告終。↑

(註55) 由於上古史料殘缺，相關描述實無法取得共識。例如錢穆在《國史大綱》書中便提到：「見於春秋國數凡五十餘，若並見左傳者計之，有百七十國」，其註解又引顧棟高所著《春秋大事記》指出，在兼併過程中「楚併國四十二，晉十八，齊十，魯九，宋六」，也可作為參考。[↑](#)

(註56) 在所謂「會盟」的標準步驟方面，首先是約定會期與會議地點（通常設在野外，在平地上築土為壇），提供場地者必須負責保護與會者安全，接著在諸侯登壇就位後，則由稱為「相」（會議司儀）的官員引導進行討論，最後，為確保盟約的有效性，與會各方必須向祖先神靈發重誓，反映出神權政治的遺緒。[↑](#)

(註57) 當時的國際會議未必都由霸權國家召開，例如兩次「弭兵之盟」便是；第一次是由宋國大夫華元在西元前五七九年拉攏晉國與楚國暫停敵對狀態，第二次則由同樣是宋國大夫的向戌，在西元前五四六年拉攏十四個國家與會，但成效均不大。[↑](#)

(註58) 一般認為，「北杏之會」僅是齊國爭霸的開端，桓公的盟主地位此時並未得到公認；為真正鞏固霸主地位，齊桓公又在西元前六七九年與宋、陳、衛、鄭等諸侯會盟於鄆，因為此次會盟由桓公獨自召集，足見其號令諸侯的影響力，桓公自此也以「尊王攘夷」做為政治號召。例如《史記·齊太公世家》便指出：「七年，諸侯會桓公於鄆，桓公於是始霸焉。」至於西元前六五三年的「葵丘之會」，既為齊桓公召集的第七次會盟，亦為其霸業頂點。[↑](#)

(註59) 此際中國境內戰爭性質的轉化，其實也可見於歐洲自封建崩解迄今的歷史當中。[↑](#)

(註60) Michael Loewe, "The Heritage Left to the Empire," in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031.[↑](#)

(註61) Li Feng, “Feudalism and Western Zhou China: A Critic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3:1 (2003), pp.115-144.[↑](#)

(註62) 相關概念其實源自西方觀點，但最初被使用的時間已難以考證。根據何漢理 (Harry Harding) 的研究，該名詞早在一八二七年左右便已存在，但也有另一些人指出，英國學者溫特伯森 (William Winterbotham) 在一七九五年 An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 書中便提出過「China Proper」的概念。[↑](#)

(註63) 事實上，包括內藤湖南 (一八六六—一九三四) 在內的部分日本學者，在二十世紀初便提出「所謂東洋史就是中國文化發展歷史」的概念，亦即以中國文化發展作為界定東洋 (亞) 史的範圍，頗具客觀性與參考價值。[↑](#)

(註64) 正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言：「孟子見梁襄王，出與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之。』」[↑](#)

(註65) 日本學者好並隆司在《秦漢帝國史研究》(東京：未來社，一九七八年)一書中認為，秦國以游牧為主的經濟型態容易產生「君權神授」趨勢，東方六國由於以農業經濟為主，因此「家父長奴隸制」乃居於主導地位，至於在秦統一中國後，建立帝制之目的便是企圖結合上述二者；對此，中國學者林劍鳴在《新編秦漢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一九九二年)書中也持同樣觀點。但本書仍傾向由重建層級性體系角度來加以觀察。[↑](#)

(註66) 此為大致狀態，但不排除在秩序陷入紛亂之分裂時期的「幾人稱帝」現象。[↑](#)

(註67) 參見：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馬伯樂，《古代中國》（La Chine antique，一九二七年於巴黎出版）。[↑](#)

(註68) 近代研究結果顯示，長城走向約略與四百毫米（或十五英吋）等雨線重疊，這條線是森林植被與草原植被的大致分界，也是不同經濟型態的分野。俞煒華、南文海，[□長城與農耕游牧民族的分界線□](#)，《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第一期（二〇〇九），頁四六至五二。[↑](#)

(註69) 五服的說法最早見於《尚書·禹貢》中，其細目包括：「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採，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主要說明根據地理遠近所呈現出來責任義務的差異。[↑](#)

(註70) 井田制一般是指春秋時期以前可能存在的土地公有制形式，此一名詞最早見於《穀梁傳·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但部分學者（例如在一九一九年撰文否定此一制度的胡適）認為，此種設計可能僅僅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制度，由於實際地形地貌的限制，事實上它很難被嚴格實施。[↑](#)

(註71) 有關「中國」涵義，例如《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中國，京師也。」《史記·五帝本紀》：「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集解》：「劉熙曰，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這些都是指京師或首都之意。其次，

《詩經·小雅·六月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禮記》：「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指的則是華夏民族聚居之地，與諸如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華等同義。[↑](#)

（註72）安部健夫，[《中國人の天下觀念》](#)，收於《元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一九七二年）。[↑](#)

（註73）例如《左傳·莊公三十一年》曾經提及：「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公羊傳·禧公四年》稱：「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公羊傳·成公十五年》亦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註74）有關中國「天下觀」的討論可參考：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於省吾，[《釋中國》](#)，收於《中華學術論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趙汀陽，《沒有世界觀的世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高明士，《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北：政大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等。[↑](#)

（註75）西漢於西元前六〇年在烏壘國（今新疆輪台以西）首設西域都護府，由鄭吉出任都護，此後至西元二三年新朝初期撤廢前，共十八人擔任過此一職務，負責管理天山南路區域秩序。[↑](#)

（註76）單于為匈奴部族長稱號，在握衍胸鞮單于於西元前五八年死後，匈奴因多人自立單于陷入紛爭，進而分為南北二部；其中，南支呼韓邪單于在西元前五四年被郅支單于所敗，轉而求助漢朝。[↑](#)

(註77) 王明珂曾將遊牧者所進行者分成「生計性掠奪」(subsistence raids)與「戰略性掠奪」(strategic raids)兩大類，前者通常是在秋季或初冬為配合季節活動所進行，後者則是為了威脅恐嚇定居國家所發動的，參考《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落》(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九年)；但此處則將前類行動併入後者考量，例如匈奴對漢朝施加壓力的結果，不僅換得後者對其納貢，亦迫使後者在文帝與景帝之間開放邊境貿易(設置關市)，由此對其經濟所得亦大有正面助益，對此可參考余英時，《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八年)等。最後，關於匈奴部落源起部分，可參考：林幹，《匈奴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武沐，《匈奴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二〇〇九年)。↑

(註78) 西元九〇至九一年間，漢朝依南匈奴單于請求，派遣將軍竇憲等出兵討伐北匈奴，直抵燕然山(蒙古杭愛山)刻石頌功，其後又再勝於金微山(新疆北部阿爾泰山)。一部分潰敗之北匈奴繼續向西逃去，在塞北的殘餘勢力亦大多被消滅，地盤陸續被鮮卑族乘機佔領。↑

(註79) 五胡亂華是由氏族及匈奴族揭開序幕；首先是氏族領袖李雄在三〇四年自稱成都王，史稱「成漢」；於此同時，匈奴族劉淵也在山西離石起兵，史稱「漢趙」，此亦為五胡建國的開端。↑

(註80) 文化採借(cultural adoption)意指「接受經過選擇的異文化素材」，亦即把部分他者文化納入自身制度功能體系的一種過程，十九世紀末以來的全球「歐洲化」也是一例。↑

(註81) 參見：谷川道雄著，耿立群譯，《世界帝國的形成》(台北：稻鄉出版社，二〇〇九年)。↑

(註82) 近期氣候史研究指出，北半球自二世紀末起進入小冰川期，由此延續至四世紀末左右，不僅迫使歐亞大陸內側受乾燥化所苦的游牧民族向南遷徙，原本緯度適中的農耕區也深受嚴寒與旱災侵擾。[↑](#)

(註83) 最著名的匈奴領袖當屬有「上帝之鞭」稱號的阿提拉 (Attila)，他曾率軍隊兩次入侵巴爾幹半島，包圍君士坦丁堡，並遠征至高盧 (今法國) 地區，接著更攻進義大利半島，使西羅馬帝國終於名存實亡。在其帶領下，匈奴部族在西元四四八至四五〇年間版圖達到盛極狀態，東起鹹海，西至大西洋岸，南達多瑙河畔，北部影響力則至波羅的海附近。[↑](#)

(註84) 鐵勒又稱敕勒、高車、丁零等，為六至七世紀亞洲大陸中部突厥以外，突厥語游牧民之總稱，其中之一的回紇 (回鶻) 在七四四年統一鐵勒部落建立汗國，成為唐朝晚期主要外患。[↑](#)

(註85) 有關隋唐時期胡漢互動關係可參考：劉義棠，《中國西域研究》(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七年)；林天蔚，《隋唐史新論》(台北：東華書局，一九九六年)；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章群，《唐代蕃將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姚大中，《中國世界的全盛》(台北：三民書局，一九八三年)；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等。[↑](#)

(註86) 所謂「天可汗」乃Tängri Qaghan一詞的音譯。游牧民族稱「天」為Tängri，唐朝時多譯作「登里」、「登利」或「騰里」，至於部落領袖則稱為Qaghan，一般譯為「可汗」。值得注意的是，游牧君長亦經常自稱Tängri Qaghan，只不過漢文史料為凸顯「中國中心觀」，多半僅將中國皇帝譯作「天可汗」，游牧領袖所獲同樣稱號卻譯為「登利 (登里) 可汗」。杜佑《通典·邊防十六》記載「大唐貞觀中，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

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百二十餘萬口。時諸蕃君長詣闕頓顙，請太宗為天可汗。制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域、北荒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臨統四夷，自此始也」；這也是史書中最早完整提及相關始末。[↑](#)

（註87）所謂「胡風」是指流行於唐朝社會種種非漢族原有社會習俗而言，包括當時從北方草原和西域傳來的風俗，以及魏晉南北朝遊牧民族遺留的習慣等。相關研究可參考：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註88）隋代開鑿運河聯絡江南地區，固然有彌補大分裂以來南北長期隔閡，並加強對新征服區統治之意義，將長江下游地區經濟成果往帝國首都輸送也是重要戰略考量，其後自元至清的運河建設，政策背景略同。[↑](#)

（註89）起自三一一年永嘉之禍，直到五八九年隋滅南陳再度統一為止，共兩百七十八年。[↑](#)

（註90）此處僅將趙匡胤所建立的「宋」視為一個朝代（dynasty），而非帝國（empire）。[↑](#)

（註91）成吉思汗（1162-1227），名鐵木真，屬蒙古乞顏部孛兒只斤氏，姓奇渥溫，曾言：「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面，乘其馬，納其妻女也。」所謂「成吉思汗」此一尊號根據蒙古語，意為「海洋的大汗」。[↑](#)

（註92）蒙哥（第四任蒙古大汗）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長子與三子窩闊台（第二任蒙古大汗）養子，拔都則為成吉思汗長子朮赤

次子。欽察汗國亦被稱為「金帳汗國」，疆域西至多瑙河與克里米亞地區，東至額爾齊斯河，東北部至保加利亞，南至北高加索區，西南方至花刺子模與錫爾河下游。現今俄羅斯大部分地區都是金帳汗國的附庸國。[↑](#)

（註93）旭烈兀為蒙哥與忽必烈之弟，所建立伊兒汗國領土涵蓋現今伊朗與阿富汗多數地區，包括亞塞拜然、伊拉克、庫德斯坦、美索不達米亞上游、小亞細亞西部、喬治亞、亞美尼亞以及拜占庭都成為其附庸。[↑](#)

（註94）費正清，《中國新史》（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九四年），頁一二二至一二八。[↑](#)

（註95）宋元時期，泉州刺桐港成為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的「東方第一大港」，與其通商貿易之國家和地區超過一百個，呈現出「市井十洲人」與「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但在元朝末年的一三五七至一三六六年間，由於波斯色目人發動所謂「亦思巴奚戰亂」或稱「波斯戍兵之亂」後，外商紛紛避難回國，盛極一時的泉州港因此元氣大損，海外貿易大幅衰落。[↑](#)

（註96）宋代是中國史上少數關稅作為政府收入主要財源的王朝，尤其南宋時期更佔五分之一左右。有關近代中國海洋政策發展可參考：曹永和，《中國海洋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〇年）；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三年）；李金明，《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史》（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李慶新，《明代海外貿易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黃順力，《海洋迷思：中國海洋觀的傳統與變遷》（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註97) 張士誠與方國珍為元末割據勢力之一，皆出身販鹽事業，並善用水軍，前者活動於江蘇至浙江北部沿海地區，一三六七年被俘後自縊而死，後者則活動於浙東至福建沿海，於張士誠被俘同年向朱元璋投降。[↑](#)

(註98) 例如在一三七四年（洪武七年）撤銷泉州、明州、廣州三個市舶司，一三八一年（洪武十四年）以防堵倭寇為由，禁瀕海人民私通諸國；一三九〇年（洪武二十三年）再次發佈「禁外藩交通令」，一三九四年（洪武二十七年）下令一律禁止民間買賣及使用舶來番香與番貨等，最後在一三九七年（洪武三十年）再次發佈命令禁止下海通番。[↑](#)

(註99) 正因如此，此處亦僅將「明」比照「宋」視為一個朝代（dynasty），而非帝國（empire）。[↑](#)

(註100) 明代長城自太祖洪武年間至神宗萬曆年間，共經過二十次大規模修建，西起甘肅嘉裕關，東至遼東虎山，全長共八八五一點八公里；現仍存敵台（塔樓式建築）七〇六二座，馬面（矩形墩台）三三五七座，烽火台五七二三座，關堡一一七六座，相關遺存一〇二六處。[↑](#)

(註101) 元朝將全國劃分為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等西北少數民族）、漢人（包括契丹、女真和金朝統治下的漢人）和南人（指長江以南的漢人和西南少數民族）。其中，漢人和南人很難擔任重要官職，甚至自一二七一年建立朝代後，直到一三一五年方才正式實行科舉取士，來籠絡中原民族。[↑](#)

(註102) 存在於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間的太平天國（其中「天」字的兩橫上長下短，「国」字內為「王」字）是清朝後期由洪秀全（自號天王）建立的政權，一八五三年建都天京（南京），

曾佔領長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區，全盛時期兵力超過百萬人，估計在整場戰爭中造成約兩千萬人喪生。[↑](#)

（註103）自一六二四年的「後金」時期起，滿人便將歸附的蒙古部眾按八旗組織進行編制，至乾隆年間的一七七一年後，蒙古部眾更悉數被納入盟旗體制；所謂「旗」為軍政合一單位，其長官稱札薩克，然後合數旗為一「盟」，設正副盟長各一人。[↑](#)

（註104）參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頁一。[↑](#)

（註105）此問題主要由英國的中國科技史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提出，因此被稱為「李約瑟之謎」，相關討論與回應可參考：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台北：時報文化，二〇〇九年），頁五四至九二；蔡東杰，《遠西掠影：十六世紀以來的歐洲與世界》（台北：暖暖書屋，二〇一七年），頁一五七至一六九。在此不擬贅述其內容。[↑](#)

（註106）當然，這並不意味清朝在政治體制方面毫無建樹，例如在沿襲明朝廢除宰相制度之餘，它致力於透過皇家教育以提高領導人素質，在世襲制度上也透過「密建皇儲」消弭宮廷鬥爭，但囿於少數統治本質，制度變革關鍵主要聚焦加強控制而非提高行政效率。[↑](#)

（註107）狄金遜為英國政治哲學家與社會主義者，也是一次戰後國際聯盟主要推動者之一；G. Lowes Dickinson, *A Modern Symposium*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 1905).[↑](#)

（註108）閻學通等，《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五八。[↑](#)

(註109)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9); Asle Toje, ed., *Will China's Rise be Peaceful? Security, Stability, and Legitim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傳統：現實的建構主義

在簡略地重新勾勒出中國過去兩千餘年來的歷史發展脈絡，並透過國家形式變遷與體系架構內涵等角度，引導大家瞭解中國在面對周邊環境挑戰時之相應對策後，此處接著將焦點轉往政策制定的心理邏輯基礎，亦即所謂「天朝觀念」。很顯然地，我們所關注之天朝觀念並不僅僅是其外表所顯現出來的「中心式」概念罷了，而是希望進一步切入其核心，一方面透過現代國際關係理論作為觀察輔助，更重要的是回歸建構觀念過程中的現實基礎，亦即中國的地理與歷史條件背景。由此，個人首先提出「現實建構主義」之修正性概念作為理論指引，其次鎖定天朝觀念最主要的制度形式，亦即朝貢體制加以批判論證，期盼能在「解構」部分不切實際且先入為主的傳統觀點之後，「建構」出對未來中國外交更確實的分析角度。

中心觀與華夷思想的建構

在前一章當中，我們一方面設法用最簡略方式，試圖以「帝國」為標的，去勾勒出中國過去兩千餘年來的歷史發展脈絡，另一方面則透過國家形式變遷與體系架構內涵等角度，逐步引導大家瞭解中國在面對周邊環境挑戰與新的地緣變數時，如何選擇並設定相應對策。無論如何，政策的制定必然來自某種心理上的邏輯基礎；其次，又因為人類基本上是種群居性社會動物，在行動上經常將共同體（community）概念視為與生俱來且既存的日常生活指導來源，反映在對外關係上，便涉及到如何透過例如許倬雲所稱「我者」與「他者」的分際，[（註110）](#)一方面區隔彼此，更重要的則是由此衍生出一套處理彼此利害關係的互動準則來，從而在有形的地理邊界之

外，建構出另一條隱形的「心理邊界」。這也是本章試圖深入進行觀察，並加以論述的重點所在。

中國式的宏觀敘事 傳統上，諸如「中國」、「華夏」、「天下」、「世界」、「九州」等詞彙，都經常出現在中國對包含自身之周邊環境的表述上，但它們究竟各自代表些甚麼真正意思，或許可先加以簡略探究一番。首先，「世界」雖是目前最被普遍使用的一個名詞，但它並非中國自身傳統用語，而是源自佛教經典，「世」代表時間，「界」則代表空間，中國對此之用詞其實是「宇宙」，根據《淮南子》的說法，「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所以「世 - 界」就等於「宙 - 宇」，乃無限之時間與空間的總稱。

相較宇宙或世界等時空概念經常出現於哲學性論述，在政治敘事中，較常使用的則是所謂的「天下」。[\(註111\)](#)如同字面上「天之下」的暗示，天下指的是某種「無遠弗屆之絕對空間」，在文獻中首次出現於《尚書·召誥》所謂「用于天下，越王顯」一段。值得注意的是，天下與西方的world並不相同，因為world是可數名詞，但天下則只有一個；其次，天下在西周體系時期使用或未普遍（在《尚書》中出現五次，《詩經》中只有一次），反倒是另一個用以區隔中原與周邊部族的說法，亦即「華夷」或「夷夏」觀念，更常被使用一些。儘管在上古時代，所謂「夏」與「夷」不過是單純用來表示不同地域和民族之某種對等性指稱詞，[\(註112\)](#)約略到了春秋初期之後，特別是受到齊桓公高舉「尊王攘夷」政治旗幟的影響，夷夏對比概念也因此開始被賦予更多的文化和泛政治涵意，例如用以區別尊卑上下，以及甚至是辨別文明與野蠻的界線。例如《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稱：「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許慎在《說文解字》一書中也曾指出：「……夏，中國之人也；夷，東方之人也。……南方蠻閩，從蟲；北方狄，從

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此皆異種也。」[\(註113\)](#)從中國傳統特殊的「造字學」邏輯看來，由此既可見其對周邊民族充斥的文化歧視味道，強調彼此區隔也暗示著體系核心對周邊影響力有限。

進一步來說，相較「天下」指稱之絕對空間，即便最初體系核心能量有限，但階層性結構暗示之相對優勢，已足以讓核心（西周）自稱「中國」，亦即「位於結構中央頂層位置」之意。於此同時，無論「九州」或「五服」，則代表中國清楚地理解到，即便自認具優越性（中國中心），體系中的政治分裂與權力分散乃不爭事實。

無論如何，在從西周體系時代的部落聯盟，逐步轉向由秦朝建立的帝國結構過程當中，所謂「中國中心」的內涵也慢慢從某種單純體系概念，出現若干質變。首先，如同帝國框架所暗示之權力明顯不對稱性，中國也從自認為「居天下之中」，朝向聲稱「領有天下」方向昇華，亦即先驗地自認為擁有仲裁天下事務之最終正當性來源；其次，如同「權力愈大，責任也愈大」之相對概念，所謂「中國中心」至第二帝國時期後乃漸次呈現出更多的世界主義意涵，此即「天朝」（Celestial Empire，中國自我設定為具最高位階之天朝上國，亦即體系核心）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如何去定義所謂「天下」，它都意味著將已知地理範圍內的全體人類，涵納在互動範圍當中，如同梁漱溟所言，「天下是個關於世界，而不是關於國家的概念」；[\(註114\)](#)更甚者，此種觀念之浮現與文明進展程度應具有某種正面連繫，例如在希臘化時代（Hellenistic period）中發展起來的斯多葛學派（Stoicism），亦以某種「有序世界」（cosmos）作為理解對象；[\(註115\)](#)事實上，幾乎就在同時，西漢時期哲學家董仲舒也結合道家、陰陽家與儒家等，在《春秋繁露》書中提出了「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天人合一」概念，強調將某種宏觀和諧狀態作為發展目標，不僅成為此後主流儒家哲學的思想核心，由此建構了中國傳

統世界主義文化的觀念基礎，同時深深影響著中國決策者面對涉外關係時的哲學框架。

現實建構主義的思想途徑 無論所謂天下觀經歷了何種哲學性理解昇華，與自我正當性建構過程，當我們回到傳統上以國家為中心的外交決策分析途徑時，至少就當前主流觀點來看，政策制定乃是由另一套邏輯衍生出來的。

正如休謨（David Hume）所謂的「理性必然成為情感奴隸」，對多數學者而言，或許「人性自遠古時代以來就從來沒有改變過」，特別是其中的「利己」（egoistic）傾向更讓各種「邪惡」與「不道德」事件必然層出不窮，從而導致國際關係長期動盪不安，這也是現實主義（realism）的主要觀點。例如，十六世紀義大利佛羅倫斯外交官兼史家馬基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便主張，由於世間人們「盡是一群忘恩負義與反覆無常的偽君子」，除非被客觀情勢所迫，否則理論上絕不會主動為善，只要君主能夠「獲勝並維繫國家生存，其所使用手段不僅都會被推論是正當且榮耀的，而且會受到所有人的稱頌」。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則接著認定，因為人性中普遍存在著競爭（由於資源稀少導致彼此爭奪有限利益）、缺乏自信（相信攻擊乃最佳之防衛手段）與追求榮耀（滿足威望與虛榮心）等關鍵要素，由此亦將世界推向「人人為戰且人人為敵」的衝突性循環當中。[（註116）](#)

最後，美國政治學者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更據此在二十世紀中期建立了現代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亦即：無論國際政治終極目的為何，「追求與捍衛權力永遠是國家的直接目標」，值得說明的是，這並非意指政府（領導者）必須在道德原則與缺乏道德之國家利益間進行抉擇，而是在一套與政治現實分離的道德，與另一套由政治現實衍生出來之道德原則之間的抉擇。[（註117）](#)換言之，藉

由對「道德」問題的重新詮釋，現實主義者非但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長期的道德困境，同時也讓「權力」（power）與「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成為幾乎所有決策者奉行不悖的行為準則。

儘管如此，這真是一個亙古不變的準則嗎？至少在多元主義隨著二十世紀末新一波全球化浪潮浮上檯面後，多元中心（multi-centric）既對傳統的國家中心（state-centric）視角發出質疑，由於所著重的行為動能與政策發展過程看法不同，其彼此之間的邏輯論戰也讓其他不同看法有機會脫穎而出，建構主義便是其中之一。（註118）

源起於後冷戰初期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認為，國家認同和利益並非先設性因素，而是由國際互動加以建構的。進言之，強調社會性質的建構主義者不僅重視體系結構對國家的作用（尤其是共有知識、期望與觀念等體系文化對國家的意義），同時主張，國際政治的社會性結構不僅影響行為體，亦決定了其認同基礎和利益取向。正如前述，不同於新現實主義，建構學派所關切的結構指的是「社會意義上的結構」，不僅觀念的分配乃是其重點所在，能動者（agency）和結構之間的「互構」（mutual constructing）更為重要；可以這麼說，他們既強調能動者對結構的作用，亦強調結構對能動者的反向建構過程，如果能動者的互動發生變化，國際體系結構也將跟著發生變化。由此，當可發現建構主義不同於現實主義的動態假定。

儘管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探討並非本書焦點，個人也絕不支持將用以詮釋當代國際關係之邏輯架構，「超現實且超時空」地直接帶入過去歷史當中，不過，此處必須說明的是，一般學者在進行歸納論述時，雖未必明言採取何種理論作為邏輯演繹途徑，絕不可能不受到任何既有學說影響，（註119）這也是為何在此先行討論理論的原因。由於中國舊有正史自古以來皆無「邦交志」的設計（亦即無專章討論其對外關係），這便使得對兩千年來中國外交政策與對外關

係的分析，很難看到古人的著述觀點，亦無可避免地多半都由近代學者來書寫，因此很自然而然地傾向戴了「現代有色眼鏡」（亦即前述理論框架）來看待過去的歷史發展，從而不免有先入為主、無心誤導或引喻失義的嫌疑與危險。但反過來說，假使認定過去與當代歷史各自具有時空特殊性，以致我們必須完全捨棄目前手中的理論工具，或也是因噎廢食且不理性的。因此，透過重新反思既有的理論工具，並選擇最有用的組合方式，或許是進入正題以前的必要任務。

進言之，所謂理論亦鮮少由學者關在象牙塔中自言自語推導出來，多半還是必須反映出周遭環境的現實經歷。正因如此，多數理論具有「經驗性」特質。就迄今仍具主流性質之前述現實主義理論來說，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它以「衝突」和「競爭」作為觀察國際關係與推行外交政策的出發點，其實源自於對近數百年來歐洲中古封建體制崩解過程的歷史體驗。但至少對中國而言，由於其歷史體驗與感受未必與歐洲類似（相較歐洲自西羅馬崩解後陷入千餘年統一困境，中國則時有分合），我們所需要的或許是種折衷性架構。在此，個人將它稱為「現實建構主義」（realistic constructivism），或者用聶牙一些的說法，乃是某種「輔之以現實主義的建構主義途徑」。[（註120）](#)

無可否認，從現實主義導向的利益角度來思考與回應問題，不僅方便，在研究中國歷代外交決策中同樣占據重要的比例。儘管如此，在長達兩千餘年以建立帝國作為發展主軸的漫長時期中，正如建構主義者所言，國際體系文化（中國中心觀）對能動者（中國本部與其周邊之行為體）始終有著強大的影響力，至於數度重構的帝國核心，既是強化前述體系文化的主要能量來源，在現實層面上，也從行為體角度，對體系結構本身產生了強化以及延續性的作用。如同冷戰初期美國學者肯南所暗示的，[（註121）](#)理解蘇聯行為的關鍵，或許前提是設法先搞清楚深植於其國內結構中的行為慣性與價值觀系統；同樣地，對於擁有更悠久歷史且哲學系統更為成熟的中國而言，何嘗不是如此？換句話說，加上一定程度的文化相對論

(cultural relativism) 觀點，站在重新認知歷史的出發點上，輔以更客觀的觀察角度，對於理解中國的傳統行為模式應該是有幫助的。

中國中心觀的地理與歷史基礎 正如前面段落所述，在所謂「天朝觀念」的指導下，層級性 (hierarchy) 既是主要以中國作為核心之東亞國際體系的長期特徵，至於其形成原因與運作邏輯，則首先或許與地理環境及位置有關。據說拿破崙曾言：「瞭解一個國家的地理背景，便可明白其外交政策走向。」史派克曼也認為，相較於經濟與領導人性格等因素，地理環境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可能更深遠並具持續性。[\(註122\)](#) 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同樣指出，從地緣戰略角度來理解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因為從地圖上的每一點看來，世界並不一樣，所以，我們必須透過中國的處境，來看待並理解他們的行動，……中國本身並不特殊，特殊的其實是他們地緣政治處境的特徵」。[\(註123\)](#)

就中國而言，相較於人類文明 (以「大河文明」為主) 最初幾個重要的發源點，華夏文明核心所處的黃河流域，可說具有相對最為「孤絕」的地理位置；它與印度次大陸文明間隔著平均海拔超過五千公尺與面積廣達兩百萬平方公里的青康藏高原，而其約略位於長城終點 (河西走廊出口) 的文明邊界，隔著被游牧民族盤據的中亞草原地區，與中東兩河流域的距離也超過了五千公里以上。在缺乏現代交通投射技術的情況下，這顯然使它不像其他文明區域一般，容易受到外來影響 (例如亞歷山大帝國或後來的伊斯蘭帝國，雖然都曾經串連過尼羅河、兩河流域與印度河等三大文明區，始終無法對東亞體系產生影響，甚至於尼羅河與兩河流域還連同希臘化地區，共同奠定了近代歐洲文明的基礎)，亦使中國或東亞體系得以在此種趨近於「天然疆界」 (natural boundary) 的獨立環境當中，深化其塑造世界觀的視覺記憶基礎。

從歷史內容看來，如同奧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所言：「農民由於附著在土地上，慣於規則性的工作，既然無法離開土地，勢必只有投降向征服者（按：主要指遊牧民族）繳納賦稅，這便是舊世界（即歐亞大陸）陸上國家誕生的過程。」[（註124）](#)此即一般所謂的「遊牧造國論」。在中國兩千餘年來以三大帝國為主軸的歷史當中，受到蠻族壓制或影響的時間雖確實也不短，不能不承認，長期以定居性農耕生活為基調的中國不啻是前述論點的例外。可以這麼說，在中國強盛時（亦即三大帝國時期），基於相對權力與威望優越性，產生自尊自大之天朝觀念固然其來有自，即使在帝國崩解以致偶爾被迫屈居弱勢時，由於入侵的蠻族亦多未能真正滅亡中國正統王朝，生於憂患所激發的民族主義意識既經常藉由中國中心說來提供自我正當性，並凝聚必要對抗共識，至於多數南下蠻族最終紛紛進行大規模漢化運動，並消融於華夏文明（蒙古除外）的結果，更成為相關論調最強有力的佐證。如同《孟子》所言，「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直到十九世紀末西風東漸之前，這確為實情，也是持自我中心觀者最有力的歷史內涵佐證。

進一步言之，從研究當代民族主義發展的角度來看，所謂「中心觀」反映的其實是種民族沙文主義（chauvinism）或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註125）](#)

此種想法主要凸顯於對自己群體及文化內涵的高度認同與肯定，一方面傾向將自身所在視為宇宙或世界（天下）中心，從而為自身行為模式賦予高度且正面的價值，相對地，對其他周邊群體則多半給予歧視性對待。[（註126）](#)例如文化人類學者伊薩克（Harold R. Isaacs）便曾將可直溯至遠古的天朝觀念視為是種「中國式種族沙文主義」，認為它經常被不加掩飾的表現在中國與異族的關係上。[（註127）](#)當然，這種源自近代民族主義思想與近兩百年國際關係發展的概念，或許對我們的觀察有所啟發，但事實是，中國一方面絕非此種所謂種族沙文主義的唯一或最佳例證（它對近代歐洲對外關係之影響甚至更為明顯），至於此種概念能否被套用到前現代階段（premodern period）的中國身上，更不無疑問（至少中國確實很少

主動推銷其文化內涵)。因此，比較好的辦法應該還是先回到中國歷史本身，從它真實的行為內涵中去進行歸納分析。

朝貢機制之演進與運作

無論如何看待中國對待其周邊族群時所採用的基本態度與對策，或選擇使用何種概念名詞（中國中心觀、天朝觀念、華夷觀念……等）來描述或解釋此種態度，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價值中立」的重要性，亦即若非排除先入為主的情緒性角度（無論支持或否定），恐怕並不容易窺見其真正面貌；進一步來說，若想瞭解中國處理其對外關係的基本態度，個人認為還是得從行為面著手，藉由重新組織歸納事實來加以深入分析，是甚麼就是甚麼，或許才能有所收穫。對此，「朝貢制度」（tributary system）既是近代學者們觀察相關問題時的焦點所在，[（註128）](#)此處也將以此為核心來進行討論與批判。

迄今為止，以國外學界為主的研究者，幾乎都從「貿易活動」的經濟或金融性視野切入，藉此尋求某種具正當性的長期誘因（經濟利潤），並以此觀察所謂朝貢體制的演進與發展歷程。很顯然地，從客觀角度看來或許並不排除如此，不過若將焦點轉回到此一體制之設計與操作者（中國）身上的話，結論恐怕就會稍稍有點不同。

朝貢體制的源起與發展 大體來說，所謂朝貢體制可被細分為「朝覲」與「貢納」兩個部分。事實上，若考慮到這兩種行為的演進先後次序與政策重要性，或許將其稱為「貢朝」體制會更恰當一些。
[（註129）](#)

正如《廣雅·釋言》所言：「貢，獻也」，指的是地方或邊陲附屬單位向中央或較高權力核心單位，奉納土產禮品以表達忠誠的行為。從某個角度看來，此種具層級意涵之行為在西周體系時便出現若干制度化趨勢，例如在《周禮·秋官·大行人》中，便有一段文字記載：「……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註130\)](#)

前述「六服說」或許是《國語·周語上》所謂「五服制」的補充，但從《周禮·夏官·職方氏》延續《尚書·禹貢》當中所謂「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的說法看來，首先，前述高度有序的情況可能不容易在真實世界中出現，至於記敘內容的彼此矛盾與無法統一，更或許反映出史學家在理想驅使下，各自發揮想像力的結果。無論如何，值得注意的是，所謂「貢」未必全然是種「由外而內」的動作，例如《漢書》當中便記載了漢文帝在即位初期所頒布的「卻貢令」，「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歡洽」，由此既顯示出另一種「由下而上」的方面，亦或暗示西漢初年在郡國制框架下的地方分權傾向。[\(註131\)](#)不過，正如前章所述，直到第一帝國初期為止仍以「貢納」為主的互動關係架構，因為南匈奴單于在西漢宣帝時期決定「稱臣入朝事漢」，以致強化了「朝覲」（威望匯入）的制度化發展，從而讓朝貢體制因此逐步成熟，最終成為中國（尤其是帝國時期）處理對外關係時最重要的行為準則。

正如前述現實建構主義的觀察角度，朝貢體制的出現、存在與運作固然以「權力對比差距」為前提，並以滿足「國家安全利益」為目標，考慮到帝國時期乃此一體制主要的運作階段，作為擁有不對稱權力之行為者，安全問題恐怕並不是最重要，相對地，如何以此為主要形式來建構特定體系文化，從而滿足帝國核心之威望需求，

藉此為捍衛帝國體系奠定較長遠的穩定能量來源，或許更為關鍵所在。

冊封、頒賞與定期使團 為達前述目的，朝貢邁向正式制度化既有其必要，[\(註132\)](#) 由此也跟著出現下列幾個中國對外政策之慣常特徵：首先是「冊封」，也就是在形式上由中國皇帝頒授名號（其中，次於皇帝的「王」乃最高階名號）並賜予印璽給周圍附庸國的君主，一方面為其正統性進行政治背書，也藉此確認受冊封者對帝國核心的臣服；由於中國皇帝被設定在體系內諸國中具備最高權威，相關舉動自然具有邏輯正當性，至於周邊國家君主在接受冊封後，不但等同於承認中國居於「宗主國」（suzerainty）地位，也必須遵守一連串義務，包括定期遣使朝覲、入貢、「奉正朔」（採取中國正統年號做為紀元標準），以及必要時應邀派兵支援等。其次是「頒賞」，也就是由帝國在接見朝覲使團後給予附庸回禮；事實上，不管是否為體系內固定的朝貢成員，只要表現出仰慕中華文化以及願意尊崇中國皇帝的意願，基本上都會得到豐厚賞賜，這也突顯出某種「面子外交」傳統。[\(註133\)](#)

總的來說，透過貢納關係所強化的天朝觀念固然起源甚早，中國在東亞世界中落實朝貢制度化之進程卻相當緩慢。例如冊封與宗藩關係（此為因果關係，接受冊封即自認為藩屬國家）大約於漢代（第一帝國時期）左右初步確立，存祀（為受封之附庸國家延續政權）的反饋性權利義務規範，[\(註134\)](#) 自唐代（第二帝國時期）起逐漸有所發揮，至於將更密切聯繫的朝貢制度作為體系內部主要規範，則基本上確立於明代（不確定的帝國時期），最終由清代（第三帝國時期）加以完備。可以這麼說，正因明清兩代是一般所謂朝貢體制落實或邁向制度化建構的重要歷史階段，這也經常讓它們成為個案研究的主要對象。[\(註135\)](#)

根據《明會典》、《欽定禮部規例》與《大清會典》等官方文獻記載，藩國在「奉表納貢」時，至少必須遵守下列若干制式化的規則。首先在時間規律方面，相較於前述「五服」、「六服」或「九服」等古代制度，主要由「距離遠近」作為入貢時間規範的主要來源（看起來似乎頗為合理），但在真正運作上，各國的「貢期」其實是根據其與帝國核心的「關係親疏」來決定（儘管跟距離似乎也不無關聯），最緊密者例如朝鮮的「每年一貢」，[（註136）](#)較為疏離者則分別為兩年至十年一次不等。其次，在入境後的「貢道」路線方面，例如明代最初曾經規定「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與西洋諸國」，清朝後則改為「朝鮮由鳳凰城進入盛京，琉球自福建閩安鎮進入，安南經由廣西太平府……」等，反映出各自不同的政策考量。

接著是「貢團」規模定制。根據清朝在一六五二年（世祖順治九年）頒布の入貢規範，各國貢團人數都有嚴格限制，一般貢使隨從以一百人為限，但入京時不得超過二十人，至於貢船也以三艘為限，基本規模並不大。不過，日本曾經在一四五三年（明景泰四年）派遣過分乘九艘貢船、共達一千兩百人的使團前來，規模顯然相當龐大，後來因爆發倭亂才在國家安全考量下開始受到限制。至於最後且最關鍵的，還是有關朝覲禮儀的規定。為強化朝貢體制對於帝國核心的「威望輸入」，明代曾陸續制訂諸如「蕃王來朝儀」、「蕃國遣使進表儀」、「蕃使朝貢儀」和「蕃國迎詔儀」等一連串明確規範，甚至在正式朝覲之前，還規定蕃王及其隨從必須先「習儀三日」，表面上是為了避免發生潛在之禮制疏漏，實則示威效果也相當重要。[（註137）](#)總而言之，進貢使節按例在覲見中國皇帝時應行習稱「三跪九叩」之跪拜禮，在清朝如恰好碰上皇帝巡幸熱河木蘭圍場，則應轉赴「行在」（亦即臨時駐蹕辦公處所，一般都設在避暑山莊）瞻仰，倘使進貢使節覺得有必要親自獻上貢物，亦可在呈明禮部後轉奏請旨是否獲准。

天朝觀念下的朝貢體系架構 在帝國框架支撐以及「天朝觀念」提供行為準則規範的影響下，整個東亞地區遂在特定時刻裡（以三大帝國時期為主），以中國為核心，從而形成某種同時兼具垂直與水平層次性的外交網絡。[（註138）](#)

例如，梁伯華曾在整理了費正清的研究見解並嘗試進一步演繹後，將此體系區分為以下「由內而外」的架構：[（註139）](#)首先是體系核心，亦即扮演著天朝（Middle Kingdom）角色的中國；其外側是邊陲區（frontier zone），組成份子隨著不同朝代之影響力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唐朝時包括渤海國、回紇、吐蕃與南詔等，北宋時有遼國、西夏與大理等，清朝則有蒙古、西藏與青海等；第三圈是漢化區（sinicized zone），包括了朝鮮、越南、琉球與日本等，一般也被稱為「漢文化圈」，使用漢字並服膺儒家經典是其共同特徵；接下來是內亞區（inner-Asia zone），指涉絕大部分中亞與東亞國家，包括東南亞的泰國、菲律賓與緬甸等地，以及中亞地區如浩罕（後來的烏茲別克）與吉爾吉斯等國家；最後則是外亞區（outer-Asia zone），包括少數不臣服與不朝貢的亞洲國家，大概只有中亞西緣與南亞地區如印度等國，此外亦泛指不定期朝貢（或偽裝貢使以求經濟利益）的部分西方國家，例如荷蘭、葡萄牙或英國。[（註140）](#)

上述分類方式雖正確地呈現出中國與鄰國間「親疏有別」的特徵，不過，首先必須指出，由於邊陲區國家部分也有著漢化傾向（例如遼國、西夏與西藏等），而漢化區國家部分甚至曾被中國直接納入領土管轄範圍內（例如朝鮮半島與越南的一部分在漢朝與唐朝都曾設置郡縣），[（註141）](#)因此這種劃分方式仍有商榷空間；其次，若此一劃分標準乃「由內而外」，則邊陲區與漢化區之先後順序也可進一步區考；第三，所謂外亞區（甚至部分內亞區）國家既不真正參與朝貢，是否應列入體系成員乃不無疑問；最後，帝國時期雖與朝貢運作效率具正相關，如同前述，由於朝貢之制度化內涵與速度在歷史上呈現與時俱進現象，這也代表「事實上」的朝貢體系不可能一致化。

更甚者，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體系雖因存在著可資勾勒之地理「邊界」，以及體系內成員曾具體「互動」等規律現象，加上中國頒定之朝貢準則亦提供若干可依循的「行為規範」，從而使其具有現代國際體系之某些特徵，過度類比顯然並不恰當。主要原因是，中國針對周邊國家之互動僅具一定之「羈縻性」效果，非但相對消極，尤其在第三帝國末期對抗西方國際體系加諸之「主權」概念時，由清季外交主持者與外國的交涉經驗中，當可清楚看出此一觀念上的差異與影響。[\(註142\)](#)例如像是在面對琉球、越南和朝鮮等藩屬問題時，清廷官僚（主要是李鴻章）與外國使節（以日本為例）之間的溝通簡直是各說各話。最後結果是，相對於中國仍掙扎維持著一個很難繼續存在，且聚焦威望反饋作用（滿足天朝想像）的華夷體系，外國使節們也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亦即各藩屬的事實（de facto）獨立。

當緬甸於一八九四年（清德宗光緒二十年）進行最後一次入貢舉動後（清廷在一八八六年與英國簽約後，後者雖同意緬甸每十年循例向中國「呈進方物」，但清廷承認英國在緬甸特權，實則已導致宗藩關係趨於崩解），儘管中國在同年出兵朝鮮半島，並因此與日本爆發甲午戰爭，仍舊有著實踐「興滅國」存祀傳統道德義務的意味，這個東亞體系終於無法繼續維持傳統互動模式，因而在形式上也跟著面臨逐步瓦解的命運，並在中國爆發民主革命以致終結第三帝國時期後，所謂「天朝觀念」亦隨同此一新情勢而暫時煙消雲散。[\(註143\)](#)

帝國核心與主要藩屬之間的互動 值得注意的是，個人所以不選擇使用純粹現實主義邏輯來說明以中國為中心之東亞體系運作，主要是因為此一體系的形成大體上是「兩廂情願」的結果，多半非由帝國核心藉權力手段威脅逼迫而來。事實上，中國極少主動強迫他國

進行朝貢，多半均設法以詔令與豐厚賞賜誘使它們前來（這也是鄭和下西洋時的主要外交任務之一），甚至在某些時刻與情境中，身為宗主國的中國其實常常被動地接受朝貢要求（例如前述面對歐洲國家實為通商，但表面上要求進貢之要求時）。正因為如此，從周邊藩屬國家角度來進行觀察，也是不可或缺的。

歸結言之，以東亞為主的地區政治行為體，所以向中國朝貢之目的可大致分為以下幾點。首先是安全利益。在積極方面主要是指「存祀」而言，亦即希望獲得中國威望下的安全保護傘，例如當朝鮮（明朝萬曆戰爭、清朝甲午戰爭）、越南（十八世紀末黎朝末年內亂、十九世紀末法國入侵）、琉球（日本併吞壓力）在政權生存受到威脅時，這些國家都曾陸續派遣使節向中國求援；至於在消極方面，則如同清朝初年的緬甸與廓爾喀，以及在清朝征服新疆後陸續臣服的中亞國家等，其目的在於透過朝貢行為來表達忠誠，以防止遭到帝國勢力攻擊，在此雖部分合乎現實主義權力政治概念，但中國依舊處於相對被動角色。

其次是政治利益，主要是指透過「冊封」取得政權正當性而言。例如清朝自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頒行「金奔巴制」（金瓶抽籤方式）開始，便介入認證西藏活佛轉世的過程，其後並藉此成為西藏政治運作的平衡者。相對地，西藏也經常透過要求清廷介入來平息內部紛爭。又如當越南在一七七八年因內部政爭（西山起義）導致國家陷入分裂後，競爭雙方（尤其新朝阮氏家族）都希望爭取中國承認以確立正當性，也是一個明顯例證。[（註144）](#)

第三是文化利益。正如前述，中國與周邊地區的文明與經濟發展程度差距，乃是造成天朝概念出現的重要客觀原因。事實上，長期以來，中國的政治制度、科學技術與哲學思想，乃至於生活方式、文學內容、建築技術與各種藝術流派等，往往是周邊國家的模倣對象，後者經常透過大規模的「漢化運動」（例如鮮卑、契丹與女真

的積極「中原化」，另外如日本的「大化革新」運動也是一例）來進行學習與採借，以便收到提昇自身文化層次的目標。[（註145）](#)

最後或也無可忽視的，自然是經濟利益。不僅近年來多數學者認為，經濟誘因（而非帝國核心的威嚇與壓制能量）或許才是朝貢制度能長期運作的最重要因素，元朝學者馬端臨早在《文獻通考·四夷考八》（卷三三一）中便曾提到：「島夷朝貢，不過利於互市賜予，豈真慕義而來？」濱下武志指出：「朝貢的根本特徵，在於它是以商業貿易行為進行的活動。」[（註146）](#)王曾才也認為：「朝貢與通商實為一體之兩面：中國所重視者為朝貢制度的精神價值，至於朝貢國所追求者則為通商的實際利益。」[（註147）](#)由於帝國核心廣土眾民所提供之龐大「經濟規模」與外溢可能，使中國不僅長期成為東亞地區最發達繁榮的政經單位，亦使其他國家企圖藉由通商行為來分享此一巨額經濟積累。由此首先出現的是邊境貿易，[（註148）](#)其後自西漢初期之後，原本採行「重農抑商」政策的中國慢慢發現此類貿易既可作為重要的利益談判籌碼，甚至成為交換帝國威望的關鍵工具之一。於是，在逐步朝向制度化邁進的朝貢體制當中，「必須先取得朝貢國身分，始能獲得在一定條件下進行局部通商的權利」，既成為此一體制最早成熟的互動規範，[（註149）](#)也讓「禁市」（暫停貿易權利）成為中國對外國進行外交施壓時最主要的政策籌碼。

通商權利在朝貢體制中的重要性，可以清朝為例來說明。

儘管第三帝國的影響力與國際地位明顯高於明朝，但根據《清會典》內容記載，直到乾隆年間，前來中國朝貢的國家數目竟然只有七個而已，相較於明代多達百個以上的朝貢名單，其間差距似乎不可思議。[（註150）](#)原因或許在於，相較於明朝以「給價收買」（透過皇帝頒賞，以高過物品價值數倍的金額進行回賜）來處理「附進蕃貨」（亦即外使隨貢物同時帶來的貨品）問題，清朝最初使用「以貢代市」（在頒賞後，准許來貢國家在會同館進行交易若干時日，

若非入貢則不許互市交易）制度來解決，康熙之後雖改為「貢市並舉」（除了在京師交易貨物之外，也允許朝貢國家在邊境特定地區進行局部貿易），[（註151）](#)但乾隆之後由於限縮互市貿易規模（一七五九年後廣州單口通商時期來臨），隨著貿易數量下降，吸引周邊國家前來朝貢的誘因也跟著消退。

無論如何，中國皇帝基於帝國威望，同時也為「懷柔遠人」以安其心，經常頒賞給來貢使節數倍於其進貢土物價值的禮品，這已經鼓勵許多國家透過朝貢制度來分享中國的經濟果實，甚至連部分歐洲國家在十九世紀前也經常「偽裝」貢使前來，這無疑是整個體制能長期存在運作的關鍵所在。進一步來說，正如費正清指出的，相較處於帝國鼎盛時期的十八世紀，清朝國勢雖在十九世紀開始走下坡，前來向其進行朝貢的活動頻率反而有增無減，尤其是琉球與暹羅這兩個國家；對此，若沒有從雙邊貿易角度切入觀察的話，恐怕是不易理解的。[（註152）](#)至於另一個統計數據也支持類似概念，例如在一六六二至一七六一年清朝較強盛前期，共接待貢使兩百一十六次，但在一七六二至一八六一年清朝實質上趨於衰弱之後，接待貢使次數反而達到兩百五十五次之多，其暗示由此可見一般。[（註153）](#)

中國中心體系的現實與虛構

不可否認，尤其在三大帝國時期，由帝國核心（中國本部）創造並逐步朝成熟制度化邁進的朝貢體制，非但成功滿足「威望回饋」目標，奠下帝國正當性的重要基礎，同時為東亞提供了「邊界」和「互動規範」等要素，讓我們可藉以觀察此一區域體系的存在與運作模樣。可以這麼說，即便在非帝國（例如三國或南北朝分裂局面）或準帝國（例如宋朝或明朝）時期，迫使相對弱勢者接受類似相關規範，亦往往是用以彰顯強者（包括學習中原規範的異族政權）相對權力差距的重要象徵，從而延續其作為重要之區域性國際

規範慣例。儘管如此，在瞭解朝貢體制形成之心理基礎及其主要操作內容後，在此仍有必要對其作進一步的分析。

朝貢體制之現實與主要特徵 大體來說，廣義上延續超過兩千年以上的朝貢體制（狹義則或僅明清兩代），約略存在著下列幾個特徵。

首先是「主觀性」。可以這麼說，就在華夷思想與中國中心主導的世界主義逐漸成熟後，帝國核心便開始主觀地建構出一個將自己置於中心的世界秩序結構。在此一秩序中，嚴格講起來，無論周邊政治單位是否與中國有著密切互動或臣服於帝國，均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等儒家王道邏輯的擴大解釋下，被認定為應當服從王化的「蕞爾小邦」；換言之，即便沒有朝貢的事實，也不代表它不被認定從屬於此一最高秩序。當然，若能夠達成「四夷來朝」的結果，自然得以藉此「證明」此種主觀認定之世界秩序的「真實性」（鄭和下西洋便代表某種實踐的努力），但即便未能做到如此，亦不妨礙帝國核心從事此種自我心理建構或自我催眠的過程。正如法國史家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所指出的：「不僅希臘把異己民族都視為是蠻族，中國人也是如此。」必須再度強調的是，此種中心觀思想絕非是朝貢體制獨有的特色，而是一個甚至迄今都繼續存在的自然現象，例如十九世紀部分歐洲人所強調之「白種人的負擔」概念，以及即便進入後冷戰時期後，美國仍不斷自我描繪的「單極體系」印象與自我認定應擔負之「國際警察」義務等，不啻均為顯著例證。

其次是「層級性」。針對此一特徵，基本上是透過兩個步驟來完成的：在第一個階段中，首先出現諸如「五服」、「六服」或「九服」等平面性的「同心圓」概念，接著則逐步透過朝貢的建制化，塑造出某種「多層蛋糕」般的立體構面，然後將帝國核心置於最高

層的中心點上。說實話，以「主權平等」作為國際互動原則的體系概念，過去不僅至多只存在歐洲一隅，甚至在它名義上透過一六四八年西發利亞會議被創造出來後，甚至直到目前為止，也還沒有被真正落實。[（註154）](#)例如在國際會議中，往往只有大國享受實質參與權，[（註155）](#)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的「否決權」設計，又何嘗不是間接證明了國際關係中長期的不平等本質。由此看來，如同前一個主觀性特徵，具層級性特徵之朝貢體制，確實並不如想像中特殊，或為國際政治通例。

最後是「被動性」。正如本章試圖透過「建構主義為主，現實主義為輔」之概念框架來理解並解構朝貢體制，除了少數幾個基於安全考量下的例外個案，作為帝國核心之中國儘管自視為世界秩序的基石與代表，往往僅鼓勵但並不強迫秩序（體系）內其他行為單位進行朝貢，以便取得「相對認證性」，對於類似之事實結果，亦僅僅是「欣然接受」而已。進一步來說，以中國為中心之區域體制的被動性質，固然來自帝國核心能動性有限的政治現實（在前工業時代缺乏足夠技術輔助，以致長程投射能力不足，或成本昂貴難以負擔），相對地，正如前述，儘管周邊國家（部分甚至長途而來）主動進行朝貢，或多半是回應經濟誘因（尋求貿易機會）所致，仍舊滿足了帝國「重名不重實」的基本態度。

朝貢體制的非真實性部分可以這麼說，以中國為中心之朝貢體制不僅既不特別（自我中心觀與層級性架構均非中國特有，以歐洲為主之西方世界亦復如此），甚至也並不如想像中地真實（前述重名不重實的基本態度，經常讓此體制顯得似有若無）。尤其對於後者，我們可以從該體制的另外幾個特徵來進行觀察。

首先是「非連續性」。朝貢體制與帝國架構有著密切關聯。理論上，帝國核心希望透過相關行為來確保體系（世界）秩序（至少在

集體認知層面)存在，且有賴於朝貢提供的威望反饋作用來鞏固國際地位，另一方面，帝國之有效運作也有助於提高並保障朝貢行為的經濟利得，從而鼓勵各國繼續派遣朝貢團前來。不過，正如本書第一章所述，由於真正具意義之帝國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僅占據了三個時間區塊，這既意味著在帝國崩解與重組的漫長過程中，很難保證朝貢行為的存在與普遍落實（這還不包括在第一帝國時期，僅僅具備雛型之模糊運作），至少亦暗示了朝貢體制在兩次「帝國間歇期」（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及從五代十國到宋、明時期，蒙元則是另一例外）中，應該有著稍稍不同的表現形式與面貌，在此暫不擬贅述。

其次是「非一元性」。如同濱下武志指出的，中國雖是整個朝貢體制的創建者與運作核心，並不能單獨擁有與壟斷類似概念。事實上，由於周邊若干國家也學習了此一模式並吸收作為其對外關係規範，於是導致幾個「衛星體系」或「次體系」（sub-system）的出現。例如在清代（第三帝國），琉球與朝鮮同時向中國與日本派出朝貢使團，[\(註156\)](#)便可瞭解日本作為另一個衛星性核心的地位。其次，無論是越南要求鄰國老撾向其進貢，還是滿州女真最初同時向明朝及朝鮮進貢，隨後又迫使朝鮮反過來向其進貢，抑或是琉球自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初，同時派遣朝貢使團前往中國、日本與朝鮮三方的事實，都可清楚發現，類似行為在東亞地區非常普遍，絕非中國單獨享有的特權。

第三是「非威望性」。根據中國古典文獻闡釋的理想，朝貢之最終目標乃「用夏變夷」，亦即透過文明同化以維護安全與秩序。正如《舊唐書·北狄傳》所言，倘若「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被聲教以服之，擇信臣以撫之。」總之，帝國之對外行為既要符合「以德治立國」的號召，也希望周邊各國能在中國威望遠布的情況下，紛紛自願前來表達敬意。儘管如此，正如前述，經濟誘因不僅是促使多數國家對中國朝貢的最主要目的，所以會出現其他衛星體系的原因，其實大多數也出自於貿易動機，例如遠在東南亞的暹羅與爪哇等國便曾在十四世紀派遣使團向朝鮮進貢，目的便是試圖開

關雙邊貿易關係。事實是，自第二帝國末期以來，尤其是沿大陸東側的西太平洋緣海地帶，由於帝國核心經濟不斷繁榮提升的結果，一方面讓海路貿易大為發達，從而亦漸次構築出一個海洋貿易網路，不但海盜勢力興起與企圖分享此一貿易大餅有關，[\(註157\)](#)彼此派遣使團也充滿著強烈的經濟動機，而非純粹由於政治與文化性目的而來。

朝貢體制的歷史意義及其影響 在義大利新馬克思派學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於二十世紀初提出所謂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概念，藉此分析統治階層如何將其世界觀轉化成某種具普遍性地位的思潮（ethos），從而鞏固其支配權（ascendancy）後，有關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的討論，也跟著在該世紀下半葉慢慢浮現，希望從另一個較隱性且間接的角度來觀察國際（與國內）社會中的權力現象及其問題。[\(註158\)](#)當然，從某個角度看來（例如本章所持的現實建構主義），前述觀點確實有助於理解中國對朝貢體制之形塑與操控過程，尤其在建立「心理印記」（psychological impress）這個層面上。只不過，若要完全套用此種觀點，或許也並非恰當。正如前述「被動性」以及「非威望性」這兩個特徵所揭示的，掌握與維持實質支配權，甚至著眼於某種物質回饋，始終不是帝國核心的政策重點，利用近代歐洲帝國主義政策作為類比例證，也將潛藏無可避免的視覺落差，從而讓我們很難真正去理解這段歷史之現實內涵。

值得注意的是，朝貢體制不只已然成為歷史陳跡，由於全球化浪潮與現代世界體系逐步成形的關係，一個僅僅侷限於東亞的獨立性區域體系，或許也很難被複製再現。更甚者，即便主權平等未必存在於「現實」層面（只要權力問題繼續存在，權力鬥爭及其分配爭議將成為平等的永恆阻礙），至少因其迄今在「理論」層面的影響力（目前仍作為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在可見的未來，存在顯性層級特徵的朝貢體制恐怕依舊是「不合時宜」的。問題是：若現實與

趨勢果真如此，研究中國外交傳統究竟意義何在？它對當前中國外交戰略的形成是否還存在影響？若有的話，影響將如何呈現？該如何探知並看待近期中國外交政策中的傳統成分？如何釐清它在時空環境轉換後的變遷？此種傳統成分將對中國與當代世界秩序產生何種影響？對於這一連串問題，本書將在後面的章節中，設法逐一加以思索分析。

（註110）許倬雲，《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台北：時報出版社，二〇〇九年）。有關他者（other）與我者（us）所凸顯出來的文化認知差異，在薩伊德（Edward W. Said）批評西方帝國主義時經常用到；他認為，透過現代化理論所建構出來之落後、保守、封建的東方印象，實際上是西方中心主義作祟下的錯誤觀念。請參考薩伊德，《東方主義》（台北：立緒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事實上，中國對周邊地區的態度亦復如此，儘管其政策與近代歐洲的帝國主義並不能完全等同而論。[↑](#)

（註111）所謂「天下」概念在中國自古有之，起源甚早，例如《尚書·大禹謨》記載堯「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尚書·益稷》有「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之句；《周書·召誥》提及「用于天下，越王顯」；《論語》中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之句；《楚辭·天問》有「授殷天下，其德安施」、「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等；《戰國策》記載「古大禹之時，天下萬國」；《詩經·小雅·北山》則提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著名觀念。[↑](#)

（註112）根據許倬雲在前述著作中的說法，所謂「夏」字的象形意義，指的是一個長面的人形，雙手環握且雙足交疊，至於「夷」字則是描繪形相有若背負大弓的人形，在遠古時代，所謂夷並沒有蠻夷的貶意。[↑](#)

(註113) 目前已知最早出現「中國」一詞是一九六三年出土的西周成王時期青銅器「何尊」，上面刻有「余其宅茲中國」字樣（意即我將中國作為統治地），至於在文字記載中的首度出現則是《尚書·梓材》中的：「皇天既付中國民」，其後至戰國時期左右，「中國」一詞已普遍被接受等同「世界」的概念。參見梁二平，《誰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廣州：花城出版社，二〇一〇年），頁五〇至五三。[↑](#)

(註114) 梁漱溟，《梁漱溟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三三二。[↑](#)

(註115) 斯多葛學派 (Stoicism) 乃是在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希臘城邦後所出現的新學派（一般認為起自西元前三二〇年前後，終於羅馬帝國在西元前一四六年征服希臘世界為止），學說重點乃忽視人在社會中的政治性，強調個人主義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普世觀念，並認為人類不但是其中一部分，同時必須服膺自然法則，因此每個人都應被認為是「世界人」(cosmopolitan, 此名詞曾被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普遍運用，儘管啟蒙運動與斯多葛派並無聯繫)[↑](#)

(註116)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London: Bantam Classics, 1984);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Art of War* (Pacific Publishing Studio, 2010);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註117)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of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see also Michael Williams, *Realism Reconsidered: The Legacy of Hans J. Morgenthau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註118)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Karin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New York: M.E. Sharpe, 2001).[↑]

(註119) 在此所謂學者指的是政治學者或國際關係學者而言，而非歷史學者，因為兩者焦點不同；相較於歷史學者著重於「真實」(truth)的澄清，亦即釐清所有人事時地物的確切存在，前者更關切的毋寧是「事實」(fact)問題，亦即事件發生的因果關係與變數之間的互動關聯；進言之，政治學者較重視「分析」(analysis)，歷史學家則聚焦於「考證」(prove)。[↑]

(註120) 美國學者江憶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曾試圖從「文化現實主義」(cultural realism) 角度來觀察中國對外戰略傳統，雖也加入軟性因素，畢竟還是從現實主義出發。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註121) 肯南 (George F. Kennan, 1904-2005) 是美國外交家、政治學者與歷史學家，也是著名之圍堵政策 (containment) 的創始人。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時任駐蘇聯代辦的肯南向美國國務院發了一封長達數千字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對蘇聯內部社會和對外政策進行深入分析，並提出了最終被美國政府所採納的長期戰略。相關內容曾被整理發表於一九四七年七月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季刊上，對學術界也產生相當之影響。[↑]

(註122)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2);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4). See also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Klaus Dodds, Geopolit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註123)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xiv.[↑](#)

(註124) 奧本海默 (Franz Oppenheimer) 著 , 薩孟武譯 , 《國家論》 (台北 : 三民書局 , 一九八一年) 。 [↑](#)

(註125) 相關研究請參考 : W.G. Sumner, Folkways (Boston: Ginn, 1906); Jerome D. Frank, Sanity and Survival: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Ralph K. White, Nobody Wanted War: Misperception in Vietnam and Other Wars (New York: Doubleday, 1968); Ken Booth,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New York: Croom Helm, 1979).[↑](#)

(註126) 值得注意的是 , 在蒙古與滿清入主中原後 , 雖一定程度承接了中心概念 , 但其歧視性政策也可從族群優先主義 (ethnic nepotism) 角度來分析。 [↑](#)

(註127) 伊薩克 (Harold R. Isaacs) 著 , 鄧伯宸譯 , 《族群》 (台北 : 立緒文化公司 , 二〇〇四年) 。 [↑](#)

(註128) 相關研究請參考 :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14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Ji-Young Lee, China's Hegemony: Four Hundred Years of East

Asian Domi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高偉濃，《走向近世的中國與朝貢國關係》（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黃枝連，《天朝禮治秩序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二〇〇四年）；濱下武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與歷史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石元蒙，《明清朝貢體制的兩種實踐》（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二〇一五年）。[↑](#)

（註129）中國文獻中提到「朝貢」一詞，始於《漢書·敘傳下》（卷一百）以「修奉朝貢，各以其職」來記述西域諸國與中國的互動，自《後漢書》起則使用頻率愈來愈頻繁。[↑](#)

（註130）從書名來看，《周禮》應是一部記載周代官制的書籍，但因內容與周代官制不盡相符，也有人認為或許只是一部討論理想中的政治制度與百官職守的著作。漢初書名原稱《周官》，西漢劉歆始稱《周禮》，內容分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其中冬官已亡佚，由《考工記》補足。近代有不少學者認為本書為偽作，例如康有為便直指劉歆具有嫌疑，但未獲定論。[↑](#)

（註131）正因為了鞏固中央集權，一方面在西元前一五四年引爆「七國之亂」，其後西漢也藉由平亂成功所收納的權力，終於正式實質鞏固內部權力，進而為對外擴張並建立帝國奠下基礎。[↑](#)

（註132）學者們對朝貢的制度化有著不同觀點，例如王曾才在《中國外交史要義》（台北：經世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三年）書中便認為，朝貢其實是一種「關係」而非「制度」，他的理由是：「……這種制度的基本精神，係由於中國的文化特別優美，中國的經濟也非常繁榮，同時中國一向不以血統而以文化（接受中國生活

方式與否)作為夷夏之辨的基礎，外族必須嚮慕中國文化與尊重中國皇帝方能與中國發生關係，這種嚮慕與尊崇便表現在定期朝貢上。」[↑](#)

(註133)可參考石之瑜，《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事實上，面子外交(姑且譯為face diplomacy)確實是中國對外政策重要特徵。[↑](#)

(註134)所謂「存祀」之概念與運作由來已久，據稱商朝武丁時期已有類似思想，武王伐紂後分封武庚祿父延續殷商政權也是一例，其後由孔子衍申為「興滅國，繼絕世」，明清時更為朝貢制度運作原則之一。參見王爾敏，[□中國古代存祀主義之國際王道思想□](#)，《人文中國》，第六期(一九九九)，頁三三至五二。[↑](#)

(註135)甚至有人主張朝貢在明清之前並不存在。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72-173.[↑](#)

(註136)事實上，朝鮮進貢頻率不僅如此，以清朝為例，在一六三七至一八七四年間，朝鮮以慶典、謝恩或陳奏等各種理由，在兩百三十八年間共派出六百三十二次貢使，平均每年二點六次，這也是最高紀錄。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入關以前，或出於懲罰與壓制心態，曾在一六三七至一六四〇年間規定朝鮮必須「一年四貢」，當然，這是屬於例外範圍。[↑](#)

(註137)其實藩屬君主親自來朝並不常見，在明代主要集中於成祖永樂年間，在整個清代更僅有一次，亦即安南國王阮光平在一七九〇(乾隆五十五年)年前來祝壽朝謁。[↑](#)

(註138) Michael H. Hunt,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pp.1-42.↑

(註139) 梁氏根據費正清所編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書中所謂「漢字圈、內亞圈、外圈」的區分觀點，在所著《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外交制度與中外關係的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一年) 書中提出此一看法，雖然個人對宋朝部分以及邊陲區與漢化區順序有不同見解。↑

(註140) 葡萄牙與西班牙曾於明朝末年努力躋身朝貢國行列，但因在東南亞地區進行殖民征服活動而遭到拒絕，直到一六五五年(清順治十二年)，荷蘭才成為第一個成功對中國朝貢的國家，如同其他朝貢國家一般，擁有固定之貢期(五年一貢)、貢道(由廣東進入) 與貢物規範。至於葡萄牙則於一六七〇年(康熙九年) 首度取得朝貢資格。↑

(註141) 例如，越南歷史上有四次所謂「北屬時期」，第一次是前一一年至西元三九年，西漢在此設置交州九郡，第二次是四三至五四四年，從東漢至南朝梁長達五個世紀的時期，第三次是六〇二至九〇五年的隋唐時期，最後一次是一四〇七至一四二七短暫的明朝統治，共約九百七十四年，但主要是越南北部。↑

(註142)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在《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書中，曾由「同心圓」角度，依中央影響力的強弱，將中國體系內的統治關係依照「中央 - 地方 - 土司與土官 - 藩屬 - 朝貢 - 互市」等分別加以描述；由此亦可清楚看出，相較於現代國家觀中的「均勻式」主權概念(在主權範圍內，其法律效能與制度運作都是均等的)，中國(或前主權時期的世界各地) 所呈現的不啻是種「漸層式」的現象，因此也影響了理論的解讀能力。↑

(註143) Suisheng Zhao, *Power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From the Old Chinese World Order to Post-Cold War Regional Multipolar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Key-Hiuk Kim, *The Last Phase of the East Asian World 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註144) 現據《安南紀略》記載，在越南遣使求援後，乾隆隨即派兩廣總督孫士毅於一七八八年出兵，並於大敗西山軍後，宣詔襲封黎維祁為安南國王；至於乾隆在接到捷報後亦賦詩誌喜：「絕繼滅興經久傳，尺土寸疆非所利」，完全反映出天朝觀念下的傳統存祀思維。[↑]

(註145) 西元六四五年，日本大和國中大兄皇子等暗殺蘇我入鹿掌握實權，推孝德天王即位並首度仿倣中國設立「大化」年號；六四六年元旦，孝德天王發佈「改新之詔」，開始實行政經改革，此即大化革新源起。其後，元明天皇在七一〇年將京城從飛鳥遷到平城京（今奈良），七九四年，桓武天皇又遷都至平安京（今京都），史稱「奈良平安時期」，乃日本中世紀最繁榮的時代，唐朝對日本的影響也達於極致。[↑]

(註146)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頁三八。[↑]

(註147) 王曾才，《中國外交史要義》（台北：經世文化公司，一九九三年），頁三〇。[↑]

(註148) 例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卷八一）便曾記載，早在戰國時期，趙國將軍李牧為了在雁門地區屯田防堵匈奴，於是便在邊境設立「軍市」，透過所獲得稅收來給養軍隊；到了西漢時期，《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卷一〇二）也記載，雲中太守魏尚在文帝時期亦仿效李牧作法，建立「關市」且獲利頗豐；相對地，包括匈奴在內的邊境異族也對此感到高度興趣。[↑]

(註149) 對此可參考：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張曉寧，《天子南庫：清前期廣州制度下的中西貿易》（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一九九九年）；費正清編，張玉法等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台北：南天書局，一九八七年）。↑

(註150) 根據《明會典·朝貢一·東南夷上》列有十九個朝貢國家，《朝貢二·東南夷下》列有四十五個國家，《朝貢三·西戎上》列有三十八個國家，總計已超過百個，但記錄時間僅及於萬曆年間；若根據清朝修纂的《明史》，則總數更達到一百四十八個左右。↑

(註151) 從順治到康熙年間（一六五五、一六五六、一六六五、一六七二、一六七五）共五次頒布「禁海令」（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以及三次（一六六一、一六七二、一六七八）配合頒布「遷海令」（又稱為「遷界令」，亦即自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均內遷五十里，並焚毀全部房舍，以達堅壁清野目的），對沿海貿易也構成重大影響。↑

(註152) John K. Fairbank and S.Y.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 (1941), pp.193-199.↑

(註153)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〇年），頁二九至三〇。↑

(註154) 由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費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II）企圖在帝國內貫徹天主教信仰，並拒絕對波希米亞境內的誓反教徒讓步，於是在一六一八年引爆了後來所稱的「三十年戰爭」。事實上，這場戰爭原本就不全是宗教性的，同時也有複雜的政治意味，尤其是法國和霍布斯堡王朝的歐洲爭霸戰，雙方最終在一六四八年

於西發利亞（Westphalia）簽訂和約，讓神聖羅馬帝國因此分裂成三百四十三個具有獨立主權的小邦。[↑](#)

（註155）例如為結束拿破崙戰爭所召開的「維也納會議」共有超過兩百個政治單位參加，但最初真正能參與決策的只有英國、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等四國；參見David King, *Vienna 1814: How the Conquerors of Napoleon Made Love, War, and Peace at the Congress of Vienna* (London: Random House, 2008).[↑](#)

（註156）朝鮮是否對日本朝貢存在歷史爭議，日本認為自二世紀神功皇后征服新羅後，朝鮮半島南部便長期對日本進行朝貢，但朝鮮方面則認為至少自十六世紀以來，派往日本的為「通信使、體察使或敬查使」，目的僅在進行單純的外交與貿易互動，並非所謂朝貢。[↑](#)

（註157）在海盜勢力中，最著名者為十三至十六世紀之間的「倭寇」集團，事實上它又可以十五世紀中葉為分水嶺，前期範圍主要為朝鮮半島至中國沿海一帶，以日本人為主，稱為「真倭」；後期舞台則為中國沿岸至東南亞方面，成員以中國人及朝鮮人為主，稱為「假倭」。倭寇發生的主要原因基本上是明代海禁政策的後遺症，相關問題可參考：松浦章，《東亞海域與台灣的海盜》（台北：博揚文化公司，二〇〇八年）；松浦章與卜鳳奎，《明代東亞海域海盜史料彙編》（台北：樂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松浦章，《清代帆船東亞航運與中國海商海盜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

（註158）相關討論可參考：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Lenny Flank, *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 Marxism, Capitalism, and Their Relation to Sexism, Racism, National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St Petersburg, Florida: Red and Black Publishers, 2007);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前提：先安內再攘外

正如眾所周知，政策的理性程度有賴於「政策目標」與「實際能力」之間的有效維持平衡。以中國傳統外交戰略為例，重建帝國政治架構並恢復天朝上國威望，固然是許多執政者（尤其是王朝創建者）夢寐以求的目標，但基於「逐夢踏實」的理性，在邁向目標的過程中自然需要不斷地進行相關評估。可以這麼說，無論最終發動對外擴張的目標僅僅為了消極地抵禦外敵入侵，還是為了更積極地奠定帝國基礎，在此之前，建立並維持一個穩定、凝聚且有效運作的內部政治體系乃至關重要。更何況俗話說「外交乃內政之延長」，因此，瞭解中國進行內部統治時所面對之各種挑戰，此類挑戰對於對外政策內涵之影響，以及中國在面對此類挑戰時慣常出現的思考與反應，既是分析其對外政策時無可迴避的基本點，也是此部分敘述重點。

規模性政治壓力與危機

正所謂「外交乃內政之延長」，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固然可反映出其周邊環境所潛藏的安全威脅問題，但根據決策邏輯的基本理性要求，亦即最終政策必須配合國家利益設定，並與資源供給現實成正比，由此也凸顯出國內結構特徵的關鍵影響所在。在本書當中，個人一方面雖以「帝國時期」概念重新進行歷史斷代，藉此理解中國外交戰略傳統的焦點所在，然後設法將朝貢體制視為此種戰略的終極制度化呈現，不過，究竟甚麼是帝國？其主要特徵為何？帝國內部政治結構又如何影響其對外戰略與政策？對此，若缺乏更客觀且詳細之陳述，恐怕不易提供大家一個有效的認知基礎。

帝國概念之再辯證 由於推動帝國主義（imperialism）政策乃近代以來主要歐洲國家對外戰略之思考核心，且主要強權都紛紛自稱為「帝國」（empire）的關係，不僅使得相關研究無論在詞彙設定或思維內涵方面都深受西方學界支配，[（註159）](#)至於「帝國」與「帝國主義」兩個概念的混淆不清，更是產生理論誤導的最主要根源。

一般來說，多數學者都將所謂帝國之特徵聚焦在壟斷性統治、廣大地理面積幅員與複雜之組成份子上，並凸顯其擁有權力之絕對優勢，以致無法清楚區隔「帝國」與「強權」之間的差異。[（註160）](#)例如《牛津詞典》便將「帝國」定義為「由一個統治族群團體透過政治與軍事手段，將其權力加諸於擁有不同文化與族群脈絡的人民身上。」[（註161）](#)波本克（Jane Burbank）和庫柏（Frederick Cooper）在區隔帝國與其他政治實體時，除了規模之外，主要僅聚焦在其「差異政治」的治理特徵上，亦即「預設用不同方式來治理政體內的不同民族」，從而使其主權呈現「分散、分層與重疊」之特色，目的在凸顯與當前主流之民族國家的差異。[（註162）](#)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的看法與此類似，他指出帝國經常是個「多民族實體」，且由於考慮到經濟與政治代價高昂的緣故，雖然經常自視為文明核心，但並不傾向推動類似「文化標準化」的政策，甚至被迫選擇較接近聯邦概念的政治制度。[（註163）](#)

那麼，什麼又是帝國主義呢？以道爾（Michael Doyle）的說法為例，儘管他部分正確或客觀地指出「所謂帝國主義乃建立或維持一個帝國的過程或政策」，依舊認為「帝國乃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關係，在此種關係當中，一個國家可藉由武力、政治合作、經濟、社會或文化依賴等途徑，達成控制另一個政治社會實際主權之目標」。[（註164）](#)前述說法的正確部分在於，所謂帝國主義其實是一種未來性政策或戰略之「進行式」與「未完成式」狀態，目的或在於

最終完成帝國之政經建構，但錯誤之處則在於將為了建立帝國所使用的手段，等同於帝國政策本身。[\(註165\)](#)

當然，西方學界中不乏較中肯的論述，例如哈德（Michael Hardt）與納格里（Antonio Negri）便直接指出，「就帝國而言，我們所認識者與帝國主義全然不同」，其差異關鍵不在治理實體本身，而在於它所反映出來的「一個由法律構成之既存世界秩序」；相較僅僅代表歐洲民族國家主權疆界向外延伸的帝國主義，帝國則指稱一個環繞著「被文明化之世界」（a civilized world）的有效統治方式，重點在展現某種靜止式歷史秩序，從另一角度看來，帝國不僅目的在管理一個特定地域中的人群，同時創造出它所存在的世界本身；一言以蔽之，「帝國的概念核心乃是和平，亦即超越歷史之外，永久與普遍的和平。」[\(註166\)](#)明克勒（Herfried Munkler）的看法與此類似，他認為有必要「將帝國與一般的主權國家區分開來」，首先，相較主權國家彼此承認對等地位且擁有涇渭分明的邊界線，帝國則不僅存在不全然封閉且難以精確劃定之邊界，更重要的是，它既不承認存在與其平起平坐的實體，對體系內影響力也有從中央到邊陲逐漸遞減之趨勢。[\(註167\)](#)很顯然，前述既是本書大致接受的「帝國」概念，[\(註168\)](#)也是個人藉以觀察中國歷史發展的基礎。

大體言之，empire源自拉丁文中用以描述羅馬的imperium一詞，意指「無遠弗屆之有效統治」，至於所謂「帝國」乃近代將來自西方之概念漢譯後，結合中國既有皇帝制度所產生的新名詞，由於中國古代一般自認是「天朝上國」，並未自稱「帝國」，因此必須考慮到語詞轉借時產生的定義問題。接下來，本章將由更重視「體系秩序」而非單純指出「權力對比」之定義角度出發，瞭解中國維持帝國架構面臨的問題。

帝國規模與統治途徑的最初挑戰 就中國而言，秦始皇雖在西元前二二一年開啟了「第一帝國」時期，並奠定了此後兩千年歷代王朝追尋帝國規模與相關法制時，最為重要的參考基礎，奇特的是，一度無比強盛的秦朝僅維持了短短十五年的時間，便隨著子嬰在西元前二〇六年開城投降而宣告覆滅。比起先前秦國在幾十年間橫掃關東六國，幾乎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態勢，帝國崩解的如此快速不啻是個充滿著難解矛盾的歷史謎團，值得進一步加以思索。[（註169）](#)

若想探討所謂「秦國崛起」議題，不能不回溯至西元前三六五至三三八年的商鞅變法過程。[（註170）](#)自此，秦國一方面開始逐步整頓吏治並統一法令制度，不僅將人民用軍事方式（什伍連坐法）更有效地組織起來，並透過解放奴隸與獎勵軍功來刺激人民的參戰意願，再加上農業生產與手工業技術大幅進步，以及鼓勵商業經濟發展等政策，從而讓它慢慢拉開與其餘各國之間的差距，最終更在不到十年之間（西元前二三〇至二二一年）便完成征服「已知世界」（以西周體系為基礎加以擴大之戰國世界）的偉業，氣勢不可謂之不強，與其他行為者之實力差距懸殊亦一眼可見。儘管如此，首先，有組織的軍事抵抗不能讓各國免於被征服，散亂且漫無章法的群眾起義，反倒讓統一後的秦帝國左支右絀，這已然是個難以解釋的問題；其次，若說秦朝是因過度地役使民力以致亡國的話，或許也不是個令人滿意的答案，無論是修長城、建馳道或遠征塞外游牧民族，秦始皇之所為不僅比不上隋煬帝（雖然後者也被認為因此造成帝國覆滅），跟明成祖相較更是小巫見大巫（後者還有推動下西洋政策之錢坑壯舉）。至於所謂「坑儒」，規模既遠遠比不上明、清兩代的文字獄，而為了爭奪皇位所導致的宮室內部相殘，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隨處可見，毫不稀奇。那麼，秦朝覆滅的根本原因究竟是甚麼呢？

個人認為，「統治規模與治理政策失衡」乃關鍵所在。

正如眾所周知（並如前述），商鞅變法既是秦國富強的轉捩點，其背景則為一般被稱作「刑名之學」的法家學說。大體言之，此一學派否定了由西周體系所建構，以世襲貴族階級為中心的保守主義制度傳統，進而認為「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亦即制度必須與時俱進才有競爭力。至於其思想核心，大致為「明法」與「壹刑」兩者，前者指的是法令的公開性，亦即所謂「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後者則指出法令應具備之公平性，相較傳統中的「刑不上大夫」，法家強調刑罰不應區分等級，亦必須跳出貴賤的隔閡。

可以這麼說，由於戰國時期相對於西周，甚至春秋時代的更加動盪局面，改變法令的「靜態假定」以求因應周邊環境之快速變遷，當然具有高度的必要性，結果也讓「變法圖強」成為一時風尚所趨。[（註171）](#)只不過，隨著戰國時期終結以及秦國建立大一統帝國之後，情況顯然出現了根本不同。

首先，第一帝國非但終結了動盪數百年的戰國時代，在它重建了自西周體系崩解便始終無法出現的大致和平狀態後，「維持體系新秩序」很自然地取代戰國時期「提高效率以面對環境挑戰」政策目標，成為應有的政治決策考量核心，而「靜態假定」也必須取代「動態調整」，重新作為帝國統治者面對並思索新治理環境時的政策理性基礎。換言之，面對變動不居的時代，固然得「以變應變」，但在帝國結構提供了「不變」的可能暗示後，「以不變應萬變」不啻成為新的決策圭臬。由此看來，在統一六國後還不斷埋首進行各種制度變革的秦朝，不免有點與新時勢脫節的嫌疑。

更重要的是，法家主張的「明法」與「壹刑」固然是落實制度所需，在理性上也無可非議，但觀諸人類歷史當可以發現，制度化的難處經常並非出在「創造面」（例如變法並非商鞅所獨創，事實上各國都在積極變法），而在「實踐面」（最終只有秦國可全面落實改革），進言之，最高統治者（在秦國為秦孝公）義無反顧的支持，一般認為乃秦國成功關鍵所在。從某個角度看來，此種觀點雖

然似乎沒錯，卻有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個人認為，如何建構一個同時具備效率與可信度的執法系統或許更重要。以秦獻公在西元前三七五年推動的「戶籍相伍」（取消國、野界限，將全國按五家為一「伍」的單位重新編組起來）作為制度基礎，商鞅一方面增加了以十家為一「什」的新單位，更透過「連坐」與「客舍登記」等新設計，利用什伍編制作為防範犯罪的第一線，必要時配合強制性鎮壓作為以求達到貫徹法令的目標。

就結果而論，商鞅變法也許可算成功。[\(註172\)](#)不過，隨著秦國因為統一天下以致使其統治地理規模擴張了十倍以上，執法難度在乘數化下顯然相對增加了不只十倍。值得注意之處在於：首先，任何制度設計均重在「對症下藥」與「因地制宜」，商鞅改革的成功正因為他正確地面對了秦國的問題與條件，關鍵是，秦國的問題未必等於新帝國面臨的問題，由於征服所得來之充滿文化與地理異質性的廣大區域，既必須被重新認知瞭解，也應當設法納入其需求成為新制度的基礎，而非僅期望單純以「秦制」強加於天下來解決所有問題。

其次，統治規模的明顯擴張也必然大幅增加執法難度，例如，在西元前二一八與二一六年兩度發生秦始皇車駕遭到驚擾的事件後，儘管帝國政府依照以往慣例「大索」咸陽，結果卻毫無所獲，原因便在於犯罪行為者的逃竄與藏匿早已超越執法所需要的「技術」範圍。事實上，直到現代輔助性科技出現之前，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帝國架構能解決相關法律落實問題，其結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既成為政治慣例，[\(註173\)](#)所謂帝國統治亦往往僅能侷限於虛擬的層次而已。

獨尊儒術與帝國統治正當性之建構 顯然，秦在面對新的統一局面時，並未思考「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s）途徑。面對進

入帝國時期後，由於體系規模擴張帶來的異質性治理壓力，秦朝企圖藉由統一貨幣、度量衡與文字來創造新的同質性基礎，廣設直轄郡縣單位以加強中央集權，並修築全國道路網以利隨時進行鎮壓等，[\(註174\)](#)這些政策選項都不能說不理性，終究無法逃避傾覆命運。可以這麼說，作為「前無古人」的帝國結構創造者，秦朝的迅速終結既屬「非戰之罪」，在毫無前例可供依循的情況下也算相當自然。更重要的是，這段短暫的試驗性歷史為未來真正奠定帝國基本規格的漢朝，提供了難得的參考借鏡。

只有正確地回首過去，向前演化才具可能性。

站在秦朝失敗的歷史灰燼上，漢朝首先選擇的是具有某種過渡性質的所謂「黃老治術」。[\(註175\)](#)作出此種選擇理由有二：首先，正如漢初主要制度設計者陸賈在《新語》書中所主張，「夫道莫大於無為，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由此一方面衍生出「無為而治」及「與民休息」等政策綱領，至於其哲學基礎則在強調並發揮「無為而無不為」的道家思想原則（其實正如同前述「以不變應萬變」的概念）。就秦國以武力征服六國，乃至秦末全國動亂所帶來的連續數十年戰禍蹂躪看來，隨處可見的殘破荒涼景象自然讓漢朝雖然未曾明文宣傳黃老之學，但「約法省禁」以便修養民力亦屬無可避免的政策選擇。其次，純就哲學思想本身發展來說，儘管戰國時代的激烈競爭壓力使得法家之流的「極右派」脫穎而出（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西斯思想興起的歷史背景一般），為了與其對抗並求取平衡，「極左派」的道家在大亂之後應運而生也可以想見。

儘管如此，由於主張「個人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的極左派道家，畢竟與重視中央集權的帝國格局不符，因此在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右派的「獨尊儒術」乃緊接著粉墨登場，從而創造出未來兩千年帝國時期的正當性思想核心。

從某個角度看來，漢武帝時期開啟的「尊儒」政策與秦國自商鞅變法至李斯「焚書坑儒」，所企圖完成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只不過手段稍有不同。相較商鞅直截了當地強調「民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而不殆」的「愚民」主張，漢朝則迂迴地設置了「五經博士」，以利誘而非威逼的方式，來達到建構學術思想一言堂的效果。其次，為維持帝國架構穩定，漢朝既必須解決「法家作法無法被貫徹，但法令制度設置又為威望所需」的兩難困境，至於辦法則是將重構後的儒家「宗教化」（這也是董仲舒納入「天人感應」之類陰陽家思想的緣故），[（註176）](#)主要是吸納從西周到春秋時期所流行有關於「天」的泛靈論概念，將其轉化為與人類社會具有準血緣倫理關係的哲學基礎，[（註177）](#)繼之再透過「君權神授」概念將皇帝予以「教宗化」（強調其作為上承天命的神人溝通角色）。正如韋伯（Max Weber）指出的，比起歐洲清教徒強調「理性地去支配世界」，中國的儒教則強調「理性地去適應世界」，[（註178）](#)這正是此時期帝國政策作為想達到之最終目標所在。

更重要的是，漢朝還進一步突出「家」與「孝」的地位。

相較西方主要在凸顯男性壟斷政治的「家父長制」（patriarchy）概念，日本學界自桑原隲藏以降，從「家族國家觀」來理解中國政治的角度，或許更值得參考。[（註179）](#)趙汀陽亦指出，「家」和「天下」是中國思維中最具支配地位的兩個概念，「家庭性」不僅是多數中國人理解自身政治與文化制度之基本原則，[（註180）](#)在「家 - 國 - 天下」的思想體系當中，「家」既是出發點也是某種終點，無論司馬遷「天子以四海為家」或蔡邕「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的說法，都反映出「家」在中國政治倫理中的位階，至於近代以來將state或country翻譯成「國家」，也很具有中國特色。

在處理「家」的問題時，「孝」乃行為核心指導準則。儘管孔子說過，「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相較最初有關孝道的討論仍主要集中在倫理哲學層面，漢代則早在武帝獨尊儒術之前，

例如文帝便曾經說：「孝悌者，天地之大順也」，由此開啟了孝道從倫理哲學轉化為政治思想，甚至是主流統治學說的過程。不僅第一帝國本身強調「以孝治天下」，因此繼嗣皇帝諡號都有「孝」字，根據《漢書》與《後漢書》的記載，自西漢惠帝至東漢順帝年間，中央政府對於民間孝悌行為的公開褒獎便達三十二次，地方性獎勵個案更是不計其數。[\(註181\)](#) 尤有甚者，漢武帝還採納董仲舒「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建議，自此，在接下來的兩千餘年間，孝道行為除作為社會文化核心外，也成為政府選官任職的重要參考標準，「君父一體」、「忠臣必出自孝子之門」、「移孝做忠」以及「臣事君猶子事父」等觀念也居於政治學說的正統核心；早在西漢宣帝時期，張敞便上書說，「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室則竭力于君，……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註182\)](#)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化後的孝道不但重視其倫理性，「絕對服從」更被凸顯為最重要的行為規範。

帝國危機：政治與經濟的雙重來源 儘管自身國祚不長，由秦朝在「第一帝國」時期中創建的治理制度框架，加上漢代進一步補充的正當性思想基礎，仍成為未來重建帝國者遵循的標準典範。問題是：何以帝國不斷經歷崩潰與重構的循環歷程呢？首先，就政治層面來說，帝國統治危機主要往往來自為了因應治理規模問題，所帶來一連串制度選擇下的自然結果。

基於前工業時期之技術限制，中國固然暫時必須以道家的「清靜無為」來取代或調和法家的「積極有為」，但強調「無為」所間接暗示的「虛擬治理」（virtual governance）狀態，又由於無法完成持續補充威望的功能性作用（理論上，政治威望應來自於有為政策之反饋），為了彌補威望因無為而流失可能帶來的威脅，透過「宗教化後的儒家」以及「政治化後的孝道」所提供的思想麻痺效果，短期內雖或可轉移人民注意力以維繫帝國存續，根本關鍵仍在於，政府效率能否經由制度革新而被有效地提升。對此，中國歷代制度演

進的歷史，表面上雖似乎提供了某種正面訊息，薩孟武依舊認為：「官僚政治的理想能夠實現，需有一個前提，即天子高拱於上，事事聽受宰相主張」，但因「天子不皆賢，而決定宰相賢不賢之權，又屬天子之故」，因而透過選賢與能來維持官僚理性之主張乃難以落實。加上君權與相權之間的長期鬥爭（參考下面段落所述），[（註183）](#)政治穩定與政策理性既不可得，希望透過政府完善運作來增加威望亦屬緣木求魚，在此一情況下，不斷受創的帝國威望自然埋下最終崩潰的伏筆。

無論如何，更關鍵的影響其實來自經濟層面。

正如《大學》所言「有土斯有財」般，作為農業社會最重要且甚至是唯一的資本財形式，土地雖是占人口絕大多數之農人的立身根本，卻也成為豪強階層與商人爭奪的主要對象，其結果經常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社會發展窘境。從理論面看來，解決前述挑戰的辦法可說既簡單又複雜：從簡單角度來說，「土地國有化」政策始終被認為是釜底抽薪之道，無論是王莽試圖推動的「王田」制度（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還是從西元四八五年（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一直持續到七八〇年（唐德宗建中元年）的「均田」制度（將天下之田均分於民，男女年滿十五歲者都由國家授地，男子授露田四十畝，女子二十畝，身死或年滿七十歲時交還給政府，初受田男子則另授予桑田二十畝，作為世田或稱永業田，不須歸還且可買賣），目的都在於由政府出面解決土地分配爭議。[（註184）](#)甚至到了十九世紀末，在孫文的革命主張中（平均地權與耕者有其田），對於土地問題的看法依舊與前述基本類似。

不過，且不論大一統體制使統治者可「獨擅天下之利」，並經常在缺乏制衡的情況下流於鋪張奢靡，如同政治層面的挑戰一般，帝國政府的運作既然僅具有虛擬性質，執法效率自然不能被過高地期待。其次，在生產技術難以迅速提升的情況下，由於農民無法在短

期間明顯拉高單位面積產量，又因為人口繁衍導致土地不斷被切割（源自均分制的遺產分配慣例），一旦天災人禍衝擊生產結果，假以時日早被細碎化的土地也很難避免被兼併的命運。更甚者，由於帝國政府為了拉攏地方仕紳與宗教力量作為穩定社會秩序的基礎，往往以「免稅」作為利益交換條件，[（註185）](#)由此讓後者在爭奪土地時擁有更強大的制度性優勢，[（註186）](#)至於廣大農民只好在失去生存所賴的土地之後，被迫「揭竿而起」，發動大規模的群眾反叛運動（例如黃巾之亂、黃巢之亂、紅巾之亂，或太平天國運動……等），從而直接衝擊了帝國的根基並導致其趨於瓦解。

分權式結構的必然性與問題

承上所述，中國雖然在秦朝奠下某種「可重建之帝國框架」，由於始終缺乏足以克服治理規模障礙（大到無法治理）之相關技術，在僅能勉強維持「虛擬統治」狀態之困境下，從而讓維持「統一表象」成為帝國政府的核心要務。例如，董仲舒曾言：「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換句話說，其建議是從統一思想（獨尊儒術）著手，希望藉由遏止自由討論的空間，消弭任何對帝國結構正當性的挑戰。

儘管如此，從歷史發展現實看來，控制思想雖確實有助於提供支援後續帝國重建過程的意識形態（ideology）基礎，畢竟無法阻止帝國邁向最終崩解的命運。因此，藉制度面設計來協助維持帝國的穩定性，乃統治者無可避免的思考方向。事實上，為達成權力自保及防患未然之目的，既得利益者經常採取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手段，亦即利用機制設計與權力再分配的過程，來達到抑制潛在競爭者之目的。在中國的帝國時期中亦復如此。

中央層次：相權之設計、演進與裁抑 在秦始皇所建立之單一權力導向的君權政治系統中，理論上「天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由此讓「皇帝」成為握有最高權力者。其主要特徵正如李斯所言，「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亦即是絕對無可挑戰的。但事實並不盡然，其中，君權最具威脅性的競爭者便是身為行政首長的宰相。[\(註187\)](#)不僅帝國治理之制度化本即需要時間來逐步成熟，何況皇位繼承乃根據血緣關係，而非能力臧否，亦即無法保證繼位者的執政品質，由此既彰顯世襲專制政治本質上無法克服的缺陷，也讓專業宰相成為必要的輔助性設計。所謂「相也者，百官之長也」，[\(註188\)](#)具專業文官訓練之宰相不啻是帝國管理體系中的一個穩定力量關鍵。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相權乃「不得已」卻又具「必然性」的設計，伴隨著統治技巧與經驗的成熟，以及行政官僚體系分工逐漸進步與繁複化，如同張金鑑指出，中國的宰輔制度演進也凸顯出下列幾個特質：「第一，中國歷代的宰輔機構兼掌立法與行政兩種功能。……第二，中國歷代宰輔機構的職掌則為名實不相符，事權不確定的特殊運用。……第三，法定宰輔機構每每退為徒具虛名的榮銜爵位，天子近幸私人或長文書草擬者，卻常進為掌握實權的宰輔大臣。……第四，中國宰輔組織不但無定制、無定職、而且無定員，秦以後宰臣數額，呈逐漸增加的趨勢。」[\(註189\)](#)細心者當可發現，其中除第一項之外，其餘特質幾乎都是為了裁抑相權而產生的。

如同皇帝自稱「寡人」一般，在孤獨之餘，不安全感乃油然而生。

相關發展早自東漢初期便已開始，例如光武帝便下詔改定官名，並強調三公職權相等，這種設計當然看得出制衡的潛在意味。不過，「三公並立」並非他用以裁抑相權的唯一手段，更重要的還是內朝官（中尚書令）地位的提升，[（註190）](#)這也凸顯了在帝國內部集權過程中，「以近臣抑制大臣」之一大特徵，[（註191）](#)至於東漢末期，由秘書令發展出來的中書監令，不啻是另一個例證。[（註192）](#)接下來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個制度發展動盪的時代，不穩定的原因主要來自於第一帝國崩解導致皇權低落的結果。由於權力覬覦者不斷設法攘奪具最高實權的政府職位，統治者的因應則是持續形成新的內朝幕僚機構來加以抗衡，這既是後來中書與門下兩個機構更迭興起的緣由，也隱約出現了一個新的分工趨勢。迄於隋唐第二帝國之後，基於帝國再造與強勢皇權重新鞏固的事實，在政治設計方面，從「三省並相」以及三省最高長官均置二員的雙重設計看來，可見仍保有「制衡」的意味。

總的來說，在第一帝國時期的「相權一元化」階段中，一方面在地方上運用簡單的郡縣制度作為統治架構中的基層治理單位，至於中央官員所管轄內容則大多若非宮廷宗室之事，便只是以掌握軍隊主力作為政權鞏固的基礎。由於此際政治事務尚不繁雜，相權無分工之絕對必要，因此發展仍大致維持一元化原則。儘管如此，到了第二帝國時期後，政務的複雜化由取代九卿之尚書諸曹所管轄內容當中，地方事務比率增加即可明顯看出。除此之外，隨著政府組織更為成熟，以及皇帝在累積歷代經驗中所體會出集權與制衡的必要性，相權設計乃順勢朝多元化發展，這也是三省制的緣起。[（註193）](#)

到了明朝，為進一步鞏固中央權力，明太祖朱元璋首先重新編組地方治理結構，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專掌民政與財政，另設按察使司掌刑法，設都指揮使司管軍事，三者不但互相獨立而且皆直屬於中央。接著，在中央設通政使司專掌官員及各部門奏章收發與百姓陳訴審驗後，一三八〇年（洪武十三年）藉「胡惟庸案」廢除中書省與丞相制度，並陞六部直屬皇帝之舉，則凸顯出中國相權發展之「虛位化」特徵。值得注意的是，此階段發展亦奠定了在

清朝建立的第三帝國時期，整個帝國權力制度慢慢轉而以皇帝作為其放射核心，最終建立起一個完全中央集權的統治體系。

總結兩千餘年來中國的帝國政治發展經驗，君主與宰輔的權力互動，可說是其中最重要且明顯的邏輯所在，至於其歷史特徵大致有下列幾項：首先，不斷強化皇權乃主軸所在；皇帝採用的首要形式是以集體討論方法展開「廷議」，接著是吸收智囊以擴充幕僚能量，最後則是以直接指派官吏及收受地方奏章的方式獨攬大權。[\(註194\)](#)其次，皇位繼承制度的不完美，乃君相衝突的最大內在因素；傳統的嫡長子繼承制固然理論上可一定程度降低人事衝突，缺點在於「立嫡以長不以賢」的原則，不僅無法杜絕其他人的競爭野心，此種「非智能性」的決定方式對繼承品質同樣是毫無保障的。更甚者，由於皇帝統治能力既不可靠，對宰臣之倚賴既相對提高，牽制相權的主觀想法自然也難以被真正落實。最後，缺乏法制概念終究導致相權結構一再被破壞。由於人治傾向嚴重，再加上無法以宏觀視野來檢討組織運作，皇帝經常不加深思地以個人好惡來改變既有政治結構；此種缺乏法治觀念的做法，既使帝國君主無法理性地由制度面來徹底解決君相之間的權力緊張問題，也因此埋下帝國動盪的伏筆。

地方層次：建立帝國屏藩之兩難困境 除了解決「茶壺裡的風暴」，穩定帝國核心的權力挑戰之外，在交通與通訊技術遠較現代落伍的情況下，要如何僅僅能維持虛擬治理，又得有效控制地理幅員龐大的帝國體系，恐怕還是統治者必須面對之最急切難題。

在兩千餘年的帝制時期中，中國雖表面上展示出「中央集權」的治理假象，實則權力下放讓地方得以因地制宜解決問題固然無可避免，也是維繫中央威望必要的制度舉動，只不過由此可能埋下「山頭主義」之疑慮也不能不防。為此，透過統一思想（獨尊儒術）來

建構具說服力的正當性基礎，雖合乎「攻心為上」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但為免面臨地方山頭佔地為王，甚至反叛者兵臨城下戳破「國王新衣」的假象，從未雨綢繆角度建構出一套合乎「預防性戰略」（preventive strategy）的政治設計，或許是更加迫切的制度任務。

針對前述挑戰，解決途徑或只有一個，亦即設法「以點制面」，至於實際辦法則早在西周體系初期便已出現。例如為統治剛剛征服得來的廣大東方，周公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國和異姓國，正所謂「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目的便是希望「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藉此鞏固統治基礎。由於貴族制度本即以血緣標準作為正當性關鍵，再加上家族關係所暗示的情感接近性，將近親佈防帝國各地戰略要點，理論上應是最可靠穩當的安排。

儘管在第一帝國初期，秦朝由於過度信任法令制度的管制能力，因此並未作類似安排，但在劉邦接著建立漢朝之後，隨即便「殺白馬為盟」，立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接著分封劉氏宗室貴族為諸侯王，分駐全國各處，[（註195）](#)不過，一方面由於劉邦所封同姓諸侯封國，在天下五十四郡當中便占了三十九郡（光是齊、楚、吳等三國幾乎就「分天下半」），中央直轄人口也僅有諸侯國的一半左右，不啻形成某種「尾大不掉」的潛在政權安全威脅。更甚者，血緣關係雖可能讓帝國中心對諸侯動之以情，若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帝國雖重建了某種靜態性政治結構，畢竟西周時期嚴謹禮法已隨封建解體蕩然無存，血緣接近性不僅暗示著繼承的潛在正當性，帝國架構試圖維繫之高度權力集中傾向，也向諸侯散發著無可抗拒的奪權誘惑，至於結果便是文帝時期在西元前一七七至一七四年爆發的兩度叛亂（分別由濟北王劉興居與淮南王劉長發動），以及景帝時期在西元前一五四年由吳王發起的「七國之亂」。[（註196）](#)其後，漢朝一方面實施「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軟性漸進政策，並規定「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剝奪其政務權力，從而讓利用同姓諸侯護衛帝國安全的設計名存實亡。

西晉初期，晉武帝基於「懲前代之失」（主要是王莽與司馬氏奪權的歷史經驗）而制定「王國置軍」制度，將二十七個同姓封國分為三等，各置數目不等的軍隊，但剝奪其地方行政權，結果依舊再度發生類似的「八王之亂」（二九一至三〇六年），[（註197）](#)甚至還讓遊牧部落趁勢南下，將中國帶進長達三百餘年的南北朝「大分裂」中。根據此一負面經驗教訓，重建後的第二帝國於是改弦易轍，儘管大臣蕭瑀曾在唐太宗時期建議恢復分封同姓諸侯的制度，以保障帝國久遠發展，太宗本人也曾在六三一年下令擬定由皇族擔任邊疆長官的草案，並於六三七年任命了一部分皇子與大臣至各州擔任具世襲性質的「藩翰」與刺史，但因多數朝議反對，此一制度最終並未被落實。[（註198）](#)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地方分封制度曾經歷數度變革，在西周體系時期等同於獨立國家的政治單位，雖在西漢初期被重建起來，但在前述「七國之亂」的教訓下，漢武帝乃順勢對食邑制度進行了第一次改革動作，亦即取消諸王直接擁有私軍、土地與統治人民的權力，僅保留了其租稅特權，從而強化了中央集權程度。至於八個世紀之後的唐玄宗時期，更進一步取消地方諸侯直接向食邑封戶徵收賦稅的權力，從而使後者只剩下名義上的榮銜地位。[（註199）](#)

可以這麼說，「強幹弱枝」乃是帝國權力結構發展的主旋律，其中兩度逆流式（西晉時期與明代初年）發展結果，都以爆發兄弟鬩牆與內戰收尾。其次，由於模仿西周體系的「分封制度」事實未能達成穩定體系之目的，一旦帝國威望受到威脅，為了在龐大幅員中維持架構運作，暫時將部分權力過渡給地方單位雖無可避免，最終往往埋下帝國崩裂的因子。例如在東漢末年爆發「黃巾之亂」（一八四至一八八年）後，各地方長官與地主豪強便紛紛趁機發展自己的獨立武裝力量，[（註200）](#)其後更逐漸演變成割據分裂的局面。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唐末的「安史之亂」（七五五至七六三年）後，為因應緊急軍情而予以強化的「藩鎮」制度，[（註201）](#)在叛亂結束後不但數量繼續增長（從三十四個增至五十個左右），甚至成為正式地

方單位；因為地方分權導致中央威望削弱，基本上也成為第二帝國覆亡的原因。

無論如何，血緣關係依舊具有強大的誘惑與說服力。在分封近親諸侯可能引發皇族同室操戈，與缺乏親族扶持以致中央與地方權臣經常趁機攘奪權力的兩難困境之間，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一方面恢復西漢與西晉初年的制度，讓部分皇子領軍駐紮帝國各處，甚至明朝的制度還更接近西漢初期一些，亦即讓駐地藩王擁有相當的行政與司法權限，但為了防止產生類似「七國之亂」與「八王之亂」的悲劇，補救的辦法有二：首先是積極強化中央集權（廢相舉措是一例證），其次則是試圖透過皇室教育（為每位皇子配備知名儒士做師傅）來達到感化的目標，但終究還是爆發了一三九九至一四〇二年間的「靖難之變」。

正如前述，無法克服治理技術障礙的「統治規模」問題，似乎是中國在兩千餘年帝制時期中，統治者永遠揮之不去的夢魘。從歷史經驗歸納可見，中國的帝國發展經常面臨兩個潛在的「危險期」：其中之一出現在開創朝代的前三代君主時，主要來源是「禍起蕭牆」，例如第一至第二帝國時期的七國之亂與玄武門之變（明朝初年的靖難之變也與此類似，至於第三帝國面對的「三藩之亂」，則是由於異族統治所帶來的變體），但無論宮廷政變或者同室操戈，基本上都還不致影響帝國穩定；至於因土地分配問題而起之大規模農民起義，則不啻是帝國晚期難以迴避的問題，無論是漢末黃巾之亂、唐末黃巢之亂，或者清末的太平天國等，土地兼併所帶來的經濟危機，終究是帝國無可迴避之最具殺傷力的挑戰。

對外擴張與體系建構

或可這麼說，中國其實長期存在著一個「早熟」（early-maturing）的帝國結構。儘管相較於世界各地其他的類似個案，它

擁有幾乎最長的延續性，但這一方面既不能掩蓋帝國時期在歷史當中的「間歇」（intermittence）特質，更甚者，由於古代國際社會相對於近代之趨近「靜態且和平」，透過對外擴張以建立帝國，雖是歷代統一王朝都希望落實的政策目標（分裂時期的正統王朝，採取的則是趨近現實主義取向的現狀政策，詳見本書後面敘述），從現實角度看來，倘若無法先穩定內部政治統治基礎，想成功對外擴張幾乎也是不可能的。換言之，「內部優先，對外次之」乃是中國歷代統治者理性的政策順序。更何況對外擴張乃高度「資本密集」的行為，如果無法透過有效內部治理以建構提供穩定補給之可能性，從邊境地區發起對外戰爭無異盲目的自殺性行為。

缺乏擴張條件下之退縮綏靖政策 在西元前二〇〇年的平城之戰後，[（註202）](#)漢朝為暫時平息匈奴威脅所進行的「和親」（政治婚姻）政策，不僅是此後各朝代（甚至帝國初期）在面對外部壓力下經常沿用的周旋手段，甚至成為中國在「顯性」的朝貢傳統之外，長期與其並存的「隱性」外交慣例。

根據建信侯劉敬的建議：「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禮者。」漢高祖劉邦於是在西元前一九八年決定將公主（事實上以庶民之女頂替）嫁給匈奴冒頓單于來換取和平，與此同時，表面上漢朝與匈奴雖然約為「兄弟之國」，每年仍需數度向匈奴輸送大量絲綢與黃金等禮物，由此顯示雙方關係並不平等，甚至匈奴還成為漢朝貢納的對象。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此種政策在當時已遭受各方批評，甚至宋朝司馬光也在《資治通鑑》中從道德立論指出：「蓋上古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鎮之以威，未聞與婚姻也。」但這類說法，顯然只是在天朝觀念下自我麻痺的觀點罷了。相對地，自第一帝國以降，北方遊牧民族「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同時在軍事上威脅中國」，[（註203）](#)也是一個非常普遍的慣常現象。

事實上，貴族婚姻本即國際關係中傳統慣用的和平手段。至少自西周時期以來，周王與各諸侯便經常與夷狄通婚來維持外交關係或獲取援助，此種行為在春秋之後更為頻繁，例如周襄王便透過娶戎狄女以聯合其力量討伐鄭國，甚至當時影響力最大的晉國亦時常選擇與戎狄通婚。[（註204）](#)其後，不僅第一帝國（從漢高祖到景帝時期）在「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而得以主動出擊之前，數度「委曲求全」以和親納貢方式來爭取轉圜空間，在第二帝國前期（甚至直到中唐為止），唐朝也曾經十餘次與突厥、契丹、吐蕃等周邊遊牧國家聯姻。[（註205）](#)不僅唐朝開國君主李淵曾經對突厥承諾「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即便自稱遭受「渭水之辱」，[（註206）](#)唐太宗李世民仍向突厥使臣表示：「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甚至後來送到契丹地區的皇室新娘還一度被殺害。[（註207）](#)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第一與第二帝國時期，中國為求獲得和平喘息機會而被迫推動和親政策，作為第三帝國的清朝，雖早期與蒙古部族也存在競爭衝突互動，早在入關以前（明萬曆年間）便轉而透過頻繁的聯姻關係，與蒙古形成緊密的政治同盟，甚至還將雙方通婚落實至制度面上。[（註208）](#)總計清朝在入關前（一六一二至一六四三）與蒙古聯姻共八十四次，入關後（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更達五百零二次，總計五百八十六次的通婚不啻直接反映出雙方關係的密切程度。[（註209）](#)當然，這或許與滿清與蒙古同樣出身遊牧民族，因此不像傳統中原華夏文明政權一般，在通婚利益考量中加入「自尊心」因素有部分之關聯。

事實上，即便三大帝國在初期都必須暫時採取消極退讓政策，對於明顯不具備相對優勢（足以建立帝國之能量）的其他朝代而言，選擇守勢戰略當然更為理性。尤其自第二帝國（唐朝）末期以來，儘管「天下根本在河北」，更嚴酷的發展是「天下根本仰給東南」；換言之，隨著經濟重心南移，北方雖仍是主要外患來源，補給線逐漸拉長與難以維持既為不爭事實，亦大幅增加了建造帝國的難度。以宋朝為例，在太宗時期北伐失敗後，隨即轉向遵循「欲理

外，先理內」以及「守內虛外」的務實政策，從某個角度看來，由此衍生出來之「先安內再攘外」政策原則，也是中國歷代對外政策的重要基礎與出發點。早在盛唐貞觀時期，魏徵便曾向唐太宗建議以「中國既安，遠人自服」作為對外原則，也是一個例證。

強調軟硬兼施的戰術運用 正如陶晉生所言：「中國固然具有一個很強的傳統來維持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要求鄰國稱臣進貢，但是另一個傳統也不可以忽視，那就是與鄰國實際維持的對等關係；傳統中國君臣從中國與外族之間複雜變動的關係中，不斷地汲取經驗，以求在不同的形勢和環境之下制定不同的政策。」[\(註210\)](#)的確，儘管中心觀傳統似乎總給人們某種中國「始終強大」的假象，誠如三大帝國時期歷史經驗直接暗示的，由於中國至少在過去兩千多年當中，絕大多數時間都缺乏足以長期有效壓制周邊鄰國之必要能量，因此如西漢初期般透過「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等政策換取和平的生存環境，可說既理性又自然。對此處境，唐朝的陸贄也說過：「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有不得以也。」[\(註211\)](#)所言確為實情。

進一步來說，由於帝國架構所暗示之秩序要素及其和平紅利，提供了人口大量繁衍的必要契機與社會環境，並創造出推動勞力密集之集約式農耕的條件，無論土壤施肥改良、新品種研究與水利工程的進步，都讓作為「農業帝國」的中國擁有累積必要擴張能量的可能性。儘管如此，一方面考慮到交通運輸科技現狀確實使補給成本相當沉重，更甚者，一旦發動大規模戰爭，動員投入其中且難以避免慘重損失的青壯年勞動力，亦將直接侵蝕帝國之經濟與心理基礎，因此，戰爭既向來被視為「國之生死大事」，儘量息事寧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態度，亦不能不說是種應被高度接受的選項。例如東漢時期班固在《漢書·匈奴傳》中，便試圖論述某種理想的對外戰略：「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

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充分顯示出消極被動的守勢戰略（defensive strategy）特徵。

儘管如此，由於帝國結構帶來巨大之潛在能量累積性，使帝國核心確實擁有發動大規模（非長期）戰爭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正如前章所言，在中國強盛時（亦即三大帝國時期），基於絕對之權力不對稱與威望優越性，產生自尊自大觀念固然其來有自，即使在帝國崩解以致被迫屈居弱勢時，由於入侵蠻族多未能真正滅亡正統王朝，憂患意識激發的民族主義也常藉由強化中心說來提供抵抗的正當性。總而言之，中國中心觀（天朝觀念）的產生既無可厚非，更關鍵者還是在於「自證」（self-certification）過程，亦即在適當時機完成建立帝國的最終目標。

當然，對建造帝國而言，戰爭乃是無可避免的政策工具選項。

全面壓制原則與帝國體系成形 回到本章一開始提過之「帝國」定義辯證，所謂帝國既意味著某種高度穩定的廣域秩序狀態，此種狀態亦必須以特定地理空間（世界）內多數權力單位受到控制（亦即趨於中央集權），或在威懾下選擇臣服作為前提。

從心理層面看來，達成此種普遍性政治控制的動機，或許來自前述中心觀導致的自證過程，但就實際生活需求而言，一方面由於農耕生活需要高度的環境穩定性以提供持續積累的可能，除了屬於不可抗力的「天災」之外，消弭主要源自制度不完善與國內外戰爭的「人禍」則是統治者施政要項，其中，阻絕遊牧民族對農耕地區的侵擾，更為穩定社會秩序並提供統治正當性基礎的關鍵。

正如前述提及的「逐離理論」，由於以西周體系為主的文明地區（黃河中游河套南端地帶附近）在農業生產技術上顯著進步，加上

人口快速繁衍增長帶來的擴張壓力，於是逐漸迫使草原民族向北遷徙，並由原先的農牧並行轉而專營游牧生活。於此同時，或許如同湯恩比「挑戰 - 回應」文明發展模式所暗示的，受中原勢力壓迫的草原民族開始在西元前三世紀左右，在經濟、社會與政治內涵方面經歷了全面且徹底的改變，不僅專營游牧，包括奴隸制與部落聯盟等特徵也為了保障生存而發展起來，一方面逐步形成具高度集體行動性的社會群體，而前往農耕地區進行劫掠，也在求生存的前提下獲得正當性。其中，最早出現並對中原民族帶來具體威脅的便是所謂匈奴。[\(註212\)](#)

對後來形成的帝國核心（中國本部）而言，前述北方游牧民族活動所帶來的，首先當然是一種必須予以反擊的安全「威脅」。例如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隨即派蒙恬北伐匈奴，[\(註213\)](#)並於西元前二一五年「悉收河南地」，將其完全逐出河套地區以外。由於游牧民族幾乎不可能被滅絕或永遠壓制，他們與南方中原農業文明的長期互動，既象徵某種固定之彼此鏈結，也暗示著既存「世界」地理範疇因不斷融合以致擴大的過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由於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持續互動所帶來的世界擴張效應，即便前者被定位處於體系邊緣地帶，能否成功加以壓制，仍成為建構帝國（維繫世界秩序）的要件之一，這也是本書何以未將西晉、北宋和明代等統一王朝列入帝國名單的緣故，更遑論分裂時期中林立的大小政權，即便它們都模仿或沿襲了部分帝國規範。

進言之，雖然秦漢、隋唐和滿清等三個時期都大致完成了帝國要件，亦即透過全面壓制帝國內外的潛在挑戰勢力而維繫了「世界秩序」，各自使用的手段與途徑並不完全一致。第一帝國採用的是「追亡逐北」的徹底殲滅戰略，例如漢武帝以西元前一三三年的「馬邑事件」起始，首先在西元前一二七年再度收復河南地，接著自西元前一二四年起更頻頻主動出塞攻擊，並於西元前一一九年穿越戈壁沙漠進行數千里遠征，終於迫使匈奴向北遠遁，以致「幕南無王庭」。不過，由於此種遠征戰爭已逼近第一帝國能量極限，武帝不得不在西元前九〇年後傾向休兵，轉而採取以「屯田」為主的

守勢戰略。到了東漢時期，則帝國政府一方面利用匈奴在西元四八年分裂為南、北兩部，且南匈奴要求「內附」的戰略契機，一方面透過「以夷制夷」手段削弱北匈奴實力，接著，以鞏固對西域地區之控制為基礎，[\(註214\)](#)在西元八九至九一年陸續發起大規模戰爭，最終迫使匈奴走上徹底往西方遷徙的不歸路。[\(註215\)](#)

比起漢武帝從消極和親走向徹底武力逐離之里程碑式戰略演進，[\(註216\)](#)第二帝國採用的則是兼顧「文攻武嚇」的戰略，甚至更重視有關威望政策的運用。首先是唐太宗於六三〇年出兵滅亡東突厥，跟著將帝國勢力伸入中亞的綠洲地區，接著高宗在六五七年徹底擊潰西突厥，使帝國邊界與舊波斯薩珊（Sassanid）勢力邊緣接壤（該王朝恰於六五一年崩解）。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第二帝國一度展現出對於主要威脅來源（突厥）的壓制能力，不過，一方面東突厥在六七九年再度反叛顯示此種壓制並不完全，其次，此時威脅帝國核心的力量，與主要來自北方草原民族的第一帝國有所不同，在七世紀初興起於西藏高原的吐蕃，此時慢慢在西邊成為帝國新的安全敵人，[\(註217\)](#)甚至東北方的高麗與契丹部落亦陸續崛起壯大。可以這麼說，威脅來源的多樣性與地緣全面化，既迫使第二帝國更慣用和親政策來爭取轉圜空間，透過「天可汗」尊號與制度所帶來的「威望加值」效果，也提供不少穩定體系的能量。

至於第三帝國時期，正如前述，入主中原的滿清一方面吸取了中原的世界主義與帝國架構概念，出身北方游牧民族的社會背景，更使其得以去除部分自尊心障礙，透過淋漓盡致的和親政策根本地收服了蒙古部落，以致康熙帝可大言夸稱：「修築長城，實屬無益。」除此之外，不僅乾隆帝大舉進軍，透過新疆羈縻整個中亞地區，利用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設計，以控制活佛轉世的認可權來獲致對此地區的威望地位，更讓其西南邊陲免於威脅。總的來說，由於清朝成功地運用其近乎完美且精巧的外交手腕，從而也讓第三帝國一度處於幾無邊患的「完全帝國」（finished empire）境界，直到安全挑戰出乎意料地自數千里之外從海路輾轉前來後，才導致帝國結構最終趨於崩解。

(註159) See 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New York: General Books, 2009); Hannah Arendt, *Imperialism* (New York: Mariner Books, 1976); Wolfgang J. Mommsen,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Bonnie G. Smith, *Imperialism: A History in Docum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tephen Howe, *Empi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Brett Bowden, *The Empire of Civil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an Imperial Ide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註160) Anthony Pagden, *People and Empir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Book, 2000), preface.[↑](#)

(註161) *The Oxford English Reference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61.[↑](#)

(註162) 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註163) Maurice Duverger, *Le concept d'empire* (Paris: PUF, 1980).[↑](#)

(註164) Michael Doyle, *Empi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45.[↑](#)

(註165) 推究學界所以產生前述混淆概念的原因，主要是過度「短視」所致，亦即由於將焦點與個案研究集中於中世紀末以來的

歐洲歷史發展，反而忽略或誤解了更早之前或歐洲之外的類似帝國發展例證。[↑](#)

(註166)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註167) 明克勒 (Herfried Munkler) 著，閻振江、孟翰譯，《帝國：統治世界的邏輯 - 從古羅馬到美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頁四至五。[↑](#)

(註168) 個人觀點與他們並不僅相同，關鍵在於「帝國」與「世界」的認定；或因本位主義作祟，西方學者最終仍傾向將近代「自稱帝國者」等同帝國，也因此被迫接受「一個世界中可擁有複數帝國」之現實，但個人仍主張「帝國體系 = 世界」，從某個角度來說，帝國也是「世界」的界定者。[↑](#)

(註169) 有關秦朝的覆亡，過去往往從道德面立論，例如西漢賈誼所撰《過秦論》便指出：「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肴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註170) 商鞅又稱衛鞅 (其先祖為衛國國君，因此以國為姓) 或公孫鞅 (諸侯之子曰公孫，因此以身分為姓)，至於商鞅之名則來自他被秦國封為「商君」，因此以封地為姓。《漢書·食貨志》記載：「孝公用商鞅之法，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傾鄰國而雄諸侯；……移風易俗，民以殷盛，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戰國策》則曰：「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基本上都給予正面歷史評價。[↑](#)

(註171) 除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之外，其餘戰國強權亦復如此，例如魏文侯用李悝變法，尊崇賢人且盡地利之教，使該國首先稱霸；齊威王用鄒忌與孫臏變法，鼓勵進諫，擴大稷下學宮廣召賢士，緊接著稱霸東方；楚悼王用吳起變法，重點在削弱貴族勢力，然結果不完全成功；韓昭侯用申不害變法，主要是責成官員提高效率；趙武靈王引進騎射戰術並變服易裝，使趙兵成為天下勁旅；燕昭王用樂毅變法，一度聯合五國攻陷齊都。↑

(註172) 歸結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林劍鳴在《秦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書中，也提到包括秦國奴隸社會實行的「爰田制」(交換田地)、高度中央集權的政體組織，以及缺乏宗法制約束等特有的環境條件。↑

(註173) 吳思在《潛規則：中國歷史上的進退遊戲》(台北：究竟出版社，二〇〇二年)書中，曾生動地創造出「潛規則」此名詞來形容這種狀況。↑

(註174) 秦朝所建構的全國交通網路包括「馳道」(一條向東抵達齊燕地區，另一條則向南直達吳楚地區，道廣五十，三丈而樹)、「直道」(由咸陽以北的雲陽出發，到達今日包頭附近的九原郡，全長一千八百公里)、「五尺道」(主要在西南邊疆地區)與「新道」(分部在今日湖南、江西、廣東與廣西省之間)等。↑

(註175) 所謂「黃老」在先秦道家中其實分成兩派，首先是由老子與莊子以《道德經》和《莊子》兩書為代表趨近無政府主義的說法，主張「我無為而民自化」，另一派則是在戰國末期假託「黃帝之學」且鼓吹「帝道」的新流派，《史記·樂毅列傳贊》稱其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與安期生等兩者，最終結合成所謂「黃老之學」或稱「新道家」。參見周桂鈿，《中國歷代思想史：秦漢卷》(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陳廣忠，《道家與中國哲學：漢代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註176）事實上，陰陽家思想早在秦代便以「五德終始說」形態影響政治運作；例如帝國宣揚秦代周乃是以水德取代火德，亦因此代表水德的「黑色」與數字「六」在秦代幾乎隨處可見，「衣服旌旗皆上黑」及「度以六為名」都是例證。[↑](#)

（註177）張榮明，《權力的謊言：中國傳統的政治宗教》（台北：星定石文化公司，二〇〇一年），頁三八至三九；楊陽，《王權的圖騰化：政教合一與中國社會》（台北：星定石文化公司，二〇〇一年），頁一九至二六。[↑](#)

（註178）請參考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台北：遠流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當然，韋伯的討論重心是經濟問題，亦即中國何以未產生資本主義，與本章所強調的政治意義未必直接相關，但他對於儒教的觀點還是很值得參考。[↑](#)

（註179）桑原隲藏著，宮崎市定校訂，《中國の孝道》（東京：講談社學術文庫，一九七七年）；事實上，桑原在一九二〇年代進行研究之最初目的，並非解讀中國歷史，而是擔憂中日兩國同時面對之孝道傳統衰微。甚至另一位學者白鳥庫吉早在一九〇七年便指出，「中國的國家是一個大家庭」。另請參照：尾形勇，《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北京：中華書局，二〇一〇年）。[↑](#)

（註180）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頁六三至六五。[↑](#)

（註181）有關孝文化的討論請參考：肖群忠，《中國孝文化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公司，二〇〇二年）；王長坤，《先秦儒家孝

道研究》（成都：巴蜀書社，二〇〇七年）；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二〇一一年）。↑

（註182）見《漢書》，卷七十六，「張敞傳」。↑

（註183）參見：薩孟武，《中國政治社會史》（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九八年）；蔡東杰，「中國歷代君相權力之演變」，《淡江人文社會學報》，第十一期（二〇〇二），頁一〇三至一二五。↑

（註184）均田制度所以有機會施行，主要源自五胡亂華衝擊舊中原地區，大量人口流散帶來重新分配契機；且北魏政權出身遊牧民族，對土地所有權之堅持與中原農耕民族觀念亦不同。↑

（註185）包括封建貴族與官宦世家（有功名在身者）經常可獲得免除租稅或繇役的特權。↑

（註186）自南北朝以來，國家經常給予佛寺定額供給，有的甚至由皇帝指定某縣租稅的一部分歸寺院支配，至於一些王公貴族也對寺院進行供養。在寺產擁有免稅特權的時代，地主們奏設寺院與布舍莊田既有逃稅的意義，亦企圖在寺院財產掩護下實行土地兼併。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指出，由於僧侶們如同企業家般系統地管理其土地與財產，因此自漢末至明初，中國與其說是一個儒教社會，不如說是一個存在著強大佛教寺院資本主義（Buddhist monastic capitalism）的佛教社會。相關研究可參考張曼濤編，《佛教經濟研究論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何茲全編，《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謝和耐，《中國五至十世紀的寺院經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Randall Collins, *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註187) 宰輔制度雖一般認為發軔於春秋時代，但當時「言相者皆非官名」，只是國君的重要幕僚而已，不論名稱或職掌內容都相當分歧且難以查考；至於「丞相」之制則由秦武王在西元前三三〇年所創設，剛開始只參與國事討論，其後則逐漸被擢升成為一國的最高行政長官。[↑](#)

(註188) 參見《呂氏春秋·舉難》所述。[↑](#)

(註189) 張金鑑，《中國政治制度史》（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九一年），頁八八至九〇。[↑](#)

(註190) 內朝官自武帝時期創設以來，儘管地位卑小，但由於與皇帝關係親近，自然享有不同的政治影響力。尤其是尚書令，官階不過「秩千石，銅印墨綬」，職責不過「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內外」而已，但由於漢制「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而尚書握有「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的權力，加之以霍光首開其例，以「領尚書事」參與國政，於是此職乃水漲船高；在西漢已有「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之語，到東漢後地位更是不同於以往。[↑](#)

(註191) 史雲貴，《外朝化、邊緣化與平民化：帝制中國近官嬗變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

(註192) 中書監令不僅在魏明帝之後「號為專任」，更由於出納王命，掌機衡之任，因而迅速取得行政大權，「凡任中書者皆運籌帷幄，佐命移祚之人，凡任三公者皆備員高位，畏權遠勢之人」，至東晉則「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為宰相之任」，此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於是中書省乃成了新的宰輔機關。[↑](#)

(註193) 值得一提的是，宋初中央機構分成二府三司，明顯具有分割牽制相權的特徵；宰相部分以同平章事為真相，一般置二至三人，武備方面委由樞密使，「本天下之兵權，帶天子之武威，勢均中書，號稱二府」，至於財政部分則「置三司使以掌天下利權預，號為計相」；因此相權乃依內容分工為原則建立起新的三權分立體系。[↑](#)

(註194) 類似的制度起於唐代的「使」職官員，經宋朝以「差遣」為主的官僚體系加以強化後，明清的廢相之舉可謂集其大成，至於清朝的「密摺」制度更是登峰造極。[↑](#)

(註195) 至劉邦去世時，被封為諸侯王的劉氏子弟共九個，分別是荊王劉賈（叔父之子）、楚王劉交（同父幼弟）、齊王劉肥（長庶男）、代王劉喜（次兄）、吳王劉濞（劉喜之子）、淮南王劉長、趙王劉如意、梁王劉恢、淮揚王劉友、代王劉恆（皆劉邦之子）。[↑](#)

(註196) 在大臣晁錯向漢景帝上《削藩策》，主張「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後，景帝決定採取其政策，削楚王東海郡、趙王常山郡與膠西王文縣，由於次將及吳國，吳王劉濞遂以「清君側」為藉口舉兵反叛，接著楚王、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與趙王等也陸續叛漢，史稱「吳楚七國之亂」，後被太尉周亞夫於三個月內平定。[↑](#)

(註197) 西晉皇族參與這場動亂的「王」其實不只八個，但八王為主要參與者，且《晉書》將八王合編匯為一個列傳，故稱此名。這場動亂從宮廷內權力鬥爭開始，而後引發戰爭，既加劇西晉王朝統治危機，成為其迅速滅亡的重要因素，也將中國帶進「五胡十六國」時期。[↑](#)

(註198) 關於「封建」之議，請參見《唐會要》，卷四十六，頁八二四至八二七；關於分派皇族鎮守邊境，則可參見《資治通鑑》，卷一九三，頁六〇八九。[↑](#)

(註199) 閻守誠、吳宗國，《唐恨：唐玄宗的真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一〇年），頁九一至九二。[↑](#)

(註200) 為了有效鎮壓黃巾之亂，漢靈帝於一八八年接受太常劉焉的建議，將部分原僅具監察性質的刺史，改為擁有地方軍政大權的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擔任，結果埋下分裂的伏筆。[↑](#)

(註201) 所謂「藩鎮」始於唐玄宗時期設置的十個節度使職務，包括平盧、范陽、河東、朔方、河西、隴右、劍南、安西與北庭等九個節度使，以及同性質的嶺南五府經略使。[↑](#)

(註202) 冒頓單于在西元前二〇九年繼位後，開始向外大規模擴張，西元前二〇一年發兵包圍韓王信於馬邑（今山西朔縣），後者雖向朝廷求救，但同時也暗中向匈奴謀和；漢高祖劉邦親自率領三十萬軍隊，但因孤軍深入受困於平城（今山西大同以北），又稱「白登之圍」，最後漢朝以和親為條件與匈奴訂下盟約。[↑](#)

(註203) Mark Edward Lewis,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Qin and H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32.[↑](#)

(註204) 根據《左傳》記載，晉獻公曾娶二女於戎，其中大戎狐姬生重耳（即晉文公），而重耳在「投狄十二年」之間也納赤狄女並生二子，且公開向秦國喊話：「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

(註205) 值得一提的是，唐初和親都是派公主的堂姐妹或遠房宗親，臨時賜予封號矇混過關，隨著中唐時期以後國勢漸衰，才被迫以真公主和親。來自宗室女的弘化公主是唐朝和親的開端，於六四〇年（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與吐谷渾國王諾曷鉢成婚，至於翌年嫁給吐蕃君主松贊干布的文成公主也是宗室女。[↑](#)

(註206) 西元六二六年，突厥兵力進逼至離首都長安四十里處，唐朝被迫「空府庫」以求退兵。[↑](#)

(註207) 根據《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所言（頁五〇）：「七四五年，唐廷試圖用建立新通婚聯盟的辦法來恢復和契丹的關係，但是沒有成功。」[↑](#)

(註208) 清代滿蒙聯姻制度重點在於，由於皇帝掌握皇室及宗室子女的婚配權，一般稱「指婚」或「拴婚」，王公女兒常由皇帝或太后擇取八旗及蒙古王公適齡子弟指配聘嫁；更甚者，指婚還帶有強制性，例如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便曾發佈諭旨強調：「嗣後凡親王郡王之格格俱遵照舊例，俟朕旨指給蒙古台吉等；其間或有因原系姻親熟視蒙古等，情願自行許給，尚屬可行，伊等可自行定議奏聞；其不行奏聞而私行許聘京師旗人者，著永遠禁止。」[↑](#)

(註209) 前述數據參照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統計資料；相關敘述也可參考陳捷先，《明清史》（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九〇年），頁一九四至一九五。[↑](#)

(註210)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頁一〇。[↑](#)

(註211) 陸贄，《陸宣公奏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五年)，卷三，頁六二。[↑](#)

(註212) 有關匈奴起源之記載與推論，多根據中國史籍，例如《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淳維是夏桀之子，這暗示匈奴始祖乃夏朝遺民。不過，例如王國維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便根據《史記》後半段文字對匈奴名稱演變進行系統性概括，認為匈奴原是由山戎與獫狁等早期北方異民族的統稱。值得注意的是，秦漢之前，中原人對北方的游牧民族和西域城邦國家都統稱為「胡」(秦漢以後主要指匈奴)，有人認為「匈奴」和「胡」不過都是突厥語與蒙古語中「人」(kun, Hun)一詞的音譯罷了。[↑](#)

(註213) 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提出「亡秦者胡」的動機論，雖不免穿鑿附會，也反映出真實外部壓力。[↑](#)

(註214) 古代西域大致指玉門關、陽關(甘肅敦煌)以西，從源自鹹海的兩河流域(錫爾河與阿姆河，又稱河間地或河中地區，約當今日烏茲別克與哈薩克南部)，直到天山北路塔里木盆地周邊綠洲的一個地理區域；此區域位於歐亞大陸中央，為傳統絲路之重要地緣樞紐。[↑](#)

(註215) 關於匈奴西遷後的動向，十八世紀的法國學者德揆尼(de Guignes)曾於一七七〇年出版的《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部韃靼各族通史》中指出，匈人(匈牙利前身)即是中國歷史上的匈奴，稍後英國歷史學家吉朋又把此說法寫入《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中；儘管如此，他們都未能考證出匈奴人西遷的具體過程，例如中國學者何震亞在一九三七年一篇題為「匈奴和匈牙利」(刊於《中外文化》，第一卷第一期)的文章中，便認為匈奴與匈牙利其實沒有關係。[↑](#)

（註216）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著，賀巖、高書文譯，《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第六章。[↑](#)

（註217）參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







特色：中國式戰略觀及其作為

前面三個部分嘗試透過有限篇幅，努力去重新勾勒過去兩千餘年來中國歷史的階段性演進特徵，一方面理解其對外作為之內部基礎，並藉由嚴謹詮釋所謂「帝國」概念，突出由「中國中心觀」支撐之「三大帝國」時期的歷史特殊性，由此追尋中國對外關係之主要特徵與觀念。無論如何，在進一步分析中國外交政策形成過程之前，仍有一個關鍵處必須說明，亦即理解工具的問題：究竟我們應繼續使用西方理論邏輯來解析中國歷史發展，還是必要但有限地加入部分「具中國特色」的想法？這也是本章的努力重點。換言之，儘管個人並不否認某些普遍性概念確實存在，基於不同的地緣環境條件與社會結構要素，不同的群體仍可能衍生出具相對獨特性的行為規範，例如中國便是如此。對此，本章將維持前一章從內政出發的觀察角度，討論「具中國特色之戰略觀」的焦點內涵所在。

中國棋盤與佈局邏輯

在前面幾個段落中，個人嘗試透過相當有限篇幅，嘗試勾勒出中國歷史（尤其在對外互動關係方面）在過去兩千餘年來的階段性演進特徵，並藉由重新詮釋（並未代表學界共識）所謂「帝國」的概念，一方面突出「三大帝國」（秦漢、隋唐、滿清）之歷史地位，同時經由「帝國」與「非帝國」時期的對比，讓大家更清楚帝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取向與主要作為。

在此必須不斷說明的是，釐清事實或完成所謂「辨偽」（falsification）工作，並非本書主旨所在。因為嚴格來說，本書並

非是一本歷史著作。無論如何，由於歷史內涵依舊是此處論述主軸所在，正如史學界公認的概念一般，無論史家主觀意願如何，「還是得為證據服務，而非讓證據為史家服務」，[\(註218\)](#)澄清歷史發展脈絡當然是個人努力目標。不過，如同英國學者卡爾（E.H. Carr）所言：「所謂歷史乃是史家與事實之間不斷互動的過程，也是過去與現代之間永恆的對話。」[\(註219\)](#)換言之，他既強調史家對於歷史的介入（engaging the past）過程，也極重視選擇史料時的主觀性，因為唯有如此，最終才能達成「解構性之歷史重構」（d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s）目的，從而至少讓我們擁有另一個解讀或認知的新角度，並使歷史真相得以浮出水面。

更甚者，個人向來認為，所有社會科學研究雖然均必須以豐富的質化歷史資料作為基礎，至少就國際關係理論而言，此種基礎無疑呈現出嚴重受到「中心論」指導所產生的偏狹影響。相較中國中心觀對於理解中國歷史之影響，西方中心論（west-centric）或歐洲中心論對於我們觀察近代迄今全球發展歷史之影響亦絕不容小覷，至於源自十七世紀的「西發利亞框架」（Westphalia structure，亦即將世界設定為由主權單位所共同形成的國際體系）則為其最主要觀點。[\(註220\)](#)當然，歐洲歷史經驗與規範能否直接套用至其他地區本來就不無疑問，如何拋開前述中心說桎梏，以便尋回某種「歷史自我」更屬當務之急。

對此，延續葛蘭西「文化霸權觀」與傅柯（Michel Foucault）對知識與權力關係的研究，薩伊德（Edward Said）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東方主義》無疑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他指出西方（包括當前深受西方影響的東方）學者在研究東方社會時，多以西方中心立論作為理所當然的出發點，如同「自十九世紀乃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與法國支配了東方與東方主義」，自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如同過往英、法對東方的統治一般，也全面支配了東方」，[\(註221\)](#)因此，對於東方（或者西方以外世界）的客觀認知乃依舊不可得。與此類似，美國漢學家柯文（Paul A. Cohen）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在中國發現歷史》，進一步批判了三種主要的研究中國近

代史分析架構模式（衝擊及回應理論、傳統與近代化理論，以及帝國主義理論），並以具體之美國漢學作品來解析前述三種模式各自的缺失，最後並提出以中國為中心（China centered）之研究主張，強調中國本身具有的內部及動態發展，並呼籲應重視中國地區性研究。[（註222）](#)

當然，本書並不想將焦點擺在對於東方主義的批判與辯駁上，也無意介入相關的理論爭辯。正所謂「真理是愈辯愈明的」，本書目的僅希望從中國本身角度出發，提供「多一種不同的觀點」而已。

中國式戰略觀的哲學基礎：結構主義 除了從歷史現實內容（儘管未免主觀）重新歸納中國歷史演進，追尋中國對外政策的概念基礎（天朝觀念）及其制度化（朝貢體制）過程，並設法進一步由「內部 - 外部」聯繫（internal-external linkage）角度，印證中國同樣實踐了「外交乃內政之延長」這句俗諺之外，接下來，個人更希望從不同的文化視野角度，來理解並歸納中國在面對外部挑戰時選擇的生存之道，亦即它的對外認知以及戰略觀基礎。

潘乃德（Ruth F. Benedict）指出，所謂文化，乃是透過某個民族（族群）的活動而表現出來的一種長期性思維和行動方式。[（註223）](#)從這個角度看來，以私有財產制度作為基本概念的現代資本主義，十九世紀後逐漸鞏固了在西方文化與思想主流中的地位，作為捍衛資本主義最重要之哲學思考起點，重視個別單位利益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不僅成為西方世界分析社會發展與形成內外政策時的指導原則，即便表面上看似擁有集體傾向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從宏觀面向看來，亦不啻聚焦於更大的個體單位（國家）罷了。進言之，個體主義的核心內容包括：所有個體（個人或國家）都是獨立自主且平等的，均擁有排他性的權利和天賦自由來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為了處理所有個體同時

自我實踐所帶來無可避免的競爭，如何達成某種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狀態，既成為西方世界的重要課題，同時由於權力乃支撐與追求利益的主要載體（國家作為其最高層次形式），這也讓維持所謂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成為某種國際關係準則，以及多數決策者制定外交政策時的指導來源。[（註224）](#)

儘管如此，從另一方面看來，如果說個體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的創造品或衍生物的話，或許也未必真確。嚴格來說，由於人類本即一種「社會動物」（social animal），亦即本質上既獨立自主又難以完全脫離群體，因此在其理性行為模式當中，本來就同時混合著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要素，只不過依情況差異而有著不同的比例結果而已。換句話說，相較於自羅馬帝國在西元五世紀崩解以來，西方世界長期陷入分崩離析以致缺乏有效集體能量制約，[（註225）](#)從而埋下個體主義滋長的環境背景，以大一統王朝（儘管未必都能達成建構帝國目標）為主軸的中國歷史發展，則在王朝政治結構及其所創造之「獨尊儒術」思想環境塑造下，形成了更傾向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的政治文化傳統。正如眾所周知，中國社會向來以群體利益為主要優先考量，個人榮辱亦以團體（從家庭到國家）為最終依歸，據此，為完成大我必須犧牲小我，自然被認為是不容分說且顛撲不破的「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擁有形成集體主義政治文化的自然基礎，由於在技術面上支撐龐大的帝國治理規模有其困難，因此在中國的政治發展過程中，「制度」始終不如「意識形態」來得重要，至於從家庭倫理衍生出來的「孝道」，則與「儒術」成為前述意識形態的兩大支柱。進言之，被政治化後的孝道邏輯，不再單純用以敘述應有的家庭內部行為準則，而是在家庭被奠定作為社會價值網絡核心的前提下，首先建立「親親」原則以培養個人對於家族成員的高度認同，其次則要求所有家庭成員都必須收斂、壓抑且克制自己，以達到家庭和諧與共同榮譽之終極目的，接著，為確保落實前述目標，倫常互動也被設定成一種「權威性服從」關係；更重要的是，透過泛政治化思維轉換過程，這套規範也成為中國特有之社會規

範，亦即家國主義（family-state doctrine）的基礎。即便遠在歐洲，孟德斯鳩早在十八世紀便觀察到，以中國為中心之亞洲專制國家的核心運作原則，「不是人的不平等，而是奴隸式的服從」，至於某種「絕對之隸屬性」更是中國不斷被再統一的心理前提。[（註226）](#)

無論如何，根據前述文化內涵設定，具備「差序格局」特徵的中國社會結構，按親疏關係被組成網狀關係，[（註227）](#)事實上等於某種「放大版」的家庭。正如周知，在儒家經典中，「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是種具邏輯性的進階概念，至於「家」與「國」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關係，既讓近代為因應西方思潮而出現「國家」這個新詞，這也直接反映出中國傳統中「家國同構」的特殊社會歷史模式。尤其在政治方面，「國」往往被當成「家」來治理。

中國的集體主義文化，除反映在以家庭此一最小集合體作為社會核心外，長期作為主要意識形態的儒家也提供了概念上的補充。由於篇幅限制，此處不擬涉入深層之哲學思辨演繹，從最簡化角度切入，「仁、禮、義」或為最值得注意之中心概念。首先，所謂「仁」本即「二人」之意，更精確地說就是「複數人」、「人群」或「社會」，這代表儒家在思考環境設定中，永遠以處理共同體問題做為關切焦點所在（法家與墨家與此類似，但著眼點不同）；其次，作為不成文規範的「禮」，乃處理前述問題主要準則（法家雖相對重視成文法，但兩者概念相近，故「禮法」亦經常並稱），這或許暗示儒家更務實地注意到透過制度化途徑來處理問題的難度，從而更重視習慣對行為之約制性；最後，制定「禮」的基本原則乃是「義」，在中國文化傳統當中，所謂義經常充滿了「利他」意味，由此再度回應群體關係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

進言之，由家庭倫理提供之高度心理黏著效果，確實帶來正面的政治反饋，再加上以統一格局為主軸的政治發展，相較於歐洲自五世紀末以來因長期分裂競爭造成的安全困境，大體穩定之秩序對中國而言既非難以奢求，對於靜態秩序平衡（balance of order）的重視

也成為政治思想的核心。據此，「大處著眼」或「大局為重」等既成為某種思考習慣，某種特定「結構」（穩定世界秩序的具體呈現）的持續維繫，亦自然是戰略設定的主要目標所在。

進一步來說，所謂「天下觀」乃此種結構主義的具體呈現，至於「天下大勢」則被用以指稱特定時間範圍內的結構內涵與特徵。

中國式戰略觀的主要內涵：比例主義 從大體上維持穩定秩序，並更強調整體結構而非個別成員的角度出發，此種在本書中被稱為「結構主義」（或可稱結構至上主義，象徵性的結構穩定高於現實可計算之利益反饋）的想法雖構成中國戰略觀之哲學基礎，不過，瞭解它如何被反映到中國處理對外關係事務的傳統過程上，或許對本書主題而言是更為重要的。

既然談戰略，則不可能不論勝負。相較於西方或歐洲更重視在競爭的（常態）環境中去維持生存，儘管中國歷史多數時間中都能維持著相對有序狀態，競爭與生存挑戰（例如陷入政治分裂或遭受周邊部族侵擾）並不因此得以豁免，其中，勝負雖永遠是戰略思考關鍵，但相較於西方重視「斬首式勝利」（checkmate victory），中國不啻更傾向於追求另一種「比例式勝利」（percentage victory）。

在試圖描述或模擬戰略思考的過程中，多數人既慣於借用民間流行的博弈遊戲予以類推（現代兵棋推演也是一例），事實上，傳統棋戲非但本質上就是一場微型戰爭（mini war），其規則設計與佈局也間接反映出不同文化底蘊對於競爭過程與結果的看法。例如，儘管並非最初發源地，[（註228）](#)西洋棋仍可代表西方或歐洲的部分想法。在西洋棋的遊戲規則中，無論付出何種代價，勝負關鍵都在於能否「將死」（checkmate，吃掉）對方的國王（king）。這種規範也投射在西方對於戰爭的觀點上，例如英國軍事思想家李德哈特

(B.H. Liddell-Hart) 雖然認為，以「在戰場上毀滅敵人主力」作為戰爭唯一真正目標，乃十九世紀以來的軍事主要教條，克勞塞維茨 (Karl von Clausewitz) 依舊指出，會戰乃戰爭中的唯一手段，至於目標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註229\)](#) 富勒 (J.F.C. Fuller) 更直接在現代戰爭中引入所謂「斬首」(decapitation) 概念，亦即將以最迅捷方式直指敵方指揮系統的「癱瘓攻擊」作為戰爭過程中的首要目標。[\(註230\)](#) 此種想法不僅在西方歷史中隨處可見，美國在二〇〇三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更是最佳例證。

當然，前述源自印度的棋戲也傳入中國（稱為象棋），[\(註231\)](#) 並成為民間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中國俗諺也有「擒賊先擒王」或「打蛇打七寸」等類似斬首的戰術概念，儘管如此，由中國自身發源的圍棋仍是菁英階層之博弈模擬主流。[\(註232\)](#) 大體言之，圍棋與西洋棋（或象棋）之不同處有三：首先，相較西洋棋盤上各種棋子擁有不同的地位與功能差異，無論黑子或白子，所有的圍棋棋子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其次，西洋棋基本上更接近正規軍隊建置與戰場實務，不同棋子都有其特定功能與走法，但圍棋棋子只能「下」不能「走」，較具戰略布局意涵；第三，正如前述，西洋棋規則的勝負關鍵在於能否用盡一切方法，以最快速度（暗示最少損失）去吃掉對方的國王，但無論使用「比目法」或「數子法」，[\(註233\)](#) 圍棋最終勝負既根據雙方佔據棋盤表面之比例多寡，甚至經常無須下到最後一顆棋子，便可提前分出勝負。

西元二〇七年諸葛亮對劉備所提出的著名「隆中對」大戰略，或是前述比例概念的一個例證：「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將軍……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

川，……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由上文可見，若想成就霸業（大戰略目標），重點並非鎖定或戰勝任何主要敵人，而是應想辦法找到並儘可能擴大自己的地盤（爭取足夠比例）。事實上，此種想法不僅早就瀰漫在戰國時期縱橫家（例如蘇秦與張儀等）的滔滔雄辯之中，當項羽率領楚軍在西元前二〇三年兵敗垓下時，所以選擇自殺身亡的緣故，主要也是體認到「大勢已去」（居於比例劣勢）所致，而非由於遭漢軍絕對擊潰，或由劉邦主導的漢勢力已然底定帝國格局之故。[（註234）](#)

關於前述天下大「勢」的看法，近年來也引起一部分西方學者關注，[（註235）](#)並強調它是中國戰略傳統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但多數依舊傾向於「能量」和「情勢變遷」等傳統西方視野下的關鍵因素來解讀，致使其理解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西洋棋並非源自西方本身，其觀念最終為歐洲國家接受的關鍵之處，部分或許來自四世紀末奠定「一神論」（monotheism）宗教傳統所帶來之「製造敵人的文化」，[（註236）](#)更重要的是，隨著地理發現運動擴張了歐洲人的眼界，正如法國學者克黑朋（Marc Crepon）指出的，[（註237）](#)複數文明的出現，不僅激發了歐洲對其自身霸權地位的不安全感與恐懼氣氛，為了使其他文明最終不致於統治或摧毀歐洲，歐洲也萌生出應予對抗並壓制其他潛在強大文明的想法，這可稱是「黃禍」（Yellow Peril）概念的源起之一，[（註238）](#)也是二十世紀末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倡言所謂「文明衝突論」的重要邏輯背景。[（註239）](#)

以威望為主的政策反饋設定

即便必要的擴張乃建構帝國（無論成功與否）不可或缺的過程，「重內輕外」仍是中國政治的思想主流。從某個角度看來，缺乏足夠的投射能力，讓帝國核心只能被迫維持外強中乾的「紙老虎式」

虛擬治理，由此，將有限能力集中於鞏固內部極為脆弱的統治基礎，當然是個十足理性的選擇，至於如何透過各種作為，獲致維持統治正當性所需的威望能量，則是中國歷代統治者決策時的主要考量。更甚者，在結構主義想法的影響下，儘管胡適曾以一篇「差不多先生傳」來諷刺中國人和稀泥的社會行為傳統，[\(註240\)](#)實則此處之「差不多主義」正反映出以靜態秩序平衡作為決策目標的結果。德國思想家黑格爾（Georg W.F. Hegel）曾指出，「中國乃是一切例外的例外，……由於它在客觀存在與主觀運動之間缺少某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變化」，致使其存在一種亙古靜止不動的狀態。可以這麼說，黑格爾的觀察結果大致沒錯，但中國所以存在長期靜態秩序既是一種政策結果，也是治理技術與統治規模（包括人口與土地面積）存在明顯落差之下不得不然的發展。

以維持內部統治正當性為核心 所謂「內政優先」雖似為政治常態，但對中國而言乃更為重要。例如，北宋初年大臣張齊賢曾向宋太宗進諫：「……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事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受此影響，即便宋太宗數度親征伐遼，未嘗沒有重新建構帝國的想法，仍然表達過與前述類似的想法：「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註241\)](#)換言之，中國統治者傳統上被賦予的職責（或被灌輸的政治觀念）主要是培育道德（鞏固正當性基礎）與安定百姓（以便對統治進行正面反饋），相對地，就算是四周邊境不寧，夷狄的威脅也不可能比爆發於內部的動亂來得嚴重，甚至外夷還被認為可以運用威德來加以感化。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前面篇幅中的描述，中亞與北亞游牧民族和中國農耕文明之間的長期互動，不僅構成兩千餘年來中國歷史變遷主軸之一，更重要的關鍵是，儘管游牧民族確實對中原王朝甚至帝國核心帶來嚴重的潛在安全威脅，由於其文明發展程度略低，且經

常在南下後隨即展開大規模漢化採借運動，[（註242）](#)結果既導致所謂天朝觀念之自證式源起，也帶來了前述「外憂不過邊事」的想法。事實確然如此，除了十三世紀的蒙古與十七世紀的滿洲女真人外，並沒有任何周邊異族入侵能對中原正統王朝構成「心腹之患」。相對地，更嚴峻的治理挑戰在於，儘管地理基礎（以中國本部為主）在兩千餘年間並沒有經歷太大變動，但人口規模首先從秦末漢初大約一千萬人上下，至西漢末年暴增至六千萬人以上，[（註243）](#)其後，雖一度因為東漢末年動亂，在三國時期約略回到漢初水準，又在第二帝國盛世（天寶年間）超越八千萬人，甚至由於社會經濟水準持續攀升，更接連於北宋、明朝與清朝初年陸續突破一億、兩億與四億大關。

進言之，人口數字的三級跳既帶來落實治理義務的沉重挑戰，深化了治理虛擬性的不得不然。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儘管人口規模暴增使帝國核心在對抗周邊遊牧群體安全挑戰時，由於意味著可徵調更多兵員上陣，從而平添不少農耕文明社會在「數量」方面的天然優勢，但經濟重心自第二帝國時期起逐漸向南方（尤其是長江流域中下游）挪移的現實，亦不啻暗示著由於後勤補給線被迫拉長，以致在邊防成本相對提高的同時，也間接削弱了中原王朝的擴張動能。在此情況下，一旦決定進行大規模遠征行動，龐大的經濟（包括運輸損耗以及對勞力密集耕作帶來的間接衝擊）與心理成本（被徵召兵員將更遠離家鄉，挑戰「安土重遷」的傳統社會性格）或許將成為帝國與王朝政府「不可承受之重」。特別在明清兩代中後階段，例如明朝萬曆年間投入朝鮮戰爭（一五九二至一五九九），[（註244）](#)以及在清朝末年接連爆發的幾場中外戰爭，幾乎都成為壓垮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反過來說，「重內輕外」不僅是中國歷代王朝的理性選項，事實證明，即便中國決定投入擴張性軍事行動，儘管表面上都有著國家安全考量，但透過行動本身（有時結果未必重要）帶來「威望反饋」，以便鞏固實際上為「紙老虎」的強勢外貌，往往是影響決策者更大的關鍵所在。對此，第三帝國末期外交主要負責人李鴻章曾

有過一段非常生動而深刻的自述：「我辦了一輩子的事，……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修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註245\)](#)可說一語道破中國之治理困境所在。

結構主義下的中外關係：懷柔遠人 中國傳統上對待周邊發展的態度，表面上如同趙普對宋太宗所言：「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夷狄）於化外，任其隨逐水草」，亦即採取如同對國內一般「無為而治」的政策。其實正如前述，殘酷的真相或許乃「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換言之，在「重內輕外」原則的指導下，儘管在與周邊國家互動上，帝國核心傾向以文明和道德優越感作為「感化」周邊地區的工具，從某個角度看來類似「文化帝國主義」政策，但此種以擴張文化影響力，而非掠人土地為主要目的之作法，實則理性地反映了面對前述內部治理困境下的外部投射手段限制，至於設法穩定彼此關係，以免周邊事態衝擊內部統治正當性，以現狀政策為主之所謂「懷柔遠人」概念自然也被刻意地凸顯出來。

在傳統儒家經典《禮記·中庸》中，曾論述了「懷柔四夷」原則：「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除了前述這段概念外，《左傳》上的另一段話也常常被引用：「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註246\)](#)由此可見，相較於西方以個體主義出發所衍生出來的「敵我」想法，以及必須透過壓制敵人來保障自我安全的政策與戰略設計，即便有時衝突難以避免，中國更重視的乃是與周邊單位之間的「結構性靜態秩序平衡」（a structural and static balance of order）。例如在滿清第三帝國時期，康熙帝便曾指出：「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又說「我朝施恩於喀爾

喀，使之防備朔方」等，這些都不啻反映出前述「守在四夷」（亦即讓夷狄為我所用）的概念，據此，諸如「協和萬邦」與「蠻夷率服」等德化天下的相關論述，一方面成為中國建立世界秩序的理想模式典範，至於前提，也如康熙所言，「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是也」。總的一句話，還是「安內攘外」罷了。

可以這麼說，在結構主義式「天下觀」的指導下，中國與體系或秩序內周邊國家（以朝貢國為主）的互動，或許並非類似大樹主幹及其旁枝之間的關係，而是更像樹木與纏繞其上的藤蔓之間的「共存」但又維持「共生而不同質」的微妙關係。

正如許多人觀察到的，朝貢國雖部分寄生於中國宗主之下，特別是分享其經濟溢出利益與政治威望保護傘，但絕非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進言之，此種「既依附又獨立」的實質聯繫，最終讓中國與前來朝貢國家之間具備了各取所得、共容和互利的特徵。對周邊國家而言，服從中國的宗主權暗示著可由此取得交換貢品和回賜物，以及在一定區域內進行互市貿易的經濟權利，甚至在政治方面，既可藉由中國背書來鞏固各自之內部政權正當性基礎，且可在安全受威脅時，請求獲得中國的軍事保護。相對地，中國則從朝貢行為中得到「萬國來朝」和「天下共主」的威望利益，一方面利用朝貢國作為戰略緩衝，實現理想中「守在四夷」戰略，更可進而將此轉化為內部統治的穩定性來源。

對此一文化內涵之發展，王爾敏曾言：「由文化而泯除種界的區別，是自先秦以來政治理想的傳統；王道中心以中國皇帝為代表，對四裔的關係並不專靠征服，而是多靠同化。……接受同化的形式不是設重兵置總督，而只是奉行中國的一冊正朔就可以。至於對待臨邊的番邦，其間道義關係，多少仍保存著春秋時代的精神。制度形式雖然演變得複雜，而維持這種形式的卻一直為禮部所主持。雖然沒有發展出外交部，卻也沒有轉變為殖民部。」[（註247）](#)此言頗接

近歷史現實，也可一窺中國傳統與西方國際關係習慣準則之間的部分差異所在。

羈縻與和戰策略交叉運用

總的來說，在重視「個體利益」並強調「絕對勝利」之原則下，西方（以歐洲為主）在設定國家對外戰略時，一方面更著重於計算絕對安全係數，更因「敵我」關係的二分法設定，讓殲滅敵人成為無可取代的最終目標，在尚未達成前述目標之前，先透過「隔離」（quarantine）與「圍堵」（containment）來阻止敵人力量繼續擴張，並藉此鎖定攻擊行動方向，亦成為觀察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指標。

以近代史為例，無論是英、俄、普、奧在拿破崙戰爭期間組織所謂「大同盟」（Grand Alliance），[（註248）](#)拿破崙對英國採取的「大陸封鎖」（Continental System），[（註249）](#)英國自十九世紀中期起（以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戰爭為標記）對俄國擴張政策的封鎖，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推動的「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美國在冷戰期間對蘇聯進行的「全球圍堵同盟網」，乃至於今日美國對歐亞大陸核心國家（俄羅斯與中國）依舊進行中的隱性圍堵等，基本上都反映出類似政策趨勢與大戰略思考軌跡。

相對地，強調「結構平衡」並相對注重「比例優勢」的傳統中國，一方面僅傾向追求某種「相對勝利」概念，從西方視野看來，更經常存在「與敵人共存」（co-existence）的現象。與西方差異在於，有時歐洲國家也不排除在某種條件下與敵人共存，但重點在於前述條件式戰略設計的存在，例如十九世紀初英國表面上名為「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實則企圖透過「平衡者」角色作為歐洲大陸政治槓桿，[（註250）](#)至於十九世紀末德國建構之所謂「俾斯

麥體系」(Bismarck System)，更是它與宿敵法國和解共生的前提。不過，對中國而言，與敵人共存雖並不必然需要類似條件，當然亦不僅僅是「以靜制動」而已，有時也需要某種可稱之為「中國式權力平衡」(Chinese-style balance policy)的戰略加以配合，以下便對此深入描述探討。

以夷制夷與維持世界秩序之和諧 第三帝國末期，在一八七八至一八八〇年間被清廷政府派到法國學習國際公法的馬建忠，曾寫信給李鴻章如下分析當時歐洲局勢：「……蓋天下事眾擎則易舉，孤掌則難鳴，理之常也，夫同宅寰中，此疆彼界，而建為國，則必小事大，大事小，憂危與共，戰守相援，而勢乃不孤。故……列國安危所系，莫大於邦交。」[\(註251\)](#)或由於他人在歐洲，且正學習歐洲的國際行為規範(國際法)，再加上歐洲正是當時中國主要的安全威脅來源，因此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角度，[\(註252\)](#)設法引進不同(或最新)觀點來提出政策建議當屬無可厚非。

對歐洲而言確實如此。正如前述，最終得以殲滅或壓制敵人雖然是各國針對假想敵時，在制定政策過程中必定存在的邏輯目標，事實上，國家之間長期分裂且彼此牽扯糾葛的結果，一方面使得落實前述目標的困難度極高，更甚者，正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達成目標前先保障自身安全既屬必要之舉，至於締結同盟拉高安全係數也是相當自然的選項。可以這麼說，無論馬建忠的建議是否真影響了李鴻章，對負責晚清外交事務的李氏而言，採取與歐洲類似的同盟戰略確實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特徵。基於現實主義想法，李鴻章始終認為，單憑中國自身的力量，在世道衰微與國內政爭頻仍的情況下，清廷實在無法抗衡歐洲積極進逼的政策，自掌握外交決策以來，便不斷希望以各種「同盟」形式來達成驅敵自保的目標。

大體言之，此種想法的首度發揮乃是一八七〇年代初期的「聯日制洋」，[\(註253\)](#)但在一八七九年日本正式吞併琉球，並逐漸透露出對外擴張跡象後，為未雨綢繆計，李鴻章又轉而主張「聯俄制日」，稱「……倭人畏俄如虎，與其多讓於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懾倭」。[\(註254\)](#)接著，由於中、日在朝鮮半島競爭慢慢浮上檯面，為制約日本的西進野心，李鴻章也在一八八〇年代推出「聯洋制日」的目標，尤其是拉攏英國與美國。[\(註255\)](#)最後，則是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所選擇的「聯俄制日」策略，例如他在一八九六年出使俄國前，便明言此行目的在「聯絡西洋，牽制東洋」。[\(註256\)](#)綜觀李鴻章的「以夷制夷」策略脈絡，梁啟超曾言：「……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制某國為主，而所謂聯者，又非平時而結之，不過臨時而促之，……卒之未嘗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註257\)](#)此論固然有理，但衡諸中國所有之實際國力，亦當知李氏之無奈難處。

即便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以夷制夷」戰略不僅起源甚早，與歐洲傳統之同盟政策在內涵上也有著根本不同。其差異在於，對歐洲而言，同盟國之間具有某種平等互賴關係，中國則基本上試圖從制高點位置，僅僅將外夷視為單純的戰略工具（儘管結果有時也可能失控，例如宋朝「聯金滅遼」與「聯蒙滅金」兩次戰略失敗）。可以這麼說，所謂以夷制夷正如「驅虎吞狼」或「借力使力」一般，具有雙重效能：首先是可以節約遠征成本並降低戰爭對農耕生活的衝擊，其次則是可收「聯絡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之效，讓這些本即「其心必異」的異族自相殘殺。

中國歷史上最initial的「以夷制夷」戰略大約起自第一帝國時期。為尋求擊敗匈奴的可能，漢武帝自西元前一二七年便開始在河西走廊推動「屯田」政策，一方面藉此縮短補給距離並降低後勤成本，更重要的是以此作為聯絡西域諸國牽制匈奴的據點。其後，無論是西漢時期在西元前六〇年被任命為首任西域都護的鄭吉，還是東漢時期再度通西域的班超等，都經常就近利用西域力量來抗衡匈奴，甚至在南匈奴降漢後，也有人建議以這支力量「東捍鮮卑，北拒匈

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 ([註258](#))到了第二帝國時期，唐朝既透過「分治」(divide and rule)策略來分化並壓制突厥，在起自西元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亂導致帝國威望受創，([註259](#))以致西南方的吐蕃勢力趁機崛起之後，唐朝也開始推動「以回(紇)制吐(蕃)」政策。至於在宋代時期，由於未能成功再造帝國，運用「以夷制夷」策略也就更為頻繁。感受到來自北方契丹(遼)民族的強烈安全威脅，北宋前期首先試圖聯合高麗來加以牽制，但因後者其實力量不足，([註260](#))加上女真勢力隨後崛起，於是在北宋後期又轉而「聯金制遼」；儘管契丹最終遭到夾攻滅亡，與其說這是北宋政策成功，實際上主動權完全操在女真手中。同樣情況也發生在南宋後期，亦即它雖企圖「聯蒙滅金」，結果南宋最終仍然亡於蒙古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契丹雖自始至終似乎是被牽制的主要對象，但在面對來自西夏的威脅時，「聯遼制夏」也是北宋努力的戰略方向之一，可見其運用「以夷制夷」策略之複雜與彈性程度。

遠交近攻與近悅遠來交錯運用 即便在宋朝時，由於相對能量有限，表面上看似與外夷處於較平等或甚至有時略低(尤其是宋金互動)的關係，([註261](#))正如前述，一方面它大體維持著某種「局外人」的姿態，亦即依舊自認身為天朝上國，更甚者，即便兩個被鎖定的主要牽制對象(契丹與女真勢力)先後覆滅，但滅亡它們其實自始便不是宋朝政府設定的政策目標(目的只在壓制)，頂多只是種意外但有利的結果而已。從某個角度看來，這正是我們所企圖強調傳統中國與歐洲的差異所在：相較於西方結盟的目標，主要在保障國家生存，([註262](#))對中國而言，由於多數外部威脅還不致於威脅到王朝存續，因此結盟所涉及的利益焦點並不在個體單位(國家或政權自身)，而在於維持更高之整體結構(天下或世界秩序)的穩定性。

當然，儘管中國（尤其統一王朝與帝國時期）外交戰略之最高標的乃維繫前述「結構性靜態秩序平衡」，事實上從微觀視野看來，無論自然環境或人類世界從來就不可能被維持在所謂穩定不變的狀態中，動態變數非但存在且無可避免，至於控制這類變數亦正是秩序平衡能否被維繫之關鍵。進言之，最終傾覆王朝的政治動能雖經常來自「禍起蕭牆」（亦即由內部大規模民變所引發）的結果，來自帝國邊緣異族的外部威脅依舊是秩序穩定的常態性挑戰來源。至於中國的對應辦法，則主要依賴對於自身能量的理性判斷，也就是說，處於建立秩序之擴張階段時採取積極主動的「遠交近攻」戰術，一旦周邊秩序大致穩定，則轉而採取較消極守勢的「近悅遠來」策略。

所謂「遠交近攻」戰術，其實源自第一帝國時期以前。在范雎於西元前二六八年說服秦昭襄王並於兩年後接任相職後，便成為秦所以完成統一六國大業的關鍵之一。范雎的想法是，若想提升對外戰爭的效率，則「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事實證明，秦國確實努力落實此項戰術，根據統計顯示，在西元前二六八至二三七年的三十年當中，秦國共對外用兵三十三次，全部集中於周邊國家，對於更遠的燕國與齊國則從未動武。[（註263）](#)正以此為基礎，秦奠定了後來創造帝國的重要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自秦創立第一帝國以來的兩千餘年之間，儘管在中國歷史上只出現過三個具實質意義之帝國時期，以大一統為主軸的發展仍使前述戰術出現些微變化，尤其是與「以夷制夷」策略的結合。漢武帝在西元前一三八年派遣張騫「通西域」以便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便是此種戰術轉換的首度嘗試，接著在前述行動失敗後，隨後又在西元前一一九年將位於伊犁河流域的烏孫列為第二目標。事實上，不僅歷朝執行前述以夷制夷策略時，遠交近攻的想法始終都是其中戰略思考核心所在，例如在帖木兒蒙古汗國興起的壓力下，明朝派遣鄭和下西洋的目標之一，其實或也聚焦於設法尋找新的制衡盟友。[（註264）](#)表面上看來，在歐洲歷史上也不乏類似例

證，例如一八九四年為東西夾擊德國而產生的《法俄協約》便是一個最佳說明，[\(註265\)](#)但如前述，個人依舊認為有必要在中國式「聯夷」策略和歐洲式「同盟」政策之間作出區隔。

除此之外，發動攻擊有時並不只是「最佳的防禦」而已，尤其對自視為世界秩序維繫者，並仰賴此種秩序被轉換為內部治理必要威望的中國來說，在一定條件下出兵履行天朝義務，也是證明「存在感」且提升其威懾「可信度」之不得不然的舉措。只不過對中國文明核心本質（農業經濟社會）而言，戰爭仍是一種具有高成本與高風險特徵的政策，因此自然是能免則免；倘使真無可迴避，則理性的外交努力（不戰）將是減少戰爭風險與成本的最佳選項。

最後，如同前面段落論述朝貢體制之形成與發展時曾經提及的，一旦帝國或王朝建構出某種相對穩定的體系秩序，朝貢體制也會很自然地迅速恢復並運作起來。對周邊國家而言，或許它們前來朝貢並非仰慕天朝威望，僅僅是為了獲致經濟利益而已，[\(註266\)](#)但對中國而言，推動和平友好的周邊外交至少可同時完成雙重目標，首先是降低敵對以提高邊境地區安全係數，其次，則是藉由進貢活動形塑出繁榮昌盛的天朝景象，並由此內化為鞏固治理所需的威望來源。更甚者，透過與周邊國家的正向互動，也可對距離更遙遠的國家形成某種示範效應，因為朝貢本即「多多益善」，愈多國家參與則更可透過「萬邦來朝」達成自我肯定的目標。儘管接待遠來訪客所費不貲，若將其視為必須花費的治理成本，其實大致還是在可忍受範圍之內。

(註218) 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37;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between Scholarship and Poetry: Reflections on Hayden White’s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Rethinking History*, 4:3 (2000), pp.373-390; Hayden White, “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 Is

Historiography Art or Science?” Rethinking History, 4:3 (2000), pp.391-406.[↑]

(註219) 卡爾 (E.H. Carr) 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台北：幼獅出版公司，一九六八年)。[↑]

(註220) 一六四八年的《西發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 乃是三十年宗教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結束的政治象徵，也被認為奠定了近代民族國家與主權概念的開端；從結果看來，此和約導致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失去大量領地，削弱了該王朝對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各邦的控制，一方面導致日耳曼世界陷入封建分裂的時代，從而讓法國、荷蘭與瑞典等新興強權藉機崛起。[↑]

(註221) 參見薩伊德 (Edward Said) 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頁五。相較於所謂東方主義，西方主義 (Occidentalism) 也成為某些人關注的焦點，參見布魯瑪 (Ian Buruma) 與馬格利特 (Avishai Margalit) 著，林錚顥譯，《西方主義：敵人眼中的西方》(台北：博雅書屋，二〇一〇年)；如同東方主義者的偏見一般，從十九世紀的德國和俄國，到二十世紀的日本、中國、東南亞和中東等地，西方主義者所想像的妖魔化西方社會文明乃是沒有靈魂、墮落、聚斂錢財、無信仰、冷漠無情、傲慢、唯物主義、機械性和無根的世界主義，至於相對於邪惡的西方，「我們」則是聖潔的，為了保衛聖潔的我們，對部分基本教義派者而言，或許必須阻擋甚至摧毀西方。[↑]

(註222) 柯文 (Paul A. Cohen) 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

(註223) 潘乃德 (Ruth F. Benedict) 著，黃道琳譯，《文化模式》(台北：巨流圖書公司，一九九八年)。[↑]

(註224) 以現實主義為主的國際關係理論，大多以「人類本性」(humanity) 為出發點，認為「人類相互競逐制約的現象，乃人性不可避免的發展」，更甚者，「人類對於權力的渴求，並非歷史上的一次偶發事件而已」，請參見：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Morgenthau, *Poli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of Ethic and Politics* (Lond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2).[↑](#)

(註225) 在此期間，西方最主要的集體能量來自於基督教會，但因其作為宗教性團體，從而也形成某種無可避免的自我制約結果。[↑](#)

(註226) Charles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nne Cohler, Basia C. Miller and Harold S. Sto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art 1, Book 3, Chapter 8-9.[↑](#)

(註227) 中國社會學者費孝通在一九四七年《鄉土中國》書中，針對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和人際關係提出所謂「差序格局」概念，認為在此種格局當中，「社會關係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繫的增加，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路。……這一社會關係的網路是以親屬關係為基礎而形成的，……像個蜘蛛的網，有一個中心，就是自己。……我們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係就是這種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係的那一群人裡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就是倫（人倫）」。[↑](#)

(註228) 西洋棋 (chess, 也被稱為國際象棋) 一般認為源自被稱為「恰圖蘭卡」(Chaturanga) 的古老印度遊戲，西元七世紀時經蒙古傳入俄羅斯，同時經由統治波斯的穆斯林帶進伊斯蘭世界；大約十、十一世紀時分別傳到西班牙與英國。除此之外，它也在八

世紀左右傳入東北亞的中國，然後漸次傳至朝鮮與日本，經改良後形成所謂象棋與將棋的遊戲。[↑](#)

（註229）李德哈特（B.H. Liddell-Hart）著，鈕先鍾譯，《戰略論：間接路線》（台北：麥田出版公司，二〇〇七年），頁四二八；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著，楊南芳等譯，《戰爭論》（台北：貓頭鷹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註230）其後美國的資訊戰專家又進一步延伸此種概念，強調打擊敵方的「頭部」，亦即攻擊敵國指揮當局、聯合參謀部、戰區總部與各級部隊司令部，並破壞敵方所有的資訊媒介，包括電話、無線電頻、電纜和其他傳輸手段等；此種戰術又被稱為「外科手術式」或「點穴式」打擊。[↑](#)

（註231）中國的「象棋」一詞最早出現於戰國時代，意指某種古代棋戲，但具體內容已失傳，目前名詞源起於十世紀北宋時期改良後的波斯象棋。[↑](#)

（註232）有人認為，圍棋大約起自西元前六世紀，最早記載於春秋時期的《左傳》一書，目前的十九道棋盤則定型於南北朝時期。[↑](#)

（註233）在日本圍棋規則中，棋子所圍成的空白交叉點被叫做「目」，最終以目多的一方為勝方，所以被稱為比目法；中國古代也使用比目法，但明朝以後，棋子本身所佔的交叉點和佔據的實空統稱為「地」，以地多者為勝，所以被稱為數子法。[↑](#)

（註234）事實上直到西元前一九五年為止，亦即項羽兵敗自殺八年之後，漢高祖劉邦仍僅維持著某種天下共主的地位，包括楚王韓信、趙王張敖、韓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鯨布、燕王臧荼，與長沙王吳芮等八個異姓王仍各自割據著中原部分土地。[↑](#)

(註235) Francois Jullien, *The Propensity of Things: Toward a History of Efficacy in China*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A Treatise on Efficacy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Think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see also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2).[↑]

(註236) 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 (Theodosius I, 347-395) 在三八〇年公布敕令，宣布基督教為正統國教。更重要的是，由於一神論強調「真神」，相對也創造出必須摧毀的「異端」(假神)。[↑]

(註237) 克黑朋 (Marc Crepon) 著，李鳳新譯，《製造敵人的文化》(台北：果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註238) 有人認為，最早使用「黃禍」概念的是小說家希爾 (Matthew Phipps Shiel)，他在一八九八年發表了名為《黃禍》(The Yellow Danger) 的短篇小說集，其中強烈表達了對中國的反感(反映出當時美國瀰漫的排華情緒)，並因隨即在中國發生義和團事件而成名；但也有人指出，德皇威廉二世在一八九五年送給俄國沙皇的一幅畫中，暗示應聯合歐洲各民族對抗亞洲人種，乃是該概念更早的起源。至於「黃禍」一詞最早被用於美國作家魯伯特 (G.G. Rupert) 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一本同名書籍上頭。[↑]

(註23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72:3 (1993), pp.22-49;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註240) 原文登載於一九一九年《新生活》雜誌第二期，為民國初年最早之白話文創作之一。[↑]

(註241) 請參考：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世界書局輯本)，卷二十一與卷三十二。[↑]

（註242）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台北：里仁書局，一九八四年），頁一二九至一三〇。[↑](#)

（註243）參見閻守誠，《中國人口史》（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七九、一九三、二二〇。當然，由於古代統計技術限制，人口估計誤差值也很大，但趨勢大致如此。此外亦可參考：王躍生，《中國人口的盛衰與對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史念海，《中國歷史人口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一九九一年）；何炳棣，《一三六八至一九五三年中國人口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陳彩章，《中國歷代人口變遷之研究》（重慶：重慶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六年）；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般認為，直到清康熙年間進行稅制改革後，人民失去隱藏戶口的誘因，人口統計的確切真實性才隨著上升。[↑](#)

（註244）根據粗略統計數據，明朝實際常備兵員約八十四萬人，援助朝鮮的十六萬六千餘人等於是動員全國將近兩成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戰費所形成的巨大財政負擔，負責支應援朝軍費的「太倉銀」（一四二二年始置的明朝官庫）在一五九二年時有白銀七百萬兩，每年進帳約兩百一十萬兩，但該戰爭軍費平均一年即達兩百四十萬兩左右，造成明顯財政赤字問題。[↑](#)

（註245）吳永口述，劉治襄筆記，《庚子西狩叢談》，卷四，頁一二八至一三〇。[↑](#)

（註246）李宗侗註譯，葉慶炳校訂，《春秋左傳今譯今註》（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九年），頁一六六〇。[↑](#)

(註247)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華世出版社，一九七七年)，頁二一〇。[↑](#)

(註248) 為反制或壓制法國之可能擴張，各國陸續在一七九三、一七九八、一八〇四、一八〇六、一八〇九與一八一四年組成過六次大同盟，後面四次特別針對拿破崙；參考蔡東杰，《西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頁一五至一六。[↑](#)

(註249) 大陸封鎖政策是拿破崙在一八〇六年十一月，為求透過經濟戰手段迫使英國屈服，在柏林啟動的對英國的經濟封鎖政策，但因成效有限而於一八一四年結束；一般認為，拿破崙政策失敗關鍵在於高估英國對大陸的經濟依賴程度，並低估了殖民地對英國的挹注與反饋效果。[↑](#)

(註250) 一般認為，所謂光榮孤立乃是十九世紀英國外交政策特徵；此名詞其實直到一八九六年才由一位加拿大議員佛斯特 (George E. Foster) 在訪英期間提出，目的是讚揚英國的不干預歐洲事務，隨後英國保守黨政治家戈申 (George Goschen) 在演講中引用後，才更廣為人知。此政策基本目標就是保持歐洲均勢的存在，不容任何力量破壞此一和諧局面，至於前提是英國拒絕加入任何永久性聯盟或與其他強國簽訂盟約。自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此政策直到一九〇二年才因為英日同盟的出現而被扭轉。[↑](#)

(註251) 馬建忠，《適可齋紀言》，卷二，頁一三至一四。[↑](#)

(註252) 此一觀念首先由清末思想家魏源在一八四三年所編譯《海國圖志》一書中提出，目的在「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從而抵抗西方列強入侵」；其中，所謂長技乃確定並非萬事皆從師於西方，僅僅學習先進軍事技術。這後來也成為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說的張本。[↑](#)

(註253) 李鴻章在一八七〇年接見日本特使柳原前光之後，有一函致總理衙門云：「鴻章前聞日本與英法通商立約，簡嚴特甚，……又購求泰西機器兵船，仿製精利鎗炮，不惜工本，勿謂小國無人。……日本距蘇浙僅三日程，精通中華文字，其兵甲較東島各國差強，正可聯為外援，勿使西人倚為外府。」明顯看出有「聯日制洋」之意味。參見《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一，頁三至四。[↑](#)

(註254) 此處所謂「稍讓於俄」指的是一八七八至七九年的中俄伊犁交涉事件；中國在一八七八年授予崇厚「全權大臣便宜行事」頭銜，前往俄國聖彼得堡談判索還伊犁，結果卻付出了割讓大塊土地和高額賠款的代價。對此，原本輿論大譁，但最終被李鴻章壓制下來，部分原因即在於此。[↑](#)

(註255) 李鴻章在一八七九年致函朝鮮太師李裕元，建議其「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其後又於一八八二年協助朝鮮同時與美國與英國談判簽署《修好通商條約》；李志奇，《中國近代外交史》（台北：南天書局，一九九三年），頁六六六至六六八。[↑](#)

(註256) 參見黃遵憲，《人境廬詩草》，卷十一，頁一五。[↑](#)

(註257) 梁啟超，《李鴻章傳》（台北：立緒文化公司，二〇〇四年），頁六七。[↑](#)

(註258) 參見《後漢書》，卷十九，[\[耿弇列傳第九\]](#)。[↑](#)

(註259) 一般認為，安史之亂乃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政治轉折點，由於發起叛亂者以安祿山與史思明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

又由於此事件爆發於唐玄宗天寶年間，也被稱為天寶之亂；更重要的是，此事件讓周邊部族有了進入帝國核心的機會。[↑](#)

（註260）高麗曾於西元九八五年宋太宗第二次出征契丹時，派兵參與作戰，但隨後雙邊關係趨緩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或許也與一〇〇五年宋遼「澶淵盟約」簽訂後，北宋方面不欲在輕啟戰端有關。參見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頁一七一；姜吉仲，《高麗與宋金外交經貿關係史論》（台北：文津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頁一〇六。[↑](#)

（註261）高麗與西夏是主要的例外；儘管北宋希望聯合高麗的力量，後者始終是正式向中國朝貢的周邊國家，至於西夏雖在一〇〇六至一〇三六年間向宋稱臣，隨即長期維持獨立自主地位。後者請參見湯開建，《黨項西夏史探微》（台北：允晨文化公司，二〇〇五年），頁二九六至二九七。[↑](#)

（註262）See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Farok J. Contractor and Peter Lorange, *Cooperative Strategies and Alliances* (New York: Pergamon, 2002);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Erich Reiter and Heinz Gartner, eds., *Small States and Alliances* (New York: Physica-Verlag HD, 2010).[↑](#)

（註263）鈕先鍾，《歷史與戰略：中西軍事史新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頁四二至四三。[↑](#)

（註264）費南德茲 - 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著，黃中憲譯，《大探險家：發現新世界的壯闊之旅》（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二〇一〇年），頁一四七。[↑](#)

（註265）俄國在十九世紀原本傾向德國，但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結果導致德、俄兩國首度齟齬，而一八九〇年俾斯麥去職，又讓雙方失去良好溝通橋樑後，俄國終於決定在一八九四年與法國結盟自保。[↑](#)

（註266）例如，費正清便曾指出，相較於十八世紀清朝處於鼎盛時期，前往中國朝貢的活動在十九世紀清朝趨於衰落時，反而有頻率增加的趨勢，尤其以琉球與暹羅（泰國）為典型，其原因分別與中日貿易活絡以及清政府需要進口白米有連帶關係；參見John K. Fairbank and S.Y.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 (1941), pp.193-199.[↑](#)







挑戰：大轉型後的內外部結構內涵

本書不僅嘗試進行重構中國歷史的工作，焦點更放在中國如何建立自我認知，然後依此判斷並決定其對外行動方針。可以這麼說，無論如何去重新看待這段長達兩千餘年的歷史經驗，引發來自不同觀點的爭議都是極自然的，但重構中國歷史時，最重要的挑戰或許並不在選擇何種切入角度，而是如何在邏輯上將王朝史與近代史銜接起來。因為相較西方史而言，十九世紀末以來的中國發展經常被從「斷裂」角度來審視，亦即邏輯上存在著兩個中國，也就是「舊中國」與「新中國」。儘管此種觀點在中國研究中極為普遍，甚或是某種不約而同的共識，本書依舊希望在這兩者之間找出某些微妙的連結出來。對此，個人首先從「大轉型」的角度出發，瞭解中國所遭受衝擊的特徵及其主要之影響，然後設法由中國面對挑戰時所選擇的回應途徑，整理出連繫兩個歷史階段的接合點。

工業與資本主義文明衝擊

由於過去中國歷史過於重視以上層結構活動為主的「王朝斷代史」，一方面輕視在政治層面以外，包括經濟與社會生活的紀錄，更在以中國中心觀為基礎之天朝觀念籠罩下，慣性地忽略或貶抑中國與周邊行為體互動過程的重要性，正如蔣廷黻所言：「有清以前，中國惟有藩屬之控制馭夷懷遠諸政，無所謂邦交；春秋戰國之合縱連橫，不過等於西洋封建時代諸侯之爭鬥，雖遠交近攻，有似近代之國際交涉；然時代之局勢及精神，實與十九世紀中外關係迥然不同。」[（註267）](#)結果致使自近代以來，當學者們試圖重新探索並建構中國歷史發展脈絡時，往往陷入眾說紛紜且莫衷一是的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書也嘗試進行類似的重構工作。但更重要的

是，相關問題的主要挑戰並不在於如何去整理史料，而是如何將王朝史與近代史在邏輯上重新銜接起來。

博蘭尼（Karl Polanyi）延續布洛克（Marc Bloch）等人有關「整體歷史觀」（totalizing history）的概念，並進而在深入整理近代歐洲發展後，一方面提出了所謂「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說法，[（註268）](#)同時站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灰燼上，充滿反思地倡言：「十九世紀的文明已然徹底崩潰。」不過，崩潰的或許並非十九世紀。正如霍布斯邦將同時起自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與英國工業革命稱為「雙元革命」一般，革命的內涵雖確然無疑，絕非一蹴可幾，它需要時間去沉澱和落實，由此，從某個角度看來，則整個十九世紀不啻走過了一段「百年革命」歷程，甚至最後還得加上兩場大戰煙硝的推進，終於讓歐洲和「舊體制」（Ancien Régime）分手道別。

就在歐洲陷入「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的同時，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受到歐洲革命浪潮外溢影響，中國同樣面臨了類似的結構性徹底變遷挑戰，至於結果如同多數人所見，無論政治結構或經濟社會活動內涵，當然還包括了外部環境，今日的中國與其過去，無論自我認知抑或者對策設定，似乎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樣貌。由此衍生的問題是：當代中國與其過去歷史傳統之間是否仍存在延續性？抑或它根本經歷了某種「斷裂式」的歷程，從而使其實質上變成了「另一個中國」（another China），所以我們再也不須理會那些斷爛朝報？相對地，若中國仍與其過去之歷史發展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聯繫性，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去審視此種關聯呢？進一步來說，即便前述與傳統之間的聯繫確實存在，在所謂大轉型的衝擊下，其最終發展趨勢又將如何？中國終將被融入更全面性的潮流當中，還是會出現文藝復興式的發展呢？

對此，本章首先將由推動此一轉型過程的源頭（亦即因歐洲進行全球擴張所帶來的外部力量）入手，檢視這波後來被稱為「全球化」的浪潮究竟怎樣興起，又如何波及並改變整個世界與其他地區

之結構與外貌。當然，更重要的是，當中國在被動的情況下遭遇這波挑戰時，其統治階層（包括異族統治者與傳統知識分子）到底用何種眼光來看待這群未知世界的新訪客，如何進行自我認知與體制方面的調適，在努力應對挑戰後又帶來了何種歷史結果。

中國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之逆轉 十九世紀對於以歐洲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言，不啻是個偉大的時代，但是對中國來說，卻是段被認為是悲劇命運的開端。

在哥倫布於一四九二年不無僥倖地建立了從歐洲到美洲航線，麥哲倫又於一五二一年透過史無前例之遠航連接了美洲與亞洲之後，[（註269）](#)地理意義上的全球化雛型首先因此浮上檯面。至於英國與荷蘭分別在一六〇〇與一六〇二年成立所謂「東印度公司」之後，[（註270）](#)國家機器的積極介入，終於使透過掌握海權而進行擴張的歐洲，獲得了填充全球化內涵的必要能量，從而既於此後兩百年間逐漸莫立了作為「人類的主人」的主宰地位，[（註271）](#)並在所謂「維多利亞式世界觀」（人類將迎來無限進步與擴張的新時代）橫掃世界各地後，[（註272）](#)一個以「條約」作為互動準據基礎的新國際結構網絡，也成為歐洲獲致並保障其權力的重要反饋機制。在此時期，歐洲與白種人口經歷了史無前例的一段高速增長過程，佔世界人口比例從一八〇〇年的約五分之一左右，一路攀升至一九三〇年第二次大戰前夕的三分之一強。當然，更引人注目的，乃是白人在十九世紀末於世界各地所控制的廣大殖民地（約占地表面積四分之三以上），以及所擁有之巨大財富與權力能量。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柯能（Victor G. Kiernan）所言，約略至十八世紀末為止，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仍猶如童話般美好」。此時，中國將歐洲人稱為「佛郎機」（Fo-lang-ki，其後用以專稱葡萄牙人），這個名詞或源自阿拉伯人對於十字軍稱呼的音轉（Firangi or

Franks，亦即法蘭克人），[\(註273\)](#)至於他們所獲得的待遇，大體上與其他傳統中國周邊國家差別並不大。相對地，在葡萄牙人自十六世紀起從中國帶回大量瓷器後，收藏華麗細膩的中國瓷器很快成為歐洲貴族趨之若鶩的文化風潮，隨著更多的中國產品經由新航道湧入，整個歐洲也陷入長達百餘年的「中國熱」（Chinoiserie or China Fever）當中，諸如瓷器、漆器與絲綢等不但影響了歐洲此時的審美觀念，居於文化主流的法國宮廷中盛行的洛可可（Rococo）風格也應運而生。[\(註274\)](#)估計在整個十八世紀，輸入歐洲的中國瓷器至少在六千萬件以上，每年絲綢進口量亦將近八萬匹。

法國學者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曾經具體而微地，描述了此際這股中國文化熱潮：「整個歐洲都對中國相當著迷，宮殿裡掛著中國圖案的裝飾布，……由於真品太過昂貴，只好加以仿製；在布里斯托和里摩日等地都生產著中國式古玩，……一切都顯示歐洲人非常習慣中國模式口味。」[\(註275\)](#)甚至在鴉片戰爭結束後，一本在一八五三年於倫敦再版的十六世紀中國史論著，依舊從遙遠曖昧的眼光，稱中國是全世界最富庶的一個國家。[\(註276\)](#)

不僅如此，法蘭克（A. Gunder Frank）也指出，在一八〇〇年左右，光是廣州鄰近地區的人口數便超過整個歐洲城市人口的總和。[\(註277\)](#)此種說法雖略顯誇張，但若估計當時在全球經濟中所占位置的話，中國的確無疑是當時世界中心所在。[\(註278\)](#)甚至更客觀地說，「十八世紀世界工業中心是在亞洲，而非歐洲，當時最強大的國家也不是路易十四的法國或彼得大帝的俄國，而是東亞的滿清中國與南亞的莫臥兒帝國」，[\(註279\)](#)此論或非虛言。

無論如何，情況在十九世紀中期出現了陡然性轉變。

如同佩雷菲特繼續以充滿戲劇性的口吻描述：「……正值法國大革命之際，英國派遣了一個浩大的使團前往中國，……他們就像面對巨人歌利亞的又一個大衛，儘管只有八百萬人口，卻自認為是世

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並打算跟一個擁有三點三億人口的國家平起平坐，結果被這個自視為天下唯一文明國家的中國拒絕了。」[\(註280\)](#)由於此際歐洲拿破崙戰爭方酣，暫時無暇東顧的英國只能接受屈辱被逐的待遇，從而繼續滿足了第三帝國的自我天朝想像。儘管如此，在維多利亞女王於一八三七年登基並開啟了近代英國的「黃金時期」，起自十八世紀末的工業革命更賦予歐洲完成高速增長的新動能後，一股新的全球化洪流也在一八四〇年代以萬鈞之勢衝向東亞大陸，從而迫使中國自秦始皇在西元前二二一年首度締造帝國架構以來，繼中國本部遭蒙古勢力橫掃之後，又一次面臨了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重要的結構性轉捩點。

與帝國時期的經驗相較起來，中國歷史上因為改朝換代所引起的動盪，只不過是上層結構內的政治權力交接轉換而已，大體上幾乎「換湯不換藥」，除了蒙古與滿清（前者擺出懷柔姿態，後者則大體被同化進中原文化之中）之外，來自邊疆的多數外患威脅很難動搖中國中心體系的基本框架。但在這波由歐洲所帶來的「近代化」壓力下，中國所遭遇的非但可能是如同部分非帝國時期（尤其是分裂階段）一般，陷入被貶抑的世界邊陲地位，甚至得面對體系內涵徹底被抽換之結果。

中國對於外部挑戰之初步回應 隨著新航路發現與造船技術的持續精進，與一股以擴張欲望為基礎的內在驅動力，於是使歐洲人在自許之「全球化」時代使命感下，將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思考模式及工業社會政治制度，藉著無堅不摧的武力和無孔不入的傳教士散播到世界各地。正如同霍布斯邦所言：「……到了一八八〇年代，歐洲不僅是支配和改變世界的資本主義發展核心，也是世界經濟和資產階級社會主要的組成份子；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時刻比起此時更稱得上是歐洲的世紀，未來也不可能。」[\(註281\)](#)

隨著歐洲逐漸邁向其歷史的巔峰，中國呢？

或許從「宿命」的角度視之，中國在十九世紀遭逢歐洲擴張的挑戰，乃歷史發展的某種必然趨勢，至少與此刻歐洲的活躍比起來，處於清朝盛世餘蔭下的中國由於「在經濟上自以為無求於人，……因而無論生活方式或生活需要，並未感到有何變通的必要。……即令有人為了求知欲、好奇心或進步觀念所驅使，有志於域外之學，事實既不許可，亦絕少可能。」[\(註282\)](#)與此類似，費正清也指出：「中國的發展成熟度將由其穩定性及維持一個長久不變國家之能力所證實，這如同生理學上的壅滯（homestasis）現象一般；換句話說，累積的既得利益已龐大到無法作任何的變革。」[\(註283\)](#)可以這麼說，這種心理（而非制度）上因自證式優越感以致之自我封閉，乃中國在面對挑戰時的反射動作，儘管過去後遺症有限（主要面對文明程度略低之周邊異族），如今則新的敵人乃同時受革命浪潮激盪的歐洲，結果顯然大為不同。

無論如何，面對挑戰時產生回應不僅是人類的自然反應，對中國而言，首要之務乃是先認清當下局勢。

在鴉片戰爭結束三十年後，剛剛接任直隸總督不久、正炙手可熱的李鴻章，在一八七二年對當時國際情勢及中國地位有過如下分析：「……竊維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中國邊界腹地，……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兩年後，他又進一步由反思中國與周邊關係演進出發，作了更為深入的探討：「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形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聚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萬里；軍械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砲彈所到之處無所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千年來未有之強敵。」[\(註284\)](#)事實上，前述觀點並不單單代表李鴻章的個人看

法而已，也是當時中國知識界普遍（但未必主流）的看法。例如中國首任駐英國大使郭嵩燾便曾說：「西洋人之中國，誠天地之一大變。」黃鈞宰云：「乃自中華西北環海而至東南，梯琛航賚，中外一家，亦古今之變局哉。」薛福成也說：「近數十年來，火輪舟車無所不通，瀛環諸國互為比鄰，實開宇宙之奇局。」[（註285）](#)

可以這麼說，隨著拿破崙戰爭結束帶來一段和平穩定，且有助於國際貿易發展的時期，再加上工業革命後，隨著經濟供給增加而讓歐洲有更強烈的尋求市場動機，以及鴉片出口稅逐漸作為印度殖民政府收入大宗的現實，打開中國市場也成為英國具重大利益性質的政策方針。[（註286）](#)不過，對中國而言，此時第三帝國政府基本上毋寧是「滿足且傾向維持現狀」的，在對外互動方面仍舊以傳統「重內輕外」與「懷柔遠人」政策為前提。例如，即便英國正式發動戰爭，並陸續攻占了廣州與定海等城鎮，帝國政府並未認為這屬於完全不可容忍的事，甚至在英國船艦到達大沽後，作為欽差進行斡旋的琦善還贈送食物，「既以示天朝之厚恩，俾知欽感」，呈現出傳統的「羈縻」辦法。直到英軍攻占鎮江並顯示出有切斷運河通航的威脅後，清朝才終於下決心與其議和。

很明顯地，中國在戰爭後期決定屈服於英國的要求，並非由於在軍事方面受到致命打擊所致，而是源自另一個更嚴酷的潛在政治現實，亦即在鎮江被攻陷後，由於此地位於長江與大運河交界處，[（註287）](#)隨著中國經濟重心自第二帝國末期逐漸南移，[（註288）](#)此處從宋代以來便是南北漕運樞紐所在，進言之，長江下游三角洲既是帝國人口最稠密處與稅賦主要來源，同時也是支撐政治中心（北京）的後勤要地；儘管以海軍為主的英國未必具備足夠的占領能力，一旦此區域遭到外敵控制或破壞，其結果將直接衝擊帝國統治的正當性基礎。換句話說，正如同過去中國多數王朝統治者一般，當第三帝國面對來自於外部的新安全威脅時，首要考量仍然是內部性的，至於主要政策態度也還是「能拖則拖，得過且過」的差不多主義。

儘管康熙早在一七一六年便不無睿智地預言：「海外如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註289\)](#)顯然，其後繼任的滿清皇帝既未能理解這段話的涵義，也並未具備跟他一樣的國際觀與西學背景。事實是，直到外國勢力在一八五六至一八六〇年間英法聯軍之役（或稱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衝破京畿門戶，直接威脅帝國政治核心後，清朝才開始對此有消極且有限之回應。

國際結構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

從某個角度來看，其實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當第三帝國在以英國為首之歐洲新興勢力壓迫下，終於被動調整長期以來對外的「限制性交往」政策（過去一般稱為「閉關自守」政策）時，[\(註290\)](#)無論從國力對比，或海權國家所帶來的實質安全威脅而言，中國仍然擁有部分的相對優勢。例如在鴉片戰爭爆發約二十年前的¹⁸²⁰年，當時中國不僅在人口數字（約三點八億）方面遙遙領先歐洲總和（約一點七億），佔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約百分之三十三）也遠高於整個歐洲（約百分之二十七），甚至在前工業時期最後階段（¹⁷⁰⁰至¹⁸²⁰年）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百分之零點八五）亦不比歐洲（百分之零點五八）的長期表現來得遜色。[\(註291\)](#)

相較於歐洲借助工業革命能量而啟動其崛起歷程，滿清第三帝國的發展到了一八三〇年代後，開始受到內部與外部因素之明顯制約與影響。從內部看來，由於治理規模與統治技術依舊呈現不對稱狀態，一方面帝國的政治運作持續存在虛擬性質，在生產技術提升速度緩慢的情況下，如同先前歷史脈絡，帝國結構帶來的人口迅速繁衍（因提供穩定秩序之故）導致可耕地不斷遭到切割，再度加劇土地兼併現象，使部分人民在失去生存所賴土地後被迫「揭竿而起」，[\(註292\)](#)至於政府內部冗員充斥導致行政效能下降，也因無法有效回應挑戰，直接衝擊正當性根基並帶來帝國中期無可避免的衰

弱趨勢。[\(註293\)](#)從這個角度看來，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正是前述惡性循環邏輯下的自然結果，[\(註294\)](#)同時也是第三帝國最後終結的主要關鍵。

不過，此際對中國影響更為深遠的，或許還是來自外部的變數。

前面雖曾提過清末時期林林總總的「變局論」概念，表面上看來，此時中國面臨之變化重點主要是「威脅來源方向」的差異，亦即相較「歷代備邊，多在西北」，歐洲國家不僅來自東南方（事實上更早來自東南方的挑戰乃是「倭寇」，他們也是明清兩代「海禁」政策的根源，只不過威脅沒有歐洲來得大），且「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也就是幾乎來自對中國而言遙不可及的地區，這意味著帝國缺乏相關訊息，也不可能預知威脅。大體來說，歐洲勢力在十九世紀中葉突如其來提出挑戰，對中國帶來了兩個重大影響：首先，這是繼秦朝奠定「中國本部」地理基礎與蒙古打通歐亞大陸通道以來，中國第三度面對之「世界擴張」效應挑戰，至於其次亦更關鍵者，歐洲勢力也是繼蒙古之後，中國歷史上再度遭遇完全無法被「漢化」的對象。以下便進一步針對上述兩點加以說明。

世界擴張效應及其影響 阿諾德（David Arnold）認為：「約略在一四〇〇年時，整個世界其實被區隔成數十個各自獨立的社會與文明，彼此間根本沒有或僅僅維繫著微不足道的接觸與溝通。」[\(註295\)](#)事實上，此處所謂「整個世界」應指「地球表面上」，至於「各自獨立的社會與文明」則是指「同時並存的不同世界」。

儘管許多地方（例如美洲、澳洲與許多海洋上的島嶼）未必如主流歷史學所宣稱都是由歐洲人在所謂「大發現運動」中首度踏足的，[\(註296\)](#)不過，相較以往人類多半為了尋求生存要素（耕地、水草、市場、貴金屬……等）而向遠處移動，歐洲最初的擴張目標雖

然也是如此（尋求前往非洲與東方的新貿易航道），但最終正如發現（discover）此一名詞被定義為「經由研究與探索等，看到或找出前人未知的事物或規律」，可看出此種活動已逐漸變質為某種「無止盡的運動」，甚至可延伸至今日依舊方興未艾的太空探險競賽。必須一提的是，許多人雖試圖將明代初年的「鄭和下西洋」對比此際歐洲的海洋擴張活動，藉此不無遺憾地證明中國失去了進行全球擴張的「先機」，如同費南德茲 - 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指出的，與歐洲比起來，「鄭和的這些遠航並非探索未知之路的旅程」，[（註297）](#)而是沿著已知航道，目標明確且小心翼翼地前進，象徵意義大為不同。這可說是相當客觀正確的見解。

進一步來說，繼十三世紀蒙古西征打通歐亞大陸通道，從而為人類帶來近代第一次的「世界擴張效應」後，透過十六到十七世紀之間的大規模海上活動，歐洲則不啻從另一種管道（海洋通道）再度激發了此種效應。[（註298）](#)其結果一方面使歐洲人對地球表面的認知比例從一五〇〇年約兩成，一六〇〇年將近五成，一路激增至一七〇〇年的超越六成，[（註299）](#)最終奠定了今日「世界 = 全球」的新地理概念基礎，這也是在人類歷史上首度將所謂世界範圍涵蓋了整個地球表面的壯舉（儘管此種概念落實到實際生活中，需要更長久的時間）。

針對歐洲所以帶來此一新歷史發展的背景因素，一般認為，首先來自中古末期西歐封建制度逐步沒落之後，隨著現代國家單位興起而誕生的民族主義熱潮，其次，是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與十七世紀理性主義當道的情況下，基督教會也掀起一股海外傳教復興運動，最後，則是伴隨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結構轉型，讓歐洲同時獲得了更強烈的擴張動機與威力更巨大的擴張能量。[（註300）](#)總而言之，歐洲擴張一方面奠下所謂「現代世界體系」（modern world system）的雛型，也在將諸如中國等其他行為者被動地拖入此一新體系後，從而對其歷史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就中國來說，對比第一（秦漢）與第二（隋唐）帝國時期奠下的地理邊界基礎，明朝表面上重新控制了「中國本部」，至於遭驅趕至塞北的蒙古，亦未如北宋時期的契丹與女真般帶來嚴重威脅，致使其不啻滿足了建構帝國的基本地理要件。儘管如此，由於前述蒙古西征帶來「世界擴張效應」與歐亞大陸地緣板塊內涵質變的結果，加上唐宋以來海洋貿易發達所帶來不同於陸權本位之戰略視野，都成為明朝在設法重建帝國時所遭遇之主要挑戰。尤其在蒙古時代中，如同杉山正明指出，忽必烈時期「開始建造龐大的帝國新首都，這個城市與現今北京的差異在於，當時城市內部設有港口」，這是因為彼時的國家構想框架，「是將蒙古傳統的草原軍事力量，與歐亞世界最大的中國經濟力量結合為一體，並進一步全面活用與蒙古存在共生關係的穆斯林商業力量，以達到經濟統合的新形態」，從而帶來「在人類史上，第一次將內陸及海洋真正系統化連結之新時代的開端」。[（註301）](#)且不論此一系統實際運作情況如何，甚或其存在時間亦未必太長（十三至十四世紀），畢竟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何況在「去古未遠」情況下，任何體系殘留遺跡都將影響接下來明朝的戰略選擇。

如前所述，此時明朝政府擁有兩個選項：亦即將自己閉鎖回原有帝國邊界中，抑或接受新的地緣環境變數，沿著歐亞交通新動脈（中亞絲路網與「印度洋 - 南中國海」航線）去回應來自「新世界」的挑戰。從「鄭和下西洋」與隨後明朝決定全面毀棄所有鄭和艦隊資料看來，[（註302）](#)中國最後似乎選擇了前一個選項，至於理由既來自「重內輕外」以及「重農抑商」戰略傳統的自然驅使，始終無法有效壓制蒙古勢力，也讓其不可能騰出手來，將龐大資源投入另一個新的戰略發展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歐洲人在全球各地瘋狂「探索」擴張，確實從「點」（殖民據點，尤其是戰略性港口與島嶼）和「線」（定期航道）的角度，交織出一張遍及地表各處的全球性網路（globalizing network），但在十八世紀末期工業革命來臨前，他們依舊缺乏從「面」的角度落實世界體系的必要能量。相對地，歐亞中間地帶隨

著蒙古勢力消退而逐漸空泛疏離化，既使滿清入主中原後成功重建帝國架構，並誘使中國周邊鄰國再度將互動焦點置於帝國核心所在，從而使一個「已具雛型但仍未真正成形」的新世界繼續停留在原地踏步的狀態，直到英國挾其新的工業能量再度前來叩關為止。可以這麼說，不僅是滿清中國，包括蒙兀兒印度、波斯與最靠近歐洲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等，都面臨著類似的地緣視野挑戰。儘管它們最初都很自然地試圖透過隔離政策，來保護傳統概念中的舊世界框架與行為準則，事實是，這些歐洲以外的「世界中心們」最終都無法避免被捲入一個更廣泛的歷史漩渦中。

文明衝擊與中國中心觀之崩解 費南德茲 - 阿梅斯托認為：「中國所以跟更廣大的世界脫鉤，並非肇因於科技低劣或好奇心不足；中國人若想駕船前往歐洲或美洲，亦絕非辦不到。事實上，在中世紀時，中國探索者很可能曾數次由東往西繞過好望角，……但這類創舉毫無意義，因為他們通往的地區並未生產中國人所需要的東西；中國人橫越太平洋到美洲的證據，再怎麼看都令人懷疑，不過，若說他們曾有過此種壯舉，卻是絕對可能的事情。」[\(註303\)](#)相對地，達爾文 (John Darwin) 則指出：「將東南亞、印度、西非洲與美洲連成一氣者，乃是歐洲人，但是我們不該認為，藉由這些作為，歐洲人已經為稱霸全球一事奠下基礎，或這時他們已蓄勢待發，準備包圍、孤立、征服歐亞世界其他社會與文化。」[\(註304\)](#)由此也呼應了前段中的觀點，亦即直到十八世紀末為止，歐洲仍缺乏從「面」的角度落實世界體系的必要能量。

無論如何，由於以貴金屬與奴隸買賣支撐的大西洋貿易持續提供收益，[\(註305\)](#)隨著荷蘭創造出各種現代經濟制度（包括金融體系與股票交易雛型），英國提供了在生產技術上的重要突破（蒸汽機工業革命），加上法國在一七八九年爆發大革命，帶頭給了「舊體制」致命一擊，前述一連串歷史經驗終於讓歐洲文明有了脫胎換骨

的發展，據此，部分歐洲（以西歐為主）國家因此獲致了將殖民擴張轉化為征服行動的關鍵動能。尤其在經濟表現更為明顯。以全球製造業產能比率為例，根據粗略估計，相對於中國在一八三〇年占有百分之三十左右，逐漸於歐洲獨占鰲頭的英國則僅有近百分之十，到了英法聯軍後的一八六〇年則雙方已拉成平手（各占約百分之十九），甚至英國在一八八〇年更以百分之二十二點九的比例，遠超過中國的百分之十二點五。[（註306）](#)

前述力量比例扭轉的過程，並非僅僅表現在統計層面。隨著英國透過一八三九至四二年的鴉片戰爭成功敲開中國門戶，歐洲文明在近一個世紀以來的爆炸性成長，非但逐步落實了作為「人類主人」的全球性新地位，更由於直接將其文明優勢從視覺層面展現在中國面前，從而對於長期支撐帝國結構的心理基礎（中國中心觀或天朝觀念）帶來嚴重衝擊。正如前述，在中國相對強盛時期（亦即三大帝國階段），基於其擁有之權力與威望優勢，產生自尊自大之天朝觀念固然其來有自，即便在帝國崩解以致屈居相對弱勢時，由於帶來威脅之周邊部族多未能真正滅亡中國正統王朝，甚至其中多數還紛紛進行大規模漢化運動並消融於華夏文明中，[（註307）](#)由此形成的「中國式種族沙文主義」既強有力地支持著天朝觀念，並使其成為超越王朝框架的政治正當性心理基礎。

在英國企圖強行武力叩關的壓力下，至少從「知己知彼」的角度切入，正如林則徐所言：「籌夷必須知夷情，知其虛實始可定控制之方」，中國首先開始一段吸收新知的過程。但因天朝觀念制約，此過程最初僅侷限於廣州周邊地區而已。[（註308）](#)儘管如此，在戰敗殘酷現實的沉重壓力下，一方面導致前述「變局論」認知的產生，同時出現愈來愈多感時而起的知識分子，紛紛提出對於時局的針貶。例如魏源早在戰爭期間便指出：「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無不除弊而能興利之法。」[（註309）](#)由此開啟一波透過「師夷長技」與「經世致用」途徑以因應變局的想法。儘管如此，在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攻入首都北京的震撼下，終於才驅使馮桂芬等人提出更積極的「采西學、制洋器、籌國用、改科舉」新思

維，這也是繼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在西元前三〇六年推動「胡服騎射」後，中國歷史上首度主張普遍學習外部文明的公開倡議。其中，最重要且極具象徵意義的不啻是「西學」的逐漸「顯學化」，儘管在過程中一度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心理掙扎，[\(註310\)](#)最後仍於二十世紀初匯聚為「全盤西化」的浪潮，從而在心理層面推倒了似乎無法動搖的天朝觀念，也讓「崇洋媚外」成為部分衛道人士進行自省時的批判用語。

自我認知結構之質變 事實是，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所經歷的並不僅是自尊心的崩解，或者隨後而至的後帝國時期制度變遷而已，進言之，學習與模仿固然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關鍵處所在，更重要的或許是中國自我認知的調整。

無論歷史如何呈現出十六、七世紀以前東西方發展經驗的比較結果，至少就「近代化」進程而言，相較歐洲，中國無疑屬於「後進者」行列。限於篇幅，在此無法贅述整個近代化主要內涵，僅能就其涉及政治結構部分略作簡要說明。可以這麼說，主導整個所謂近代化進程的思考主軸乃是「競爭」的概念，這一方面源自於歐洲自中古末期封建解體以來，戰爭頻仍且始終無法（再度透過帝國結構）重建普遍秩序的現實，由此既使世界內涵始終維持著「動態且高度不穩定」的結構特徵，在無秩序之暗示下，也讓「自保」始終作為政治決策中的當急要務。據此，為提升所謂自我保存效能，首先在對外關係方面，歐洲國家被迫針對彼此日趨頻繁的互動聯繫建立了現代外交的雛型，亦即「常設使節」的制度，[\(註311\)](#)目的在減少誤判並爭取反應時間。至於在對內方面，則「現代國家」也跟著浮上檯面。[\(註312\)](#)

與過去的傳統政治單位相比，現代國家的最大特徵乃透過更嚴謹的結構設計，將過去大多僅具虛擬與象徵意義的治理形式，轉換為

更具實質效能導向之政治運作，以便回應前述的高度競爭要求。進言之，為使政治機器籌措更多資源來投入國際競爭行列，統治階層必須在確認他們得以收集必要資源的地理範圍（此即所謂領土）之後，其次確認其收集資源的對象（可在數字上被管理的人民），接著設法提升收集資源的行政能量（經過再造與功能重組以便獲致足夠的政府效能），最後，則透過制度設計（相對承認之主權地位），在由於無可迴避之競爭以致爆發大規模激烈衝突前，設法去維持體系暫時的穩定秩序狀態，這也是一六四八年西發利亞框架的努力方向。

由此可見，至少從政治層面而言，中國所以在近代政治演化進程中「淪落」為後進追趕者的被動角色，並非由於技不如人或思慮不周之類的因素，純粹是因為沒有「類似需求」的緣故。正如前述，透過相對隔絕的地理環境與早熟之帝國結構，即便再造帝國的努力未必都能心想事成，由於游牧民族入侵抑或王朝興衰更迭等，都未能真正動搖秩序基礎，結果既使中國（或東亞世界）得以長期存在著與歐洲迥異之相對靜態的環境內涵，從而限制了政治單位提升其治理效能的動機。[（註313）](#)這正是前面所論述，強調「秩序平衡」遠大於「利益平衡」之中國式戰略觀的認知基礎所在。

重點是，無論認知或制度發展都不可能是先驗性（metempirical）的，往往是在人群與其生存環境互動下，受「供需原則」牽引而被動地發展的成長過程。正是在歐洲進行全球性地理探索，以致於對歐洲以外地區與文明帶來「世界擴張效應」的前提下，加上此地區國家既未能透過對外擴張來解決內部競爭問題，甚至還因外交與軍備競賽導致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不斷深化體系內的危機意識感，[（註314）](#)從而一方面為了籌集必要資源因應危機，進一步強化了原有的帝國主義傾向，至於在其壓力下，其他地區（大部分第三世界行為者）若非完全屈服而成為其殖民地，便是在苟延殘喘的情況下，奮力進行多數最終都事與願違的自我結構改革，中國便是其中一例。

新思潮引導之結構轉型

歐洲透過全球性擴張在十九世紀中葉為第三帝國帶來的沉重壓力，雖確實從「需求面」提供了進行必要結構調整或轉型的誘因與動能，儘管如此，基於長期「自我正當性建構」的結果，讓中國很難由其心理慣性來個大轉彎，這也是何以出現「中體西用」式觀念掙扎的緣故。

無可否認，歐洲不僅透過工業革命，首度使其自中古時期以來在文明程度上超越中國，即便雙方交流直到十九世紀末依舊相當有限，中國在競爭中不斷屈居劣勢確為不爭事實。再加上愈來愈多知識份子前往西方，[\(註315\)](#)親眼目睹中國與歐美世界存在之一定發展差距，例如，一八七六至七八年駐英法公使郭嵩燾便表示對西洋「從未敢懷輕視之心，以吾心實見其不可輕視」，至於一八七八至九五年接替任職的曾紀澤，也「目睹遠人政教有緒，富強之有本，艷羨之極，憤懣隨之」，更別提在中國本土上的中外互動經驗，這些眼見為憑之實際感受都不斷經過累積與分享，逐漸轉化成為催促中國進行根本變革的動力。嚴格來說，即便遭受鴉片戰爭挫敗，並不代表此時歐洲發展程度便已明顯超過中國，但單單是展示撼動帝國之力，便讓天朝觀念有所動搖。

正如保守主義者經常援引《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一段話：「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近代中國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所受到時人的對待，可從一幅對聯內容看出：「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由此，不僅揭示出當時中國國內瀰漫的保守氛圍，甚至在一八六一年恭親王等關於設置「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的奏摺中，為求獲得保守派支持，也特別聲明：「俟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該衙門）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以符舊制。」可見變革阻力之大。就在此種情況下，清季中國也僅能極其緩慢但持續地啟動了它通往近代化目標的轉型進程。

從民族主義向民族國家邁進 有關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落後歐洲的原因，迄今多數人仍慣於由其「失敗的事實」出發，然後加以反省或詮釋，例如郭廷以便指出：「人家是一日千里的在邁進，我們是故步自封，孤陋寡聞，仍是吳下阿蒙。」[\(註316\)](#) 蘭迪斯 (David S. Landes) 的看法與此類似：「中國缺乏發現與學習的機制，沒有學校、研究院、學術交換場所，也沒有競爭、交換心得，以及吸收別人的知識來累積進步，更上層樓的想法若非很薄弱，就是根本不存在。」[\(註317\)](#) 徐中約則認為：「中國內部的腐敗和外來帝國主義的羞辱性掠奪，如同一對學生惡魔，給它帶來了長時期的衰落。」[\(註318\)](#) 此類幾近乎老生常談的論調，幾乎都只是短視淺見地將焦點放在「現象」上，完全無視於背後真正的「問題」所在。

正如個人在前面不斷追索「歐洲崛起」(Europe Rise)的過程，蒂利 (Charles Tilly) 曾指出，在一四〇〇年以前歐洲的世襲主義 (patrimonialism) 時期中，沒有任何國家存在現代意義的預算制度，[\(註319\)](#) 如同世界上其他地區 (包括中國在內) 一般，統治者都是透過稅收與貢賦來獲得財政收入。不過，隨著戰爭日趨頻繁，無論願意與否，政府一方面既被迫進行更密集的資源收集活動，為了保證籌措到足夠資源，並獲得人民支持以維繫政權存續，必要且更積極的普遍性精神動員亦不可或缺，此即近代民族主義 (modern nationalism) 的起源，[\(註320\)](#) 其主要目的在強化我者 (we group) 與他者 (the other) 的區隔，建立起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框架之出發點，並透過「社會達爾文主義」等後設性概念，[\(註321\)](#) 突出前述區隔之間的競爭與衝突必然性，然後藉由賦予政府擴權更高的正當性基礎，據此形塑出「強國家 - 弱社會」(例如王權至上或強化權威統治等中央集權機制) 趨勢的政治發展軌跡。

相對地，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自七世紀起逐漸完善之專業官僚體系，治理能力雖高於歐洲的貴族體制，但依舊明顯有限，甚至在第一帝國建立後，隨著帝國結構愈來愈趨成熟，具初步族群意識特徵的夷夏概念亦被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取代，從而使其習慣從更普遍的「天下觀」角度，來表述一個以帝國作為核心的世界秩序。即使在帝國更迭或無法成功再造帝國的時期當中，秩序穩定性雖不如三大帝國時期清晰，邊境安全威脅導致的危機感也讓某種程度的民族意識跟著萌芽，正如個人一再強調，尤其相較於封建解體過程中的歐洲，由於前述安全威脅尚不至於觸及核心生存利益，在世界主義始終作為主流的情況下，中國也就難以想像如同歐洲一般，由僅僅作為社會概念的民族意識，轉化成作為政治正當性基礎之民族主義的思想演進過程。當然，正因如此，可見社會進步往往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而非在「政策主導」下根據既定計畫與戰略目標去積極地達成，因此也就沒有所謂「故步自封」的問題。更何況，事實是中國的政經表現自中古至近代初期都較歐洲來得優秀，倘使中國真的長期不知進取，又該如何說明此一時期雙方對比呢？

很顯然，從「成敗論英雄」雖然相當自然，卻未必具邏輯性。

無論如何，正如中原文明在南北朝時期受到嚴重挑戰，以致在西元二九九年出現江統所提出「徙戎論」之類的族群主義言論一般，由於歐洲國家在第三帝國末期帶來的沉重壓力，「排外」浪潮亦很自然地成為重要的政治現象，[（註322）](#)非但在上層結構中成為清末保守派力量與民國時期以來民粹動員的口號基礎，更是十九世紀末以來，從義和團到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思想支撐來源。總的來說，某種意義上的生存危機導致近代中國也出現了類似歐洲現代民族主義思想發展，例如孫文便在《三民主義》第五講中聲稱：「長此以往，如果不想辦法恢復民族主義，中國將來不但是要亡國，或者要亡種。」至於「百年桎梏」（從鴉片戰爭到二戰告終）暗示之長期受壓抑處境，更助長了此種危機概念的滋生蔓延，從而奠下了中國由

「文化本位之傳統普遍性帝國」向更重視地緣政治關係之民族國家結構轉型的過程。[\(註323\)](#)

前述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結構發展所帶來更重要的影響，或許是自我認知核心的轉變。如同「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概念所暗示的民族主義信仰核心一般，新的「民族」單位取代「王室」成為新的最高價值所在，「救國」(民族國家)也取代「勤王」成為新的群眾動員正當性基礎。從歷史現實看來，由義和團運動的「扶清滅洋」到國民革命「救亡圖存」的口號焦點轉換，前述認同對象變遷不啻清晰可見。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前述，由於中國本來便擁有傾向集體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因此在執行認同對象抽換的過程中，阻力自然不會太大。不過，或許也正因为如此，所謂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發展也未必不是「換湯不換藥」而已，從某個角度看來(如同歐洲一般)，不過為少數政客提供了新的動員口號。

擺盪於從民粹到民主之間 在源自歐洲之現代民族主義在中國萌芽並不斷發展的過程當中，同時應予高度關注的，乃是此種思想在效果上呈現出來的「兩面性」特質。換言之，基於權力與義務的心理相對性，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民族主義雖讓統治者擁有集中權力的更高正當性，作為一種理性交換結果，由此被累積出來的新權力既具有「公益」(common good)性質(亦即目的必須被設定為滿足多數人利益)，[\(註324\)](#)相較過去之正當性來源(君權神授)，它不僅源自某種隱形契約，理論上也不能被任何個人或家庭所永遠保有。正如史威夫特(Richard Swift)所言：「民主制度通常與民族國家形影不離。」[\(註325\)](#)道理正是如此。儘管民主制度的發展時至今日仍未臻成熟，與其說民主乃是一種天賦價值，「兼併戰爭 - 民族主義 - 民族國家 - 民主政體」的發展邏輯或許更具有說服力，也更貼近歐洲的歷史發展真實面。

進一步來說，前述社會發展與制度演進交互影響前進的邏輯，隨後也被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加以發掘。

在歐洲國家企圖打開貿易門戶的沉重壓力下，中國出現了歷史上首度主張大規模學習外部文明的倡議與實際行動，此即一八六一至一八九五年的「自強運動」，或稱「洋務運動」。[\(註326\)](#)關於此一運動成果之評價，並非此處焦點所在。值得一提的是，與後來更重視「制度」改革之一八九八年「維新運動」、一九〇一至〇五年的「新政運動」，以及一九〇五至一一年的「立憲運動」比較起來，自強運動顯然主要聚焦「器物」層面（亦即所謂船堅炮利）罷了。儘管如此，隨著推動改革以求生存之需求日趨殷切，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既刺激了中國從更深層的制度面來思考戰爭失利原因，激發民族情緒與制度改革的聲浪，也在一八九七至一九〇〇年同時臻於巔峰，明顯可見的是，無論民粹式的義和團運動或菁英式的戊戌百日維新，目標都在於鎖定邁向自強的「捷徑」，但因共通點都在炒短線而未有長期思考，紛紛失敗乃可以想見。

尤其在制度變革方面，傳統王朝體制的行政效能顯然遭到徹底否定，取而代之的是邏輯上能提高「課責性」的議會政治。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國菁英階層對西方政體內涵的認識雖依舊極其模糊，所謂「議會救國論」或「議會萬能論」的思維方式亦不免過於一廂情願，甚或有些誇張，所以具說服力不過因為它們都是「強國們」正在使用中的產品，或許事實就可以說明一切。[\(註327\)](#)儘管如此，它未必代表某種全面共識，例如章太炎早在同盟會時期便公開聲稱「代議政體者，封建之變相，……選舉法行，則上品無寒門，而下品無膏粱，名曰國會，實為奸府，……故議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註328\)](#)但畢竟議會派出發點本即試圖以權力制約權力，以野心對抗野心，一方面以對人性的不信任作為基礎，且起碼議會政治總比少數異族統治來得好，這些都使其在帝國體制崩解終結後，成為建構民國時期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即便暫時不去深究一九一一年革命陡然成功的真實原委，由古希臘城邦民主雛型經驗與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看來，經濟水準與政治民主之間確有相當密切之關係。例如，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便指出：「經濟自由本身就是構成廣泛所謂自由的一部分，……經濟自由亦是達成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工具。」[（註329）](#)李普塞

（Seymour M. Lipset）也提到：「當人們收入愈豐厚，處於複雜而廣泛互賴的工作情況，教育程度提高，而且更易取得衛生及其他服務時，將更可能要求擴大政治自由。」[（註330）](#)由此所衍生出來的普遍觀點乃「民主的富裕理論」（The wealth theory of democracy），亦即強調先創造一系列有利民主發展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包括：市場經濟取向、重視容忍與妥協之文化、提升教育水準、高度都市化，以及強大而獨立之中產階級等。[（註331）](#)從這個角度看來，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只擁有約百分之五左右的識字率，不僅遠低於主要歐洲國家（例如法國為四成，德國更高達七成），甚至不如鄰近國家日本的將近三成，即便在百年後的一九四九年亦約略只有百分之二十，據此，不要說促進經濟發展，單單想讓一般民眾真正理解社會現實與艱難晦澀的政治口號，絕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要大家理性地去支撐一個新的政治制度。

正是在此情況下，透過數十年「西化」浪潮，中國在模仿歐洲政治發展過程中，最終只完成了「半套轉型」。更甚者，在形式民主與普遍民粹動員的交互作用之下，中國一方面陷入長期內憂外患的動盪時期，所謂轉型也一度只能原地踏步而已。面對不確定的自我（脫離帝制後該何去何從）與不確定的未來（兩次大戰與世界格局變遷），中國的下一步將如何走？我們又該如何去追蹤觀察呢？

[（註267）](#)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研究》（台北：里仁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一。[↑](#)

(註268) 布洛克 (Marc Bloch, 1886-1944) 為「年鑑學派」開創者之一，強調透過客觀比較方法，突出每一個社會的獨特處 (originality)，並藉由多領域視野共同勾勒出社會之完整面貌。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Lucien Febvre, *A New Kind of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Beacon Press, 1957).[↑]

(註269) 自一四九二年起，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 共進行過四次航行，分別是一四九二至九三、一四九三至九六、一四九八至一五〇〇與一五〇二至〇四年，其中，第一次登陸地點是巴哈馬群島，第三次航行才終於真正登上南美洲大陸。至於麥哲倫 (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 則在一五一九至一五二一年間進行人類首度環球航行的壯舉，但他本人於途中死於菲律賓。值得一提的是，這兩人都是在遭到葡萄牙拒絕後，最終在西班牙贊助下出發。[↑]

(註270) 英屬東印度公司也被稱為「可敬的東印度公司」(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HEIC) 或「不列顛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BEIC)，最初正式全名是「倫敦商人在東印度貿易的公司」(The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但有時也被稱為約翰公司 (John Company)，它是一個由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在一六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授予皇家特許狀，給予它在印度貿易特權而組成的股份公司，最初特許壟斷權為二十一年，但後來隨時間與環境變遷，竟從一個商業貿易企業變成印度的實際主宰者。[↑]

(註271) See Victor G. Kiernan,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European Attitudes to other Cultures in the Imperial Age* (New York: Serif Publishing, 1996).[↑]

(註272) 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Era, 1837-1901)，一般被認為是英國工業革命和大英帝國的發展巔峰，事實上即維多利亞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統治時期，此階段也奠定英國作為日不落國的霸權地位。[↑](#)

(註273) 在明代和清代前期，「佛朗機」一詞也曾經被用來指稱一種銃炮。明代耶穌會教士艾儒略(Juliano Aleni, 1582-1649)在《職方外紀》曾提到：「以西把尼亞(西班牙)東北為拂郎察(按，指法國，源于法蘭克人一詞)，因其國在歐邏巴內，回人概稱西土人佛郎機，銃炮亦沾襲此名」；事實上，由於中國早期與歐洲接觸有限，此類名詞主要來自阿拉伯世界穆斯林的轉介，所謂「佛朗機」指的是組織十字軍主力的法蘭克人。儘管如此，《明史·外國傳》又記載：「佛郎機，近滿刺加。正德中，據滿刺加地，逐其王。」亦即把佛郎機誤認為是滿刺加(麻六甲)的鄰國。其後，佛郎機一度被用於專指首先來到東方的葡萄牙，在康熙年間兩次(一六六八與一六七二)覲見中國皇帝時，官方記載對方為「西洋國」，雍正(一七二六)與乾隆(一七五二)時期，則被漢譯作「博爾都噶爾」，首度使用了葡國人的自稱「Portugal」。[↑](#)

(註274) 例如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便於一六七〇年決定在凡爾賽宮內興建一座「中國宮」，整座建築的裝修都是令人眼花繚亂的中國風格，宮內簷口楣柱、牆角四邊屋頂都貼著豔麗瓷磚，室內到處也都擺上中國式的瓷花瓶、綢帳與金流蘇。有關中國文化對洛可可風格的影響，亦可參照史景遷(Ja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台北：時報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頁一五〇至一五一。[↑](#)

(註275) 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著，毛鳳支譯，《停滯的帝國》(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三四至三五。[↑](#)

(註276) 門多薩 (J.G. de Mendoza) 撰，何高濟譯，《中華大帝國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門多薩是一名西班牙傳教士，本人並未到過中國，本書於一五八五年首版於羅馬，一八五三年由斯湯通 (S.G. Staunton) 英譯後在倫敦出版，書名為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 of，內容雖不盡真實，但非全然杜撰。[↑](#)

(註277) 法蘭克 (A. Gunder Frank) 著，劉北成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一五九。[↑](#)

(註278)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A History of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Frederic Wakeman, Jr., "China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Late Imperial China*, 7:1 (1986), pp.1-23; Dennis Flynn and Arturo Giraldez,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6:2 (1995), pp.201-222.[↑](#)

(註279) 莫臥兒帝國 (Mughal Empire, 1526-1858)，是帖木兒 (Timur) 後裔巴卑爾 (Zahir ud-din Muhammad Babur) 南下入侵印度建立的帝國 (或譯蒙兀兒)，「莫臥兒」本意即為「蒙古」。在其全盛時期，領土幾乎囊括整個印度次大陸與阿富汗。Geoffrey Parker, ed., *The Time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5), p.206.[↑](#)

(註280) 佩雷菲特 (Alain Peyrefitte) 著，《停滯的帝國》，頁三。為打破中國的貿易限制，英國在一七八七年首度派遣加茨喀特 (Charles Cathcart) 為使節來華，目的除聲明英國並無領土野心之外，也希望雙方互派使節以改善通商情況，並要求中國給予一個可供儲貨加水的島嶼；但因使節病死途中而無功折返。此處所指的是 一七九二年，英國以乾隆八十壽誕為由，派遣馬戛爾尼 (George

Macartney) 來華商談貿易問題的過程；由於馬戛爾尼拒絕行跪拜禮，乾隆對其要求也表示完全拒絕。[↑](#)

(註281) 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著，賈士蘅譯，《帝國的年代》(台北：麥田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頁二六。[↑](#)

(註282) 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頁九至一〇。[↑](#)

(註283)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Vol.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p.3.[↑](#)

(註284) 參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頁四四；卷二十四，頁一一。[↑](#)

(註285) 參見：黃鈞宰，《金壺七墨》，[□浪墨□](#)，卷四，頁三；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編》，卷三，頁八。[↑](#)

(註286) 從另一個問題角度來看，由於飲茶文化自十八世紀起逐漸在英國成形，茶葉既佔其自中國進口大宗，甚至英國在一八一〇年占中國茶葉出口份額已高達八成以上，參見George M. Trevelyan, English Society Hist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6), pp.400-402。尤其在一八三二年通過貿易改革法案後，為弭補由於茶葉貿易所帶來的巨額貿易逆差，鴉片也就成為英國平衡雙邊貿易的重要工具。[↑](#)

(註287) 大運河基本上是具有高度政治意義的後勤補給線，又稱為「貢河」或「運糧河」；自第二帝國時期以來，隨著經濟重心南移，它也在中國東部地區構築了一條以運河為軸心，長達一千八百公里的運河經濟帶。[↑](#)

(註288) 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長沙：岳麓書社，二〇〇三年)。↑

(註289) 參見《清實錄》，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

(註290) 在部分外國學者眼中，中國的「閉關政策」(Lock-door Policy)經常與日本德川時代的「鎖國政策」相提並論，同時被歸入傾向「孤立」(isolation)政策之列；姑且不論中國與日本的對外政策內涵其實有著相當的歧異性，無論如何，這種說法實不無疑問。從中國在東亞擁有的「區域性霸權」地位，以及其基本國際觀趨勢看來，所謂隔離傾向還不如說是「選擇性的篩檢動作」，或許來得更適當些。參見蔡東杰，《中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五六至五七。↑

(註291) 麥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曉鷹、馬德斌譯，《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頁三六至三七。此處歐洲包括二十九個西歐國家與十個東歐國家，由此可以窺見在工業革命之前，東西方發展對比的真實情況。↑

(註292) 與明朝主要由宗室藩王、勳臣貴戚和縉紳官僚透過「政治暴力」掠奪比起來，清朝的土地兼併激烈情況雖稍低一些，自乾隆末年起仍普遍出現「田連阡陌」現象；呂景琳、郭松義主編，《中國歷代經濟史：明清篇》(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六二五至六二六。↑

(註293) 費正清等編，《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台北：南天書局，一九八七年)，頁一三二至一三七。↑

(註294) 太平天國(其中「天」字的兩橫上長下短；「国」字內為「王」字)是十九世紀中葉爆發的一場大規模武裝反政府運動，

一八五〇至五一年間在廣西省發起，後建國號為太平天國，並於一八五三年定都天京（南京），其勢力影響範圍曾達十五個省份，攻克過六百餘座城市，最後在一八六四年因天京陷落而覆滅。由於主張恢復蓄髮傳統，故被清政府稱作「長毛」，又因起事者多來自兩廣地區，故亦被稱為「粵匪」。↑

（註295）阿諾德（David Arnold）著，王國璋譯，《地理大發現》（台北：麥田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頁二二。↑

（註296）Charles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ierre Chaunu, *European Expans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House, 1979); John H.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Discovery, Exploration and Settl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Richard Holmes, *Age of Wonder: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Beauty and the Terror of Science* (New York: Vintage, 2010); Glenn J. Ames, *The Globe Encompassed: The Age of European Discovery* (New York: Prentice Hall, 2007).↑

（註297）費南德茲 - 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著，黃中憲譯，《大探險家：發現新世界的壯闊之旅》（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二〇一〇年），頁一四七。↑

（註298）這波地理發現運動雖以海洋擴張為主軸，但一般也忽略了俄羅斯從北亞經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在跨越白令海峽後，抵達北美大陸北部的陸上擴張活動。↑

（註299）施泰因（Werner Stein）著，董光熙譯，《人類文明編年紀事：科學與技術分冊》（北京：對外翻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六三至六四。↑

(註300) 參見季平子,《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台北:雲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三一至三三;張箭,《地理大發現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二年),頁三三至四〇。當然,包括相關航海與造船技術的進步,葡萄牙民族國家發展的結果,以及與土耳其為首之伊斯蘭勢力的較勁等,都影響到這波歐洲對外的大規模擴張活動。[↑](#)

(註301) 杉山正明,《大漠:遊牧民族的世界史》(台北:廣場出版,二〇一一年),頁三四八至三五八。[↑](#)

(註302) 明朝雖未正式下令銷毀相關航海資料,事實是在下西洋結束不到半個世紀後的憲宗(一四八〇年代)時期便發現資料已大量亡佚。E.L. Dreyer, *Early M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20.[↑](#)

(註303) 費南德茲 - 阿梅斯托著,《大探險家:發現新世界的壯闊之旅》,頁一五一。[↑](#)

(註304) 達爾文(John Darwin)著,黃中憲譯,《帖木兒之後:一四〇五至二〇〇〇年全球帝國史》(台北:野人出版社,二〇一〇年),頁一二四。[↑](#)

(註305) 大西洋貿易是指十六到十九世紀時期,在環大西洋地區,由歐洲人將西非人民作為廉價勞動力帶到美洲殖民地,然後將其勞動所得(礦場與種植園)運回歐洲的一種貿易過程。在長達四百年的黑奴貿易中,估計從非洲運到美洲的奴隸約為一千兩百萬至三千萬人左右。至於其與歐洲的關係也被描述成一種三角貿易,亦即先將販奴船載著「交換」奴隸用的槍枝彈藥和廉價消費品,從歐洲港口航行到西非海岸,在此地交換大批奴隸後,再橫渡大西洋駛往美洲,最後則將美洲用奴隸獲取的原料和金銀運回歐洲。一次完整的三角航程需要六個月,獲利率約兩倍至十倍,由此一方面為歐

洲帶來源源不斷的財富，也為工業革命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Hugh Thomas, *The Slave Trade: the 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440-1870*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Lisa A. Lindsay, *Captives as Commodities: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New York: Pearson, 2007).[↑]

(註306) 高岱、鄭家馨，《殖民主義史：總論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四二。[↑]

(註307) 事實上，漢人的「胡化」亦不容小覷，且自東漢末年便已展開，例如《後漢書》提到：「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由此上層階級乃競相仿效，於是興起一股胡化之風，此後不僅在五胡十六國時期達到高潮，至隋唐之後，某些原非中原典型的文化內涵，更被內化而接受為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註308) 李志剛，林則徐對西知之探求與基督教士對西知之傳播

，收於林啟彥、朱益宜編，《鴉片戰爭的再認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一九一至二〇二；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一七七；季平子，《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頁一四〇。[↑]

(註309) 參見《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頁四三二。[↑]

(註310) 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乃是十九世紀末中國思想界的流行語，正如梁啟超所言，此語雖是「張之洞最樂道之」，實則形成「舉國以為至言」之局，亦即晚清中國思想主流。張之洞認為：「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但其中仍有本末之分。[↑]

(註311) 近代常駐使團 (permanent envoy) 制度的想法雖首創自威尼斯人，但第一個常駐公使團乃是一四五五年米蘭派往熱那亞的使節團，接著薩伏依也在一四六〇年向羅馬派遣常駐代表，至於威尼斯則在一四九六年將此發展為普遍制度，一般也被認為是現代外交的開端。[↑](#)

(註312) Douglas C. North and Robert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Joseph R. Strayer,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註313) 除了戰國時期外，若中國歷史上出現強化治理效能之發展的話，大多數若非用以因應「君權與相權競爭」的體制內部因素，便是來自回應治理規模（主要為人口成長壓力）擴大的挑戰。[↑](#)

(註314) Richard N.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1919-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E.H. Carr, ed. by Michael Cox,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Eric D. Brose, *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World War On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註315) 中國在一八六六年首度派遣同文館官員出洋考察，一八七二年又派出史上首度留學生三十名前往美國留學，被稱為「中華創始之舉，抑亦古來未有之事」，其中，一八四七年首位自行前往美國留學的容闈乃重要推手（首位赴美留學的日本人則是一八六七年的新島襄，他在返日後於一八七五年創設同志社學校）；儘管官派留學計畫在一八八一年被迫中止，已然開啟一波出洋留學風潮。至於一八七六年的郭嵩燾則為近代中國首位駐外使節。[↑](#)

(註316) 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收於《近代中國的變局》（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頁一〇。[↑](#)

(註317) 蘭迪斯 (David S. Landes) 著，汪仲譯，《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台北：時報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頁三一八。[↑](#)

(註318)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xxi。[↑](#)

(註319) 蒂利 (Charles Tilly) 著，魏洪鐘譯，《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九九〇至一九九二年》（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二〇〇七年），頁八二至八三。[↑](#)

(註320) 請參見余建華，《民族主義》（上海：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一五至一八；Edward Mortimer and Robert Fine, *People, Nation, and State: The Meaning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John Hall, "Nationalism: Classified and Explained," in Sukumar Periwal, ed., *Notions of Nationalism*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0-15.[↑](#)

(註321) 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 是將英國學者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82) 所提出「進化論」中的「物競天擇」概念，應用於人類社會的一種理論。最早提出相關概念的是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史賓賽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至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最早則出現在美國學者霍夫施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 於一九四四年出版的《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書中。無論如何，此概念曾被用來解釋社會不平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並捲入優生學的爭論。[↑](#)

(註322) 參考廖光生，《排外與中國政治》(台北：三民書局，一九八八年)；丁韋良(William A. P. Martin)著，沈弘譯，《中國覺醒》(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二〇〇〇年)，第三十一章。[↑](#)

(註323) Joseph B.R. Whitney, *China: Area, Administr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Ishwer B. Ojha,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the Diplomacy of Cultural Despair*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註324) 卡諾伊(Martin Carnoy)著，《國家與政治理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頁一二至三八。[↑](#)

(註325) 史威夫特(Richard Swift)著，《民主不民主：直擊民主政體》(台北：書林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一〇三。[↑](#)

(註326) 儘管所謂「自強運動」並沒有確切的起迄時間，根據一般學術共識，多數人都認為它起自一八六一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終於一八九五年對日本甲午戰爭失敗為止。楊家駱主編，《洋務運動文獻彙編》(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三年)；李恩涵、張朋園等，《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自強運動》(台北：食貨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註327) 請參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頁六二五至六二六。所謂議會救國論大約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年間，由於四波國會請願活動達於高峰，請願代表甚至成立「請願速開國會同志會」以專事請願活動。[↑](#)

(註328) 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四六四至四八三。[↑](#)

(註329)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8.[↑](#)

(註330) Seymour M. Lipset, Kyoung-Ryung Seong, and J.C.Torr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36 (1993), p.166.[↑](#)

(註331) Abbas Pourgerami,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n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123.[↑](#)







趨勢：持續變遷中的中國與世界

回首百餘年以來中國對外關係的發展，真有些眼見它「樓塌了」，又見它逐步「起高樓」的強烈對比。正如甘迺迪（Paul Kennedy）所言：「一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不斷變化的，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各國國力的增長速度不同，其次，則是技術突破和組織形式的不同。」儘管他對於歷史上霸權興衰的解釋其實未必客觀，國家之間相對權力地位經常處於動態變遷狀態確為不可否認之事實。例如，中國雖慣常自詡（或被認定）是東亞區域霸權，但歷史告訴我們，無論「五胡亂華」後帶來的數百年大分裂、契丹與女真的長期侵擾，乃至蒙古與滿清陸續終結漢族的統治地位等，中國確經常扮演了被侵略的消極弱勢者角色。換言之，本書主要目標便在於設法透過回顧性的深入探討，希望藉由「客觀」與「自省」所提供的理性，脫離「中國中心」傳統且不必要之主觀論點，以便更清楚地檢視中國決策者的心理背景與治理過程。至於本章則希望將焦點轉至二十世紀，經由釐清「中國崛起」相關概念以預視其未來發展。

歷史演化之起承轉合

自十九世紀以來，在歐洲透過推動全球化進程所提供的「引力」下，中國一方面抗拒失敗地被捲入這場歷史漩渦中，更面臨著一場由外（制度結構）到內（心理認知）的徹底轉型進程。首先在外貌方面，由於一九一一年革命「成功」，導致長達兩千年之傳統世襲主義帝制框架崩解告終，無疑是最具震撼感與象徵性的轉捩點；至於在內部心理歷程方面，引入現代民族主義與大規模學習西方運

動，自然相當引人注目，由於信心崩解引發從極左到極右全面「崇洋媚外式」自我否定，亦不啻史所未見。

值得注意的是，歷史永遠在人們不經意時來個大轉彎。

正如自視處於天朝盛世、睥睨萬邦的第三帝國，完全無法察覺一七九二年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之象徵意涵，及其所暗示東、西方之間正歷經潛在「軸線翻轉」的現實一般，在十九世紀臻於全球影響力巔峰的歐洲，也很難想像出戴維斯（Norman Davies）所指出，籠罩著二十世紀歐洲之一股「野蠻陰影」（意指隨後爆發的兩次毀滅性世界大戰），以及在該世紀下半葉所瀰漫「歐洲已不再重要」的心理感受。[（註332）](#)隨著二次大戰終結，其結果是，「十九世紀時的幾個主要強權，例如英國、法國、德國，如今只有當它們願意將自身利益共同彙聚在一個整體性的歐洲共同市場上時，才有資格稱得上是強權。」[（註333）](#)取而代之的，一度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一八三五年鴉片戰爭陰霾逐漸籠罩在中國頭上時提出的預言，「現時世界上有兩個偉大民族，……我指的是俄國人與美國人，兩者都神不知鬼不覺地就成長起來，當人類將注意力放在別處的時候，他們突然躋身到了各國的前列。……所有其他民族，彷彿都已達到它們的天然極限，但這兩個民族卻仍然在生長。」[（註334）](#)

前述高瞻遠見儘管在冷戰時期有了神奇應驗，最終美蘇兩極對抗格局仍隨著二十世紀結束而告終。接下來如同喬飛（Josef Joffe）在二〇〇六年的描述：「美國的部隊無論從訓練、火力或機動性看來，都是無人企及的；在經濟方面，美國不僅繼續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甚至它的規模還幾乎等於日本這個緊追在後之追趕者的三倍；再者，如果有所謂全球文明的話，美國的影響力也未必僅表現在電影、流行音樂或速食上而已，……更別說使用者高達十四億人以上的全球最主要官方語言，也是英語。……總而言之，美國是名副其實的超級強權。……無論最後結果是好是壞，它都將主導接下來半

個世紀的全球舞台。」[\(註335\)](#)顯然，站在新世紀起點的美國無疑堪稱傲視群倫。只不過，誰也沒想到重擊隨後突然而來，此即二〇〇七年的次級房貸風暴，以及翌年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海嘯。

從某個角度看來，近代歷史變遷發展始終跟著工業革命提供之社會轉型動能，而在不斷地「加速」當中。對此，除了迫使所有研究者避免輕率地去「蓋棺論定」之外，持續地觀察、歸納與思索或許是唯一窺視真相的道路，而本章也試圖再次檢視近數十年來歷史軌跡的關鍵所在。

一段非朝代的朝代史歷程 儘管中國的敘史方式，傳統上可分為正統朝代史（例如各朝之官修正史）與通史（無論是紀傳體的《史記》或編年體的《資治通鑑》）兩大類，其中，以「朝代」作為主要紀錄單位的前者，不啻是主流所在。由於清朝最後一位皇帝在一九一二年正式宣布遜位並交出政權，[\(註336\)](#)至少第三帝國可被認定劃上句點，但自此開啟的新階段究竟應如何被看待，則迄今依舊存在諸多爭議。

對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被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而言，一般被稱為「中華民國」時期之前一政治階段的中止，當然是具有充分政治正當性的觀點，隨著兩岸外交競賽在一九七一至七九年間似乎明顯「勝負已分」，在劍橋大學出版社主導的《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系列於一九八三與一九八六年分別出版了《中華民國史》上、下兩卷，並將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確認為其斷代時間後，儘管在台灣一隅仍然有其正統性堅持，[\(註337\)](#)國際學界關於此一問題的爭辯，似乎也跟著蓋棺論定沉寂下來。在此，本書雖不擬加入此場論戰當中，但因釐清所謂「中華民國」的「歷史性定位」，對於延續前述對於中國歷史發展脈絡的重新整理，確有其關鍵意義，在此還是提供若干個人淺見以供參酌。

個人認為，所謂中華民國時期（至少是一九一二至四九年間）其實只是一段「非朝代史」（non-dynastic history）進程。

儘管過去中國歷史上所存在的「朝代」，未必完全符合「現代國家」關於人民、土地、政府與主權等規範性定義（尤其是主權部分），不過，即便並非屬於統一王朝（例如三國、南北朝、五代等），至少也應維持相當之中央集權特質才是。相對地，徐中約雖然指出：「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共和國成立，其間共僅有八十三天，這樣迅速的勝利在世界上其他任何的偉大革命中，都是罕有其匹的」，[（註338）](#)但事實是，從革命透過「各省紛紛響應」獲致最終成功看來，滿清第三帝國雖確實自一九一二年起終結，取而代之的卻是中國立即陷入分裂的局面。在此期間，袁世凱不過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一度擔任「天下共主」角色，其地位與秦漢交接之際的項羽其實相距不遠（儘管還是略高一些，至少他曾擔任名義上國家元首，甚至稱帝）。

更甚者，正如謝里登（James E. Sheridan）所言：「在民國時期，舉凡地方性和地區性，以至全國規模的長期和短期的武裝衝突，……有數十百次之多。……北京政府不過只是正統的象徵而已。」[（註339）](#)在此期間，不僅數度同時出現兩個以上「自稱」中央政府者，[（註340）](#)即便中國國民黨透過一九二六至二八年間的「北伐」，[（註341）](#)企圖說服各界接受中國已然「統一」的政治假象，與戰爭前夕全國軍閥割據的現實相比，這場軍事行動的結果不過削弱了一個軍閥派系（吳佩孚領導的直系）而已，不但其他軍閥依舊各安其位，甚至還出現兩批新的割據勢力（國民黨的黃埔系與共產黨的蘇維埃系），至於主要的政治變化，僅僅發生在象徵核心的轉移上，亦即從「北京時期」變成所謂的「南京時期」。

可以這麼說，近代中國分裂的源起其實可溯及清末時期，在太平天國戰爭開啟地方分權自主性（包括徵兵、組織軍隊與收稅管理

權)之後，[\(註342\)](#)多頭馬車式的自強運動(包括湘淮軍集團間的衝突)既昇高了此種潛在分裂傾向，八國聯軍時期的東南自保運動更提供了決定性發展，直接影響日後「各省紛紛響應」的革命結果，以及在袁世凱死後一觸即發的軍閥混戰。[\(註343\)](#)此後，整個政治分裂態勢不僅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才被真正地統一起來，相對地，正因中國在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間根本缺乏任何有效的中央集權形式，這也是它很難被接受是個「朝代」的緣故。不過，若果真如此，接下來衍生的問題便是：如果中華民國在一九一二至四九年間可能「根本不存在」，那麼它迄今為止的「存在感」到底從何而來？我們又該如何客觀地去看待這個歷史階段呢？

在此，我們可以先回答第二個相對比較簡單的問題。

正如從西元前二〇九年陳勝與吳廣起兵後，劉邦雖於西元前二〇二年稱帝，但直到西元前一九五年消滅第七個異姓王(指盧縮，劉邦也於同一年去世)後才重新鞏固統一局面，秦末共陷入約十五年的混亂分裂狀態。同樣地，隋末動盪持續了約十一年(自六一三年爆發大規模叛亂起，唐高祖李淵於六一八年稱帝，直到六二四年左右始完成全國統一)，北宋花了十九年結束五代分裂(從宋太祖趙匡胤於九六〇年「陳橋兵變」後稱帝，到宋太宗於九七九年攻滅北漢)，元末動亂長達三十年以上(一三四一年左右爆發普遍性農民起義，朱元璋在一三六八年正式稱帝，直到一三七二年才結束與蒙古的主要戰役)，至於清朝也用了近二十年時間統一天下(若不計算一六三一年起兵反叛的李自成，從一六四四年順治入關起算，持續到一六六二年南明永曆帝被殺，鄭成功亦於同年去世；若計入一六八一年結束的「三藩之亂」則耗時更久，將近四十年)。換言之，除去長期分裂不算，中國的朝代之間本來就罕有「無縫接軌」情形，[\(註344\)](#)亦即總是要花些時間去重新完成政治整合工作，何況是面對著由於帝國崩解帶來的全面性動盪，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間也是如此。

至於這一段本即屬於朝代更迭的過渡期，何以目前也被視為是個朝代，原委固然可能由於缺乏「歷史縱深」的短視效果所致，更重要的，或許還是中國被捲入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體制化」效果。進言之，中國在十九世紀末被動加入歐洲所領導之全球體系結構當中，並非只是一種抽象認知而已，從具體面而言，它也反映在中國接受了國際法規範上。根據由主權概念所定義，並依條約內容進行互動的國際關係，每個國家單位既都被賦予且擁有「單一主權」，同時也只有跟擁有主權代表性之單位所簽訂的條約才具有國際法效力。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冷戰時期出現所謂「分裂國家」（divided nation）現象與理論以前，[（註345）](#)國家由於內戰以致出現「主權分裂」或「代表性不確定」等狀況始終受到忽視（迄今仍舊如此）。為了單方面追求行動正當性起見，自歐洲乃至美國等西方國家往往習於主觀性地逕行認定主權歸屬，以便維護其既得利益。換句話說，無論是北京或南京政府，都不過是歐美國家所認定「在國際法規範下，可代表中國簽約的談判對象」罷了，[（註346）](#)只要自身既得權益有人承認，至於它是否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國家」，跟這些西方列強一點關係也沒有。

全球化的頓挫：從新帝國主義到冷戰 無論如何，就在中國掙扎於作為一個「國際法上的國家」，以及面對「朝代更迭過程中之過渡分裂時期」的尷尬處境時，原本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結構也經歷了一段天翻地覆的歷史轉折變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一九一四年，以歐洲為主角，起自十五世紀末的地理發現運動，並由於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來臨而陡然加速的所謂「全球化」進程，表面上似乎正處於其最輝煌的時刻。此時歐洲大陸擁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獨佔國際貿易額六成以上，並控制著地表陸地面積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其中，大英帝國的版圖達到其本土面積的一百四十倍以上，比利時與荷蘭分別控制著

大於其本土八十倍與六十倍的海外殖民地，[\(註347\)](#)整個歐洲的國民生產總值從一八五〇年到一九〇〇年的半個世紀中，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由於此種令人注目之飛躍進步，美國《紐約時報》一九〇〇年元旦社論也獻上如下預言與祝福：「那即將到來的輝煌世紀，將卸下窮人身上的重擔，掃除所有的不幸與謬誤，並讓天使所頌讚的和平仁善如雪花飄揚大地，灑落在那些爭戰對立的國家中。」

在世紀之交的這一夜，歐洲各處迴盪著鐘聲，港邊輪船響起汽笛，到處都充滿了歡天喜地的慶祝氣氛。為未來發展擁有無比樂觀的想法，儘管反映出當時國際政治的部分現實與輿論共識，歷史顯然與此完全相反。接下來的二十世紀，非但堪稱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世紀，全面大戰的爆發也幾乎將歐洲的全球地位從雲端推入谷底。

從另一角度看來，自十五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葉，歐洲雖無疑是所謂全球化最主要的推手，但情況在一八七〇年代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出現後便有了不同。正如貝格哈恩（Volker R. Berghahn）所言：「儘管歐洲人長期統治著海外領土，直到一八七〇年代以前，占支配地位的乃是非正式帝國以及為了貿易及經濟剝削目標而對他國進行間接滲透之原則，在此之後，則開始了直接占領和統治的正式帝國時代。」[\(註348\)](#)正是海外擴張從原先各自努力轉為彼此激烈競爭之後，在高度不安全感的籠罩下，歐洲人一方面在心理上出現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新概念，至於在實質政策方面，「瓜分」也取代自由主義導向的「開放」成為主軸所在，從而為全球化進程踩了煞車。

對中國來說，上述結果必須從兩個方面同時觀察：首先，新帝國主義發展加上一八九五年對日本甲午戰敗的自我負面證明，立即讓中國在一八九六到一八九九年間陷入所謂「瓜分風潮」（正確說是勢力範圍劃分風潮）當中；[\(註349\)](#)其次，這波國際壓力表面上雖似乎迫使中國瀕臨崩解邊緣，美國隨後推動「門戶開放政策」的發

展，[\(註350\)](#)不啻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且不論英國是否為該政策始作俑者，[\(註351\)](#)所謂門戶開放其實僅是美國「單方面發動之多重雙邊外交諮詢」而已，至於被徵詢各國所以不嘗試積極捍衛它們剛剛爭取到的排他性權益，或許亦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從一八九〇年俾斯麥下台後，在歐洲掀起的一股外交與軍備競賽浪潮看來，儘管第一次世界大戰未必在各方意料之中，但在十九世紀末各主要國家緊鑼密鼓積極備戰的刺激下，正如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所言：「第一次大戰爆發之真正令人驚訝之處，……在於它居然拖延許久才發生。」[\(註352\)](#)正是在此種情況下，一方面拖緩歐洲落實控制其所攫取勢力範圍（包括中國以外地區，例如近東與非洲）的能量，更甚者，中國既身處所謂「遠東」（Far East）地區，[\(註353\)](#)亦暗示它位於歐洲全球擴張的「強弩之末」，因此得以在影響遞減的保護下得以免於被真正瓜分。

進言之，由於新帝國主義激發的「對抗」情緒，各國乃紛紛透過劃分勢力範圍而形成某種彼此隱性隔離態勢，從而如同前述一般阻緩了全球化的發展。接著，兩次世界大戰不僅未能消耗掉這種對抗氛圍，在美國推出全球「圍堵」戰略後，[\(註354\)](#)更促使彼此的隔離朝向顯性化推進。

值得注意的是，對中國而言，近百年來以歐洲為主要舞台的這場大國權力較量，首先一定程度抵銷或減弱了清末以來「世界擴張效益」所帶來的地緣壓力，歐洲各國為維持其既得利益而在遠東地區進行的「動態權力平衡」與「集體制衡行動」（主要針對新興強權日本，並以一九二一至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為高峰），亦使中國在第三帝國崩解後得以繼續維持大體穩定之內部秩序（與過去不同，此時各地割據之軍閥多數具有國際依賴性），[\(註355\)](#)並讓它獲致在時代夾縫中求生存的機會。從某個角度視之，此種夾縫狀態在冷戰時期可謂更加明顯。例如，儘管中國在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建政初期面臨計劃經濟實驗（三面紅旗與大躍進運動）失敗的衝擊，一九六六至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又帶來全面性內部政治社會動盪的挑戰，仍能藉助有利國際環境而客觀地繼續維持生存，便是一個特殊結果。

後冷戰時期的世界與中國 自《韋氏字典》（Webster Collegiate Dictionary）首先在一九六一年納入「全球主義」（globalism）這個新辭彙後，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或全球化（globalization）便分別自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起，開始成為一種分析情勢之流行措詞，[（註356）](#)至於其內涵，最少可從三種角度來理解：[（註357）](#)首先，以大前研一等人為代表的「超全球主義論」認為，[（註358）](#)作為傳統國際行為者的民族國家，其所擁有的權力與權威正逐漸轉移給全球性的制度與公司，[（註359）](#)致使國內政府在社會福利與經濟調控方面的獨立功能大打折扣；[（註360）](#)其次，持「懷疑論」者指出，這波全球化其實可追溯回一八六〇年代，主要是因現代工業技術普及帶來之經濟國際化風潮，不過，其結果雖拉近了國家的距離，政府效能並未因此遭到削弱，甚至國際經濟在二十世紀末的開放度還不及一八七〇至一次戰前；[（註361）](#)最後，「轉型論」則認為，全球化乃是現階段重塑世界秩序的主要動力，換句話說，處於目前體系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制度正被賦予一股遽變的力量，但其變遷之最終型態仍有待觀察。

其實，如同懷疑論者所言，當前全球化既以人群之間的經貿交易往來為基礎，也由歐洲在十五世紀末的地理發現浪潮所啟動，二十世紀末所以「重新」感覺到一股全球化風潮，正如前述，乃因西方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間，陸續透過新帝國主義競賽與兩極圍堵架構以致阻緩了全球化進程的緣故。至於從一九七〇年代「和解」時期來臨到一九九〇年代蘇聯集團最終崩解，[（註362）](#)不僅解除了前述煞車作用，亦再度啟動了新一波進程。

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再度面臨了世界擴張效應的挑戰。

在中國歷史上三次類似經驗當中，首先，奠定此後兩千餘年中華帝國與東亞體系地理基礎的秦朝，不啻是當時世界擴張的主要動力來源；其次，面對蒙古勢力打通歐亞通道所帶來的第二次世紀擴張效應，明朝一度採取了較積極之因應作為（一四〇五至一四三三年間的鄭和下西洋），儘管後來轉趨消極退縮，但在停止出海二十年後，鄂圖曼土耳其於一四五三年滅亡東羅馬帝國，並截斷東西通道之舉，既抵銷了此波世界擴張的壓力，也讓滿清趁機重建第三帝國；接著，則是歐洲的全球擴張在十九世紀對清朝帶來的地緣挑戰，明顯可見，即便出現自強與維新運動等改革努力，中國的對應大體仍傾向消極被動，至於結果也如同眾所周知，最後以帝國崩潰瓦解告終。幸運的是，由於主導此波世界擴張的歐洲，自十九世紀末起陷入自我隔離甚至彼此爭鬥的亂局（從兩次大戰到冷戰），加上中國所處之地緣優勢（居於歐洲之投射末端），於是讓它得以在格局縫隙中覓得一線生機。

無論如何，面對自二十世紀末以來掀起的一股全球化浪潮，在重新推動以「開放整合」為主的世界擴張效應推波助瀾下，亦再度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一九七二年訪華乃關鍵轉捩點。[（註363）](#)與前面幾次經驗相比，中國雖然並非此次擴張的主要推手，但也未陷入消極被動的困窘局面，而是有機會透過更客觀且具自主性的立場來選擇對策。從某個角度看來，此際中國的地緣環境背景雖與明朝大異其趣，決策環境則或部分類似，亦即都存在著選擇的可能性。由鄧小平領導的中國不僅在經濟改革方面採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途徑，在處理對外關係方面又何嘗不是如此；不過，正所謂「發展才是硬道理」，可以想見，中國仍將以傳統上「先內後外」的政策基礎來面對新的全球局勢挑戰。

當前中國崛起的背景與發展

根據美國丕優調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People & the Press）在二〇一一年民調結果顯示，儘管有三分之二受訪者認為美國仍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軍事強權，選擇中國者只有百分之十六，但有近半數美國人同意，中國已然凌駕美國成為當今全球第一經濟大國，認為美國還獨佔鰲頭者只占百分之三十一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與二〇〇八年調查結果相比，當時美國人心目中的中美經濟地位與此時大不相同，認為美國是全球第一經濟大國者占四成，認為是中國者只近三成左右。大體言之，前述發展既反映出全球金融海嘯帶來之結構性衝突，以美國作為全球現任霸權的地位而言，此種大眾想法之變遷趨勢也相當具象徵意義，同時直接突顯出「中國崛起」（China Rise）議題發展的後續效應。根據該中心在二〇一八年針對二十五國二萬六千人進行民調的結果，相較只有三成認為美國的世界角色比十年前更重要，有七成受訪者則同意中國此時的角色比十年前更重要，也是一例。

相較第三帝國末年遭逢之窘況，今日中國確實有所不同了。

中國崛起之事實 正如奧森柏格（Michel Oksenberg）指出的：「……由於蘇聯解體與冷戰落幕，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形成的這個（東亞）區域體系，終於出現一群國家和另一群國家間沒有被分割的現象。……中國不必在到處是衝突的背景中考慮國防問題，首度可以同時和所有國家相交，……致使經濟影響力與軍事力量日益強盛的中國，可在塑造其周遭環境時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註364）](#)在這種情況下，不僅中國也認為自己「正在世界的東方崛起」，[（註365）](#)國際上對中國未來的樂觀評估並非沒有道理，無論改革開放後連續二十年高達兩位數的奇蹟式成長率，抑或力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政治結構調整挑戰等，再再都暗示著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新的權力競爭者。[（註366）](#)

事實上，中國經濟起飛不僅是後冷戰時期影響全球經濟發展最大的變數之一，其崛起之迅速或許也遠超過中國本身的預期。例如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報告，曾提出在二〇〇〇年使GDP比一九八〇年增長四倍的目標，實際結果是六點五五倍；[\(註367\)](#)又如二〇〇二年「十六大」報告也提出，讓二〇二〇年GDP比二〇〇〇年翻兩番的目標（亦即年平均增長率達到百分之七點二），僅僅至二〇〇六年，其年增率便已達百分之九點八，[\(註368\)](#)且中國的外匯存底非但在同年二月首度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一，甚至迅速於二〇〇八年四月底超過了七大工業國外匯存底總和；不僅如此，中國的GDP還在二〇一〇年超越日本，正式躋身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儘管許多人對前述數據表示質疑，也指出經濟發展帶給中國的社會挑戰絕不亞於機會，可見之經濟成就不僅仍是當前中國能量的主要象徵，特別是它逐步從「世界工廠」邁向「世界市場」之際，許多觀察家認為其影響力已漸由東亞的傳統勢力範圍外溢，首先擴展到中亞和東南亞，接著由於石油需求（二〇一七年起成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家）而有機會介入中東，加上眾所周知對非洲經濟紓困之主導能量，這些都讓中國成為最受全世界矚目的新強權角色。

儘管如毛思迪所言，「身為霸主乃是中國夢寐以求的國家定位」，未必是種合乎現實之普遍想像，至少就依舊可見的歷史記憶（近百年來的發展頓挫）與正常的國家利益考量而言，對中國領導者來說，他們確實很難不希望利用這個「戰略機遇期」來提昇國家安全，甚至取得更高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其中，前述經濟實力既成為中國最不容忽視的軟軍備，所謂「大國論」也跟著逐步成型。例如若干分析家便指出，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將利用龐大的外匯存底資金作為落實其外交政策的工具。特別是在二〇〇八年爆發全球金融海嘯後，握有世界最高外匯存底（二〇一八年達三點一兆美元，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的中國不僅成為真正能提供金援的少數國家之一，[\(註369\)](#)中國在二〇〇九年倫敦二十國高峰會中倡議建立一種新的國際貨幣以取代美元的地位，乃至二〇一八年起開始聯合俄羅斯挑戰「石油美元」，[\(註370\)](#)都反映出其全球地位提升之事實，及參與國際機制愈來愈強勢之發展趨勢。

接下來，我們將繼續透過歷史回溯與展望未來兩種時空角度，探索並分析中國對外戰略的可能演進方向。

中國對外戰略選項之總整理 長期以來，中國對外關係之發展與主要政策內涵，可大致歸納為以下幾項，「一個政策核心、兩項基本原則、三套政策選項、四大發展挑戰」。首先，所謂「一個政策核心」指的是中國永遠將「重內輕外」或至少「先內後外」，作為決策思考時之指導核心。

正如前述，無法克服治理技術障礙的「統治規模」問題，似乎是中國在兩千餘年帝國時期中統治者始終揮之不去的夢魘。[\(註371\)](#)事實上，此一挑戰在當前看來可謂有增無減。儘管這一波中國人口成長或於二〇三〇年達到最高峰，[\(註372\)](#)且在此之前便逐漸邁入負成長之少子化時期，無論如何，其人口數字不僅遠邁前代，占全球人口比例高達五分之一，[\(註373\)](#)對其未來發展也同時衍生出正反兩面之可能影響。除此之外，就政治直轄範圍而言，無論過去如何從中國中心觀角度來勾勒政治版圖，相較三大帝國時期，當前中國的「有效政治管轄權範圍」正處於史上最大化的狀態當中。除了承襲自第三帝國時期才落實統治的東北地區（明朝僅於此處設置若干象徵性羈縻單位，清朝多數時間屬於禁區狀態，一九〇七年設省），以及十八世紀末後關係漸趨緊密之新疆地區（一七七五年遭乾隆征服後維持鬆散羈縻狀態，一八八四年後正式設省）之外，西藏則在一九五一年後首度被涵蓋進中國正式直轄版圖中。總而言之，即便時至今日的工業化時代，統治如此廣大幅員、人口眾多且具高度異質性的國家仍不啻是一大挑戰（與其情況最接近者乃位於南亞的印度，或可進一步比較思考），[\(註374\)](#)尤其面對資訊流通日益快速的挑戰，如何獲致支持統治正當性之足夠威望，仍為執政者最重要的工作。

在面對龐大統治規模帶來之常態性政治挑戰時，中國始終根據其歷史特質所歸納出的「兩項基本原則」，作為處理對外關係的戰略思考基礎：首先，是在傳統家國同體概念引導下，以維持大體之「秩序平衡」作為優先考量（相對地貶抑個案的重要性）的「結構主義」傾向。清朝末年希望透過所謂「一體均霑」態度來平息各國之間可能紛爭，便是一個例證；其次，則是以追求「相對優勢」而非絕對勝負（以臣服取代征服）作為戰略目標，並由較平等角度看待布局當中的各個參與份子，此即「比例主義」原則。

接著，在面對實際戰略目標方面，則理性地存在「三套政策選項」。

假使客觀環境得以配合，最佳結果（亦即可帶來最高之安全係數）當然是以帝國框架為基礎之「帝國政策」，不過難度當然很高，從歷史現實看來（三大帝國時期）只有秦漢、隋唐與滿清等三個朝代（或連續性朝代）得以達成。正如本書為帝國所設下的定義一般，亦即依此「指稱著一個環繞被文明化世界的有效統治方式，重點在展現出某種靜止式之歷史秩序，目的在有效地管理一個特定地域中的人群，同時創造出它所存在的世界，並支撐著世界範圍內之廣域穩定狀態」，換言之，也就是努力實踐「帝國（政治概念）= 世界（地理概念）」的平衡狀態。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所謂「靜止式」秩序在人類世界中很難真正存在，為了儘量維持一種最接近的狀態，帝國核心仍須透過「和戰並用」策略來加以落實；其中，靜態方面是用「結構性羈縻」（透過目的在懷柔遠人之朝貢體制，以經貿利益交換政治忠誠反饋）來維持體系內部之規律穩定運作，至於在動態（倘若存在一定安全威脅）方面，則藉由借力使力式「以夷制夷」政策來維繫戰略制高點，並保障自身與結構安全。

在更多數的歷史時間當中，基於現實狀況，中國多半選擇以下兩種政策，亦即「帝國化政策」（仍須以統一王朝為前提，目標在完成帝國建構，但最終未能成功）與「現狀政策」（亦即非帝國政

策，以分裂政權時期為主，主要僅希望維持現狀，甚至政權生存都面對可能之威脅）。

必須說明的是，首先是帝國不可能一蹴可幾，因此，即便以執行前述帝國政策為主的時期，在完成帝國結構的過程中，也必然經歷了所謂帝國化政策階段（例如西漢與唐代初期，尤其在尚未能壓制周邊威脅之前）。至於對另一些失敗的帝國建構者（例如北宋與明朝）而言，則多半在朝代肇建初期（尤其是開國前兩代君主）仍存在著建構帝國的理想，但因事實比人強，只得長期維持著帝國化政策，甚至轉向非帝國（現狀）政策發展（後者以北宋為例）。兩者差別在於，執行帝國化政策者會更頻繁利用所謂「遠交近攻」戰略，鎖定主要威脅來源並不斷地試圖削弱其力量，不過，一旦放棄建構帝國轉而改採（或原本即傾向使用）現狀政策，必要時遠交近攻雖仍舊會被選擇（例如北宋與南宋），但現實主義式退縮策略（和親或納幣）乃是主流。

表：中國傳統外交戰略選項比較

	政治前提	主要戰略與政策內容
帝國政策 Imperial policy	統一王朝 周邊不存在有效 威脅	1.以獲得威望反饋為主 建立體系結構並以此作為主要反 饋機制 透過對外經濟活動交換威望 2.作為周邊行為者政治正當性來 源 藉此確認彼此的階層性關係 3.戰爭主要屬於威望性質 有時屬被動性且對象不具安全威 脅 採取消極守勢戰略

帝國化政策 Imperializing policy	統一王朝 存在難以壓制之 威脅	4.強制力來自戰爭威嚇與切斷貿易活動 5.提倡世界主義融合政策 1.以追求權力優勢為主 鎖定主要競爭者並設法施壓以凸顯優勢 有限度對更強行為者或競爭者表達妥協 透過對外經濟活動獲取支持 有條件地進行異族聯姻 2.作為周邊行為者政治正當性來源 3.戰爭主要屬於權力性質 主要針對建立帝國障礙 趨向積極攻勢戰略 4.維持一定程度之民族主義概念 1.以維持政權生存為主 對於更強行為者表達臣服以爭取生存權 透過對外經濟活動交換生存喘息機會
現狀政策 Status quo policy	分裂政權 政權生存受到威脅	被迫進行異族聯姻 2.戰爭主要屬於自衛性質 反擊被侵略威脅或進行預防性攻擊 採取防禦型戰略 3.提倡排他性民族主義

無論如何，理性的戰略選擇必須在「主觀意願」與「客觀限制」之間取得平衡，尤其是正確地理解環境限制所在，否則將陷入「夜郎自大」的困境。對此可從「四大發展挑戰」角度來觀察，亦即：

統一中國本部、提供融合基礎、維持內部平衡，以及回應世界擴張。

如同其他國家一般，影響中國外交戰略選擇的首要變數，也是敵我能力對比，亦即理性評估自身與主要假想敵之間的差距。從過去經驗看來，由於只要完成統一「中國本部」工作，便暗示在以東亞體系為主之「世界」中取得相對比例優勢，該朝代通常接著便會嘗試去進行帝國化政策。[\(註375\)](#)其次，建構帝國所需者顯然不僅是「硬實力」（武力）而已，由於最終完成的帝國必然具有高度內部異質性，因此亦需要相對之「軟實力」（亦即回應「差異政治」之制度設計）提供黏合可能；對此，朝貢體系的經濟誘因與中原文化具備之文明高度，雖然向來是中國最重要的軟實力來源，具世界主義意涵之族群融合概念尤其重要，據此，推究北宋與明朝無法完成帝國目標之緣由，或許由於它們在此之前都經歷過一段中原勢力相對弱勢的時期（五代十國分裂與蒙古統治），導致排他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從而使它們與三大帝國相比，所欠缺者顯然便是缺乏「民族融合」帶來的挑戰。

除建立具優勢之能力對比與消除狹義民族情緒制約之外，從帝國化政策到最終完成帝國建構，甚至思考到建構帝國後還要繼續維繫下去，第三個挑戰將回到基本點，亦即內部政治權力平衡問題。這又可從下列幾個角度來檢視：首先是統治階層內部平衡（過去挑戰多半來自繼承問題與權臣威脅），其次是中央與地方平衡（能否壓制地方山頭割據情況興起），第三則是統治與被統治階層之平衡（關鍵是能否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過去一般指農民問題）。最後，相較於前面三個基本上貫穿兩千餘年中國歷史發展的共同特徵，最後一個挑戰不啻是某種「近代現象」，亦即近四、五百年來持續浮現的世界擴張效應；換言之，當中國面對一個遠大於東亞體系的「世界」時，該如何去思考結構與比例平衡等問題呢？當然，本書更為關切的是，面對前述戰略選項，當前中國究竟作何選擇呢？

獨立自主路線下的對外戰略限制與演進 針對當前中國之外交政策發展，學者們一般從它建政伊始，根據細部差異劃分為幾個不同的時期；[（註376）](#)例如，首先是一九五〇年代的「一邊倒（向蘇聯）」政策，其次是一九六〇年代的「中間地帶」理論，再者是一九七〇年代的「三個世界論」，接下來是一九八〇年代的「獨立自主外交」，最後則是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大國外交」時期。[（註377）](#)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前夕所提出「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以及「一邊倒」等指導方針，[（註378）](#)主要希望藉此化解幾個外部環境壓力：首先，「另起爐灶」指的是相較正常（作為當前主流）之國際傳統慣例，中共為了回應自清季以來長期積壓的民族主義情緒，否認新政權應承繼舊政府對外關係結果；其次，「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表面上雖似乎意指先清除舊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境內的殘餘影響，其實暗示的是徹底殲滅國民黨殘餘力量以終結內戰；最後，「一邊倒」則直接挑明了中共建政初期最主要外交困境所在，亦即對蘇聯的嚴重依賴問題。[（註379）](#)除此之外，周恩來亦緊接著在一九五二年加上「禮尚往來」（對資本主義國家採取後發制人作法）、「互通有無」（根據平等互利原則對外交觸）與「團結世界人民」（聯合全球被殖民國家）等另外三條方針，[（註380）](#)顯示北京並未僵化在所謂「一邊倒」的框架當中，而是希望跳脫意識型態限制，保留與資本主義國家交往的政策彈性。

總的來說，中國雖然在一九五〇年代完成統一「中國本部」的基本目標（台灣其實不包括在此一傳統地理範疇中），所謂「一邊倒」政策不啻反映出建政初期必須依賴或無法擺脫蘇聯的現實困境。[（註381）](#)更甚者，此一互動既以蘇聯利益為主要考量，當然未必符合中國自身利益，更牴觸自世紀初以來高漲的民粹輿論浪潮。為回應由下而上的民族主義情緒，毛澤東早在一九四八年便聲稱：「我們的方針放在什麼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

生。」[\(註382\)](#)周恩來也在一九四九年說道：「我們對外交問題有個基本的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也就是獨立自主與自力更生的立場。」[\(註383\)](#)換言之，儘管當時中國確實缺乏足以鞏固獨立的能力，若因此推論它放棄了獨立自主路線也是不正確的。確切地說，中國採取的是一種迂迴漸進手段，亦即先以「中間地帶」來削弱一邊倒的依賴性，[\(註384\)](#)再以「三個世界」為真正的獨立自主鋪路。

除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尤其一九六六至六八年），一度形成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一年以來的第二度「革命外交」時期，[\(註385\)](#)正因為無法在敵我實力對比方面取得安全保障，亦須一段時間解決長期分裂與建政初期錯誤政策帶來之內部政治平衡挑戰，再加上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亟需外資挹注以落實新發展戰略，儘管北京不斷高舉「獨立自主」口號以回應輿論之民族主義傾向，依照前述傳統外交選項分類，無論我們如何加以分期，中國在一九五〇至九〇年代的外交戰略方向，大致走的是維持現狀的「非帝國政策」路線。尤其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所擬定之「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站穩腳跟，沉著應付，朋友要交，心中有數」方針，[\(註386\)](#)更能說明此期間對外政策之基本指導原則。

新世紀初中國之外交轉型發展趨勢 對一九四九年建政的新中國而言，前述「非帝國政策」特徵既相當現實，也是鄧小平時期（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七）處理對外關係之主要出發點。

早在一九八四年，鄧小平便提過以下辯證論點：「中國是個大國，又是個小國；所謂大國，就是人多、土地面積大，小國就是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中國是名副其實的小國，但也是名副其實的大國，因為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中，中國算一個。」一九八五年時又說道：「世界上的人在議論國際局勢的大三角，坦率

地說，我們這一角的力量是很單薄的。」[\(註387\)](#)由此可見，他對中國自身力量雖肯定又極保守的估計。據此衍生出來的，便是自保意味十足的「反霸」概念。不僅胡耀邦曾於一九八二年「十二大」報告中說：「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務。」趙紫陽在翌年六屆人大會議中也提到：「中國絕不謀求霸權，……不管誰在什麼地方搞什麼樣的霸權主義，我們都堅決反對。」鄧小平在一九九〇年時更說道：「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個頭我們當不起。中國永不稱霸，也永遠不當頭。」[\(註388\)](#)甚至直到二〇一二年「十八大」為止，「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之說法仍貫穿了歷屆政治報告核心。

儘管如此，從一九八〇年代後改革開放政策之正面發展效果出發，同時回應後冷戰初期國際體系架構朝多極化發展之內涵變遷趨勢，在實質國力逐步提高之餘，中國似乎也開始調整其外交政策。正如同鄧小平所言：「美蘇壟斷一切的情況正在變化；世界格局將來是三極也好，四極也好，五極也好，……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麼樣也算一極。」顯而易見地，一九九〇年代的中國正處於經歷從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的「依賴期」，以及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的「自主期」，轉而邁向「擴張期」外交新階段的轉捩點上。無論為了破解西方（以美國為主）圍堵政策而必須採取預防性的遏制戰略，防止各大國支持其內部分離主義或台灣獨立勢力，抑或為繼續爭取一個有助於持續經濟開放戰略的國際環境，中國對於作為國際政治中「一極」或世界「五強」之一的自我期許與肯定，[\(註389\)](#)透過「大國外交」主軸進行的高層互訪，軍備設施大幅汰舊更新，以及藉由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進行發言等明顯提高國際參與度的動作，不但都有助於拉高其全球影響力，也讓現任霸權美國感受到嚴重的壓力。

從某個角度看來，儘管近年來有愈來愈多西方觀察家從「新帝國主義」視野分析中國對外戰略發展及其影響，尤其聚焦於非洲地區，[\(註390\)](#)本書並無意跟著此種定義含混不清的籠統概念起舞，但根據前一段落中提出的政策分類說法，以及它正在「崛起」的相對

現實，自新世紀以來，中國確實有從長期「非帝國政策」立場，轉而趨向「帝國化政策」方向積極發展的可能性。

中國特色成分與崛起之潛在影響

由美國藍德公司史文（Michael D. Swaine）與泰利斯（Ashley J. Tellis）兩位中國專家在二〇〇〇年所提出名為《中國大戰略》的研究報告，[（註391）](#)除帶來一連串評論與介紹之外，[（註392）](#)也引爆了學術界對於中國大戰略討論的熱潮。根據相關觀察，多數學者歸納出下列幾個結論：首先，「大國信念」儘管或縈繞在中國領導決策階層心中，其大戰略設定與操作迄今基本上仍傾向「內向型」而非「擴張型」；其次，中國對於使用武力向來相當節制，且經常基於十分「謹慎且縝密」的計算，目前亦是如此；最後，當前中國推動的雖是一種傾向「高度務實且儘量淡化意識形態色彩」的大戰略方案，目標僅僅放在提高對國際社會的參與度，隨著綜合國力實際提升，二〇二〇至二五年間將是中國調整戰略內涵（亦即由消極轉趨積極主動）的關鍵期。閻學通同時指出，所謂崛起本來便必須區分為「準備」、「起飛」與「衝刺」等不同階段；根據其看法，中國基本上在二〇〇〇年左右雖已大體完成準備階段的工作，[（註393）](#)走完起飛階段則或許還需要三十五至四十年時間，比起前述史文等人的估計顯得保守了些。[（註394）](#)

儘管真正具意義之「中國崛起」還須幾個條件配合，包括：符合權力轉移理論有關權力均衡與追趕之假設（實質縮小與既存霸權美國之間的實力差距）、擁有可予填補的權力真空地帶（能否成功地將東亞地區作為其崛起的地緣依托）、有效地展示武力以奠定國際地位但又可避免被拖入不必要的戰爭泥沼（無法避免之下一場戰爭），以及能否擬定擁有長期前景的「大戰略」，而非實則不過為追趕戰略的「大國戰略」（具普遍引導性之長期發展藍圖）等。無論如何，對愈來愈多人來說，中國最終完成崛起既不再是遙不可及

的未來，至於如何預測其發展前景並擬妥因應對策則又為當務之急。

當代中國外交思維中的結構與比例概念 如同本書指出的，由於長期以來，在技術層面支撐龐大的帝國治理規模確有困難，在中國政治發展過程當中，制度非但始終不如意識形態來得重要，為確保透過某種思維模式以貫徹政治穩定性，社會既成為核心聚焦，其中的倫常互動也被設定成某種權威性服從關係，從而形成了可稱為「家國主義」之特殊規範。更甚者，基於前述困境，「重內輕外」、「先內後外」或「由內而外」也成為中國處理對外關係時必然之基本出發點。

例如，無論是為了在處理由於「中國崛起」帶來外交轉型之前，先解決內部社會穩定性問題，抑或單單為了面對由於「改革開放」所導致之一連串社會挑戰（包括發展差距與貧富懸殊等），中國在二〇〇四年第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無疑極具象徵意義；其後，中國一方面自二〇〇五年起將「和諧社會」訂定為建設「具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關鍵戰略價值，高舉「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等主要口號，二〇〇六年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件。於此同時，由於先前「和平崛起論」引發國際輿論與周邊國家出現不同評價之議論，[（註395）](#)北京乃嘗試以「和諧世界」取代「和平崛起」，作為外交政策之形象準則，目的在消弭「中國威脅」的可能聯想。[（註396）](#)

進一步來說，相關說法首度出現於二〇〇五年，胡錦濤於雅加達「亞非高峰會」上發言指出，亞非國家應「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同年九月，他繼續在聯合國六十週年紀念高峰會上發表「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

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演說。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和諧世界」雖不過或是種官樣文章罷了，從語意學與語詞選擇看來，「和諧」（harmony）與西方慣用的「和平」（peace）仍存在某種根本差異：首先，和諧在概念上既用以相較於「混亂」（chaos），也與「秩序」意義近似，著重的是結構之整體平衡狀態，至於和平則相對於「戰爭」（war），目標只在能否有效壓制潛在敵人。可以這麼說，即便處於「沒有戰爭的和平狀態」，也未必是和諧的，例如，拿破崙戰爭後的「百年和平」（一八一五至一九一四）、兩次大戰過渡時期（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九）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冷戰（一九四七至一九九一）等皆是明顯例證。相對地，和諧也未必暗示不會有戰爭爆發，但重點是維持「鬥而不破」的多邊動態均衡狀態。

除了在外交戰略中反映傳統的結構主義特徵之外，我們也可以在當前中國對外政策中發現另一個傳統基本原則（比例主義）的影子，中國對非洲政策或為其代表。

正如眾所周知，西方（歐美）雖似乎兩度顯示出對於非洲地緣利益之重視，分別是一八七〇至八〇年代的瓜分風潮（一八八四年柏林會議為其高峰），以及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的美蘇外交競賽，最終皆僅曇花一現，無法根本性地扭轉非洲在西方視野（經濟利益導向）中的邊陲地位。相對地，包括更廣大的亞洲與拉丁美洲在內，第三世界甚早便被視為中國的最佳「天然」盟友，例如，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上便公開宣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我們都必須給予積極的支持」，[（註397）](#)自此，相較於非洲逐漸消失在西方的關注眼神之外，中國則始終高度重視此區域，非但自一九九〇年迄今，中國外長每年都固定從非洲某地展開其年度巡迴出訪行程，二〇〇六年發佈的《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與同年召開的首次「中非合作論壇高峰會」則不啻是其高潮，[（註398）](#)除了台灣邦交國外，非洲國家元首全員到齊之號召力不要說現任霸權美國都瞠乎其後，長期經營非洲百餘年的法國看來也作不到。當然，西方或許「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但中國如此重視非洲又意欲何在？難道僅單純關注此地區之豐沛能源而已？若

此，西方又何以長期忽視此地區的能源潛力呢？對此，若非從所謂比例主義之戰略佈局角度切入，恐難真正理解。

中國崛起對當前全球格局之影響 從歷史事實看來，今日中國發展之速度與規模不只史無前例，也遠超過美國在一九二〇年代首度成為全球經濟霸權之強勢表現。德國《經濟周刊》（Wirtschafts Woche）在二〇〇三年的「中國特刊」中便曾指出：「中國的重新崛起，乃本世紀以來最重要的歷史事件。」當然，中國至少在經濟面崛起的事實雖客觀而言是無庸置疑的，對其未來潛在影響之評估卻依舊正反俱呈且眾說紛紜。[（註399）](#)相較於歐洲在十九世紀普遍認為「中國乃是世界上最早達到某種完善程度的民族，但自此便止步不前，再也沒有取得任何進步」，[（註400）](#)對比如今全球隨處可見的「中國威脅論」，可見中國確實已今非昔比。

無論如何，更重要的或許是，中國崛起究竟將帶來何種影響？

對此，本書僅能聚焦國際關係層面。如果將前提設為中國確實將繼續維持崛起力道的話（當然，世間本來就難有一帆風順的事），那麼其後續影響將可由短、中、長期等不同層次來觀察。就短期而言，部分學者預估，中國或有機會將在二〇二〇至四〇年間完成「霸權轉移」的過程，[（註401）](#)亦即以最大政經強權的姿態，取代美國所擔任超過半個世紀的全球平衡者或國際警察角色，客觀地呈現出它與其他國際行為者之相對權力差距。由此，中國所表現出的或許不過是「另一個美國」罷了。

至於在中期影響方面，關鍵則在於，中國將如何與何時真正朝「帝國化政策」選項轉型。由於有著面對西方擴張壓力的經驗，曾經掀起「反帝國主義」民粹浪潮，一度同屬所謂「第三世界」一份子，當中國以及多數發展中國家提及「帝國主義」時，通常從高度

情緒化的負面角度來理解。不過，從客觀歷史角度視之，有時建構帝國或許受到某種私欲驅使，它確實是達成「終極世界秩序」之必然過程。以美國為例，當它在二十世紀中葉最終成為霸權後，邏輯上本應由此順勢向「帝國」目標邁進，但因隨即陷入冷戰格局並受到蘇聯集團制約（暫且不論其政治體制特性），只得被迫暫時在非帝國階段原地踏步；直到冷戰結束後，由於顯然有機會透過鞏固單極體系以強化全球地位，關於它是否將建構「帝國」的探討既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註402）](#)針對美國「新帝國主義」可能發展之辯論也成為一時風潮。[（註403）](#)與此類似，一旦中國取代美國的霸權地位，同時面對舉世無匹的絕對優勢環境時，屆時中國若果真朝向「帝國化政策」邁進，亦是相當自然且在意料當中的事情。

最後，就長期來看，在「中國威脅論」的刺激下，有關中國將重建中央王國（Middle Kingdom）的說法早就漫天飛舞，毫不稀奇。不過，即便中國果真有機會（實際上恐怕不大）重建帝國，一方面根據前述時程看來，最快也是本世紀末（或半個世紀後）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所謂中央王國究竟確切意義為何？是意味著中國重建一個傳統的朝貢體系？還是不過如同近代西方強權一般，擁有單方面貫徹政策意志的能力？抑或者可能帶來另一種帝國典範？非但前述問題幾乎很少被認真思考，進一步言之，就算中國真的再次成功重建帝國，它將傾向如何扮演此一帝國核心角色？如何處理帝國所處世界內的國際關係問題與秩序挑戰？是否帶來一套新的行為規範？抑或是在沿襲既有規範的基礎上，依據環境時勢變化提供某種的修正版本？顯然，過去的三個帝國個案雖具備某種型態類似性，並未提供一套統一的對外作為模式可供依循。無論如何，對於中國崛起的長期發展影響，恐怕還需要更多的理性討論與思索。

（註332）戴維斯（Norman Davies）著，郭方、劉北成等譯，《歐洲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頁九二〇與一〇九一。[↑](#)

(註333) 拉爾夫 (Philip Lee Ralph) 等著，文從蘇等譯，《世界文明史後篇：從工業革命到現代》(台北：五南圖書公司，二〇〇九年)，頁三四〇。[↑](#)

(註334) 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著，秦修明、湯新楣、李宜培譯，《民主在美國》(台北：貓頭鷹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三〇〇。[↑](#)

(註335) 喬飛 (Josef Joffe) 著，蔡東杰譯，《美國的帝國誘惑》(台北：博雅書屋，二〇〇七年)，頁一五五。[↑](#)

(註336)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朝隆裕太后率同宣統帝溥儀宣統退位，其退位詔書據說由南通狀元張謇所擬，但詔書中「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文句則是袁世凱授意增加；詔書由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外務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度支大臣紹英、陸軍大臣王士珍、海軍大臣譚學衡、學務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郵傳大臣梁士詒、農工商大臣熙彥、理藩大臣達壽等人副署。[↑](#)

(註337)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曾於一九九五年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歐林講座的演說中，首度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ROC, Taiwan) 之用辭與概念，一方面引發各界議論，其後亦逐漸成為台灣方面政府外交文書、外電新聞稿及與外國簽定合作協定使用的正式國家名稱。儘管李登輝自稱早於一九九二年便開始使用此一說法，但缺乏直接佐證；其次，他也公開指出「中華民國在台灣」乃是台灣階段性「正名運動」的一部分，最終目的是要將國號更改為「台灣」。至於外交部也自二〇〇二年起推動在護照封面加註「Taiwan」的政策。[↑](#)

(註338)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四七九。[↑](#)

（註339）謝里登（James E. Sheridan），[\[軍閥時代：北京政府時期的政治鬥爭與軍閥的窮兵黷武\]](#)，收於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頁二八九；同時參見James E.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 Era i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此外亦可參考齊錫生，《中國軍閥政治，一九一二至二八》（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等。[↑](#)

（註340）例如在一九一七至二二年的「護法運動」期間，孫中山便在廣州自行成立獨立政權，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期間由於「寧漢分裂」導致第一次國共內戰後，共產黨也致力於建立自己的蘇維埃政權。[↑](#)

（註341）孫中山曾主導過三次「北伐」，包括一九一七年第一次護法戰爭、一九一八年第二次護法戰爭，與一九二二年聯合奉系與皖系共同對抗直系的戰爭，此處指一九二六年由蔣中正主導者。[↑](#)

（註342）與東漢末年「黃巾之亂」和唐代中葉「安史之亂」後埋下地方割據伏筆，其實如出一轍。[↑](#)

（註343）蔡東杰，《中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一五四。在一九〇〇年華北拳亂爆發後，包括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山東巡撫袁世凱等重要地方督撫對清廷宣戰詔書均拒不受命。至於以長江流域為勢力範圍的英國，也授權上海代理總領事代表各國領事，與代表前述各省督撫之上海道余聯沅簽訂《保護南省商教章程》（或稱互保公約）共九款，接著，閩浙總督許應騷也與英美等國訂立《福建互保協定》。儘管前述運動通常稱為「東南自保」或「東南互保」運動，但參加省分先後包括十三個，幾達中國領土一半以上（在清末的二十三個省份中，除割讓給日本的台灣、被俄國佔領的東北、戰爭主

要區域的直隸與山西，與位於邊陲的新疆、甘肅、雲南與貴州外，所謂「中國本部」幾乎全部加入）。[↑](#)

（註344）除非是篡位式禪讓，例如西元九年的王莽、二二〇年的曹丕、五四一年的楊堅，但均非朝代更迭典型。[↑](#)

（註345）See Gilbert Caty, *Le Statut Juridique des Etats divises* (Paris: Editions A. Pedone, 1969); Gregory Henderson, Richard Lebow and John Stoessinger, eds., *Divided Nations in a Divided World*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Inc., 1974); John H. Herz, “Korea and Germany as Divided Nations: the Systemic Impact,” *Asian Survey*, 15 (1975), pp.959-62.[↑](#)

（註346）此種主權問題可以用蘇聯的舉動為例；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為保障舊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既得利益，蘇聯一方面在一九二四年與國際公認的主權代表（北京直系政府）簽訂《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同時也與實際控制東北地區的奉系地方政府簽訂《奉俄協定》，為求保險，甚至一九二三年還透過孫越宣言推動與孫中山廣州政府深化合作。[↑](#)

（註347）佩克頓（Robert O. Paxton）著，劉京建、包仁譯，《西洋現代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一九九〇年），頁四至五。[↑](#)

（註348）貝格哈恩（Volker R. Berghahn）著，朱章才譯，《舊歐洲的沒落》（台北：麥田出版公司，二〇〇〇年），頁四八。[↑](#)

（註349）相關發展請參見：陳志奇，《中國近代交史》（台北：南天書局，一九九三年），頁八九五至九七四；傅啟學，《中國交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七年），頁一五一至一五八；蔡東杰，《中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一二九至一四三。另亦可參考：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

華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胡濱，《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爭奪中國權益史》（北京：三聯書局，一九五七年）。↑

（註350）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於一八九九年向美國駐六個國家（德俄英法義日）大使發出訓令，要求他們向駐在國政府發出說帖，詢問它們對在中國發展互不干涉方針之意見，儘管未獲正面回應，海約翰仍於一九〇〇年三月「逕行宣佈」門戶開放政策已獲各國同意而正式成立，但其後不到三個月，由於義和團之亂與八國聯軍等接連爆發，美國再度於七月再度發出廣泛照會，希望各國「共同保護中國的領土與行政完整」。↑

（註351）陳志奇，《中國近代交史》，頁九八八。↑

（註352）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著，林添貴譯，《大外交》（台北：智庫文化，一九九八年），頁四八。↑

（註353）根據十九世紀「歐洲中心觀」地理設定，巴爾幹至土耳其左右為近東（Near East）地區，從北非到西亞的阿拉伯世界為中東（Middle East）地區，至於印度次大陸以迄中國與東北亞則屬於遠東（Far East）地區。↑

（註354）正如眾所周知的，肯南（George Kennan）乃是所謂圍堵政策的主要設計者，其理論基礎大部分表現於下面這篇文章中“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XXV (July, 1947), pp.556-582；但在前文發表二十年後，他又在回憶錄中對此有所補充，參見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p.378。↑

（註355）過去中國的地方割據勢力亦不乏「挾外夷以自重」的情況，例如漢初的韓王信與燕王盧綰都與匈奴關係密切，隋末唐初的

華北的高開道與劉武周與突厥頗有聯繫，至於五代時期的石敬瑭與北漢政權則都仰賴契丹的支持，但這些都屬少數狀況。相對地，在所謂「民國」時期，則正如眾所周知，直系軍閥與英國關係密切，皖系與奉系軍閥先後接近或受制於日本，桂系與滇系軍閥受到法國勢力扶持，國民軍系與一九二四至二八年間的黃埔系則與蘇聯互動密切。[↑](#)

(註356)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8; George Modelski, *Principl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Malcolm Waters,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p.2.[↑](#)

(註357)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London: Polity Press, 1999), p.3.[↑](#)

(註358) See Kenichi Ohmae (大前研一) , *The Borderless World* (London: Collins, 1990);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註359) Francis Adams, Satya Dev Gupta and Kidane Mengistead,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An Introduction,” in Francis Adams, Satya Dev Gupta and Kidane Mengistead, eds., *Globalization and the Dilemmas of the State in the Sou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1.[↑](#)

(註360) Robert Cox,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Limits to Liberal Democracy,” in Anthony McGrew,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cy: Glob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p.49-72.[↑](#)

(註361)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2.↑

(註362) 所謂「和解」(detente)一般以一九六三年美蘇首度展開限武談判做為開端，並以一九七五年簽署《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為高峰，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則帶來頓挫。↑

(註363) 一九六〇年代後，由於兩極緊張對抗局勢消退、美國世界觀轉變、尼克森主義公佈及「越戰越南化」的遂行，加上中國於文革末期開始追求實用開放政策，使中美雙邊關係出現了重建契機；其基本構想是，雙方政治主張的差異應不致影響彼此關係。除了美國在一九六九年宣佈停止第七艦隊巡航台灣海峽以表達善意外，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Rogers)更於一九七一年宣佈將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至於具體作法則分為三階段進行：首先是請巴基斯坦總統伊卡汗(Yahya Kahn)等第三者作為「信差」，其次是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於一九七一年秘訪北京，最後則是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訪華與簽署《上海公報》。↑

(註364) Michel Oksenberg, "China: A Tortuous Path onto the World's Stage," in Robert Pastor, ed., *A Century's Journey: How The Great Powers Shape The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p.291-332.↑

(註365) 中國前外長錢其琛總結一九九三年外交成果時所言；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五九。↑

(註366)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78 (1999), pp.29-32.↑

（註367）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二〇〇七》（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頁二三。[↑](#)

（註368）胡鞍剛，〈中國經濟實力的定量評估與前瞻，一九八〇至二〇二〇〉，《文史哲學報》，第一期（二〇〇八），頁一三九至一四〇。[↑](#)

（註369）全球外匯儲備總額由國際貨幣基金（IMF）公告，中國外匯儲備額則由中國人民銀行公告，兩者之間存在之解讀與計算差距經常引發質疑與討論。[↑](#)

（註370）根據美國在一九七四年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之協議，該國對外石油交易一律以美元進行，此規範至一九七〇年末擴及所有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成員，從而成為美元霸權重要支撐。[↑](#)

（註371）費正清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革命的中國的興起，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頁三六至三八。[↑](#)

（註372）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年鑑的資料顯示，其總人口在一九四九到六四年間從五億增至七億，每增加一億人平均需要七點五年時間；在一九六四至七四年間，中國人口又從七億增為九億，每增一億人所需時間縮短至五年，於接下來一直到突破十二億大關為止，人口每增加一億平均用七年。根據中國國務院在二〇一七年公布之《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全國人口將於二〇三〇年達到十四點五億峰值，且可能自二〇二四年起進入負成長期。[↑](#)

（註373）部分人士認為，由於缺乏管制且難以精算，印度人口實際已超越中國，甚至二〇五〇年將達十七億。[↑](#)

(註374)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目前境內共有五十六個種族，以及五大語系一百二十九種語言（不包括各語種下的方言分支，若加總則約近三百種），但其中多數處於瀕危狀態；孫宏開、胡增益、黃行主編，《中國的語言》（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七年）。[↑](#)

(註375) 西晉時期也許是唯一例外；理由首先是時間過短，從西元二八〇年滅吳統一到三一六年滅亡，前後只有三十一年，更重要的或許是中間還經歷了「八王之亂」的動盪。[↑](#)

(註376) 何漢理 (Harry Harding) 曾將中共建政後之外交政策演進分為「激進結盟時期」(一九五〇年代)、「激進的不結盟時期」(一九六〇年代前期)、「革命的孤立主義時期」(一九六〇年代後期)、「改良的半結盟時期」(一九七〇年代前期)，以及「保守的結盟時期」(一九七〇年代末以來)，頗值得參酌；Harry Harding,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rch-April, 1983, pp.2-8.[↑](#)

(註377) See Hickey, Dennis Van Vranken, "Peking's Grow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Ties with Latin America," in David S. Chou, ed., *Peking'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s*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9), pp.389-391；尹慶耀，《中共的統戰外交》（台北：幼獅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頁四至一二；張小明，[□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收於劉山與薛君度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一至二〇。[↑](#)

(註378)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三。[↑](#)

(註379) 謝益顯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三至四；周恩來，[□新中國的外交□](#)（一九

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一至七；楊勝群、田松年主編，《共和國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四六二至四六六。[↑](#)

（註380）參見「我們的外交方針與任務」，《周恩來外交文選》，頁五一。[↑](#)

（註381）不管是一邊倒向蘇聯或日後與其分裂，中共的行為根源似乎都與國家安全考量有關，參考盧子健，《一九四九以後的中共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二二。[↑](#)

（註382）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一一三二。[↑](#)

（註383）見《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三二一。[↑](#)

（註384）所謂「中間地帶」理論首先出現於毛澤東在一九四六年與美國記者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的談話中，他表示說：「……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中間地帶，這裡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不要很久，這些國家將會認識到真正壓迫他們的是誰，是蘇聯還是美國。」參見尹慶耀，《中共的統戰外交》（台北：幼獅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頁四五至四七。[↑](#)

（註385）蔡東杰，《兩岸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台北：高立圖書公司，二〇〇一年），頁一二八；有關一九二五至三一年間革命外

交之發展，請參見李恩涵，《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〇〇四年），頁二三七至三四一。[↑](#)

（註386）請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社會主義的中國誰也動搖不了」，頁三二八至三三四，「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頁三四六至三四八，「中國永遠不允許別國干涉內政」，頁三六一至三六四。有時也簡化為「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站穩腳跟，有所作為」，見唐家璇，「當前國際形勢與我國對外關係」，《解放軍報》，一九九四年三月七日。[↑](#)

（註387）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頁八一；《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一〇五。[↑](#)

（註38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四三、四九八；《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三五八。[↑](#)

（註389）杜攻主編，《轉換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七。[↑](#)

（註390）請參考：麥克（Serge Michel）、貝雷特（Michel Beuret）、伍茲（Paolo Woods）著，陳虹君譯，《黑暗大布局：中國在非洲的經濟版圖》（台北：早安財經文化，二〇〇九年）；博戴蓉（Deborah Brautigam）著，沈曉雷譯，《紅色大布局：中國錢進非洲的真相》（台北：八旗文化公司，二〇一三年）；傅好文（Howard W. French）著，李奧森譯，《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台北：麥田出版，二〇一五年）[↑](#)

(註391)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RAND, 2000).[↑](#)

(註392) 例如唐世平，「美國人眼中的中國安全大戰略」，《當代亞太》，第六期（二〇〇〇），頁六一至六四；周建明，「評解讀中國大戰略」，《國際觀察》，第五期（二〇〇〇），頁三八至四二；陳向陽，「解釋中國的大戰略」，《國際資料信息》，第二期（二〇〇一），頁三一至三二；何科，「中國有一個國際大戰略嗎？」，《國外理論動態》，第六期（二〇〇一），頁二六至二九。[↑](#)

(註393) 他們認為中國在一九七一年加入聯合國與一九七〇年代建交潮，一九八二年完成最近一部憲法，一九九五年提前完成比一九八〇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一倍的目標後，基本上在一九九〇年代末便已分別完成準備階段的國際、政治與經濟條件；同前引書，頁一二至一三。[↑](#)

(註394) 閻學通與孫學峰等，《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頁八至一〇。[↑](#)

(註395) 在二〇〇三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中，前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鄭必堅發表了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未來」演講，也首度提出所謂「和平崛起論」。[↑](#)

(註396) 參見趙建民、許志嘉，「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和諧世界觀」：理論與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十卷一期（二〇〇九），頁四至八。關於絕對與相對利益相關論述部分，請參閱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m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16-142.[↑](#)

(註397) 沙丁，楊典求，焦震衡與孫桂榮等，《中國和拉丁美洲關係簡史》(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三三六至三三七。[↑](#)

(註398) 中非合作論壇在二〇〇〇年由中國推動成立，每三年召開一次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與非洲國家之間輪流舉辦)，二〇〇六與二〇一八年召開過兩次高峰會，均在北京舉行。[↑](#)

(註399)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John Mearsheimer,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146 (2005), pp.46-49; Jeff Legro, “What China Will Want: The Future Intentions of a Rising Pow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5 (2007), pp.515-534; Thomas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1 (2006), pp.81-126;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註400) 澤林 (Frank Sieren) 著，《中國：重建中央帝國》(香港：明鏡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頁三九五。[↑](#)

(註401) 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 在二〇一〇年底推估，中國經濟可能在二〇一九年超越美國，二〇一八年十月再度刊出「中國世紀顯然正在到來」一文；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二〇〇三年首度預估中國將在二〇四一年超越美國，二〇一一年則將預測點提早到二〇二七年。國際貨幣基金指出若以PPP估計，中國經濟總量在二〇一四年已超越美國，同時在二〇一八年預估，中國經濟將於二〇三〇年超越美國。[↑](#)

(註402) 例如赫茲 (Richard N. Haass) 便將學界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建議歸納為威爾遜主義、經濟主義、現實主義、人道主義與最低限度主義等方向，參見Richard N. Haass, “Paradigm Lost: from Containment to Confusion,” *Foreign Affairs*, 74:1 (1995), pp.50-52.[↑](#)

(註403)一般認為，所謂「新帝國論」源自於庫柏 (Robert Cooper) 在二〇〇二年的討論，儘管他最初設想的帝國對象並非美國，而是歐盟。相關討論可參見：本德爾 (Peter Bender) 著，夏靜譯，《美國：新的羅馬》(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喬飛 (Josef Joffe) 著，蔡東杰譯，《美國的帝國誘惑》(台北：博雅書屋，二〇〇七年)。↑







現狀：當前中國之潛在戰略佈局

似乎才剛剛迎來的二十一世紀，轉眼即將過了五分之一。在此期間，國際局勢也經歷了一段跌宕起伏且曲折多變的發展過程。在新世紀初，美國由新保守派主導的「新帝國論」一度甚囂塵上，小布希政府亦在其首個任期中意氣風發地力推單邊主義戰略，至於二〇〇三年秋風掃落葉般鏟除伊拉克海珊政權，無異將其推向霸權巔峰，一時頗有睥睨天下的氣勢。曾幾何時，隨著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帶來重擊，美軍黯然撤出伊拉克戰場，連「後美國時代」也開始成為被討論的新焦點。於此同時，所謂「金磚四國」與「二十國集團」平台接連崛起，尤其中國的追趕力道更讓國際輿論產生是否存在G2共治天下的可能性。當然，中國亦掌握此「戰略機遇期」，努力貫徹自身「走出去」戰略，儘管其國內社會發展依舊問題與挑戰叢生，對全球影響力的實質提升仍無庸置疑。由此，當前中國的外交目標究竟將如何設定？未來又可能朝哪個方向前進？

現狀政策路線及其發展

還是那句老話，「重內輕外」的內政優先思維，乃傳統上中國對外戰略的共通基本點，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共政權亦復如此。儘管同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在總綱第三條中，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註404\)](#)藉此回應情緒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實際上為求生存，中共早在內戰期間便與蘇聯簽訂若干協定，希望以所謂「合作發展」東北經濟，以及允許蘇聯對東北地區享有特殊之交通利益等不平等約定，換取其更多援助承諾，[\(註405\)](#)毛澤東甚至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公開宣示：「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的一邊，就是倒向社

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註406) 同年十二月更親赴莫斯科為史達林「祝壽」，並於次年二月簽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註407) 以及其他一連串相關合作協議，主要都是期盼透過出讓權利來交換蘇聯對其政權的支持。(註408)

相較中國此刻正積極由英、美等所謂「帝國主義國家」手中收回利權，對蘇聯方面付出的代價，連赫魯雪夫（Nikita S. Khurshchev）都說，「這些協定的締結乃是史達林的錯，同時也可說是對全體中國人民的侮辱；多少世紀以來，法國、英國和美國都在剝削中國，而今蘇聯竟也加入了剝削者行列」，(註409) 不啻充滿了反諷意味。不過，從另一角度看來，如同漢朝與唐朝初年也必須透過對匈奴和突厥進行「和親」、「納幣」等政策來爭取轉圜時間一般，中共政權雖在一九五〇年代完成建構帝國的基本要件，亦即統一「中國本部」，暫時仍得現實地採取現狀政策路線，以確切鞏固生存為第一要務，因此對名為盟友但實為國家安全最主要威脅來源之蘇聯採取讓步姿態，也屬無可厚非。

儘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外交政策似乎一度轉而充滿挑戰現狀意涵，究其根源卻不能不提到它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面臨的國內外困境。首先，包括一九六〇年中蘇共分裂、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糾紛，以及一九六四年美國擴大介入越戰等，不僅一再挑戰中國的國家安全，透過民族主義宣示以激發民粹式群眾運動，雖不無冒險，確有助於動員資源以因應可能變局。至於在國內方面，則一九五八至六〇年「大躍進」運動的徹底失敗，既讓中國面臨經濟發展谷底危機，同時衝擊了毛澤東個人的政治地位，甚至迫使他在一九五九至六二年將職務與權力移交給劉少奇，至於後者則推動「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反革命派要和，同時外援要少」的「三和一少」政策，希望能舒緩國際環境壓力。(註410) 由此觀察，爆發於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或為「一場權力鬥爭，其目

的乃恢復並鞏固毛澤東因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以及一九五九年大躍進政策失敗所受創的黨內地位」。[\(註411\)](#)

無論如何，由於中國此際確實缺乏挑戰現狀的能力，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於一九七六年隨毛澤東去世而終告結束後，中國對外戰略也在鄧小平上台後，理性地重新修正回到現狀政策路線上。此時距其建政已有二十七年。

向錢看：重建經濟秩序之挑戰 對多數人而言，中共得以如此迅速地在一九四九年底正式建立政權，確實有點讓人目瞪口呆。表面上看來，如同毛澤東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般，此種近乎摧枯拉朽的勝利，或許來自民族主義浪潮的推波助瀾，實則經濟破產不啻是壓垮國民政府威望的最後一根稻草。根據統計，由於長期陷入戰亂的緣故，中國的經濟表現在整個一九三〇年代幾乎在全世界中墊底，至於一九三七至四五年的抗日戰爭，[\(註412\)](#)與隨後而至持續至一九四九年的國共內戰，更無異雪上加霜。[\(註413\)](#)最嚴重的挑戰來自崩潰性的通貨膨脹；與一九三七年戰爭前夕相比，物價指數足足暴漲了三點六兆倍，貨幣貶值幅度可謂史無前例。從總量看來，一九四九年的中國與當時先進國家工業水準的差距至少在一百年以上。[\(註414\)](#)

正所謂「水能載舟、亦可覆舟」，龐大且深刻的經濟壓力，既成為中國共產黨擊敗中國國民黨最有力之援軍，能否展現更有效率之解決問題能力，自然亦關乎新政權的存續與否。對此，透過全面國營化政策，通貨膨脹上升趨勢雖在一九五〇年初被遏止，不過只是治標而已，同年的參與韓戰一度讓中國再度燃起總體經濟威脅。[\(註415\)](#)在一九五三年終於撤出半島戰場後，中國隨即於一九五三至五七年推出「第一次五年計畫」，希望徹底解決經濟發展的結構困境。表面上看來，中國首度的計畫經濟嘗試可說取得了巨大成功，

國民收入平均增長率達到百分之八點九，農業與工業部門的年增長率也分別達到百分之三點八以及百分之十八點七；[\(註416\)](#)儘管如此，倘若計入兩個無法被忽視之環境背景，亦即長期戰亂導致過低的發展起點與來自蘇聯的大量援助，[\(註417\)](#)此一結果距離真正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顯然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正因有著解決經濟發展困境以維繫政權生存的迫切性，在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第二次五年計畫」中，中國乃冒險向所謂「三面紅旗」目標（過渡時期總路線、工農業生產大躍進、人民公社）邁進，結果不僅導致一九五九至六一年名為來自天災，其實人禍居多的經濟災難，[\(註418\)](#)也為不久後爆發的文革埋下伏筆。更甚者，隨著一九六七至六八年聲稱將「打倒一切」的運動高潮來臨，不單整個國家的經濟管理機構幾乎陷入癱瘓狀態，國庫總收入也從一九六六年的五百五十八億，銳減至一九六八年的三百六十一億元。或許正因前述負面發展刺激所致之反省，中國決心自一九七九年起推動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希望再度挽救由於錯誤經濟政策帶來之可能的政權危機。於此同時，為形塑一個有利於改革政策之穩定外部環境，它也以更「現實」且「理性」的做法來修正原先的外交作為。[\(註419\)](#)

例如，鄧小平便曾直言：「中國太窮，要發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環境裡才可能。……為了使中國發展起來，實現我們的宏偉目標，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誠心誠意地希望不發生戰爭，爭取長時間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國內四化建設。」[\(註420\)](#)又說：「中國要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也正在努力創造和維護這個和平環境。」[\(註421\)](#)事實上，自一九七九年「懲越戰爭」迄今，中國的確未曾進行過大規模對外軍事舉動，這也為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締造的「經濟奇蹟」打下良好基礎。至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亦不啻迫使中國繼續延長了前述現狀政策路線，從而使其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迎來經濟高速成長果實。根據統計，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七年間由三千六百二十四億增至七點四兆元，人均GDP由三百七十九元

增至六千零七十九元人民幣，對外貿易總額也從二百零六億增至三千兩百五十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中國在一九七九年後確定重回「內政優先」傳統思維，與其他王朝初期僅需一定時期「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便可達成穩定目標比起來，此際它還多了一個「經濟轉軌」的結構性挑戰，亦即如何從由國營企業為主的計畫經濟體制，轉成更開放的自由經濟，而且還得以弱勢後進者角色面對全球性貿易競爭。例如直到一九九五年為止，儘管改革政策已實施將近二十年，國營企業仍占工業產值三分之一與工業資產淨值三分之二，並聘雇著三分之二以上職工總數，[\(註422\)](#)更別提在此之外，還有財政赤字膨脹、不良債權威脅金融部門穩定、結構調整與「三農」問題、區域失衡與貧富分配不均、天然資源嚴重匱乏等諸多挑戰。由此可見，出現「中國崩潰論」聲浪不但相當自然，[\(註423\)](#)亦無怪乎中共會在二〇〇四年十六屆四中全會上公開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口號，主要目標便在瞄準前述一連串問題。

推動政治改革之必要性與意義 二〇一〇年九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受美國電視新聞網（CNN）節目主持人札卡里亞（Fareed Zakaria）專訪，暢談金融危機、經濟刺激計畫、人民幣升值，以及胡耀邦評價、網路管制和政治改革等重要課題，尤其在加快政治改革步伐方面，他特別以「風雨不倒，至死方休」來表達個人決心。

從某個角度看來，推動政治改革對當前中國而言確實相當關鍵。主要原因在於：首先，中國雖在一九一一年正式結束長期的君主王朝體制，表面上也自一九一二年起改採西方式共和體制，正如前文揭示，基於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中國實際存在之內部政治分裂與外部壓力，且不論此刻中國是否適合推動民主政治，實則此時期任何新的制度設計都沒有落實的可能性。至於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建政

後推動的「由工人階級所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之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雖有一九五〇年代後國內大致統一狀態所支撐，顯然意識形態色彩過度濃厚，若同時考量到當時全球兩極對峙結構與中國對蘇聯之暫時依附性，想依據自身真正需求制定一套完善方案既相當困難，尤其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領導時期，個人政治權力高於政黨與國家利益的情況下，想針對政治內涵進行理性思考顯然也不可能。可以這麼說，直到鄧小平自一九七八年起開始推動政治過程「常規化」後，有意義的制度思考才有機會出現。[\(註424\)](#)

儘管鄧小平希望以「權力分散」、「政治生活常規化」與「行政專業化」作為改革大方向，一九八二年版憲法也強調將「國家行政與黨的活動」在形式上予以分開，不可諱言地，中國政治實際權力核心迄今仍是中國共產黨，而非所謂政府。[\(註425\)](#)更甚者，無論在政權成立前期（幾乎等於毛澤東時期），著眼於透過高度民粹動員以解決自鴉片戰爭以來所累積之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多重長期發展危機，抑或自改革開放時期以來，希望轉而因應主流意識形態與經濟結構轉軌問題，明顯可見，如同楊光彬所言：「黨在國家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其在戰爭時期的一種自然延續」，[\(註426\)](#)確為事實。假若中國的發展始終無法步上常軌，政治體制內涵呈現浮動性自不可免，相對地，一旦經濟社會趨於穩定，透過進一步政治改革以便維繫能長治久安的格局也是當然之舉。

值得注意的是，謝慶奎等人雖認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中共唯一執政黨的法律地位，以及它擁有大量黨員和基層組織的現實，決定了中共在政府運轉過程中的領導核心地位，[\(註427\)](#)但這顯然是種「倒果為因」的政治正確說法。

正如本書一再重申，無法克服治理技術障礙之龐大「統治規模」問題，似乎是中國統治者在兩千餘年帝國時期中永遠揮之不去的夢魘，至於「禍起蕭牆」，則經常是帝國建構初期經常面臨的政治危

險。對當前的中共政權而言，不僅統治規模（包含地理與人口）挑戰不減反增，毛澤東對劉少奇與林彪等發起的政治鬥爭，也反映出類似禍起蕭牆之權力競爭過程，至於以堅持社會主義路線□無論是否具中國特色□作為政權正當性主要來源，其實與過去帝國時期透過「獨尊儒術」控制思想的意識形態作法殊無二致。更甚者，雖然部分學者認為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乃中共主要統治形式，[（註428）](#)中國因為人口眾多且土地遼闊，賦予地方高度自主權以便因地制宜本即傳統主流，[（註429）](#)中共政權也不例外，即便黨表面上擁有壟斷性領導地位，文革時期更一度集權於「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或毛澤東一人，改革開放後的「放權讓利」不啻仍理性地回歸傳統。[（註430）](#)

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即便身為霸權國家，社會發展也不可能不存在任何問題，美國亦然。進一步來說，對中國而言，當前的崛起態勢或可能讓它有機會擺脫百餘年來由於外部限制帶來之發展困境，至於在經歷了一陣顛沛頓挫，終於在所謂「大轉型」過程中邁進一大步後，隨著國家發展邁入相對穩定階段，政治制度的真正邁向常規化既有其必要，也是維持迄今經濟成果所不可或缺。對此，儘管鄧小平早在一九九七年去世，政治上的「後鄧小平時期」（Post-Deng Era），[（註431）](#)恐怕在二〇一二年才正式到來。原因在於，「人治」傾向始終是中共政權政治特色，毛澤東與鄧小平固然因其革命功績與個人魅力而獨攬大權，江澤民與胡錦濤等兩代接班人何嘗不是鄧小平意志下的產物，而非來自其個人能量。正因如此，由於鄧小平的意志只能與胡錦濤時期同時壽終正寢，加上中國如今正面臨規劃長期制度發展的關鍵時刻，政治改革在未來之迫切性既不難窺見，也是習近平時期無可迴避之挑戰。

戰略積極化之軌跡與潛在演進趨勢

隨著以歐洲為主的國際體系，自十九世紀末起陷入惡性競爭狀態，加上因此衍生出來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乃至於美蘇兩極冷戰等衝擊，不僅全球化進程受到遏制，世界擴張效應對中國帶來的壓力也稍稍降低。儘管如此，由於中國在二次戰後初期仍居於國際結構底層位置，包括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中日戰爭，以及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的接力摧殘，更使其總體國力盪到谷底，尤其冷戰初期對蘇聯之依附性，致使中共政權雖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基本上完成了建立「統一王朝」的地理要件，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以「獨立自主」作為外交方針之前，顯然中國在客觀形式上仍不得以現狀政策作為對外戰略之指導原則。

無論如何，總體情勢在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年代間有了重大變化。

首先在國內政治方面，雖然最高權力正當性來源始終未能真正落實「制度化」的目標（理論上均有法律可依循，實則僅供參考），在鄧小平個人魅力與威望籠罩下，中國至少有三十五年（一九七八至二〇一二）免於激烈政爭的穩定發展時期，從而提供社會與經濟恢復發展活力之關鍵基礎；其次，在前述有利的政治背景下，中國首先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一年透過強國家（strong state）途徑推動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又自一九九二年起藉由鄧小平「南巡」講話與「十四大」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政策之確認，由此開啟了無大躍進之名，卻有其實質的「二次改革開放」轉軌進程。[（註432）](#)正如羅沃（Jim Rohwer）指出的：「歐洲大約花了一千五百年才取代中國，成為最先進的文明，但目前全世界最重大的問題將是，如何面對一個充滿自信、擁有核武，且掌握了全球最大經濟體的中國」，[（註433）](#)暫且不論其政治前景如何，至少中國潛藏的經濟能量已難以置疑。[（註434）](#)

於此同時，霸權（hegemony）或超級強權（superpower）的存在雖未必是世界秩序穩定的保障，[（註435）](#)霸權衰落的過程仍將為國際體系帶來一定程度的不穩定變數；例如在蘇聯於一九九一年終結

後，原來的兩極體系自然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則是個不確定的未來。短期而言，目前體系或許維持著某種趨近「單極多邊」或「一超多強」的格局特徵，正如江澤民在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對當時國際情勢的評估：「多極化趨勢在全球或地區範圍內，在政治與經濟等領域都有著新的發展，世界上各種力量出現新的分化與組合，大國之間的關係經歷著重大而又深刻的調整。」至於長期來看，由於軍備管制逐漸共識化，合作性國際組織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未來似乎是個「最好的時代」，但因後冷戰時期以來族群紛爭不斷，南北經濟對抗與貧富差距日趨惡化，全球性糧食、人口與環保等問題至少就目前看來亦似乎沒有任何解決跡象，因此，未來也可能是個「最壞的時代」。

無論如何，冷戰體系結構轉型不僅牽動著主要強國的相對地位變化，對若干蠢蠢欲動的修正主義中等國家（例如歐盟與日本，當然也包括一九九〇年代的中國）而言，則在帶來挑戰同時，也提供突破了現狀的機會。

外交路線轉折：從永不當頭到有所作為 相較一九五〇與一九六六年分別因為參加韓戰與爆發文革，兩度帶來外交挫折，與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後正面形象呈現強烈對比的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對中共外交處境的影響或許更為深遠；這年恰好也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中共建政四十週年，以及中美關係正常化十週年。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經歷已有十年的普遍性改革不僅隨後扭轉其經濟結構，也逐步改變人民的生活方式與思維路徑，從而讓挑戰權威的想法應運而生，[（註436）](#)埋下了前述大規模政治示威事件的深層社會背景。[（註437）](#)對此，包括美國、歐洲共同體與日本等主要國際行為者，紛紛「藉機」提出各種制裁與管制措施、[（註438）](#)凍結官方互訪，並取消了部分合作計劃；至於事件帶來的國內政治效果，則

包括趙紫陽下台及所謂「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的繼任；從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被比擬為「新遵義會議」，並認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因此「挽救了黨」看來，可見此際中共面臨的嚴峻形勢。面對挑戰，鄧小平務實擬定了「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站穩腳跟，沉著應付，朋友要交，心中有數」等一系列方針，[\(註439\)](#)尤其具有消極守勢意味之「韜光養晦」說法，成為此後近三十年間中國處理對外關係時的核心原則。

鄧小平曾於一九八四年指出，中國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且真正的不結盟」，至於具體展現則為「四不（不結盟、不孤立、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一全（全方位進行外交活動）」原則；[\(註440\)](#)值得一提的，相較毛澤東時期對於短期間再度爆發全面性世界戰爭的期待，鄧小平在一九八五年指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很有可能」以及「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的看法，[\(註441\)](#)既表明中國外交決策將首要考量現實而理性的國家利益，也反映出顯著之現狀政策色彩。進一步來說，確實也唯有透過對外開放，在深化經濟改革中壯大自己，才可能真正幫中國達成獨立自主的目標；與毛澤東強調透過「對立」政策來達成「雖不結盟又（與第三世界）結盟」比起來，鄧小平時期的不結盟政策傾向於美蘇之間奉行某種平衡政策，例如在一九七八年透過正式建交與美國落實關係正常化同時，亦開始試圖與蘇聯改善關係，便是明顯例證。

在此期間，由於經濟改革以致總體國力開始增長，儘管一九八九年爆發的「天安門事件」迫使中國繼續延長前述現狀戰略，美國老布希政府在一九九二年將對中國之政策態度定調為「交往而非對抗」，[\(註442\)](#)同年底上台的柯林頓也將振興美國經濟、以推動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的擴大戰略取代圍堵政策、重新評估後冷戰國際局勢，以及透過多邊機制來解決爭端等列為外交主要目標，[\(註443\)](#)這些都有助於中國擺脫國際孤立。大體來說，由於外部環境漸趨有利，結果使中國不再如過去般長期抱持「受迫受害者」心態，強調應積極參與建構多極化新格局，並直接反映在從「十五大」到「十七

大」的政治報告當中，最明顯的區別在於，弱化過去傳統之「反霸」訴求，以及突出「大國外交」與「新安全觀」的重要性。

金駿遠（Avery Goldstein）指出，中國尋求的並非僅用來捍衛國家核心利益與應對外部威脅等「消極目標」之大戰略，而是為了服務於日益突出的「積極目標」，亦即使中國成為真正的超級大國；更甚者，其方法也不只是讓中國去適應既存的國際體系，而是進一步去主動塑造其新內涵。[（註444）](#)儘管如此，或許有鑑於文革時期推動躁進式「革命外交」的負面經驗，中國似乎傾向某種可稱「新俾斯麥式」（Neo-Bismarckian）之新戰略，亦即如同德國首相俾斯麥自一八七一年起，為消除歐洲各國對德國統一局勢之憂慮，所採取更積極與周邊國家合作對話的政策，[（註445）](#)事實也是如此。例如一九八九年首次確定「立足亞太、穩定周邊」的外交指導原則後，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一九九〇年底政府工作報告當中便指出：「發展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是我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述原則隨即於一九九二年列入國家正式文件，從而啟動了所謂「睦鄰外交」戰略路線。[（註446）](#)

根據中國官方政策說法，前述戰略主要目的在建立穩定和平環境的周邊戰略，指導方針首先從「和平共處五原則」（互相尊重彼此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出發，其次是秉持「區域合作五項指導」（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開放、共同繁榮、協商一致），接著以二〇〇二年「十六大」提出的「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方針為出發點，透過「三鄰」（富鄰、睦鄰、安鄰）準則，[（註447）](#)然後以「大國為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之宏觀戰略布局基軸，強化中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作為爭霸全球的基點。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早期強調「和平共處」時所暗示之消極守勢姿態，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推動的「睦鄰外交」不啻有著更積極進取的意涵；在此一背景下，中共中央黨校前常務副校長鄭必堅首先在

二〇〇三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中，開啟了有關中國「和平崛起」議題的討論，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著在二〇〇四年十屆人大會議上闡釋了「和平崛起」的要義，強調「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中國將來即使強大也永遠不會稱霸」。儘管在二〇〇五年後，為免刺激其他主要國家（尤其是美國），中國刻意在公開場合中不再提及相關論調，或將詮釋定位為「和平地崛起、透過和平方式崛起，與為了和平而崛起」，[（註448）](#)甚至希望轉而以「和平發展」取代「和平崛起」，相關主題仍然成為中國學術圈的討論熱點。

習近平上台後，非但其外交部發行之刊物《世界知識》在二〇一三年初宣示，中國外交正在從「韜光養晦」向「主動作為」轉變，根據習近平二〇一四年底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首先總結性地指出，近期中國外交的重點包括了「著眼於新形勢新任務，積極推動對外工作理論和實踐創新」，至於未來應把握「當今世界是一個變革的世界，是一個新機遇新挑戰層出不窮的世界，是一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的世界，是一個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並朝著有利於和平與發展方向變化的世界」之觀察視野，「切實抓好周邊外交工作，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外長王毅接著進一步闡釋前述講話指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旨在走出一條與傳統大國不同的強國之路」。據此，《紐約時報》乃在二〇一四年底認為習近平已放棄「韜光養晦」，轉而積極於大國外交政策的說法，[（註449）](#)顯然並非完全只憑臆測而來。

全球大戰略之討論與發展 自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來，[（註450）](#)面對後冷戰時期降臨帶來之衝擊，中國不僅積極去重新理解並體認在新體系環境下的「世界格局」，透過改革開放累積之正向發展作為基礎，也開始觀察自身相對國際地位變化（亦即「中國崛起」未來發

展)並給予期待,再加上為了回應以美國為主之「中國威脅」挑戰,中國於是逐漸興起一股對於「大戰略」的討論。

其中,所謂「大國信念」扮演了相當重要的心理角色:例如胡鞍鋼指出:「富民強國是千百年來中國仁人志士心中的夢想,建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一直是新中國幾代領導人帶領中國人民為之奮鬥的偉大目標」,[\(註451\)](#)葉自成開宗明義地闡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需要大戰略」,[\(註452\)](#)時殷弘認為:「作為一個應有長期性國際政治抱負的大國,中國需要有某種從長遠來看合理有利的外交哲學」,何況追求強國地位乃「百年來中國許多志士仁人所希冀、所追求的大目標」;[\(註453\)](#)由此,無論欲復興固有國際地位與影響力,或希望重新扮演長期擁有的傳統大國身分,基於國內對「中國崛起」態勢的普遍正面共識,除透過諸如「大國外交」等戰術性政策來調整自我地位外,[\(註454\)](#)如何透過更廣泛之理性建構與政策安排,來滿足前述心理設定,便成為當前中國學界討論大戰略問題之「務實性目的」所在。

如同甘乃迪(Paul Kennedy)所言:「在世界事務當中,領先國家之間的相對力量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其主要原因是,不同社會間不同的發展速度以及技術與組織機構的突破,將為某些特定國家帶來更大好處的結果。」[\(註455\)](#)當前全球針對「中國崛起」的討論不僅反映出類似之相對力量變遷態勢,事實上,中國也對此做出正面回應,例如二〇〇二年的「十六大」報告便明確指出,「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註456\)](#)至於抓住此一戰略機遇期的直接辦法,便是建構出一套足以因應世局變化的大戰略框架。儘管對於中國當前大戰略方向與實質內涵究竟為何,始終沒有官方說法可以佐證,迄今以學術界為主的討論,亦若非過度主觀,便大多流於為國家政策辯護張目,前述胡錦濤在二〇〇四年所提出「大國為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的宏觀佈局概念,仍舊值得探究與思考。

首先，在崛起乃至成為「世界大國」的過程中，中國固可自許為「願意在國際社會中發揮更大作用，作負責任的國家，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社會進步」，[\(註457\)](#)客觀看來，由於結果終將改變當前權力平衡結構，因此必然引發大國（既得利益者）側目，至於能否與其周旋甚至取得妥協，既是維持現狀的前提，也是突破現狀的關鍵。其次，無論從全球地緣政治板塊變遷現實或過去大國發展之歷史經驗看來，能否獲得「勢力範圍」作為戰略支撐，可說極其重要；儘管中國學者聲稱「中國在亞洲沒有甚麼威嚇他人的戰略目標」，[\(註458\)](#)根據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在二〇〇八年發佈首份以「建設合作共進的新亞洲：面向二〇二〇年的中國亞洲戰略」為主題之《亞洲戰略報告》，一方面強調全球政治和經濟重心正繼續向亞洲轉移，至於中國亞洲戰略總體目標則應當考慮「通過同有關各方共同努力，營造中國現代化有利環境，建設地區利益共進機制，推動地區綜合安全，達成一具時代特點的共同價值觀，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地區秩序」，其中的積極意涵可謂不言而喻。尤其在美國推動「重返亞洲」後，俞正樑更強調，「南面（按：以南海為焦點之東亞地區）是我國周邊地區的重要面向，……構成我國大戰略的支撐重點，一定要穩住」。[\(註459\)](#)

一旦中國與主要國家達成新的平衡趨勢，又獲得周邊地區主導權作為權力依託，接下來，「帝國化政策」勢將自然浮現出來。如同透過穩定周邊環境以徹底達成維持安全現狀之目標一般，在更大的全球格局中取得立足點，對未來能量進一步擴張也至關重要；隨著中國因經濟起飛致使國際地位因此慢慢「大國化」同時，所謂「南南合作」不僅成為其新階段對外政策之重要組成部分，更因其特殊歷史身分，亦即「曾經」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使其可以利用橫跨在南、北方國家之間的橋梁角色，既「韜光養晦」又可藉機「有所作為」。

大國外交轉型升級與中美關係激化 無論中國是否有從長期「現狀政策」立場，轉而趨向「帝國化政策」方向發展之可能性，由於「大國外交」具有承前啟後性質，在此必須先進一步深入分析。

大體言之，中國的「大國外交」政策發展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來觀察：首先，在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年代的第一階段中，除了「大國外交」之名尚未彰顯外，重點乃是「與大國關係正常化的外交」，目的在解決過去一邊倒與革命外交時期中，與國際環境之間的意識形態與利益衝突，更重要者，乃為了配合「十二大」後深化經濟改革開放政策所需，透過關係正常化與主要大國（美蘇）達成諒解，爭取「重新」加入國際社會，同時為必要之「引資」工作提供更具說服力之正面形象。至於起自新世紀的第二階段（主要為胡錦濤時期），則可稱為「走向大國之路的外交」，[（註460）](#)目的在面對世紀之交的國際格局轉變，以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崛起所累積的資源鋪墊，透過「夥伴外交」等諸多新模式，配合闡釋中國崛起路徑與世界新格局內涵之具中國特色的新理論，更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並試圖修正過去「韜光養晦，鬥而不破」基本立場，設法將中國「再度」推往大國地位，完成「再崛起」（re-rising）之歷史使命。

儘管中國迄今對自身能量評估仍趨謹慎保守，自習近平二〇一二年年底接任總書記以來，無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中國夢」，二〇一四年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遞好中國聲音」，乃至在「十九大」報告中突出「兩個一百年」概念，並設定「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二〇三五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二〇五〇年達到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再再顯示中國近期以來日益增強之自信，尤其二〇一四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之指導地位後，不僅其外交部公開表述「二〇一三年是開局之年，二〇一四年是佈局之年，二〇一五年是全面推進之年，二〇一六年是開拓攻堅之年」，以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為主的作為，亦不啻透露出「爭霸」或將成為新階段大國外交之潛在目標所在，也將其推入「大國外交」可能之第三階段發展。

無論如何，與既存霸權美國之間的互動，不但是大國外交中最重要的一環，美國迄今大體上還是居於較主動地位，二〇一八年發起「貿易戰」便是一例。冷戰結束與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的勝利，雖似乎讓美國得以鞏固其作為全球唯一霸權的地位，於此同時，用以支撐之物質基礎（經濟能量）看來卻慢慢難以負擔巨大的霸權義務，尤其在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其次，它雖在多數競爭指標中依舊維持優勢，部分行為者短期內或許不可能「超越」它，仍舊顯現出明顯之「追趕」態勢，例如始終無法被正確估計經濟實力的中國便是其中之一。[（註461）](#)更甚者，中國不僅漸漸擁有挑戰美國的客觀條件，甚至看似也有著準備加入競爭之積極作為，例如二〇一三年起引發熱論的「帶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從而讓其崛起成為美國霸權寢食難安的棘手挑戰，也提供美國從二〇〇九年發起「重返亞洲」政策，二〇一七年又將其延伸擴大為「印太戰略」的思考背景。對此，相較二〇〇七年「十七大」政治報告指出，「將繼續同發達國家加強戰略對話，增進互信，深化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推動相互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二〇一二年「十八大」聲稱「將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關係，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二〇一七年「十九大」報告則不再特別突出發達國家對象，轉而提倡「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儘管未曾明言，顯然暗示中國將預備從某種新的制高點，迎接「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國際新情勢與新地位。

帝國可能性與世界秩序之未來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配合國家戰略重心變遷、自身綜合實力上升，加上國際格局產生變化，中國也持續調整自身政策來彈性因應各種挑戰，儘管維持「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

礎、多邊是重要舞台」基本原則，其戰略核心與原則內涵仍根據情勢呈現出階段性發展特徵。當然，此處所關切的不僅僅是中國的發展，而在於它將如何邁向下一步，從而影響整個世界之未來發展。

帝國之過去與未來 假使不考慮由於特殊殖民經驗，以致所謂「帝國」（empire）相關概念在第三世界地區可能存在之貶抑意義，回到其客觀現實與歷史定位，帝國能否存在固然與主要行為者如何克服地理障礙（世界規模）有關，更直接彰顯於它是否能提供最終公共財（秩序），由此，「世界 - 帝國 - 秩序」之關聯乃昭然若揭。例如，柄谷行人便試圖指出，「現實中明明是帝國的交替，卻被看作是王朝的交替，因此喪失了作為帝國的觀點；……所以，在以中國史為思考基礎的同時，也必須超越王朝史的觀點來思考帝國，如果這樣做的話，中國史將呈現出不同面貌」；[（註462）](#)進言之，「帝國不是光靠軍事征服就可以形成，也不是單靠暴力的強制便可以維持，必須要有眾多國家的服從」，至於獲致服從的關鍵，如同前述，闕在於能否提供秩序與穩定之交換體系。

形成帝國之第一個要素，乃擁有足夠的能力去控制世界。理論上，世界愈大則需要之控制與創造秩序的能量也愈大，這也是前面提到「世界擴張效應」對中國重建帝國帶來制約的緣故，儘管如此，建造帝國的能源與世界規模之間並不具備絕對比例關係，無論從義大利半島上的羅馬城邦共和國到環地中海的羅馬帝國，從春秋初期還僻居一隅的半游牧秦國到建立東亞體系雛型的秦帝國，從英倫三島到控制全球陸地四分之一的大英帝國，從北美十三州到橫跨兩洋且擁有海外屬地的美國，都顯示了創造帝國的無限可能性。當然，十九世紀英國與二十世紀美國的「帝國屬性」有待商榷推敲（一般認為它們僅止於霸權，離帝國仍有一步之遙），事實證明，只要具備必要之制度支撐，能量累積與爆炸性增長並不是問題。

關鍵在於「世界」，它意指一個聚焦於特定人群活動之地理範圍。可以這麼說，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不僅互動密切，有兩個前提絕不能忽視，亦即「人既逐利而居，活動範圍也不可能真正無遠弗屆」，換言之，人類移動有非常明顯之目的性（交換），且因距離與利潤在多數情況下呈反比關係，不可能漫無目的四處遊蕩。不可否認，世界範圍經常隨著帝國核心文明增長（暗示投射能力延長）而擴大，但歷史亦昭昭在目，世界崩解乃至最終只能由考古學家來追尋發掘其遺跡，也是不斷重複上演的事實，問題出在何處呢？個人認為，因為「真正的世界」（能被有效管理且存在一定秩序，非僅僅指特定地理區塊）往往是由帝國形塑建造的，其耐久性自然與帝國制度效能成正比。

由於近代國族主義與主權觀念影響，目前對人類歷史論述多被迫陷入後設性之國家中心窠臼，雖名為全球化，無論情感、利益與視野都顯得對立零落，這非但是人類無法有效處理當前多數跨國性問題（例如氣候變遷）的背景，傾向從野心與欲望角度來詮釋國家擴張（雖未必不是事實），忽略「世界秩序」此一公共財之需求，亦不能不說是當前人類看似科技進步幅度突飛猛進，生存挑戰依舊層出不窮之矛盾根源。對此，近代歐洲帝國主義與傳統帝國的差異，或可提供某種啟發。如同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書中所言，[（註463）](#)讓永續性世界帝國得以成立的，乃如同羅馬共和國一般，本質上以普遍法為基礎的政治形態」，這使其在征服後能實際統合性質極度相異的民族集團，非但國民國家（按：指現代主權民族國家）不具備這樣的統合原理，至於歐洲帝國主義不變之最高原理，則是「膨脹」，但它並非源自政治概念，而是來自商業投機領域，意味著工業生產與經濟交易永無休止的擴大。很顯然，這乃是人類歷史在近代歐洲主導下產生之質變，至於此種變化究竟具階段性抑或有著永久性暗示，既須持續觀察，現實上則已經對既存霸權美國帶來了戰略障礙，或許也是它在新世紀初試圖追求建構帝國，但最終遭遇頓挫的關鍵所在，

回到中國，根據前述從傳統經驗客觀歸納出來之分類特徵，當前中國確實由於國力增長且國際體系內涵也存在有利環境，因此在外交戰略上有逐漸朝「帝國化政策」轉進的趨勢。當然，依舊作為主流之國家中心思維，以及一度由於歐洲內部競爭與美蘇冷戰而頓挫的全球化浪潮在二十世紀末重新啟動，或將提供足以遏制前述政策趨勢之「世界擴張效應」（如同明代面對的地緣環境），但另一股區域整合浪潮與地緣政治板塊化之發展傾向，尤其隨著美國重返孤立保護主義而可能裂解由它創造的準世界秩序，亦不啻潛藏另一種可能（如同蒙古歐亞世界崩解，使清代得以重建帝國一般）。無論如何，從歷史經驗可見，即便最終無法成功地完成建構帝國之目標（例如宋代與明代），一旦存在某種可能性（主要是藉由統一整合內部，並完成相當程度之經濟能量積累），中國總會進行若干擴張嘗試，當然，絕沒有任何成功保證。

當前中國外交之若干熱點及其意涵 從歷史經驗看來，無論大國或霸權崛起條件內涵有何變化，為尋求提升地位並發揮影響力，軍事能量的運用與展現或無可避免；當然，衝突未必是唯一形式，如何將其運用在外交政策上，也是當前國際關係重要一環，此即所謂「軍事外交」（military diplomacy）；[（註464）](#)從某個角度而言，這也是傳統軍事力量在全球化浪潮下的工具性質變。

有關中國軍隊與國外的交往，過去一般統稱為「中外軍事交往」，直到一九九八年官方才首度出現「中國積極展開全方位、多層次的軍事外交」說法。[（註465）](#)根據二〇〇八年版《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內容，它已與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建立軍事關係，在一百零九個國家設立武官處，有九十八個國家在中國設立武官處（此一訊息在二〇一〇年版並未列入），可見解放軍在外交體系中的活躍角色；其中，自一九九八年申請加入聯合國維持和平方行動特別委員會後，至二〇一七年為止，中國已向二十四項任務派出軍事人員近四萬人次。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影響力向外延伸象徵，海軍活動也是中國

軍事外交的重要項目之一，包括：一九七七年首度派遣艦艇穿越島鏈進入西太平洋、一九八五前往南亞進行第一次正式出訪活動、一九九七年首度組隊橫渡太平洋抵達美洲地區、二〇〇〇年首次訪問非洲、二〇〇二年啟動超過航程超過三萬海里之首度環球遠航、二〇〇五年首度在境外與外軍（巴基斯坦、印度和泰國）舉行以聯合搜救為主要內容的非傳統安全領域演習、二〇〇八年以對抗海盜和護航為名向亞丁灣海域定期派出巡航艦隊、二〇一〇年首度穿越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二〇一二年首艘航母遼寧號正式服役、二〇一六年首度進入黑海與俄羅斯進行聯合演習、二〇一七年正式啟用吉布地海外基地等，這些都不啻擴大其軍事外交的影響力。

其次，太空範疇對未來大國競爭顯然日益舉足輕重；這從新世紀初包括美國、俄羅斯、以色列、日本、韓國和歐洲等紛紛發射軍事衛星可見一斑。對中國而言，包括：一九五六年啟動太空計劃、一九七〇年發射首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使其成為世界第五個擁有運載火箭和獨立發射衛星的國家、一九七五年成為繼美國與蘇聯後第三個掌握衛星發射和返回技術的國家、二〇〇〇年成為繼美俄後第三個擁有自主導航衛星系統的國家、二〇〇三年成為繼美俄後第三個掌握載人航太技術的國家、二〇一三年發射「嫦娥三號」成為第三個將宇宙飛船送上月球的國家、二〇一八年自製「北斗」衛星系統完成全球性覆蓋並成為首個探訪月球「背面」的國家等，未來則預計在二〇三〇年左右測試載人登月。[（註466）](#)除此之外，多邊合作也是中國透過太空計畫落實軍事外交的重要管道。[（註467）](#)

再者，無論是為打通國際貿易路線、解決發展過程中的東西部差距並擴大西部發展腹地，同時將影響力延伸至整個歐亞大陸，近年來中國積極投入周邊區域的多國性交通建設工程計畫。不管是「泛亞公路」（Asian Highway, AH）或「泛亞鐵路」（Trans-Asian Railway, TAR），[（註468）](#)中國都積極參與推動。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二〇〇〇年在國務院下組建「新亞歐大陸橋國際協調機制」、二〇〇四年提出「中 - 吉 - 烏國際鐵路」計畫（中國喀什 - 吉爾吉斯奧什市 - 烏茲別克安集延）、二〇〇六年全長一千一百餘公里的青藏鐵

路（從格爾木至拉薩）正式通車、二〇一〇年聯合其他四國（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與伊朗）簽署《中 - 伊鐵路建設初步協議》、[（註469）](#)二〇一一年起開通直達歐洲之「中歐班列」貨運通道、[（註470）](#)二〇一四年青藏鐵路從拉薩到日喀則段通車（拉日鐵路），[（註471）](#)同年在上海合作組織推動簽署《政府間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協定》等，都顯示中國試圖透過跨國交通建設延伸其地緣影響力之積極作為，起於二〇一三年的「一帶一路」倡議，目的或至少也在改寫從中亞到西亞的地緣政治版圖。

根據二〇〇二年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屆四中全會中所確立的「中國新時期外交工作的目標、任務和策略」，重點放在開展雙邊外交、區域外交、多邊外交，以及大國外交、發展中國家外交和經濟外交上。其中在區域外交部分，主要希望能透過所謂跨區域主義（trans-regionalism）概念，與各區域展開廣泛互動，並迅速建構了與世界各主要區域之間的官方與半官方，甚至民間論壇式溝通管道。首先在拉丁美洲部分，主要進展包括一九九〇年與里約集團（Rio Group）建立外長級對話機制、一九九七年起與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推進雙邊對話、二〇〇〇年與安第斯共同體（Andean Community）簽署建立「政治磋商與合作機制」的協議、二〇〇五年首度召開「中國 - 加勒比經貿合作論壇」、二〇一五年與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共同體（CELAC）推動「中國 - 拉共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等。其次，在亞太地區方面的進展包括：一九九五年起與東協開始展開「中國 - 東盟高官政治磋商」副部長級年度磋商、一九九七年參與東協主導之「十加一」與「十加三」機制、二〇〇四年推動舉辦「中國 - 東盟博覽會」並宣佈廣西南寧為永久會址、二〇〇六年舉辦首屆「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等。至於針對其他第三世界區域部分，包括一九九〇年代起透過「七十七國集團 + 中國」模式共同面對第三世界發展壓力與外債問題，[（註472）](#)二〇〇〇年聯合非洲國家共同創立的「中非合作論壇」、[（註473）](#)二〇〇三年起推動三年一次的「中國 -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二〇〇四年起與阿拉伯國家聯盟成立「中國 - 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等，充分

顯示其交流觸角已幾乎毫無遺漏地涵蓋全球各區域，就其特殊性質，或者可以「論壇外交」（forum diplomacy）稱之。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快速崛起，正如部分學者指出，其形式與內涵並不僅著重硬實力的擴張，軟實力（soft power）的影響範圍亦開始滲透世界各地，且威脅美國既存利益的可能性亦正與日俱增當中。

例如，奈伊（Joseph S. Nye）便於二〇〇五年指出，中國與美國全球軟實力呈現此消彼漲之趨勢，[（註474）](#)庫朗齊克（Joshua Kurlantzick）更於二〇〇七年描述中國「魅力攻勢」發揮的全球影響力。[（註475）](#)從某個角度來看，經濟、文化與意識型態等因素，由於冷戰以來核武嚇阻與非戰觀念普及化，一定程度凍結武力使用後，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確實越來越重要，國家的文化普世主義、建立對己有利之規則制度，以及控制國際行為領域的能力，既逐漸成為當代更重要的權力來源，這種新來源就是所謂軟實力。[（註476）](#)進言之，儘管溝通與強制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始終同樣極重要，相較西方傳統上努力「去異求同」，追求結果的一致性，中國強調保存多樣性的「求同存異」不啻提供了另一種思考方式。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智庫國家民主基金會在二〇一七年提出了「銳實力」（sharp power）概念，[（註477）](#)意指針對特定國家發動顛覆滲透，並以利刃般外交手段達到在境外壓制言論乃至操控意識形態等目的，至於俄、中兩國則被一起歸類為最具侵略性的「銳實力」大國。

中美交鋒：邁向未來的新起點 無論如何，如何面對既存霸權美國，絕對是中國處理自身崛起問題時的「重中之重」。對於中美關係未來「應然」或可能發展，王逸舟將一九八九至二〇〇二年視為中國對外關係在「冷戰結束後的適應與調整時期」，並將其後稱為一個「全新成長時期」，[（註478）](#)於此同時，美國在小布希總統於二

○○一年上台後，隨即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此一觀點也反映在二○○二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當中。[\(註479\)](#)隨著雙方互動日益複雜深刻，不僅佛格森 (Niall Ferguson) 在二○○七年創造出「中美國」(Chimerica) 新詞彙，強調由最大消費國家 (美國) 與最大儲蓄國家 (中國) 構成的利益共同體，將對全世界經濟發展帶來無可忽視之重大影響，[\(註480\)](#) 伯格斯坦 (Fred Bergstan) 更緊接著於二○○八年提出所謂「G2」概念，主張兩國應建立平等協商領導全球經濟事務的模式，以便應對中國在匯率與貿易等問題上對美國利益的挑戰。[\(註481\)](#) 可以這麼說，面對中國對美國全球地位的直接威脅，如何「奮戰至最後一刻」以捍衛自身霸權地位，仍相當自然地反映在近年美國全球戰略內涵的調整中。正如眾所周知，崛起中國家與既存強權之間經常發生戰爭；[\(註482\)](#) 那麼，中美未來可能避免此種場景嗎？

個人認為，關鍵恐怕同時在雙方身上。

中美關係不僅是「當前世界主要國家中矛盾最深刻的一對關係」，[\(註483\)](#) 對於將中國視為「正在崛起且不滿當前國際秩序現狀之大國」的美國，除非面對內部結構瞬間崩解的挑戰 (可能性實在不高)，否則即便優勢正在逐漸消失當中，亦很難想像它採取放棄領導權的政策；相對地，對於國力不斷攀升，且存在著歷史性擴張壓力 (透過對外擴張來回應近百年歷史留下之心理創傷) 的中國而言，「富貴不還鄉，有若錦衣夜行」的傳統亦使其不可能不採取更積極主動之作為，何況這也符合過去「帝國化政策」之歷史經驗特徵。當然，這也未必暗示雙方必然爆發大規模衝突。尤其在具有濃厚相互依賴特徵的全球化環境當中，國家之間的互動本來便是複雜且相當多元化的，何況對美國與崛起中的中國來說；例如謝淑麗 (Susan Shirk) 便指出，「中美經濟日趨相互依賴，扭轉了中國領導人對雙邊關係的思考方向」，尤其「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賴，更使中國必須小心維護與美國這為大買家的關係」，[\(註484\)](#) 不過，美國日益惡化的財政負擔顯然正修正著前述關係，其結果首先是讓中美地位更加「平等化」，由此中國對美國霸權的威脅也愈發明顯。

正是在此邏輯下，美國近年來對中國戰略作為似乎透露出「硬的更硬，軟的也硬」的新走向，無論強化區域軍事佈署措施或不斷擴大演習規模、藉由超強話語權在東亞與全球繼續形塑「中國威脅論」氛圍，乃至二〇一八年正式發起「貿易戰」等，無疑都反映出美國對當前現實發展之某種焦慮感。

其次，除「客觀能力」外，「主觀意願」也是觀察中國未來走向的重點，至於能否找到修正自一九八九年以來「韜光養晦」原則之足夠正當性，更為關鍵。對此，自天安門事件以來，由於政權正當性受到衝擊，加上中國轉往市場導向經濟發展後，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導性（以及作為共黨統治的正當性基礎）無可避免受到挑戰，致使中國在一九九〇年代似乎有愈來愈依賴民族主義的現象，[（註485）](#)日本則一度首當其衝成為宣洩的主要對象，其次，激進民族主義者經常將中國描繪成西方自私侵略與霸權野心擴張下的犧牲者，既存霸權美國不但當然屬於西方，自然也成為反制對象。[（註486）](#)因此以「反美」為口號，一方面成為中國近年來在擴張海權時重要之正當性支柱，[（註487）](#)加上如同前述，美國近年來相當顯著且積極的區域戰略佈局，難怪愈來愈多觀察家開始悲觀地預期著中美之間或將無可避免的一場衝突。[（註488）](#)

依舊充滿不確定性之帝國與世界秩序未來 總的來說，從新世紀以來中國對外政策的實際作為，針對其未來可能的區域與全球戰略佈局，以下幾個角度或許是值得進一步加以深思的。首先，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說，無論未來「世界」將繼續朝全球連結邁進，還是產生全球化逆流而重新切割成幾個地區，一定程度之內、對外部之「開放性」或將繼續是未來世界特徵之一，換言之，即便近代世界擴張效應帶來之壓力縮小，「走出去」將是中國難以迴避的政策路徑；據此，海權發展直接關係到未來地區安全與穩定，也是在下一個階段中，中國是否或如何重塑東亞秩序的重要指標之一。尤其在一四

三三年鄭和最後航行結束後，中國一度遠離了海權競爭，[\(註489\)](#)甚至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幾乎喪失海上自衛能力，如今則顯露積極重返海洋舞臺的企圖心；實際上，目前全球九成的貨輪都是中國承造的，[\(註490\)](#)至於遼寧號在二〇一二年正式列入編隊與首艘自製航母在二〇一七年下水，亦充分展現出中國擴大在西太平洋影響力的決心。

無論如何，更重要的是，即便自信心上升使其對外作為日益正面積極，不管從甚麼角度看來，別說是建構帝國，中國就連「稱霸」的能量都稍嫌不足，目前唯一浮現的或只有美國相對衰退帶來的「機遇期」罷了。根據本書分類，目前中國雖顯露出修正「現狀政策」之跡象，但是離「帝國化政策」還有一段距離，更何況，且不論中國絕非「後美國時代」霸權的唯一競爭者與候選人，從新自由制度主義角度看來，「霸權之後」亦未必一定補上新霸權，透過迄今累積之發展經驗，國家之間選擇藉由制度化途徑來面對未來挑戰之選項同樣存在。[\(註491\)](#)

總的來說，面對不確定之中國與世界秩序，我們既須回首過往，設法從傳統中去尋找某些蛛絲馬跡或啟發，也必須持續注視著隨時降臨之未來，在儘量保持價值中立之客觀理性思索下，突破充斥著「二律背反」(antinomy)之人類行為複雜性，從而掌握下一階段歷史發展之潛在軌跡。

(註404) 謝益顯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十至一二。[↑](#)

(註405) 包括一九四七年的《哈爾濱協定》與一九四八年的《莫斯科協定》。Andrei Ledovsky (曾任職於蘇聯駐中國大使館)，“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 and Feb. 1949,” Far Eastern

Affairs, 2 (1995), p.79；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頁七〇三至七〇四；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五七年）。不過，也有人對前述兩項協議的存在持懷疑態度。[↑](#)

（註406）參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頁一四七七至一四七八。[↑](#)

（註407）其主要內容包括：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之行動。請參考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二五。[↑](#)

（註408）張光，《中國的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一五至一六。例如雙方同時簽訂了一個貸款協定，中共獲蘇聯貸款十二億盧布（三億美元）；另外，在「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中，中共允諾與蘇聯共同管理中長鐵路，共同使用旅順及大連；並成立「民用航空」、「大連造船」，和新疆的「中蘇石油」、「中蘇有色金屬及稀有金屬」等四個合營公司，尤其最後一項還涉及鈾礦開採特權。Serge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21-127.[↑](#)

（註409）Nikita Khrushchev, trans. by Strobe Talbott, *Kh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p.463.[↑](#)

（註410）傅啟學，《三十年來中美中俄關係的演變》（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頁一二八、一三四。[↑](#)

(註411) Stuart Schram,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5。文化大革命起點說法有二：其一起自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透過姚文元發表文章抨擊吳晗所編《海瑞罷官》一劇，其二則起自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通過「五一六通知」，成立一個全新的「中央文革小組」。↑

(註412) 中國官方自二〇一七年起，將傳統關於中日「八年戰爭」說法延長至「十四年戰爭」，亦即將起點從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件移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

(註413) 費正清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頁一三一至一三五。↑

(註414) 董輔初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卷》（香港：三聯書店，二〇〇一年），頁一三。↑

(註415) 由於參與韓戰的結果，中國國防經費從一九五〇年的二十八億增至一九五二年的近五十八億元，總計三年共投入六十億元戰費；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一九九三》（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二二一。↑

(註416) 馬洪、孫尚清編，《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一〇六。↑

(註417) 蘇聯對中國的援助由一百五十六個項目組成，其中包括七個鋼鐵廠、二十四座發電廠與六十三個機械製造廠；儘管接受貸款約僅有四點三億美元，約有二點八萬名中國技工前往蘇聯接受訓練。↑

(註418) 根據估計，一九五九年中國糧食產量約較前一年下降百分之十五，一九六〇年又在此基礎上再下降百分之十五，致使全國糧食、棉花產量跌回一九五一年的水平。直到大躍進結束之後的一九六二年，糧食產量才開始回升。[↑](#)

(註419) 中共政權早期外交並不乏現實主義觀念，但意識型態色彩確實較濃；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pp.6-7.[↑](#)

(註420) 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八十至九十四。[↑](#)

(註421)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一一二。[↑](#)

(註422) 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一九九六》（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註423) 參考：章家敦，《中國即將崩潰》（台北：雅言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小林熙直編，《中國經濟的危機》（台北：經濟新潮社，二〇〇三年）；納瓦羅（Peter Navarro）著，褚耐安等譯，《中國戰爭即將到來》（台北：培生集團，二〇〇七年）。[↑](#)

(註424) 克里斯香申（Flemming Christiansen）與雷伊（Shirin Rai）著，黃烈修、潘兆民譯，《中國政治與社會》（台北：韋伯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一四一至一四三。[↑](#)

(註425) 俞可平，《中國政治體制》（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一；楊光彬，《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二〇〇七年），頁八。[↑](#)

(註426) 楊光彬, 《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 頁二八。↑

(註427) 謝慶奎、楊鳳春、燕繼榮,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圖書公司,一九九九年), 頁一八〇。↑

(註428) See Doak A.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5-55*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4).↑

(註429) 朱光磊, 《中國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公司,二〇〇四年), 頁一二。↑

(註430) 吳惠林、周亞貞, 《放權讓利:由產權理論談中國經改》(台北:中華徵信所,一九九八年); 值得一提的是, 所謂放權讓利表面上雖僅涉及經濟改革層面, 但尤其對具集權傾向的中國而言, 其政治意涵與象徵意義也相當重要。↑

(註431) See Joseph Y.S. Cheng, *China in the Post-Deng Er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David Shambaugh, *China's Post-Deng Military Leadership* (Stanford: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John Wong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Post-Deng Er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註432) Wang Gungwu, "China's New Paths for National Re-emergence," in Wang Gungwu and John Wong, eds.,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95-148; 高長, 《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公司,二〇〇四年), 頁三〇至四〇。↑

(註433) Jim Rohwer, "When China Wakes," *The Economist*, 28 November 1992, pp.3-18.↑

(註434) William Overholt, *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3); Willem van Kemenade, *China, Hong Kong, Taiwan, Inc.: the Dynamics of a New Empire* (New York: Knopf, 1997); Geoffrey Murray, *China: the Next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註435)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 (1981), pp.242-259; Robert O.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 1967-1977," in Ole Holsti, Randolph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pp.131-162.[↑](#)

(註436) Orville Schell, *Discos and Democracy: China in the Throes of Reform* (New York: Praeger Press, 1988), p.132.[↑](#)

(註437)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erment i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Chapter 1.[↑](#)

(註438)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Hostility to Engagement, 1960-1998*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999), Document 01148.[↑](#)

(註439) 相關方針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社會主義的中國誰也動搖不了」，頁三二八至三三四，「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頁三四六至三四八，「中國永遠不允許別國干涉內政」，頁三六一至三六四。有時也簡化為「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站穩腳跟，有所作為」之十六字方針，見唐家璇，「當前國際形勢與我國對外關係」，《解放軍報》，一九九四年三月七日。[↑](#)

(註440)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二三三；梁守德、劉文祥，《鄧小平的國際政治理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一六七至一六九。[↑](#)

(註441) 見□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一二七。[↑](#)

(註442) 請參考國務次卿坎特（Arnold Kanter）在國會中的報告，見《中美關係專題研究，一九九二—一九九四》（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一九九〇年），附錄II，頁三五二至三五八。[↑](#)

(註443) Bradley Patterson, Jr. *The White House Staff: Inside the West Wing and Beyon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p.52-57.[↑](#)

(註444) 金駿遠（Avery Goldstein）著，王軍、林民旺譯，《中國大戰略與國際安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頁二七。[↑](#)

(註445) Avery Goldstein, “China’s Emerging Grand Strategy: A Neo-Bismarckian Turn?”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Asia 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57-106.[↑](#)

(註446) 朱聽昌編，《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四五；陳向陽，《中國睦鄰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註447) 繼中國國務委員唐家璇在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九日於雲南召開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部長級會議」首次提出了「安鄰」和「富鄰」概念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著在同年十月七日出

席首屆「東盟商業與投資峰會」時，首度完整提出「睦鄰、安鄰和富鄰」政策理念。[↑](#)

（註448）夏立平、江西元，《中國和平崛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前言。[↑](#)

（註449）Jane Perlez, “Leader Asserts China’s Growing Role on Global Stag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2014;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1201/c01china/en-us/>[↑](#)

（註450）從已知資料看來，早期冠以「大戰略」名稱的相關研究成果包括：王家福，《國際大戰略》（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蔡賢偉，《中國大戰略》（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其後重要論述包括：蔡賢偉，《中國大戰略》（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張春與時殷弘，「大戰略：理論與實例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七期（一九九九），頁七一至七五；郭樹永，「廿一世紀前葉中國外交大戰略芻議」，《太平洋學報》，第二期（一九九九），頁九一至九六；葉自成，「中國實施大國外交戰略勢在必行」，《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一期（二〇〇〇），頁五至一〇。[↑](#)

（註451）胡鞍鋼主編，《中國大戰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三。[↑](#)

（註452）葉自成，《中國大戰略：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主要問題及戰略選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註453）時殷弘，「風物長宜放眼量：論中國應有的外交哲學和世紀性大戰略」，《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三卷第二期（二〇〇一），頁一七；《戰略問題三十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頁二三二。[↑](#)

(註454) 蔡東杰，「中共大國外交的實踐及其對台灣之影響」，
《全球政治評論》，第五期（二〇〇四），頁一至一六。[↑](#)

(註455)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xv-xvi.[↑](#)

(註456) 見《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一八。[↑](#)

(註457) 龐中英，「世界大國與正常國家：兼論再造中國的世界觀」，收於楚樹龍、耿秦編，《世界、美國和中國：新世紀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理論探索》（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三〇三。[↑](#)

(註458) 楚樹龍、金威編，《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北京：時事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頁一四六。[↑](#)

(註459) 俞正樑，「關於中國大戰略的思考」，《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五期（二〇一二），頁九五至一〇一。[↑](#)

(註460) 例如，二〇〇六年中央電視台（CCTV）推出之《大國崛起》紀錄片，不啻透露出希望借鑑西方歷史經驗以尋求自身崛起道路之意圖。至於二〇一七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華通訊社、中央電視台共同推出之《大國外交》紀錄片，則或可一窺其潛在爭霸意圖之端倪。[↑](#)

(註461) Ezra F. Vogel,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p.143.[↑](#)

(註462) 柄谷行人著，林暉鈞譯，《帝國的結構》（台北：心靈工坊，二〇一五年），頁一六〇。[↑](#)

(註463)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Franklin Classics, 2018).[↑](#)

(註464) Kenneth Allen and Eric McVadon, *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1999); Kenneth Allen, Philip C. Saunders, and John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03-2016: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Institute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17).[↑](#)

(註465) 這也是中國官方建政以來所發佈首部國防白皮書，參見《一九九八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

(註466) 或為與中國較勁，美國於二〇一七年重啟登月計畫，二〇一九年於並國家太空委員會宣布，美國太空人將於二〇二四年重返月球。俄羅斯也設定二〇三一年的登月計畫。[↑](#)

(註467) 二〇〇五年十月，中國、孟加拉、印尼、伊朗、蒙古、巴基斯坦、秘魯、泰國等國代表在北京簽署了《亞太空間合作組織公約》，二〇〇六年六月土耳其也加簽；該組織總部設在北京。其後中國繼續推動「亞太多邊合作多工小衛星」專案，並與孟加拉、伊朗、韓國、蒙古、巴基斯坦和泰國等聯合開展多邊合作。[↑](#)

(註468) 泛亞公路是聯合國亞太經濟及社會委員會（ESCAP）自一九五九年為改善亞洲公路系統所推動的跨國計畫，也是亞洲陸路交通基礎建設發展計畫（ALTID）三大工程之一，一度在一九七五年因經費問題被迫暫停，各國仍於二〇〇三年通過《泛亞公路跨政府協定》（IGA），涵蓋三十二個國家與五十五條路線，總長度

十四萬公里。至於泛亞鐵路同樣由ESCAP策劃，目的在打通歐亞大陸，預計貫通新加坡及土耳其伊斯坦堡，並延伸至歐洲及非洲。[↑](#)

(註469) 全長二千三百公里，總預算四十三億美元，將從新疆出發，抵達伊朗後分為南、西兩條線，南線直達波斯灣，西線通往土耳其和歐洲。儘管此一項目迄今未有實質進展，中歐班列已於二〇一六年經哈薩克與土庫曼，首度抵達伊朗德黑蘭。[↑](#)

(註470) 截至二〇一九年四月，中歐班列累計開行超過一萬四千列，運行線路達六十八條，從中國內地六十二個城市通往歐洲十五個國家五十一個城市。[↑](#)

(註471) 中國正計畫從日喀則延伸兩條支線通往與邊境的亞東與吉隆，與此同時，二〇一六年也開通第一條通往南亞的陸路運輸通道，先從蘭州沿鐵路至日喀則，再由日喀則沿公路經吉隆，通往尼泊爾加德滿都。[↑](#)

(註472) 以「七十七國集團 + 中國」為核心的首屆南方高峰會於二〇〇〇年十月在古巴召開，共有一百二十二位國家元首或代表參與，最後通過「最後聲明」與「行動綱領」等具體文件。二〇〇五年，第二屆南方高峰會在多哈舉辦，主題是「實現千禧年發展目標」，共有一百三十一國與會，主要審視二〇〇〇年所通過行動綱領的執行情況，以便制定未來的合作方案，但此後未再召開。[↑](#)

(註473) 根據雙邊協議，自此部長級會議每三年輪流在中國和非洲舉行，資深官員會議分別在下屆部長級會議前一年和會前召開。二〇〇六年召開第一次高峰會，幾乎所有非洲國家元首（台灣邦交國除外）都出席。[↑](#)

(註474) Joseph S. Nye, Jr., “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9, 2005;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1499/rise_of_chinas_soft_power.html[↑]

(註475)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註476) Joseph S. 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5:2 (1990), pp.177-192.[↑]

(註477)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December 2017; <https://www.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ull-Report.pdf>[↑]

(註478) 王逸舟、譚秀英主編，《中國外交六十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頁一六至二〇。[↑]

(註479) U.S.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U.S. White House, 2002), p.30.[↑]

(註480)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 *International Finance*, 10:3 (2007), pp.215–239.[↑]

(註481) Fred Bergsta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97:4 (2008), 57-69.[↑]

(註482) 羅斯克蘭斯 (Richard Rosecrance)、顧國良編，《力量與克制：中美關係的共同願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一〇年)，頁二〇〇。近年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提出之「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概念也不啻反映了類似想法。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註483) 王緝思，「中美關係：尋求穩定的新框架」，收於王緝思總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中國外交卷》(香港：和平圖書公司，二〇〇六年)，頁三一三。[↑]

(註484)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50-251.[↑]

(註485) 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China Quarterly*, 14 (1995), pp.316-317; Edward Friedman, “Chinese Nationalism, Taiwan Autonomy, and the Prospects of a Large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6:14 (1997), pp.5-32; Erica Strecher Downs and Phillip C. Saunders, “Legitimacy a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3 (1999), pp.114-146.[↑]

(註486) 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1), pp.111-158, 279-312.[↑]

(註487) Robert S. Ross, “Navigating the Taiwan Strait: Deterrence, Escalation Dominance, and U.S.-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2 (2002), pp.48-85;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2 (2009), pp.46-81.[↑]

(註488) 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Foreign Affairs*, 90:2 (2011), pp.80-91;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註489) Gang Deng, *Chinese Maritime Activitie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2100 B.C.-1900 A.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7).[↑](#)

(註490) Ian Storey, “China as a Global Maritime Power: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Andrew Forbes, ed., *Australia and its Maritime Interests: At Home and in the Region* (Canberra: RAN Seapower Centre, 2008), p.109.[↑](#)

(註491)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未來：重返朝貢體系？

從中國綜合國力持續上升，傳統西方大國繼續身陷金融海嘯餘波與地緣政治困局，國際情勢則充滿各種潛在之不確定變數看來，利用當前國際結構「缺口」以落實其「走出去」戰略，並以週邊（亞洲）為首要階梯，應該仍是未來中國外交政策的思想指導原則；無論如何，外交畢竟至少是場「雙人舞」（pas de deux），這意謂著在瞭解中國的可能作為之外，其他重要行為者（尤其是美國）的想法同樣不可忽視。當然，由於本書目的在理解中國，因此最終還是暫時將焦點集中在中國的可能性身上。

當代帝國研究與中國崛起

由哈德（Michael Hardt）與納格里（Antonio Negri）共同寫作，在二〇〇〇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行的《帝國》一書，[（註492）](#)可稱世紀初最轟動的文壇盛事，儘管從非主流視角出發，且邏輯演繹未必清晰易懂，不僅迅速被翻譯成二十種語言以上版本，熱捧之讀者圈更橫跨了左、右兩派。至於映入眼簾之全書第一句話，「帝國正在我們的眼前成形」，非但極其吸睛，更值得深思。他們從殖民解體、主權式微與全球化浪潮等角度出發，尤其面對蘇聯瓦解與冷戰告終帶來之新局面，指出「我們正見證著一種無可抗拒與無法逆轉之經濟與文化交換的全球化」，然後，由此注視著一個在新帝國邏輯與治理下的全球新秩序；其中，「關於帝國，首先取決於一個單純的事實，亦即世界秩序是存在的」，根據此一邏輯，帝國乃是「實際規範目前全球交換的政治主體，也是統治這個世界之至高無上的力量」。

顯然，兩人所述之「帝國」並不同於傳統定義。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小布希同年底當選總統，在華府新保守主義者簇擁下，美國決心緊握自己的又一次「天命契機」（manifest destiny），以二〇〇一年阿富汗戰爭與二〇〇三年伊拉克戰爭做為開端，邁步由霸權走向傳統帝國之路。此舉不但引發國際輿論鞭撻反彈，尤其隨著中東戰事陷入泥淖，哈德與納格里再度於二〇〇四年出版《帝國時代的戰爭與民主》一書指出，[（註493）](#)儘管美國的全球反恐似乎證明「老式帝國路徑」依舊陰魂不散，但其失利亦正足以說明，當前世界確實需要另一種新的帝國治理形式。更甚者，前述無論學術或政治圈的爭辯都再再顯示，至少在西方，「帝國」並非一個必須避諱之負面價值名詞，而是面對並思索未來「世界秩序」之不確定時，難以達成又無可迴避的選項之一。

那麼，當前帝國研究跟中國又有何關聯呢？

隨著新世紀初美國單邊主義攪動著世界情勢，愈發明顯之「中國崛起」態勢亦持續引發各界關注。在二〇〇七年源自美國的次級房貸危機，翌年擴大蔓延成為全球金融海嘯之際，北京在二〇〇八年主辦了史上首次在中國舉行的奧運會，隔年，中國連同俄羅斯、巴西和印度召開了第一次「金磚國家高峰會」，至於在前述金融海嘯於二〇一〇年登陸歐洲並引爆主權債務危機時，上海則迎來了中國史上首度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三年後，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引起全球關注與議論，作為其主要支撐，二〇一六年正式開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儘管迄今表現有限，累積加入的成員國數量在二〇一九年四月來到九十七個，[（註494）](#)已超過聯合國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半數以上，就在此刻，美國川普政府對中國發起之「貿易戰」也如火如荼展開。

面對一連串影響後冷戰時期世界秩序內涵之重大變化，我在二〇〇八年完成《當代中國外交政策》一書（二〇一一與一四年兩度修訂

再版），內容雖接近教科書性質，仍試圖聚焦於一九九〇年代以來中國對外關係與政策之發展歷程，目的在追索未來「中國崛起」之各種政策可能性。於此同時，隨著學術界對於中國外交之關切，逐漸從解讀現狀走向回首其傳統歷程，個人也嘗試從類似角度整理完成本書初稿，並於二〇一三年付梓；由於研究視野集中於對中國外交作為之關注，最初的書名定為《中國外交戰略：傳統及其變遷》。只不過，挖掘與思索愈深，愈覺得必須進一步放開歷史視野，何況由當前理論主流角度來理解中國過往，方法上亦或許未必理性適切。

如同國際法中的「時際法」（inter-temporal law）概念；此概念首次出現在一九二八年的帕爾瑪斯島仲裁案（Island of Palmas Arbitration）中，負責裁決的瑞士公法學家胡伯（M. Max Huber）特別指出：「一個法律事實必須按照與之同時的法律，而非按照該事實發生爭端時或解決該爭端時的法律予以判斷」。換言之，由於人類世界之發展並非線性歷程，無論法律制度與思想觀念，顯然都存在「與時俱進」或「因時制宜」之變動特徵，因此，不管想追尋真實或解決紛爭，或都應回到當下才能客觀理解。

沒錯，「客觀」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難的一件事情。例如，日本中國史學家內藤湖南雖曾如下指出，「支那這個國家，……只要與外國的戰爭戰敗了，總是不時地興起種族的觀念，……等到自己強盛了，就如同船過水無痕忘得一乾二淨，立刻又回到中國就代表天下的思維模式」；[（註495）](#)這段話說得也對也不對，事實上，如同本書前述，選擇種族主義或世界主義，本即因應環境並考量自身需求下的理性政策選擇，據此則「就如同船過水無痕忘得一乾二淨」的說法不啻充滿了主觀暗示，倘使刪去此句，則整段論述豈非客觀中肯多了？

中國之特徵，首先便在於它擁有悠久的歷史，這也是瞭解它的前提。其次，在其漫長的歷史進程當中，在多數情況下，不同於當前現代國家富有外向競爭性，儘管絕對談不上消極保守，如同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所言，「在中國文化中最顯著的一項特徵，或許就是政治秩序被視為中心，份量極重」，[\(註496\)](#)這也正是本書一再接再釐的「內政優先」原則。由於常態性存在之治理效能挑戰，加上無論朝代或帝國規模提供之相對優勢保障，結果既使其統治者傾向花費多數心力去著眼內政問題，印證蔣廷黻所謂「中國舊有之正史，皆無邦交志一門」說法之背景，在此一情況下，暫且不論時代與環境差異，想釐清中國傳統對外戰略確實不易。

進言之，趙汀陽所謂「天下理論最重要的創意，就在於它的世界概念及世界制度地先驅理念」，[\(註497\)](#)雖或不無溢美之詞，從「世界 - 帝國」而非現代主流「主權國家 - 世界」角度，來觀察中國特定時期之內外部關係，仍舊具啟發性，這也是時隔五年後，重新改寫本書之主要著力處。換句話說，本書主旨已不再單純聚焦中國的對外戰略與行為，而在於理解中國如何「自視」並「自處」於世界，其傳統思索（天下觀）為何又是否尚存，未來又可能如何面對並影響世界秩序之治理問題等。

無論如何，現在談中國的「未來」，或許還是早了一點。

中國之帝國未來與可能範式

關於中國「未來」是否可能稱霸世界的問題，早已喧嚷不休，值得注意的是，大家的觀點絕非完全樂觀一致，例如藍普頓 (David Lampton) 認為，「中國不是一個擁有超級能力的大國，即使目前的正向發展態勢持續下去，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不會成為超強；由於中國的每一層面力量都呈現出其優點與缺陷，因此對中國的最精確定義，應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註498\)](#)又如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雖然試圖指出，「中國正在走向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的路上，目的在建立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註499\)](#)但

也認為此種想法未必成為最終結局。當然，從正面角度肯定中國崛起的眼光也不在少數，至於他們對未來可能之新世界之想像，則往往以傳統朝貢體系作為藍圖。

在此，本書雖然不擬涉入「可能」或「不可能」之選項爭辯，以下幾個觀點仍然期盼與各位有興趣者商榷。

首先，如同本書在前面篇幅中的論述，所謂朝貢體系其實是一種「既存在又未必存在」的東西，進言之，它「或許客觀上存在，卻未必存在於主觀當中」，至少到第三帝國結束為止，對於所謂朝貢體系幾乎沒有任何中國本土性自我闡述。但反過來說，即便中國主觀上不存在操作此種體系之戰略設想，畢竟其客觀運行乃歷史事實，由此累積之歷史記憶很難不影響中國與周邊國家對彼此互動的想像。

隨著中國「再度崛起」，近年來亞洲各國在經濟、外交與軍事方面與中國愈來愈接近，中國亦確實有愈來愈自然往區域霸權地位靠近的跡象，[\(註500\)](#)多數認為，中國至少將無疑成為亞洲經濟成長驅動機，並形塑以其為中心的區域經濟網路。對東亞周邊各國而言，源自前述記憶而來之擔憂的無疑是某種「無可避免的階層性秩序」，[\(註501\)](#)亦即中國是否將根據其自身文明特質與傳統慣例來重塑區域規範及其內涵。儘管如此，東亞國家迄今似乎大致上選擇了「接受」而非「制衡」其崛起的政策，對此，康燦雄（David C. Kang）認為，這或許來自夾雜傳統認同與缺乏恐懼心理所致（台灣或許是唯一恐懼中國動武的區域行為者）；就利益而言，強權崛起其實同時意味著機會與威脅，中國有長期擔任區域霸權的經驗，但東亞國家多半視其為「善霸」（benign hegemony），因為從朝貢歷史看來，中國從未對體系內成員施加絕對控制，只要中國穩定，區域秩序也就跟著穩定。[\(註502\)](#)雅克（Martin Jacques）也指出，自從冷戰結束與中國崛起後，西方經常無法準確預測東亞國家關係發展，這顯示了此地區的特殊性，「過去朝貢體系的一項基本特色，

便在於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巨大不平等，正是此不平等讓體系得以長久穩定，目前則以日漸強大的中國作為核心之新東亞正在成形中，應該也會相對穩定」。[\(註503\)](#)

至於中國崛起將如何影響未來世界秩序的問題，雖為時尚早，變數也還非常多，如果真有那麼一天（what if）到來，其前提必須考慮主觀意願、地理範圍、互動模式等三點。首先，主觀意願在理論上似乎應不成問題，無論東、西方歷史，「野心」往往與客觀能力成正比，只要存在相對能量優勢，自然會產生外溢效應。值得注意的是，在「內政優先」的前提下，即便在三大帝國時期，中國的「被動帝國」絕不容忽視；如同中西輝政所指出，中華世界特有的「緩慢移行之秩序形成」之本質，[\(註504\)](#)確實形象化地描述了中國的帝國戰略特徵。

比較重要的是地理範圍問題。隨著歐洲地理發現帶來以「全球化」為範圍之世界擴張結果，至今還沒有任何「帝國」能對此一環境提供穩定秩序；以帶領兩次世界大戰勝利登上「霸權」寶座，離帝國或僅一步之遙的美國，新保守派雖在世紀初試圖走完最後一哩路，最終仍以失敗收場，由此，目前中國無論總體能量或提供公共財經歷都遠不能與美國相比，想在全球範圍內提供世界秩序的機會並不大，除非爆發突如其來的全球性災難。儘管如此，如同過去帝國興衰與世界分合的歷史，雖然很難預見，全球化無論「邏輯」或「經驗」上都非不可逆的（羅馬地中海世界與蒙古歐亞世界之崩解，便是明顯例證），一旦全球重返「複數世界」格局，中國仍可能在其中一個世界（東亞）完成重建帝國與提供秩序之目標。

最後，在可能的互動規範方面，中國是否可能如白邦瑞所言，最終「建立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嗎？其主要不同處又可能為何？

雅克認為，「一旦中國超越西方，無疑將逐漸導致全球種族階層的重新排序；作為領導全球的強權，且基於其種族與文化傳統態

度，中國將保持著很強的階層觀點看待世界，並將自身置於階梯頂端的地位」，由於階層性本即帝國特徵，此當無庸置疑。至於在與帝國範圍內次級單位互動方面，如同過往，經濟能量將依舊是中國得以透過分享來交換忠誠度之主要籌碼，因此或將重現朝貢特徵，不過，若考慮到資本主義體系對國家發展之影響，未來浮現的或接近「美國式布萊頓體系」，亦即帝國核心非僅僅外溢經濟能量，更進一步強化秩序管理者角色。在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內政優先」主軸持續不變的影響下，如同安德森（Eric Anderson）認為，中國雖正在復興所謂「中央王國」，但它不會是個帝國主義國家，也不會排外，可能重現的朝貢體系將是「一個鬆散的國家同盟，有著獲得廣泛承認的單一權力中心」。[（註505）](#)

其實，前述各種見解雖不無創意，依舊沒有脫離當前「主權國家 - 世界」框架，由此得出之結論也不過是另一種「共同體」罷了；若回到中國傳統，從「世界 - 帝國」角度視之，則從家國同構衍生出來的「天下 - 家」概念，應可提供不同的想像空間。換言之，不同於當前努力「求同」的整合運動與共同體目標，更重視「存異」之差異政治既是傳統帝國之特徵，未來或也不無例外。

總而言之，若沒有意外（雖然歷史中總充斥著意外）的話，其實，對於中國即將崛起為霸權乃至所謂帝國，大體上仍屬一種料敵從寬式的「早熟議論」，畢竟其綜合國力與現實作為甚至連霸權還夠不上，不過，作為某種思想熱身，重回其過去歷史並藉此探尋某種未來潛在性，仍具有積極之思考意義。

（註492）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註493）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註494) 根據中國官方說法，截至二〇一九年四月，中國已經與一百三十一個國家和三十個國際組織，簽署了一百八十七份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

(註495) 見《內藤湖南全集：第五卷》（東京：筑摩書房，一九六九年），頁二三九至二四〇。[↑](#)

(註496) Benjamin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4.[↑](#)

(註497)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頁七二。[↑](#)

(註498) David 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註499)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2016), p.214.[↑](#)

(註500)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3 (2004/05), pp.64-99; Brantley Womack,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symmetry, Leadership and Normalcy," *Pacific Affairs*, 76:4 (2003/04), p.526; Paul H.B. Godwin, "China as Regional Hegemon?" in Jim Rolfe, e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Transition* (Honolulu, Hawaii: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4), pp.81-101.[↑](#)

(註501) Martin Stuart-Fox, 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ribute, Trade and Influence (Crows Nest, NSW: Allen & Unwin, 2003), p.6.[↑](#)

(註502)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4 & 41.[↑](#)

(註503)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2), Chapter 10.[↑](#)

(註504) 中西輝政，《中國霸權的理論與現實》（台北：廣場出版，二〇一六年），頁五九。[↑](#)

(註505) Eric Anderson, China Restored: The Middle Kingdom Looks to 2020 and Beyond (New York: Praeger, 2010).[↑](#)

中華帝國：傳統天下觀与當代世界秩序

作者：蔡東杰

出版者：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9789869750936

電子書製作日期：2023年4月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